主编　阎纯德　吴志良

Sinological History Series
列国汉学史书系

中国文学俄罗斯传播史

李明滨　著

學苑出版社

北京语言大学
列国汉学史书系
Sinological History Series

中国文学俄罗斯传播史

李明滨 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俄罗斯传播史/李明滨著．—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12
（列国汉学史书系/阎纯德，吴志良主编）
ISBN 978-7-5077-3726-4

Ⅰ．①中… Ⅱ．①李… Ⅲ．①文学－文化交流－文化史－中国、俄罗斯 Ⅳ．①I209②I5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8689号

责任编辑：杨　雷
封面设计：徐道会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　67678944　67601101（邮购）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 厂：河北金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710×1000　1/16
印　　张：23.25
印　　数：1500册
版　　次：2011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5.00元

本书系之出版获澳门霍英东基金会与澳门基金会资助

北京语言大学列国汉学史书系
编辑委员会

顾　问：季羡林　李学勤　汤一介　王路江
主　任：崔希亮
副主任：韩经太
主　编：阎纯德　吴志良
编　委：王晓平　乐黛云　安平秋　许光华　刘顺利
吴志良　张国刚　严绍璗　李明滨　李海绩
陈开科　周发祥　侯且岸　柴剑虹　钱林森
耿　昇　阎纯德　阎国栋　熊文华

总序一

经过近30年多位学者的辛劳努力，现在我们可以说，国际汉学研究确实已经成长为一门具有特色的学科了。

“汉学”一词本义是对中国语言、历史、文化等的研究，而在国内习惯上专指外国人的这种研究，所以特称“国际汉学”，也有时作“世界汉学”、“国际中国学”，以区别于中国人自己的研究。至于“国际汉学研究”，则是对国际汉学的研究。中外都有学者从事国际汉学研究，但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中国学术界的国际汉学研究。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汉学研究改变了禁区的地位，逐渐开拓和发展。其进程我想不妨划分为三个阶段：一开始仅限于对国际汉学界状况的了解和介绍，中心工作是编纂有关的工具书，这是第一个阶段。到了20世纪90年代，出现国际汉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大量翻译和评述汉学论著，应作为第二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里，学者们为深入研究国际汉学打好了基础，准备了条件。新世纪到来之后，进入全面系统地研究国际汉学的可能性应该说业已具备。

今后国际汉学研究应当如何发展，有待大家磋商讨论。以我个人的浅见，历史的研究与现实的考察应当并重。国际汉学研究不是和现实脱离的，认识国际汉学的现状，与外国汉学家交流沟通，对于我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以至于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曾经提议，编写一部中等规模的《当代国际汉学手册》，使我们的学者便于使用；如果有条件的话，还要组织出版《国际汉学年鉴》。这样，大家在接触外国汉学界时，不会感到隔膜，阅读外国汉学作品，也就更容易体味了。必须指出的是，国际汉学有着长久的历史，因此现实和历史是分不开的，不了解各国汉学的历史传统，终究无法认识汉学的现状。

我们已经有了不少国际汉学史的著作及论文。实际上，公推为中国最

早的汉学史专书，是1949年出版的莫东寅《汉学发达史》，尽管是通史体裁，也包含了分国的篇章。这本书最近已有经过校勘的新版，大家容易看到，尽管只是概述性的，却使读者能够看到各国汉学互相间的关系。由此可见，有组织、有系统地考察各国汉学的演进和成果，将之放在国际汉学整体的背景中来考察，实在是更为理想的。

这正是我在这里向大家推荐阎纯德教授、吴志良博士主编的这套“列国汉学史书系”的原因。

阎纯德教授在北京语言大学主持汉学研究所工作多年，是我在这方面的同行和老友，曾给我以许多帮助。他为推进国际汉学研究，可谓不遗余力，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是学术界周知的。在他的引导之下，《中国文化研究》季刊成为这一学科的园地，随之又主编了《汉学研究》，列为《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其锲而不舍的精神，我一直敬服无地。特别要说的是，阎纯德教授这几年为了编著这套“列国汉学史书系”所投入的心血精力，可称出人意想。

在《汉学研究》第八集的《卷前絮语》中，阎纯德教授慨叹：“《汉学研究》很像同人刊物，究其原因是因为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学者太少，尤其是专门的研究者更是少之又少，所以每一集多是读者相熟的面孔。”现在看“列国汉学史书系”，作者已形成不小的专业队伍，这是学科进步的表现，更不必说这套书涉及的范围比以前大为扩充了。希望“列国汉学史书系”的问世成为国际汉学研究这个学科在新世纪蓬勃发展的一个界标，让我们在此对阎纯德教授、这套书的各位作者，还有出版社各位所做出的劳绩表示感谢。

李学勤

2007年4月8日

于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

总序二

汉学历史和学术形态

历史是既抽象又具体的存在，是浩瀚无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历史会让我们兴奋，也会使我们悲哀，有时会令人觉得它又仿佛是一个梦。但是，当我们梦醒而理智的时候，便会发现——自然史、时间史、太阳史、地球史、人类社会史，一切的一切，不管是曾经存在过的恐龙，还是至今还在生生不息的蚂蚁社群，天上的，地下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一切都有自己的历史。一切都有过发生，一切都还在发展，一切都还会灭亡。

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有一个有形或无形的孕育过程，“汉学”（Sinology）也是这样，其孕育和成长，就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相互交媾浸淫的历史。这个历史，始于公元1世纪前后汉代所开通的丝绸之路，接下来是7—8世纪的大唐帝国、14—15世纪的明代、清末的鸦片战争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这种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之潮时起时伏直到今天。这是历史，是汉学的昨天和今天，孕育、发生和成长的过程显现出的文化精神。但是，昨天有远有近，我们可以循蛛丝马迹探讨，找回其真；而今天，只是一个过渡，一俟走过，便成为昨天的陈迹。写作汉学史是一件艰难的劳作，尤其对象是遥远的昨天，尤其是“遗失”在异国他乡的昨天，更非一件易事。时至今日，朦胧面纱下的汉学还不为一些学人所认识，因此有必要取下面纱，让人们看个究竟。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尤其90年代以降，“汉学”（Sinology）便逐渐成为学术界耳熟能详的学术名词。中国大陆重提“汉学”（Sinology）至今，汉学就像隐藏在深山里的小溪，经过30年的艰辛跋涉之后，才终于形成一条奔腾的水流，并成为中国文化水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个变化是时代和历史变迁带来的结果，也是文化自己发展的规律。

那么，究竟什么是汉学（Sinology）呢？首先，这里的汉学非指汉代研究经学注重名物、训诂——后世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的“汉学”，而是指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语言、哲学、文学、艺术、宗教、考古及社会、经济、法律、科技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那种学问，这起码已是200多年来世界上的习惯学术称谓。李学勤教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汉学’，英语是Sinology，意思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汉学’一词主要是指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等的研究。有的学者主张把它改译为‘中国学’，不过‘汉学’沿用已久，在国外普遍流行，谈外国人这方面的研究，用‘汉学’比较方便。”① Sinology一词来自外国，它不是汉代的“汉”，也不是汉族的“汉”，不指一代一族，其词根sino源于秦朝的“秦”（Sin），所指是中国。

在历史长河里，汉学由胚胎逐渐发育成长。虽然在1814年12月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才有第一个被称为西方汉学起点的汉学讲座；但指代汉学的“Sinologie”（英文“Sinology”）一词则出现在18世纪末，早于由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emusat）主持第一个汉学讲座的时间，更不会晚于1838年。从此之后，“Sinology”便成为主导汉学世界的图腾，约定俗成的学术“域名”。在世界文化史和汉学史上，外国人把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汉学”，研究中国学问的造诣深厚的学者称为“汉学家”。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必要标新立异，根据西方大部分汉学家的习惯看法，“Sinology”发展到如今，这一历史已久的学术概念有着最广阔的内涵，绝不是什么“汉族文化之学”，更不是什么汉代独有的“汉学”，它涵盖中国的一切学问，既有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也包含“敦煌学”、“满学”、“西夏学”、“突厥学”以及“藏学”和“蒙古学”等领域。但是一直以来人们对汉学的理解和解释相左，因此便有了“中国学”、“海外汉学”、“海外中国学”、“域外汉学”、“国际汉学”、“世界汉学”等不同的叫法；如果咬文嚼字，推演下来，一定还会有“国内汉学”、“国内中国学”，甚至“北京汉学”、“河南汉学”等。由于汉学的发展、演进，以法国为首的“传统汉学”和以美国为首的“现代汉学”，到了20世纪中叶之后，研究内容、理念和方法，已经出现相互兼容并包状态，就是说Sinology可以准确地包含Chinese Studies的内容和理念；

① 李学勤《国际汉学漫步·序》，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从历史上看，尽管 Sinology 和 Chinese Studies 所负载的传统和内容有所不同，但现在却可以互为表达同一个学术概念了。话再说回来，对于这样一个负载着深刻而丰富的历史内涵的学术“域名”，我以为还是 Sinology 最好，因为，Sinology 不仅承继了汉学的传统，而且也容纳了 Chinese Studies 较为广阔的内容。另外，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应该称为国学，而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那种学问则称为汉学。这样，汉学既符合中国文化的学术规范，又符合世界上的历史认同与学术发展实际。

汉学的历史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交流的历史，是外国学者阅读、认识、理解、研究、诠释中国文明的结晶。汉学作为外国人认识中国及其文化的桥梁，是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撞击后派生出来的学问，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另一种形式的自然延伸。但是，汉学不是纯粹的中国文化，它与中国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既是中外文化的“混血儿”，又是可以照见“中国文化”的镜子，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Sinology’是一门在国际文化中涉及双边或多边文化关系的近代边缘性的学术，它以‘中国文化’作为研究的‘客体’，以研究者各自的‘本土文化语境’作为观察‘客体’的基点，在‘跨文化’的层面上各自表述其研究的结果，它具有‘泛比较文化研究’的性质。”① 以上两种表述虽有不同，但学理一致，基本可以厘清我们对于 Sinology（汉学）的基本学术定位。

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说过：“中国是欧洲以外仅有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自远古起，其古老的本土文化传统一直流传至今。”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也说：“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审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② 他在《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中提出：“我们选择出发，也就是选择离开，以创造远景思维的空间。人们这样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为了获得一个“外在的视点”，他才从遥远的视点出发，并借此视点去“解放”自己。这便是一个未曾断流、在世界上仅存的几种古老文化之一的中国文明的意义。中国文明是一道奔流不息的活水，活水流出

① 严绍璗《我对 Sinology 的理解和思考》，2006 年《世界汉学》第四期。

② ［法］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迂回与进入》，中国香港三联书店，1998 年。

去，以自己生命的光辉影响世界；流出的“活水”吸纳异国文化的智慧之后，形成既有中国文化的因子，又有外国文化思维的一种文化，这就是“汉学”。也就是说，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另一种文化精神的智慧加工而形成的一种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学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抑或说是一种亦中亦西、不中不西有着独立个性的文化。汉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具有跨文化性质的学科，是外国文化对中国文化借鉴的结果。汉学对外国人来说是他们的“中学”，对中国人来说又是西学，它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仍属“西学”。

汉学研究是指对外国汉学家及其对中国文化研究成果的再研究，是中国学者对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反馈，也是对外国文化借鉴的一个方面。凡是对历史或异质文化进行研究，都有一个价值判断和公正褒贬的问题。因此，对于外国汉学家对于我们中国文化的研究，必得有我们自己的判断，然后做出公正的褒贬。我们说汉学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但是这句箴言并非只是适用于中国人，对外国人也是一样。汉学也像外国的本体文化一样，对我们来说有借鉴作用，对西方来说有启迪作用——西方学者以汉学为媒介来了解中国，汲取中国文化的精华，完善自己的文明。人类由于文化背景差异和文化语境的不同，思维方向和方式也会不同，因而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讲出不同的道理。“西方学者接受近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又由于他们置身局外，在庐山以外看庐山，有些问题国内学者司空见惯，习而不察，外国学者往往探骊得珠。如语言学、民俗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诸多领域，时时迸发出耀眼的火花。”① 汉学的学术价值往往不被国人重视，并利用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一些误读贬低汉学的价值。其实，这并不公平，有些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确实有其独到的见解，能发中国人未发之音。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对中国上古文化和上古宗教的研究就有独到的贡献，被称对中国宗教研究有“先河”之功。他研究中国宗教的宗教社会学的方法，促进和推动了中国学者采用宗教社会学来研究中国宗教，被称为“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真正创始人”。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终生的最高成就是根据研究古代韵书、韵图和现代汉语方言、日朝越诸语言中汉语借词

① 季羡林《汉学研究·序》第七集，中华书局，2003年。

译音构拟汉语中古音和根据中古音和《诗经》用韵、谐声字构拟古音，写出了著名的学术专著《中国音韵学研究》、《汉语中古音与古音概要》、《古汉语字典重订本》、《中日汉字形声论》、《论汉语》、《诗经注释》、《尚书注释》和《汉朝以前文献中的假借字》等，他对汉语音韵训诂的研究是不少中国学者所不及的，并深刻影响了对于中国音韵训诂的研究。20世纪著名的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著述甚丰，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人事本位文化"，其核心是"帝王文化"，其他认识上尽管有偏颇，但也有其独异性和深刻之处。这就是"他山之石"的意义和价值。当然，不可否认，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误读或歪曲也是常见的，诸如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ohn Gunnar Andersson)于1921年10月对河南仰韶文化遗址发掘之后，便说中国彩陶制作技术源于西方，并在他的《甘肃考古记》和《黄土儿女》著作中反复强调他的这一错误观点。这一观点亦为"西方文化东移造成中国文化之说"提供了说辞。日本学者石田幹之助也推波助澜，闭门造车地推测出西方文化东渐的路线；甚至连我们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刘师培也被"忽悠"得认可了"中国文化西来说"。① 美国现代汉学(中国学)的奠基人费正清对中国历史尤其近代史的研究独具风采，为美国人民认识中国搭建了一座桥梁；但他在研究上的所谓"冲击—回应"模式，却近乎荒谬，认为是西方给中国带来了文明，是西方的侵略拯救了中国。综上所述，对于汉学成果的研究，只有冷静、公正、客观、全面，才能在沙中淘得真金，拥抱"他山之石"。

在中国，汉学的接受与命运，诚实地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之前，基本上是无视它的学术价值，更没人把它看做是中国文化的延伸。此外，由于民族心理上的历史"障碍"，我们还曾视汉学为洪水猛兽，甚至觉得它是仇视中国、侮辱中国的一个境外的文化"孽种"。这种"观点"，虽嫌偏颇，但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自19世纪"鸦片战争"前后，直至20世纪40年代，偌大的中国曾经惨遭蹂躏，整个历史写满了炮火压迫和宗教怀柔，其间也不乏为列强殖民政策服务的传教士、"旅行家"和"学者"深入中国腹地，以旅行、探险、考古之名而实行搜集社会情报、盗窃和骗取中国大批文物。

---

① 《章太炎全集·〈訄书·序〉·〈种姓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刘师培《刘申叔先生遗书·〈思念祖国〉·〈华夏篇〉·〈国土原始论〉》。

人类思想的飞翔，是受社会和历史禁锢的，山高水远的阻隔也使得人类互相寻找的岁月特别漫长。交流是人类文化选择的自然形态，汉学就发生在这种物质交流和文化交流之中。

公元前后，中国人被称为赛里斯（Seres），中国叫赛里加（Serice），这是陆路交往关于中国最初的叫法，时间较早；另一种叫法，把中国人称为秦尼（Sinai），中国叫秦（Sin），这是海路交往关于中国的叫法，时间较晚。由商人输往西方的中国丝绸绢绘是当时帝王贵族倾慕的奢侈珍品，Seres 和 Serice 两字系由阿尔泰语所转化，是希腊罗马称谓中国绢绘的 Serikon、Sericum 两字简化而来。西方人当时称中国为“秦”（Sin），称中国人为“秦尼”（Sinai），则是源于秦朝。①

人类在互相寻找的初级阶段，中国和西方试探性的商业交往还很原始，那时的人类，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族群处于相对落后和封闭的状态，人类各个角落的不同文化还处于相对不自觉或是相对蒙昧的历史时期。在人类最早的沟通中，中国人走在最前边。公元前 139 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越过葱岭，亲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乌孙、安息等地，直达地中海东岸，先后两次出使中亚各国，历时 10 多年，开创了古代和中世纪贯通欧亚非的陆路“丝绸之路”，为人类交往开创了先河，也为汉学的萌发洒下最初的雨露。

在文化史上，以孔孟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最先影响朝鲜半岛，然后才是日本和越南等周边国家。这些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复杂，甚至被说成同种同文，因此可以说它们的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公元 522 年，中国佛教渡海东传日本，从那时开始，中国典籍便大量传入日本，但这只是一种“输入”，只是日本创建自己文化的借鉴，并没有形成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研究。及至唐代，由于文化上承接了汉朝的开放潮流，那时与异质文化的交流相对更加频繁，商贸往来和文化沟通有了发展，西方和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域的人士通过陆路和水路进入中国腹地，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城市，都是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汇的重要都会，尤其是前者，更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商业文化之都；而后者，由于东南沿海经济崛起、人口增多、手工业发达、农田水利的改善，为海外贸易发展创造了

①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北平文化出版社，中华民国 38 年，第 3 页。

条件，再由于唐代中期“安史之乱”切断了陆路“丝绸之路”的缘故，曾称为“鲤城”、“温陵”、“刺桐城”的泉州，便成为联结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第一大港”，是那时以丝绸、金银、铜器、铁器、瓷器为主的国际贸易之都。通过频繁的往来和交流，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越来越多、越来越深，汉学也便在这种交流中不知不觉慢慢衍生。

但是，源远流长的汉学，人们习惯地认为其洪流和网络在西方，西方是汉学的形象代表。这一看法一是源自近代以来西方强势文化和中国人的崇洋心理；二是西方汉学的某些特征也确实有别于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的汉学。其实，如果我们从世界汉学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的汉学要早于西方的汉学，比如日本在十四五世纪已经初步形成了汉学，而那时西方的传教士还没有进入中国。因此，对于汉学的研究，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我们都不能顾此失彼，要以同样的关注和努力探讨其历史。当然，汉学的历史藏在文献里，而隐性源头却在文献之外。

文化往往伴随经济流动，其交流也会在不自觉或无意识状态下发生。到了明代初年，郑和率舰队出使西洋，前后 7 次，历经 28 年，到过 30 多个国家，最远抵达非洲东岸和红海口，真正拓展了海上“丝绸之路”。

在公元八九世纪至十六七八世纪期间，关于中国，多见于西方商人、外交使节、旅行家、探险家、传教士、文化人所写的游记、日记、札记、通信、报告之中，这些文字包含着重要的汉学资源，因此有人把这些文献称为“旅游汉学”。这些人的东来源于文艺复兴，因为思潮的开放影响了欧洲人的思想和生活，他们或通商，或传教，或猎奇，但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却是一致的，于是汉学便在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荷兰、英国、德国、俄罗斯等主要的西方国家逐步发展起来。

这类游记和著作较早的有约在公元 851 年成书的描述大唐帝国繁荣富强的阿拉伯佚名作者的《中国与印度游记》，吕布吕基斯的《远东游记》（1254），意大利的雅各·德安克纳的《光明城》，贝尔西奥的《中华王国的风俗与法律》（1554），《利玛窦中国札记》，亚历山大·德·罗德的《在中国的数次旅行》（1666），南怀仁的《中国皇帝出游西鞑靼行记》（1684），费尔南·门德斯·托平的《游记》，李明的《关于中国现状的新回忆录》（1696）和《中华帝国全志》（《中国通志》）等，以及罗明坚、金尼阁、汤若望、卫匡国

等名士的著作，还有大量名不见经传的传教士、商人、旅行家、探险家的各种记述，都成为日后汉学兴旺发达的必然因素。这类著作主要涉及中国的物质文明，较多描述、介绍中国的山川、城池、气候，以及生活起居、饮食、服饰、音乐、舞蹈，也涉及一些中国的观念文化。这些“旅游汉学”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马可·波罗纪行》(《东方见闻录》)。马可·波罗(Marco Polo)于1275年随父亲和叔父来中国，觐见过元世祖忽必烈，1295年回国后出版了这本书，它以美丽的语言和无穷的魅力翔实地记述了中国元朝的财富、人口、政治、物产、文化、社会与生活，第一次向西方细腻地展示了“唯一的文明国家”——“神秘中国”——的方方面面。

这些包罗万象的文献，不仅记录了不同时代的中国，还以自己的文化视角开始了中西文化最初的碰撞。作为文献，这些游记、日记、札记、通信和报告，有赞美，有误读，也有批评，但因为其中包含大量中国物质文化及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宗教、科举等多方面的文化记载，而成为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术史上有重要价值。

汉学的发生、发展与经济、政治、交通以及资讯分不开。有学者把汉学的历史分为“萌芽”、“初创”、“成熟”、“发展”、“繁荣”几个时期，也有的分为“游记汉学时期”、“传教士汉学时期”和“专业汉学时期”三个阶段。但汉学的真正形成是在明末兴起的“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的互动之中。

从16世纪到十八九世纪，在数以千计的散布在中国各地的传教士中，有不少人成为名载史册的汉学先驱，他们为汉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自1540年罗耀拉(S. Ignatins de Loyola)、圣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等人来华，开始了以意大利、西班牙传教士为主的第一时期的耶稣会的传教活动。接着，意大利的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罗明坚(Michel Ruggieri)等著名传教士来华。1583年，即明朝万历十一年，罗明坚将利玛窦神甫(Matteo Ricci)带到中国，从此，耶稣会士在中国的宗教活动无论是对于西方或是东方，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西班牙的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的《中华大帝国史》于1588年问世，这部世界汉学史上的第一部汉学著作，名副其实地对中国的政治、历史、地理、文字、教育、科学、军事、矿产、物产、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做了百科全书式的介绍，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以七种文字印行，风靡欧洲。以利玛窦为核心的耶稣会士的历史意义在于他们开始了对中国文化

的全面“开垦”，不仅著书立说，还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中国文化经典译成西文，不仅开西学东渐之先河，也推动了中学西传，使中国文化对西方科学与哲学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这位思想家当仁不让地被视为西方汉学的鼻祖。与其先后到达中国的著名的传教士都著书立说、传播中国文化，对推动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做出了贡献。在世界汉学史上，除了以上提及的，还有许多汉学家的名字十分响亮，诸如曾德照、柏应理、卫匡国、殷铎泽、南怀仁、汤若望、龙华民、金尼阁、罗如望、熊三拔、李明、张诚、白晋、马若瑟、宋君荣、钱德明、翟理斯、安特生、雷慕沙、儒莲、德理文、安东尼·巴赞、蒙田、冯秉正、尼·雅·比丘林、巴拉第·卡法罗夫、瓦西里耶夫、沙畹、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斯文赫定、马礼逊、斯坦因、理雅各、翟里斯、李约瑟、韦利、霍克斯、卫礼贤、福兰阁、孔拉迪、高本汉、卫三畏、费正清、戴密微、石泰安、谢和耐、欧文等。他们和东方日本、朝鲜半岛的富有建树的汉学家以及当今散布在各国的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独特理解，铸造成汉学史上的思想学术之碑，开垦了汉学成长的沃土。

“西方的汉学是由法国人创立的。”但是，在欧洲全面研究中国文明的问题上，“法国的先驱是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①] 戴密微把以上三个国家誉为汉学的先锋，“他们于16世纪末叶，为法国的汉学家开辟了道路，而法国的汉学家稍后又在汉学中取代了他们”，真正建立起作为学术的汉学传统。就传统汉学而言，法国是汉学家最多的国家之一，有许多汉学界的学术巨擘，不断为汉学的崇高而添砖加瓦。

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不仅意味着中国文化“外化”的传播，也意味着异质文化对中国文化“内化”的接受。汉学家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使者，在异质文化的交流中，也是人类和谐与进步的推动者。

汉学诞生在与异质文化碰撞、交流和相互浸淫之中。这个结果无异于一枚果子的成熟，只有“风调雨顺”才生长得好。和谐、宽容、理解与尊重，是异质文化彼此借鉴的保证。作为文化形态的汉学，其成长和生存离不开良好的国际语境。就中国而言，历史上凡是开放的时代，文化交流多，汉学就发展；反之，汉学就停滞，这似乎成为一种规律。

作为学术公器的汉学，文化上有其自己的成长过程。汉学是发展的，

---

① 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耿昇译《法国当代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这一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生存于异国他乡的文化,同样深受不同时代语境的极大影响。这里所说的语境,既包括中国的历史演变,也包括异国和世界的历史变化。也就是说,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汉学的发展方向和内容;换句话说,汉学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受制于中国历史的更迭,也受制于他者社会的变化。这就是以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汉学发展的基本轨迹。

汉学作为一种学术形态,总体上可以分为"传统汉学"和"现代汉学"。传统汉学以法国为中心,而现代汉学兴显于美国,20 世纪中期以来,在西方其他国家葆有传统汉学的同时,现代汉学也很繁荣。随着中国与世界政治关系的变化,随着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拓展,现代汉学有了显著的发展。

虽然 20 世纪的后 50 多年,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接触开始多了起来,但就整体而言,1949 年后约有 30 多年是一个相对"闭关锁国"的时期。公正地讲,这道意识形态的"长城"也并非就是中国的政策,是那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对我国全面封锁的结果。这个时期的"汉学"涂满了政治色彩,以法国为代表的汉学较多地保持着传统汉学的学术精神,而美国的"中国学"却成了充满政治意识的现代汉学的代表。美国的"中国学"所关心的不是中国文化,更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问题。这种政治特征,是那个时期美国汉学的基础,这一特征也影响了其他国家汉学的研究方向和内容。

由于中国与世界的隔离,由于西方与中国少有交流,因此汉学家不了解中国最新的文化进展(比如新的考古发现),致使汉学处于断炊或"无米之炊"的状态,没有中国文化的支持,西方汉学要想取得研究上的突破也很困难。陌生感和神秘感困扰着汉学家,这不仅是文化的尴尬,也是汉学家的难堪。

人类文化包含了物质文化和观念文化等。物质文化表现在衣食住行生活方面,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又极易变化的"具象"文化,例如饮食、服饰、住房、音乐、舞蹈等;观念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核心,表现在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家庭观、宗教观等诸多方面,以及关于自由、平等、民主的理解,观念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思维经过高度抽象后形成的思想、观念和精神,它通

过文化灵魂——哲学、文学、语言、宗教、历史等来表达。[①] 观念文化，一俟进入外国汉学家的研究视野，他们的研究也就进入了对中国文化核心的深层研究。

汉学家从对中国物质文化到观念文化的研究，其领域越来越广越来越深。现在，汉学不仅包括对中国的哲学、文学、宗教、历史领域的研究，还包括社会学、政治学和自然科学。Sinology（汉学）和 Chinese Studies（中国学），它们已经发展到可以“异名共体”的地步。

时至今日，传统汉学和现代汉学这两种汉学形态不仅同时存在着、共荣着，而且还互相浸透着。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美国汉学悄然嬗变为中国学，并以自己独有的个性特点和极强的生命力出现在世人面前。美国汉学始自 1830 年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的建立，这个学会虽然代表了欧洲那种对东方学文学的兴趣，但这个学会“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使命感”——“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为美国对东方的扩张政策服务”。[②] 这个特点也与“美国海外传教工作理事会”向中国派出基督教传教士的宗旨相一致。可见，美国汉学一开始就和美国的国际战略和对华政策联系在一起。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48 年出版的百科全书式的《中国总论：中华帝国的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活、艺术、宗教及其居民观》就带有较为浓厚的社会科学特点，与欧洲具有人文科学特征的汉学颇有差异，但它依然属于 Sinology 的范畴。

美国从南北战争后的统一中走向强大，加入强国之列。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行径，是列强联合的第一次尝试。从那时起，承担着相当“政治”角色的传教士进入中国。真正美国式的“汉学”——中国学，就从那时开始，而奠基人和开拓者是之后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作为美国首席中国问题专家的费正清，他的中国学研究不仅影响了美国，也对其他国家的汉学研究或中国学研究有强烈的影响。

在西方，费正清的魅力在于，没有谁能像他那样以更清晰、更富于洞察力的笔触来表述中国。“在使美国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传统、中国纷扰

---

① 任继愈《汉学发展前景无限》，《中华读书报》2001 年 9 月 19 日。

② 侯且岸《费正清与中国学》，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漫步》（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年。

不安的近代史，以及中国神秘莫测的现状等方面，谁的贡献也没有像他那样大。”费正清等一批知名的美国中国学家都参与过战时情报工作，在战后作为美国政府的智囊而直接为制定对华政策服务。费正清的研究虽然充满了实用和功利色彩，立场和观点也有偏见，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历史上作为一个贡献巨大的汉学家和中国人民的朋友的光辉。美国学者从事研究的根本出发点是“使命感”、“学术个性”和“反唯理智论倾向”，“蔑视学问，更为强调实用性知识”，“更为明显同自己以外的社会，即政治家、实业家及其实践家始终保持紧密的联系”。① 这就是美国中国学家的基本心态，他们讲究功利和实用，不理会学术上的理智倾向，这与法国汉学家的学术心态、学术个性与学术传统几乎大相径庭。

传统汉学（Sinology）和现代汉学（Chinese Studies）的差异在于前者是以文献研究和古典研究为中心，它们包括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而以美国为中心的现代汉学（中国学）则以现实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其兴趣根本不在那些负载着古典文化资源的“古典文献”，而重视正在演进、发展着的信息资源。但是，汉学发展到21世纪，其研究内容和方式已经出现了融通这两种形态的特点。这种状况既出现在欧洲的汉学世界，也出现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之中，可以说世界各国汉学家的研究中，都兼有以上两种汉学形态。

汉学（Sinology）对中国研究者来说，被尘封得太久，所以它的空白很多，浩如烟海的资源还有待于深入开掘。这种开掘，不仅可以收获汉学，还可以无意中发现被历史“放逐”和“遗失”在异国他乡的中国文化。编撰“列国汉学史书系”的目的和宗旨，不仅是为了梳理已有的汉学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追踪中国文化的外传历史状况、经验及影响，同时探究汉学的产生、成长、发展与繁荣，还要尽可能厘清这块“他山之石”对于中国文化的作用。当然，“列国汉学史书系”还期望对推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有所裨益。

“列国汉学史书系”作为一个文化工程，其撰写的难度非一般学术著作所能比拟。严绍璗教授谈到Sinology的研究者的学识素养时提出四个“必须”：①必须具有本国的文化素养（尤其是相关的历史、哲学素养）；

① ［美］赖肖尔《近代日本新观》，三联书店，1992年。

②必须具有特定对象国的文化素养(同样包括历史、哲学素养);③必须具有关于文化史学的基本学理素养(特别是关于"文化本体"理论的修养);④必须具有两种以上语文的素养(很好的中文素养和对象国的语文素养)。这几点确实都是汉学研究者必须具备的文化和语文素养,否则很难进入汉学研究的学术境界。

写作"列国汉学史"艰难,而出版可谓难上加难。1995 年曾经"落实"的出版经费,因故而一风吹。人间的事好像天上的云地上的风,飘忽不定没有根,铁板钉钉是没有的,因为钉子可以用"权力"拔出来,一切承诺和协议,都可以化为乌有。虽然"列国汉学史书系"的生长不断受到寒风的袭击,但它终没有自毙于摇篮之中,冬天之后是春天,接着便是收获的季节。这套富有创意和价值的书系,将对中外文化交流和汉学的发展及其比较研究产生深远影响。说到这里,"书系"编辑委员会同仁和作者,要感谢学苑出版社所给予的支持,尤其要感谢社长兼总编孟白先生和不久前病逝的总编辑助理郭强副编审,由于他们慧眼识金才使这一书系得以面世。

有人认为"汉学史中国人写不了",当然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立论"。日本人石田幹之助写了《欧人的中国研究》(1932)、莫东寅写了《汉学发达史》(1949),接下来又有严绍璗的《日本中国学史》(1991),张国刚的《德国的汉学研究》(1994),张静河的《瑞典汉学史》(1995),何寅、许光华主编的《国外汉学史》(2002),刘正的《图说汉学史》(2005)和李庆的《日本汉学史》(2005)相继面世。在人类的文化长廊里,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各种史书琳琅满目,这其中有外国人写中国的各类历史,也有中国人写外国的各类历史。历史,是往事,是记录,是选择,并有相对独立的评论和褒贬。但是,事实上任何一部历史都不是最后的历史,历史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演进,修史很难一步到位,它需要一代代学者"积跬步"才能"至千里",只有"积土成山,积水成渊",方能"风雨兴"、"蛟龙生"。学问之事非一夕之功,非得有前赴后继者敢于赴汤蹈火"流血牺牲",才会达至光明顶峰。

开拓者也许会在某个时候将自己的真诚劳作化为欢乐,因为在以后的岁月里,定会有人踏着自己的肩膀或是踩着自己的鼻子和头顶攀上高峰,以鸟瞰美丽风光。21 世纪是经济的大空间,对汉学来说也是一个"大空间"。但是,要探索这个"大空间",需要有个和谐的"太空站",需要大家联袂共建;当然世界上需要多元文化和谐相处的历史语境,共同创造彼此接

近、认识、理解、尊重、沟通、借鉴与融合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汉学研究发展的机会。

时间在行走，历史在行走。人类创造过历史，书写过历史，但是没有最后的历史。汉学有历史，而且还正在创造新的历史，汉学及其研究将以自己的品格和个性在人类文化的世界里放出异彩。

阎纯德

2006 年 12 月 5 日于北京半亩春

前　言

中国文学传入俄罗斯的历程，不但时间长，前后跨越四个世纪（18—21世纪）；而且种类多，包括各种体裁和不同样式的大小作品。为便于梳理历史，达到脉络清楚、重点突出，拟采取纵和横两个方向来分别叙写。

纵向的历史从开始传入写起，经过总体汉学的营建，到凸显文学分支学科的形成，全面造成文学研究学派，至文学翻译与研究趋向高峰的全过程，大致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为传入时期，当从18世纪上半叶算起，有案可查的是作家诺维科夫（1744—1818）主办的两家杂志（《雄蜂》和《爱说闲话的人》）和科泽尔斯基（1728—1794）主持的一本杂志，时常发表中国文章的译文。尤其刊载作家冯维辛从法文转译的《大学》，汉学家列昂季耶夫译自中文的《易经》、《大学》（1780）、《中庸》（1784）等书的选段和童蒙读物《三字经》（1779）。

具有标志意义的是1832年出现了章回小说《好逑传》的首次俄译本。同年出了两种版本，一为译自中文，登在普希金创始的文艺集刊《北国之花》（1932）。一为转译自法文的单行本。1835年，汉学家列昂季耶夫在其中篇小说《旅行者》中转述了《西厢记》的剧情。但这些文学作品的出现仅是“偶尔为之”，与比丘林所完成大批典籍的俄译相比，实在不明显。

比丘林是俄国东正教派驻北京宗教使团的领班，驻京14年，完成了大量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内容包括历史、地理、哲学、政治体制、社会律法，以及部分语言文学，后来编成12卷文集。他做的工作属于中国国情的综合调研，从而实践了俄国汉学奠基人的使命。因而可以说，第一时期，即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中叶营造的是俄罗斯汉学的总体学科。

第二时期在19世纪下半叶，作为汉学分支学科——中国文学翻译与

研究，晚至19世纪下半叶才凸显出来。其标志是这门课程在19世纪末进入高校（先是喀山大学，后为圣彼得堡大学）。此期俄国开创了两项中国文学研究的“世界第一”：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瓦西里耶夫著《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第一部中国神话专著（格奥尔吉耶夫斯基著《中国人的神话观和神话》，1892）。还有译介的若干先秦散文和古代诗歌。

瓦西里耶夫还注意到中国的“文”和欧洲的“文学”是两种不同的范畴，前者比后者包含的内容宽广；从而提出“雅文学”的概念，认为它才相当于欧洲“文学”范畴所含的诗歌、小说和戏剧。他在讲稿和著作中既全面涉及“文”，又重点介绍“雅文学”的三类体裁，甚至纳入民间口头创作和通俗文学（如“弹词”等）。可以说从总体汉学分立出文学这个分支学科，是瓦西里耶夫创始的。他本人也成为俄罗斯科学院第一位中国文学学科的院士（1886）。

中国文学在俄罗斯传播的鼎盛期在20世纪。其中尚可分为上、下两半叶，即第三、四时期。上半叶起初传播的速度缓慢，步履维艰。艰辛的历程却铸造出划时代的人物阿列克谢耶夫院士。20世纪中叶迅速走向繁荣，并延续至下半叶，向宽广和纵深发展，产生了代表人物李福清院士。他代表了当代俄罗斯中国文学研究的成就。

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从翻译古诗起步，研究古典诗学，并且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成为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先驱。在其推动下，俄罗斯汉学在近半个世纪内走上“少而精”即精致发展之路，实现了三项“两个并举”。一项为翻译与研究并举。翻译的选项都有明确的目的，而且是以调研为基础的。反过来，研究又进一步阐明翻译成果的内涵和价值，直至作家的学术地位。另一项为学校教育与“经院”研究并举。汉学以高校为基地，培养一代一代新人，达到薪火相传，阿氏本人执教近50年。他同时引入“科学院”式的研究体制。除了实用人才，还注意培养研究型的学人，借以产生有份量的研究成果和知名学者，打造成俄国汉学学派。再一项是学科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并举。阿氏本人注重从国情背景，尤其文化的总背景出发来研究文学，综合考察中国文学的特征，但学科的现实又要求文学研究分科化，即研究者个体对所研究对象实行专业化（专注于一项或几项，例如古诗专家、词专家或某个作家作品的专家）。他为文学研究的全面开拓和均衡发展准备了条件。

20世纪50年代起始的第四时期迎来了学科的全面发展，翻译和研究

事业在下半叶走向辉煌。俄国引进的中国文学作品形成了浩荡的洪流。翻译和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人才辈出,灿若星辰。在文学研究内又细分出神话、民间文学、诗歌(又分古诗和现代诗)、小说、戏剧和文学理论诸门类,而且各已产生其代表人物。为克服古文难而造就一批翻译古典诗词的名家(如帕纳秀克、艾德林、切尔卡斯基和雅罗斯拉夫采夫),而有些名诗人也加入了为文言译诗做润饰加工的工作,竟也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翻译家(如著名女诗人阿赫马托娃,以及吉托维奇、阿达里斯、斯腾堡等),这是俄国翻译界特别的景象。

李福清(俄名全称为鲍里斯·李沃维奇·里弗京)的工作涉及中国文学各个领域,且广有建树,包括翻译、调研、考证、专论和辞书撰述,形成一套有特色的治学方法,他代表了第四时期的最高成就。

由此本书设为上编,用头四章,即第一至第四章,分别叙写传播史的四个时期,是为纵向的撰述。

横向的梳理则依照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按作品作家产生的时代先后和种类分门别类书写。即依次为:神话、民间文学和俗文学;先秦文学,秦汉文学,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宋代文学,元代文学,明代文学,清代文学,现代文学以及当代文学等,各设一章,计十二章,即第五至第十六章,组成下编。

这样安排也是为了寻索资料的方便。因为中国文学历史悠久,俄罗斯对它的翻译和介绍既广泛又不平衡,所以每章书写的内容多寡也不一样。书中一般是对一个时代或一种文学门类翻译和介绍的情况先作出综述,接着才就一个专题或一部专著做专门的评述。有的朝代文学被译研的多,就占的篇幅大,如唐代文学、现代文学。而有的朝代文学被译研的少,自然就占较小的篇幅,如宋代文学等。

按纵横两个方向来写,当会出现重要作家作品被纵横交叉涉及,少不得重复若干内容,那是难免的,不过都尽量注意从不同角度切入,或许可增加考察研究的层面。

书后所附"俄罗斯汉学家简介"(约220余人),则是为了增加涵盖面,使本书内容更为宽广一些,以避免遗漏某些必须涉及的人物和作品,以及文学现象。

当然,个别内容重复的问题,还应特别说明。由于按纵横两个方面书

写，不但上编与下编有些章节会重叠（例如李福清院士，在纵向历史的第四时期和横向的神话、民间文学等专题之间），而且下编有的章节内部也会交叉（例如唐诗章的综述与专著、杜甫专题评介之间）；且因有的专题曾先期整理发表过，已自成系统，为了保留完整性，便于被寻索资料，故也不舍止。

目　录

前　言……（1）

上　篇

第一章　18—19 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 ……（3）
一、俄国引进中国文学的开端 ……（3）
二、从西欧文字转译的中国文学作品 ……（6）
三、早期直接译自汉、满文的文学作品 ……（7）
四、普希金所体现的中国文学在俄国早期的影响 ……（11）
第二章　19 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 ……（16）
一、汉学中心形成与中国文学研究 ……（16）
二、瓦西里耶夫院士撰世界首部中国文学史 ……（23）
三、托尔斯泰对中国文学的接受 ……（29）
四、诸子散文俄译的开始 ……（34）
第三章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 ……（36）
一、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全面开拓 ……（36）
二、俄国汉学学派的形成 ……（44）
三、中国文学译介在 50 年代趋向繁荣 ……（45）
四、宣传介绍中国文学概况 ……（49）
第四章　20 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 ……（56）
一、60—70 年代起文学译介的扩大与深化 ……（56）
二、莫斯科大学编出中国文学史教材 ……（59）
三、20 世纪末翻译和研究成果的归结 ……（65）
四、李福清院士在中国文学研究上的贡献 ……（66）

下 篇

第五章 中国神话、民间文学和俗文学在俄罗斯 …… (77)
一、俄罗斯的中国神话研究综述 …… (77)
二、俄国人撰写的第一部论中国神话的专著 …… (81)
三、李福清关于中国神话的论著 …… (83)
四、戈雷金娜论中国古代神话志怪小说的专著 …… (88)
五、李福清论民间文学孟姜女和三国故事 …… (90)
六、斯佩什涅夫的《中国俗文学》 …… (93)
第六章 先秦文学在俄罗斯 …… (98)
一、古代诗歌传俄综述 …… (98)
二、《诗经》的俄译和费德林的《〈诗经〉及其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 …… (102)
三、楚辞的翻译和研究 …… (106)
四、先秦诸子散文的译研 …… (107)
五、李谢维奇编选《圣贤书摘·中国古代散文》 …… (113)
第七章 秦汉文学在俄罗斯 …… (114)
一、两汉乐府、汉赋和秦汉散文的翻译 …… (114)
二、古代散文研究综述 …… (118)
三、李谢维奇关于乐府和古代文论的两部专著 …… (120)
四、克罗尔论《史记》的专著《历史学家司马迁》 …… (123)
五、《中国古代文学》论文集 …… (126)
第八章 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文学在俄罗斯 …… (128)
一、建安文学的译研 …… (128)
二、艾德林著《陶渊明和他的诗》 …… (130)
三、戈雷金娜的专著《六朝小说》 …… (133)
四、文论、散文译介和《文心雕龙》的诠释 …… (134)
第九章 隋唐五代文学在俄罗斯 …… (144)
一、唐诗俄译和研究综述 …… (144)
二、费什曼著《李白的生平与创作》 …… (155)
三、杜诗评介和谢列布里亚科夫的《杜甫评传》 …… (156)

四、杜甫研究专题综述 …… (158)
五、达格丹诺夫著《王维创作中的禅佛思想》 …… (165)
六、阿列克谢耶夫论司空图《诗品》的巨著 …… (166)
七、戈雷金娜论唐代传奇的《中国中世纪的短篇小说：
8 至 14 世纪题材渊源及其演化》…… (167)
八、杂纂和敦煌文学在俄罗斯 …… (168)
第十章　宋代文学在俄罗斯 …… (171)
一、宋代文学俄译概述 …… (171)
二、谢列布里亚科夫论宋代诗人的专著
《陆游·生平与创作》 …… (174)
三、谢列布里亚科夫论宋词的专著《中国 10 至 11 世纪的诗歌·
诗和词》 …… (175)
四、热洛霍夫采夫论话本的专著
《话本——中国中世纪的市民小说》 …… (176)
五、巴甫洛夫斯卡娅论平话与诗话 …… (177)
六、佐格拉芙的新译《京本通俗小说》 …… (178)
第十一章　元代文学在俄罗斯 …… (180)
一、元曲在俄苏的翻译和研究 …… (180)
二、索罗金论元代戏曲的专著《十三四世纪中国古典戏曲：
起源·结构·形象·情节》…… (184)
三、孟列夫翻译《西厢记》和彼得罗夫编选《元曲》 …… (188)
四、马里诺夫斯卡娅关于明清杂剧的新著
《中国古典戏剧杂剧简史(14—17 世纪)》…… (189)
五、元明清诗的俄译与论述 …… (190)
第十二章　明代文学在俄罗斯 …… (193)
一、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和研究综述 …… (193)
二、罗高寿的论著《吴承恩及其〈西游记〉》 …… (196)
三、李福清的专著《中国的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
——论〈三国〉故事的口头和书面异体》…… (198)
四、《金瓶梅》与古代艳情文学译介 …… (199)
五、戈雷金娜论明代传奇的《中国中世纪短篇小说》 …… (204)

六、明代戏曲研究概况 …… (205)
第十三章 清代文学在俄罗斯 …… (206)
一、清代章回小说研究综述 …… (206)
二、费什曼的专著《启蒙时期的中国讽刺章回小说》 …… (207)
三、谢曼诺夫的专著《中国章回小说的演变
(18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 …… (209)
四、《水浒传》、《红楼梦》、《镜花缘》、《儒林外史》、《三宝太监》、
《普明宝卷》诸种明清小说译介简述 …… (211)
五、费什曼论清代笔记小说的专著《17 至 18 世纪的三位中国
短篇小说作家:蒲松龄、纪昀、袁枚》 …… (217)
六、俄国蒲松龄研究巡礼 …… (218)
七、清代戏曲的译研 …… (226)
八、戈雷金娜的《中国美文学理论》 …… (227)
第十四章 中国现代文学在俄罗斯(一)
——苏联的鲁迅学和谢曼诺夫的鲁迅论 …… (229)
一、鲁迅著作在苏联的传播 …… (229)
二、苏联对鲁迅的研究 …… (230)
三、波兹涅耶娃、索罗金、彼得罗夫和谢曼诺夫的
四本鲁研专著 …… (232)
四、谢曼诺夫的《鲁迅和他的前驱》 …… (235)
第十五章 中国现代文学在俄罗斯(二) …… (245)
一、翻译作品综述 …… (245)
二、切尔卡斯基论现代诗歌的三本论著:《中国新诗》、《中国
战争年代的诗》和《艾青——太阳的使者》 …… (247)
三、彼得罗夫著《艾青评传》 …… (253)
四、苏霍鲁科夫的专著《闻一多生平与诗歌创作》 …… (254)
五、阿直马穆多娃著《郁达夫与“创造社”》 …… (255)
六、索罗金著《矛盾的创作道路》 …… (256)
七、施奈德著《瞿秋白的创作道路》 …… (257)
八、两部评老舍的专著——安季波夫斯基《老舍的早期创作》
和博洛京娜《老舍战争年代的创作》 …… (258)

九、尼科里斯卡娅著《曹禺创作概论》……（260）
十、其他几位作家的专论……（261）
十一、中国现代文学在俄苏时代的乌克兰……（261）
第十六章　中国当代文学在俄罗斯……（263）
一、小说、诗歌翻译作品数量剧增……（263）
二、汉学家的评论……（266）
三、作家的看法……（270）
四、当代文学跨世纪的俄译……（272）

附录　俄罗斯汉学家简介……（275）
参考书目……（331）
后记……（340）

上　篇

第一章
18—19 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

一、俄国引进中国文学的开端

中俄之间的文化交流起于 17 世纪末。文学交流则更晚，有案可查的当在 1715 年之后，即在 18 世纪初。开头由别的国家文字转译，后来才直接译自汉文。在 18、19 世纪都是单向传播，由中入俄，至 19 世纪末才有双向译介，增加了由俄入中。即由间接对话（由第三种语言转译）到直接对话的曲折过程。

彼得大帝（1672—1725）特别关注中国文化，在他之后的两位女皇——伊丽莎白（1609—1761）和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更显示出对异国文化的浓厚兴趣，分别引进了国外的文物和文化思潮，并且着意于推进中国热潮。前者在位十年，因营造中国环境、中国氛围而获得“伊丽莎白的中国格调”的称赞；后者以宣扬中国皇帝、提倡中国文明而著称。

传入俄罗斯的中国文化，不仅范围广，而且种类多，有典籍，也有实物。典籍包括各类文学作品，以及哲学、宗教、历史、法律、经济、民族、艺术等领域的种种著述；实物则包括艺术制品和珍奇古玩，从建筑、装饰，到民间年画、剪纸、日常摆设，甚至出土珍品、养生挂图等，无所不有。

关于西欧“中国热”的缘起，苏联时代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曾经做过简要论述。他说，西欧来华传教士“原以为会向这里的野蛮人表明欧洲的优越”，结果恰恰相反：

他们一来到中国，很快就不得不承认中国古老文明的力量，承认其艺

术和哲学思想的深刻。他们从各种角度对比中国和西方世界，结果表明这种对比在许多方面不利于后者……他们便以所写的东西，在本国有力地唤起了对中国艺术和哲学的迷恋……这种热潮在一百多年间深深地吸引了欧洲精神生活的所有流派。①

从18世纪初彼得大帝着手改革，推进欧化政策，把俄国人的目光引向西欧以来，加上两位女皇的推波助澜，弥漫于西欧的"中国热"潮便出现在俄罗斯的大地上。

俄罗斯的"中国热"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皇家园林和高官显贵的花园内设置中国景物；二、冬宫内各个博物馆收藏中国文物（甚至西夏文献）；三、当时的书刊里充满了有关中国的信息。最后一种情况，应该说是中国文化和文学向俄罗斯传播的重要渠道。从彼得大帝时代开始，俄国的报刊即不时登载文章，报道或介绍有关中国的历史和现状，间或也能看到汉籍俄译的单行本。据统计，俄国在18世纪曾经出版或发表汉籍俄译的书籍和论文约120种。诸如《圣彼得堡通报》、《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学报》、《东方评论》、《祖国纪事》等杂志，都是早期汉学研究的园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童蒙读物《三字经》的俄译。这本书在中国广为流传，它涉及"天人性命之微，地理山川之奇，历代帝王之统治，诸子百家著作之缘由"等内容，当然也为外国人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和道德风尚提供了捷径，因而引起了国外读者的兴趣。在18世纪至19世纪初，《三字经》就有了三种译本：

(1)首译出自来华教士罗索欣之手，1741—1751年充当彼得堡一家华文馆的教材；

(2)第二种译本名为《三字经·明贤集合刊本》，由另一位来华教士列昂季耶夫译出，1779年在圣彼得堡印行，是《三字经》在欧洲最早公开出版的西文译本；当时一家报纸评论说，这本书可以视为劝世喻人的三字箴言；

(3)第三种于1829年由圣彼得堡根茨出版社出版，它较晚出现，但影响颇大，因为译者是俄国著名的汉学家比丘林神父，而且得到了当时几家报刊（包括有名的《文学报》）的评价。

叶卡捷琳娜二世以"开明专制"为标榜，极力宣扬自己的"德政"。她

① 米·阿列克谢耶夫（1896—1981），科学院院士，研究俄国文学与欧洲文学的相互影响问题。

曾经拜法国的伏尔泰为师，并且告诉后者说，“俄国农民没有想吃鸡而吃不到的”。尽管其中的虚假昭然若揭，不过在她即位（1762—1796 年在位）之初，为表示接受启蒙思想，推行开明君主制，她还提倡文学创作，出版杂志，并且亲自动笔写作。她同法国老师伏尔泰等人通信，时常摘录北京官方的通报，谈论中国“理想的吏治”，并如此写诗称颂中国皇帝：

我可爱的，彬彬有礼的
小眼睛邻居。

甚至用法文诗描写中国皇帝的可爱：

中国皇帝，
饮酒微酣，
作起可笑的鬼脸……

可见宣扬中华文明，是她倡导启蒙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

如上所述，当时俄国之宣扬中国文明，是与引进欧洲启蒙主义思潮相结合的。但这种思想流行的结果，反倒引起人们对专制制度的不满，特别是把俄国现实同被理想化了的中国王朝相对照之后，矛盾就更加突出了。于是，有识之士就把中华文明当作揭露俄国时弊的利器，使得“中国热”产生了另外一种效果。例如，讽刺作家诺维科夫主编的两家杂志——《雄蜂》和《爱说闲话的人》——就是这样做的。在 1770 年 2 月出版的《雄蜂》第 8 期上，刊登了一篇名为《中国哲学家程子给皇帝的劝告》的译文，强调宋代理学家程颐“君志立而天下治”的思想，以讽刺俄国女皇所谓“开明政治”的许诺是“虎头蛇尾”，是“始锐而不克其终”。而在同年出版的《爱说闲话的人》第 2 期上，则刊登了另一篇名为《雍正帝传子遗诏》的译文，译者把雍正所说的“勤求治理，抚育蒸黎，大法小廉，万民乐乐”和“诘奸除暴，惩贪黜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当作理想社会，用以对照女皇属下那种“人人尔虞我诈，神父尽量欺骗百姓，仆人欺骗老爷，而大贵族总想欺骗皇上”，或者“拿吧，捞吧，不管什么，抓到手就算数”（见同期所载讽刺诗《致仆人书简》）的俄国。上述两篇文章的译者均是汉学家列昂季耶夫（他原是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成员），后来都收入其译文集《中国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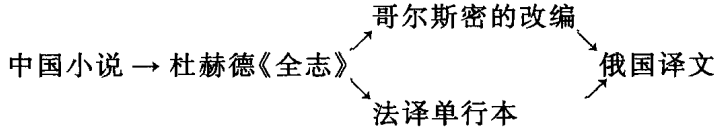
(1992 年再版)。

由俄国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是东正教,亦称正教,与天主教、新教并称为三大派别。1715 年,俄国派出了第一届宗教使团到达北京,而在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1728)以后,派遣宗教使团东来北京一事便形成了制度。每届为期 10 年,通常包括修士大司祭、修士辅司祭各一名、修士司祭两名,另外还有几名教堂辅助人员。从 1727 年起,加派留学生,每届总人数为 10 名左右。从 1820 年起,有时也派医生、教授、天文学家、圣像画师等随团驻京。

如果考察欧洲汉学,应该把俄国汉学家也计算在内。他们之中有几位学者,均以翻译文化、文学典籍的实绩而闻名于世。伊·罗索欣(1707 或 1717—1761)是俄国第一位汉学家。他作为第 2 届使团成员,于 1729 年来到北京,学习汉语、满语。1741 年回国任科学院翻译,有翻译手稿 30 部,包括文学性较强的《三字经》、《千字文》,以及《二十四孝》、《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异域录》等伦理、史地杂著。前两部曾被他用来作为汉满语学校讲课的教材。阿·列昂季耶夫(1716—1786)于 1743—1755 年留居北京。以翻译《大学》(1780)、《中庸》(1784)和《大清律》等 20 余种满汉典籍而闻名。前两种均为首次出版的俄文译本。而他与罗索欣合力译注《八旗通志》(16 卷本),更是一项重要的工程。

二、从西欧文字转译的中国文学作品[①]

除了来华的教士外,俄国学者也喜欢从西欧诸国文字,转译中国文学作品。中国古典小说曲折动人,富含寓意,较早传入俄国。1763 年,《每月著作与学术简讯》(12 月号)发表一篇中国短篇小说,名为《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即《今古奇观》第 20 回),系据英、法译文和改编而转译的。于是,这篇小说构成了如下的传播过程:



① 早期转译和直接翻译的两类作品,从篇名到内容都有大改动,有的甚至经过几种外文转译,已难于查到原作,我国也缺少此类相关的报刊。本节资料主要依据俄国汉学家李福清的考证,以及《中国书目》(莫斯科,1932、1960)。

尽管小说中的地点从中国搬到了高丽，女主人公“田氏”也改成了“韩氏”，但不难看出，故事情节与原著相吻合。1785年，这篇小说再次俄译，载于在圣彼得堡出版的一本小说集《庄子与田氏，或公然的不忠》。这篇译文，已经更接近于中国作品的原貌，“俄译者删去‘入话’，直接从正文开始。应当说这是一篇不错的译文，连夹用的诗也译了出来”，“大约仍是译自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志》（第3卷第401—416页）”。①

中国文学作为一种外国文学，有时与其他国家的文学一道在俄国流传。1788年，有一种两卷本译文集出版，全名是《译自各种外文的阿拉伯、土耳其、中国、英国、法国田园及神话小说选》。其中有一篇题为《善有善报》，即中国话本《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今古奇观》第31回），系从英译本转译的。俄译者注明，该本的英译者是一位女士，可见不是根据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的英译本，而是另一种早期的英译文。

见诸报刊的零星翻译，有些名为中国小说，实际上却很难找到原文与之对应。例如，彼得堡杂志《新闻总汇》（1775年12月）刊载的一篇《中国小说》，莫斯科《味·智·情读物》第1分册（1792年）刊载的另一篇小说《恩人与贤人，中国小说》（这两篇大概是译自法文或英文），以及《味·智·情读物》第5分册（1792年）刊载的小说《友人》（译者V. S. 已经做了说明，它译自阿诺德的一本英文书）。所有这些译文，据李福清考证，发现其中“多半仍是西方文人手笔，显系杜撰”，不是中国小说。②

三、早期直接译自汉、满文的文学作品

俄国汉学进入19世纪以后，有了新的发展，正如有的学者所说：“18世纪俄国读者见到的所谓‘中国小说’，除庄周故事及吕氏兄弟故事之外，都是西方人的创作。从19世纪初开始，偶尔出现于俄国书刊的中国小说，可以说大部分是真正的中国作品。”③俄国汉学的新发展，在19世纪上半叶即已明显地表现了出来。首先它反映在翻译领域，中国文学的俄译不仅数量有所增加，而且在转译和直接翻译P两个方面同时进行。

这个时期的翻译，仍然以小说为最多。举例来说，在1810年，《儿童之友》杂志（第11期）刊登了几篇题为《中国逸事》的译文，其中一篇是《夸妙

①②③ 参见李福清《中国文学在俄国（18—19世纪上半叶）》一文，载于《北京图书馆馆刊》1994年第1—2期。

术丹客提金》(《今古奇观》第39回)的译文,译者做了删节;在1821年,《国民教育部部刊》刊登了另一篇《中国逸事》,据称系从满文译本译出,但原题及译者均未注明;在1839年,《祖国之子》杂志又发表了11篇《中国逸事》,弗拉德金根据汉文和满文译出,其中一篇是《两县令义婚孤女》(《醒世恒言》第3回),其他几篇则为王祥卧冰、唐氏乳姑之类的二十四孝故事,和出自《烈女传》的"孟母三迁"故事。这时还有一种冠以"中国民间故事"的译作,实际上也是中国话本故事的翻译,甚至有的刊物连载中国话本小说。这些译作主要包括:

1827年:《三兄弟》(《吕大郎还金完骨肉》的第二种译文),载于《莫斯科电讯》杂志(1827年第20期)。

1828年:《真相大白的诽谤》(即《怀私怨狠仆告主》,《今古奇观》第29回),载于《俄罗斯观察》杂志)。

——以上据法国雷暮沙《中国故事》(巴黎,1827)译出

1841年:《灯塔》杂志(第17—18期,圣彼得堡)"中国小说"(即《玉娇李百年长恨》,《今古奇观》第35回),译者柯尔萨科夫。

——以上据英文杂志(1839年广州出版)的载文转译

1847年:《死后友人》(即《羊角哀舍命全交》,《今古奇观》第12回),载于《祖国纪事》杂志。

——以上据巴黎《亚洲杂志》第4卷第3期(1845)载文译出

这时还有几种章回小说译成俄文,如《金云翘传》(弗拉德金据满文抄本译出,仅存手稿,现藏于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玉娇梨》(又名《双美奇缘》)、[①]《红楼梦》第一回开篇部分[②]等。此外,文言小说《聊斋志异》也陆续介绍到了俄国,如《水莽草》、《阿宝》、《庚娘》、《毛狐》、《李娃传》等,以瓦·瓦西里耶夫翻译的最多。

而第一次直接从中文译成俄文,而且全书译出的章回小说是《好逑传》。不过译者未署姓名,也未出版,但有史料说明,译稿已于1832年全部送到了作家索莫夫的手中。1832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文集《北国之花》

---

① 这一小说的译文仅为片段,先后曾经刊出两次:第一次刊于《莫斯科通报》第10期(1827),第二次刊于《雅典娜神庙》第20期(1828)。它们都是据雷暮沙法译本(1826,巴黎)转译的。

② 载于《祖国纪事》1843年第4期。该杂志从1841年第9期至1843年第4期,连续刊登柯万科的10篇《中国旅行记》,《红楼梦》译文即附在第9篇末尾。

收入了其中的一个片段第 12 回。同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好逑传》俄译本，则是从法文转译的，而法译本是据英译本转译的。此外，1845 年作家显科夫斯基还曾以《好逑传》为蓝本，创作了一部中国体裁的小说《女中佼》，并以“中国逸事”为副题，收入了他在 1858 年出版的文集之中。

《红楼梦》是中国小说的杰作，它的俄译应该说是俄国汉学界的大事。其第一位译者是阿·柯万科（1808—1870，笔名“德明”，矿业工程师），以 10 篇《中国纪行》而闻名于世。他曾经谈到他重视《红楼梦》一书的原因，原来他来华时——

> 需要尽快学会口语，但又无法常同中国人接触。为了学习汉语，我开始读《红楼梦》。这本书是用地道的口语写成的，因此正合我意。

此外他还指出，小说作品具有更大的意义：“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喜庆节日、婚丧嫁娶、消遣娱乐以及官吏宦官的舞弊，奴婢的机诈……这一切书中都有惟妙惟肖的描述”，“如果把这本书译成俄文，那么那些想了解中国人习俗或学习汉语的人将受益匪浅”。①

在小说之外，中国戏剧、诗歌和散文这时也有翻译和介绍。1829 年，《雅典娜神庙》（6 月第 11 期）发表短文《秀才之女雪恨记》，首次介绍了《窦娥冤》的剧情和《元夜留鞋记》的故事梗概。在 1839 年发表的《樊素，或善骗的使女》（载《读书丛刊》第 35 卷）是中国剧本的首次俄译，译者巴依巴科夫注明原作者是郑德辉（郑光祖），这个剧本是《刍梅香》。1847 年，有人又转译了高则诚的《琵琶记》，在圣彼得堡出版单行本。诗文的俄译有王勃的《滕王阁序》（1824 发表）等。

其次，这个时期汉学研究基本工具书的编译和汉学教材的编纂，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著名汉学家比丘林的建树，尤为受人赞赏。

比丘林（Н. Я. Бичурин，1777—1853），原名尼·雅·比丘林斯基，法号雅金夫，中译亦作俾丘林。他曾任喀山某修道院院长、修士大司祭。1807—1821 年，他充任第 9 届使团团长常驻北京。其间他曾向沙皇政府提

---

① 转引自李福清、孟列夫《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的发现及其意义》，参见《石头记》（列藏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1 册，第 3、4 页。

供关于中国政府的情报，而为某些论者所诟病。回国后不久又以玩忽职守罪[①]被幽禁三年，并被撤销“修士大司祭”的名号。此人博学多识，精通拉丁、法、汉、满、蒙、藏多种语文，翻译了大量的中国著作，有《四书》、《三字经》、《卫藏图识》、《大清一统志》等；并撰写多种研究论著，如《中华帝国统计概要》(1842)、《中国及其居民、风俗、习惯、教育》(1840)等，还编纂《汉俄读音字典》等多部辞书。他所编的《汉语语法》，从1835年出版即在其创办于恰克图的俄国第一所汉语学校(1831年创始)使用，后又被喀山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用作教科书，一直到20世纪头十年仍在沿用。

比丘林在翻译、研究和教学方面作了全面的开拓，因此，他的出现标志着俄国汉学已趋于完备。也就是说，俄国已经有了见多识广、成果累累的汉学家，而且其成就已不限于翻译，同时扩展到了严格意义上的研究；与此同时，俄国还有了培养人才的学校、师资和教学设备。比丘林在这几个方面均有建树，自然被尊为俄国汉学的奠基人。他于1828年当选为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同普希金、克雷洛夫等著名作家建立了友谊，其著作受到别林斯基的肯定。

第三是搜购了大量中国图书。俄国获取中国图书虽然包括官方赠送、派专人来华和宗教使团购求等多种渠道，但最后一种渠道是主要的和常年进行的。比丘林长期住在北京，1821年回国时，带回图书文献和文物，重达14000磅，其中仅汉文书籍、满文书籍就有12箱之多，分别由15只骆驼驮运。而瓦西里耶夫后来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书籍简介》一文中，则不无自豪地声称，该校图书馆的满文类藏书，已“囊括了用这种文字出版和写作的全部书籍”，可见他在京期间搜集书籍，是多么的尽心尽力！岂止如此，他们的收藏往往是很珍贵的。第13届学员斯卡奇科夫后来曾再度来华，前后三次均获得了大量的珍本，因此有人说，“其收藏汉籍善本之富，为当时俄国之冠”。在他们的收藏之中，包括大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如《诗经》、《楚辞》、历代著名诗人(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等)的诗作，以及小说、戏曲作品，其中不少版本是稀有的珍本。尤为重要的是，在1832年，巴·库尔梁德采夫带回去一部《石头记》抄本，共80回。据现代学者考证，

---

① 其事见文学评论家尼基坚科1865年的一篇日记。参见蒋路《俄国文史漫笔》，东方出版社，1977年，第253页。

这是连中国都没有保存的一种抄本。[1] 该书已于1986年影印复制，由中华书局作为新的《红楼梦》抄本印行，封面题有“曹雪芹：《石头记》（列藏本）”字样。

四、普希金所体现的中国文学在俄国早期的影响

历时长久、愈演愈烈的“中国热”，给俄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普希金从小就沉浸在这种环境中，钟情于中国的事物。反过来，他又以自己的热情和行动，推动了“中国热”的蔓延。

俄国大诗人普希金（А. С. Пушкин，1799—1837），出生于圣彼得堡的一个贵族家庭，在皇村学校毕业前后，已成为著名诗人，毕生对中国怀有美好的感情。

（一）接受中国文化氛围的熏陶

幼年时代，普希金通过家庭的藏书（主要是法、英、德文著作）了解中国。少年时代在皇村学校读书时，又受到了中国气氛的熏陶。那是一所贵族子弟学校，因设立在沙皇的郊外行宫——皇村而得名。在那里，仿效中国的园林艺术，建造了小桥流水、亭台楼阁、农屋茅舍、假山湖泊，这里美丽的山光水色，给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1817），对“中国大花园”做了生动的描述：

在那迷人的田野里，
五月的清风徐徐送爽，
茂密的枝叶微微颤动，
中国的夜莺婉转歌唱。

后来，他在创作中一再写到中国，尤其在代表作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1826—1830）中，为了塑造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多余人”形象，诗人让主人公奥涅金受到东西方文化的熏染，以便显出高人一等的教养和智慧，与此同时，又赋予了他不能有所作为的性格。主人公先是去看了圣彼得堡上演的中国题材的大型芭蕾舞剧《韩姬与陶》，以至后来，他眼前几次浮现

---

① 参见孟列夫、李福清《前所未闻的〈红楼梦〉抄本》一文，载于《亚洲人民》1964年第5期。

了有关的场景："舞台上，魔鬼、恶龙、爱神还在跳跳蹦蹦，吵吵嚷嚷"，"还有那些中国人、神仙、蛇怪"，等等。后来诗人又让主人公作了有关文化的思考：

孔夫子中国的圣贤
教导我们尊重青年
为防止他们迷途
不能急着加以责难
只有他们肩负着希望
使希望……

应该指出，此系这部名诗的一段异文，仅见于诗人全集（他死后才出版）所辑录的手稿。[①] 由此可以窥见，在实际创作中，诗人的思绪不时与中国相连。

（二）向往访问中国

在《致友人》（写于1828年12月30日）一诗中，普希金明确表示了向往中国的愿望：

出发吧，我已准备好，朋友们。
不论你们想去哪里，我都将紧紧跟随，
跟着你们……
到遥远的中国长城脚下。

诗中的"朋友们"，指汉学家比丘林（亚金夫神父）等人，均系即将于1830年3月前往中国的考察团成员。诗人正是在比丘林的影响下，迷恋中国之情日渐浓烈，终于在写完这首诗的8天之后，正式向沙皇政府提出了申请：

① 戈宝权早在1959年作出的考证。见戈宝权《中外文学因缘》，北京出版社，1992年，第35页。

我现时还没有结婚,也没有担任官职,我想到法国和意大利旅行,如若不能获准,我想申请允许我随同前往中国的使团访问中国。

这份申请书是一份历史见证,极为珍贵,历来为研究家所重视。可惜他的申请未获批准,诗人未能到中国来。否则,不知他将写出多少充满激情的诗篇,来歌颂亲眼所见的中国!他的理想虽然没有实现,但他关注中国的热情并未衰减,使团出发 3 个月之后,他仍在借阅《中华帝国概览》一类的书。而且,他所编辑的《文学报》上也几次刊登比丘林等人考察中国的报道,或摘登他们写回去的信札,起了介绍中国新情况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普希金申请赴中国访问被拒绝的事,发生在他的自由受到政府限制之时,所以每当人们在批评沙皇政府加诸诗人的迫害时,总要提到这件事,从而也意外地扩大了中国在俄国的影响。

(三)热情评介《三字经》

普希金非常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他的藏书中,有关中国的图书就多达 82 种。其中有一本是由俄文译者比丘林题赠的《三字经》,颇为引人注目。书的封面上载有:《三字经》附石印中文本,亚金夫神父译自中文,圣彼得堡根次出版社 1829 年出版,题词"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惠存,译者赠"。

比丘林的译本出版后,众多书评盛赞此书的"雄浑、深刻和素朴"。尤为引人关注的是《文学报》(1830 年第 1 期)刊载的一篇未署名的书评,不断有人猜测其作者是普希金。其根据是:所评的内容既深刻又中肯,指出"《三字经》……是儿童百科全书,由宋朝末年王伯侯(按:应为王应麟)编写。他从阴阳五行、天运四季讲起,接着讲人之行为中的三纲五常……言语简练,但内容充实,用语朴素而含义深刻"。人们认为,只有关心和了解中国文化的普希金,才能写出这样的高度概括的书评。

这篇书评的作者,热情洋溢地肯定俄译本的学术水平和权威性:"亚金夫神父翻译这本书,旨在让它成为俄国人阅读从中文翻译的书籍之指南。因书中阐述了中国人的思辨,并附有欧洲人感到陌生的、会妨碍他们阅读其他中国书籍的概念和词语解释。"因而,作者对译者充满了敬意:"我们的学者,东方学家亚金夫神父比丘林找到了回答外国批评家的最好方法,他……附有该书的中文原文。这样,所有真懂和假懂中文的人,皆可将译

本和原文核对比较。”这些评价都可以说明，这位评者的身份，很像比丘林的挚友普希金。书评还指出，有些典故如不作解释，俄文读者肯定会感到难懂，所以，他转引了比丘林的详细注释，如“孟母三迁”的注文。①

（四）对华裔卡尔梅克人情有独钟

普希金死于决斗，时年仅38岁，这是他绝对没有料到的。他死前一年写的一首诗《纪念碑》（1836），恰巧成了他一生创作的总结。诗人看到其作品已经“为自己树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不过，他认为，自己之“所以永远能为人民所敬爱”，是因为曾用诗歌“歌颂自由”、“唤起人们的善心”，他仿佛能预见到身后的哀荣，他这样写到：

我的名声将传遍整个伟大的俄罗斯，
它现存的一切语言，都会讲着我的名字，
无论是骄傲的斯拉夫人的子孙，还是芬兰人，
甚至现在还是野蛮的通古斯人，和
草原上的朋友卡尔梅克人。

（戈宝权译）

细读这几行诗，有一点更耐人寻味：为什么在所列的俄国各民族中，他将卡尔梅克人亲切地称为“草原上的朋友”呢？

现今居住在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境内的卡尔梅克人，恰好是中国人的后裔，其祖先是我国西蒙古的一个部——土尔扈特部，又称厄鲁特蒙古，先游牧于塔尔巴哈台，即今内蒙额济纳河北面一带，17世纪30年代，逐渐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在萨拉托夫东南至里海之间南俄的广大草原。该部远离祖国，但联系并未中断。18世纪初（1704），有一部分人护送该部首领之侄阿拉丹珠儿，回到西藏朝拜，由康熙帝降旨，安置在今甘肃境内，后来迁至额济纳河中下游，设立土尔扈特旗，今为内蒙古自治区额济

① 后来苏联科学院院士米·阿列克谢耶夫经过考证，认为书评很可能出自普希金之手。他说，即便普希金不是该书评的直接作者，至少在公开发表前就读过这段文字，因为《文学报》第1期是普希金编辑并校阅的。100多年的研究证明，普希金与这篇书评确有关系，至少可以说，诗人参与了《三字经》的评介。见阿氏的《普希金与中国》，译文载《国外文学》1989年第3期。

纳旗。

该部仍逗留在南俄游牧的牧人，曾经受到康熙帝 1721 年派赴该地特使图理琛的慰问（图氏回国后所撰《异域录》，有详细生动的记载）。后来，大部分人也于 1770 年回国，由清政府安置在新疆。

此外，仍有一部分人留在伏尔加河下游繁衍生息。随着俄国征服伏尔加河下游阿斯特拉罕国之后，他们被归并，成为俄国的草原民族。从 18 世纪下半叶起，俄国人翻译《异域录》时，“土尔扈特”一词已译成“卡尔梅克”了。可见两个名称所指的是同一个民族。

出生于 18 世纪末的普希金，很可能了解到这段不久以前的历史。何况，他成年后被放逐到南俄，为了写作《普加乔夫史》，又亲自调查过普加乔夫起义的地区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及南俄草原，他甚至对该地区的民族都非常了解，对于归并俄国不久的卡尔梅克人之来历，不可能不知道。联想到诗人一向对中国的美好感情，会不会由于未能前来中国，而把他的感情推及在俄的华裔，才会对卡尔梅克人给予特别的注意和关切，以致诗中出现如此亲近的称呼？由此，似乎可以说，诗句“草原上的朋友卡尔梅克人”，再次证实了普希金的中国情结。

第二章
19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

一、汉学中心形成与中国文学研究

(一)喀山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汉学基地

俄国汉学除了驻北京宗教使团之外,增加了喀山大学东方系这个基地。

19世纪下半叶,即在喀山大学东方系汉语教研室(1837)、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1855)、俄国皇家地理学会(1845)、俄国皇家考古学会东方部(1851)相继设立之后,俄国汉学有了更大的发展,又出现了一批知名的汉学家,如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的作者瓦西里耶夫,第一部汉俄大辞典的编者卡法罗夫,研究中国土地所有制史的伊·扎哈罗夫(1814—1885),研究中国古代史和神话的谢·格奥尔吉耶夫斯基(1851—1893),研究中国民族学和古钱币的阿·伊凡诺夫斯基(1863—1903),翻译《论语》和《孟子》的巴·波波夫(1842—1913)以及稍后(20世纪初)出名的他们的学生辈,如翻译《韩非子》的阿·伊凡诺夫(1878—?),研究中国物质和精神文化史的屈纳(1877—1955)和研究义和团起义的阿·卢达科夫等。其中值得特别介绍的是卡法罗夫(19世纪中期)和瓦西里耶夫(19世纪中、后期)。

巴拉第·卡法罗夫(П. И. Кафаров, 1817—1878)原名彼得·伊凡诺维奇·卡法罗夫。巴拉第是法号。他曾就读于喀山教士学校和圣彼得堡神学院,于1840—1847、1850—1858和1864—1878年三次来华,共居留中国30多年。头一次是作为第十二届宗教使团成员,后两次分别为第十

三届和十五届的团长，他研究中国史、蒙古史和佛教史。主要功绩是编纂了一部两大卷的《汉俄大辞典》，死后由巴·波波夫续完，于1888年出版；同时还写了一系列论文。亚洲司曾出版第十三届《俄国驻北京宗教使团成员文集》（四卷集），这是革命前俄国出版的第一部研究中国问题的论文集。其中第四卷（1866）所收的全部是卡法罗夫的论文。

19世纪下半叶俄国汉语教学有了变化。根据尼古拉一世的命令，1855年8月27日在圣彼得堡大学成立东方系，并停止其他院校的东方语言教学。喀山大学东方系的汉语教研室办了18年之后也于当时随东方系一起并入圣彼得堡大学，由瓦西里耶夫任教研室主任。他不但讲授汉、满语，还开了中国文学、中国和满洲的历史地理等课程。从他主持制定的教学大纲看，1863—1865年，大纲均列有广博的课程，其中包括《四书》、中国的报纸、历史及文学史的著作选译以及佛教史等。

两所大学先后的教学经验证明，大学培养的汉学人才，可以在具有高等教育广博知识的基础上成为专才，是一般的汉语学校或讲习班所不及的。它们在教学的同时，还开展对中国哲学、思想、历史以及文化问题的研究，凭借人员和图书资料齐备的条件，很快就成为汉学研究中心。1855年以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便是帝俄国内唯一的培养汉语人才和汉学研究的中心。

俄国汉学在19世纪尽管有很大发展，但其进程仍然步履维艰。首先是人才缺乏，不能满足需要。除宗教使团外，国内培养的人才极少。喀山大学时期（1837—1855）由于两国交往和贸易量不大，学生毕业后就业难、薪俸低，加上汉语难学，这都使得入学人数逐年减少，毕业人数还不及入学的一半。圣彼得堡大学时期（1855年以后）招生人数也不多，1855年第一届汉满班学生仅3人，1859年招生5人，1860年招生8人（当年四个年级总计才11人），1867年招生11人，1875年招生最多，也才15人。淘汰率又高，平均每年仅有一两人人毕业。[①] 1887—1900年共有26名毕业生，还不够当时需要量的百分之一。该校东方系从创办到革命前的60余年里毕业的汉语人员还不足百名。[②] 19世纪末由于形势变化，才于1899年在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又开办了一所东方学院，主要培养行政和工商业

① 斯卡奇科夫《俄国汉学史略》，第210页。

② 《俄苏中国学手册》，第107页。

界的翻译和实用人才。该校学制四年，设有汉语，神学，英语，东方国家的历史、地理、经济、政治，还有国际法、会计、商品学等课程。它从1898至1916年共培养300余名学生和200多名军官，多少弥补了人才的不足。

其二是汉学的译作和著作出版发行困难。大量的译作手稿只好存档，或在作者身后才能出版。这都妨碍其传播。比丘林的著作《中华帝国统计概要》(1842)按广告来预订者仅有华沙的一名官员，后来也只卖出30本。他的另一本书《中国农历》只售出5本。据比丘林自己说，为出版这两本书，他亏损两千五百银卢布。①

(二)中国文学传入俄国的三种方式

首要的一种方式已如前述，即翻译中国的原著。

除了翻译作品，中国文学传入俄国的另一种方式是俄国人写的评介文字。据统计，在19世纪的18种评介文著中有不少是述评式的文章。如《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学报》从1868至1972的5年中，每年都有一篇《中国文学新闻》(北京通讯)。《东方评论》1890年第6期发表汉学家阿·伊凡诺夫斯基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东方部博物馆的讲稿《中国人的美文学：小说、章回小说和戏曲》等。这类文章虽然不长，却因是登在刊物上，无疑能造成更广的影响，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文学。俄国的一家主要杂志《祖国纪事》1843年第26期发表的随笔《中国纪行》及文中所附《红楼梦》头回片段的译文，就曾引起著名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的赞赏"②并加以评述。

在俄国人写的数量不多的评介文字中，最值得注意的是1880年问世的《中国文学史纲要》，作者是著名汉学家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1818—1900)。

在比丘林广泛译介中国的史地、民族和文化风尚，卡法罗夫编出了《汉俄大辞典》之后，开展汉语和中国文学的翻译及研究已经有了更好的基础。瓦西里耶夫便立志要系统地介绍中国文学。他应邀为东方学家柯尔什主编的《世界文学史》撰写中国文学史部分。这部分写成后与古埃及以及印度文学史合编为《世界文学史》第一卷，同时也出版单行本。瓦西里耶夫

---

① 《俄国汉学的比丘林时期》，载《远东问题》1975年第1期。

② 博格拉德、李福清《俄国汉学家德明：他的〈中国纪行〉和〈红楼梦〉部分译文》，载《亚非人民》1983年第6期，第78—87页。

能成为俄国第一个中国文学研究家决非偶然，而是同他深厚的学问和汉学修养有关。

中国文学传入俄国的再一种形式是中国的原文作品。其流传的范围虽然仅限于汉学家，但依靠他们的工作，包括当时及后代汉学家的译介和研究，却能产生很大的影响。

自从两国有了交往，俄国就注意搜集中国的图书资料。1727年瑞典人洛伦茨·郎喀受俄国政府雇用出使来中国，带回去汉、满文书籍8套82本。这成为俄国科学院图书馆的第一批中国书籍。后来该馆发展为闻名世界的汉学书库"亚洲博物馆中国部"（今为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

俄国所获中国图书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政府间互相赠送。如1845年清朝宫廷（道光时）应俄国之请求将北京雍和宫所藏佛教经典《丹珠尔经》800余册赠之。同年，俄方回赠151种俄文书籍。[①] 二是宗教使团和外交使团人员的搜购。每届使团几乎都有人受命购书，有的团员也尽其所能罗致。如瓦西里耶夫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书籍简介》文中不无自豪地谈到，该校图书馆的满文类藏书已"囊括了用这种文字出版和写作的全部书籍"。"因为在清朝首都对满文的注意已经减弱到如此程度，以至于书商认为满文书无利可图而当作汉文书的衬纸"，满文书籍极其便宜，可用低价大批购得。这为他的搜罗齐全提供了方便。在19世纪，特别是鸦片战争开始后，帝俄急需了解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和列强在华活动的情报，尤其加强对于各种图书资料的搜集。如第十三届使团学员，曾任帝俄驻天津、塔城以及中国各开放港口领事的斯卡奇科夫（孔琪庭，1821—1883）三次在华都搜集各种书籍、资料情报，"其收藏汉籍善本之富，为当时俄国之冠"，包括大量公文、日记、手稿（现均存国家图书馆）。三是高校派人专门到中国购书。如海参崴东方学院在1899年建校的当年就派出亚·格列比翁希科夫和彼·施密特教授在内的一批人到沈阳购置大量汉、满文图书。该校叶·斯帕里文教授在1910年编成出版的《东方学院中国图书编目》就展示其所藏书籍甚丰。十月革命后海参崴创办国立远东大学。东方学院随即撤销，所藏图书划归远东大学。当1939年远东大学停办时，其藏书按三路

① 戈宝权《谈中俄文字之交》，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49页。

分发。满文书及部分蒙、藏文书送交国立列宁图书馆。朝文古书送交阿拉木图市立普希金图书馆。大部分汉文书籍则在几个单位辗转运送，有一部分落入西伯利亚地区的各类翻译学校，一部分来到莫斯科，成了中国学图书馆的藏书，如今已是俄苏汉学家科研活动的重要基地，尤其是其中许多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珍本。①

在当年，俄国搜集资料的范围并不局限于图书，而是包括各类有史料价值的古文物。搜罗的地点也不限于京城等大城市，而是远至东北、西北等中国边陲地区。例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俄为了同列强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由政府扩大拨款以作为研究中国的经费，由鄂登堡（1863—1934）领头的"俄国研究中亚和东亚委员会"于1903年成立，开展了对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察，获得"由于气候特殊而保存下来的古代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摩尼文化等价值连城的稀世文物。"②鄂登堡于1909—1910和1914年两次率考察队来华活动，第一次带回去了喀什、吐鲁番和库车地区的大量考古文物，第二次到达敦煌石窟，获取千佛洞大批珍奇文物（现存圣彼得堡爱尔米塔什博物馆），后来写成大部头著作《敦煌石窟概述》。③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俄国有可能拥有大批中国的古籍文物。在今天当然是汉学家们从事研究工作的宝贵资料。

现在，这些图书文物主要集中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地保存。前者以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现名"东方文献研究所"）图书馆和爱尔米塔什博物馆为主，列宁格勒分所图书馆的藏书侧重于古代和中世纪的东方文献、手抄本、木刻本、历史文集等70多万册，包括有汉文、朝文、蒙古文、西夏文、阿拉伯文的手抄本7万多册。爱尔米塔什博物馆东方部有藏品15万件，同中国有关的是中国民间木刻画（原为阿历克谢耶夫院士所收集）、14世纪至18世纪头25年的中国瓷器、中国古钱币和敦煌文物资料等。

在莫斯科，有由1958年苏联科学院决定设立的苏联汉学史料中心——中国学图书馆。它广泛征集研究中国问题（主要是中文）的书籍3000多种13.4万件，尤其有东方学研究所（包括前海参崴东方学院）图书

---

① 李福清《中国学图书馆馆藏中国古小说》，载《中国学图书馆——苏联汉学的史料基地》，第47页，莫斯科，1983年。

② 《俄苏中国学手册》第119—120、122—123页。

③ 《俄苏中国学手册》第119—120、122—123页。

馆、帝俄驻北京宗教使团图书馆和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图书馆、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基础图书馆和阿列克谢耶夫院士个人藏书等来源，特别珍贵的有古代文献和古典作品，包括考古发掘报告、甲骨及青铜文资料、珍贵文献、古代中国诗人和作家的名著木刻本、石印本、旧式印刷本等。据说该馆所拥有的孤、珍本文籍数量在苏联占第一位，古文献数也不亚于国外一些同类的著名图书馆，最古的有公元516年的典籍。①

俄藏中国古书有《诗经》、《楚辞》的各种版本，有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以及各著名诗人诗作和剧作家的作品的各种刻本、石印本和早期铅印本。例如其中就有乾隆时期(1789)的刻本《楚辞》和光绪年间(1879)的刻本《陶渊明集》(朱墨本)。而《聊斋志异》的各种版本，从刻本《聊斋志异新评》(王士正评，广顺但明伦新评)到《绘图新编聊斋志异说唱鼓词》，种类繁多。光绪二十三年出版的《绘图新刊新聊斋》一书，在我国阿英所编的《晚清戏曲小说目》(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中甚至没有提到。

像这种在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目》和孙楷弟编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作家出版社，1957年)都未曾提到的古书还有《东周列国志》的三种版本(刻本两种、旧排字本一种)，《后列国志》刻本一种，《绘图续封神》石印本一种。

有不少章回小说同孙编书目对比，虽然书名相同，但或在绘图，或在回目，或在序、评、注方面有别，显然是不同的版本，如《绣像两汉演义》、《绘图双凤奇缘全传》、《金瓶梅》的两种旧刻本、《新说西游记》、《结水浒》、《捉鬼全传》等。有一本讲清朝兴起的《新著龙兴战绩》，桂伍樵著，奉天关东印书馆发行，10卷100回的小说，虽说是近代(中华甲寅夏季，即1914年)出版的书，但从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这段时间出版的文学作品，即便在我国也已不多见，从这个意义上说，此书当然是很难得的了。同理，还有同一时期由群强报社出版的小说《北京风流案》(又名《陈七奶奶》，作者笔名瘦郎)。②

更为难得的是苏联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的发现，③为我国已知

---

① 3·戈尔巴乔娃、H. 彼得罗夫《中国文化的古籍》(东方学研究所馆藏)，载《苏联科学院通报》1959年第9期，第90—92页。

② 李福清《中国学图书馆馆藏中国古小说》，载《中国学图书馆——苏联汉学的史料基地》，第45—84页。

③ 孟列夫、李福清《前所未闻的〈红楼梦〉抄本》，载《亚非人民》1964年第5期。

的《红楼梦》12 种抄本之外，增加了第 13 种抄本，即“苏联列宁格勒亚洲图书馆藏本”。[①] 此抄本系由 1830 年来华的第十一届宗教使团学员巴维尔·库尔梁德采夫于道光十二年(1832)回国时带去的。共 80 回，于 1964 年由苏联汉学家李福清、孟列夫在调查小说俗文学各种不同藏本时发现。收藏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已于 1986 年由中华书局影印分成六册出版。这大概是我国最早流传到俄国去的文学作品之一。

与库尔梁德采夫同届来华的学员阿·科万科谈到他们珍视《红楼梦》的缘由是很有意思的。他说：来华后“需要尽快学会口语，但又无法经常同中国人接触，为了学习汉语，我开始读《红楼梦》。这本书是用地道的口语写成的，因此正合我意”。又说，“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喜庆节日，婚丧嫁娶，消遣娱乐，官吏宦官的舞弊，奴婢的机诈……这一切书中都有惟妙惟肖的描述”，“如果把这本书译成俄文，那么那些想了解中国人习俗或希望学习汉语的人将受益匪浅”。[②] 因此他曾在 1863 年回国后以“德明”为笔名写的十篇《中国纪行》(登在 1841—1843 年的《祖国纪事》杂志上)随笔中，于第九篇随笔之后附上他译的《红楼梦》第一章前半部分。这可以说是《红楼梦》最早的俄译。

据李福清、孟列夫调查统计，在此抄本传入俄国以前，1820 年第十届宗教使团曾购去两部《红楼梦》，各为四函，分别为帝俄政府亚洲司图书馆和伊尔库茨克图书馆所藏。此外，在 1794—1807 年来过中国的卡缅斯基(后为第十届宗教使团团长)也曾带去一部萃文书屋本的《红楼梦》和另一部《红楼梦散套》，分别保存在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图书馆和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这些算是俄国图书馆中最早的《红楼梦》版本。目前在俄国图书馆中，保存有 60 多种刻本的《红楼梦》及其续集，还有以《红楼梦》为题材的作品的老版本。有十个本子是萃文书屋的稀有本子。其中有一部分就与一粟编的《红楼梦书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年)所介绍的不尽一致，是值得重视的异本。

总之，俄藏并保存至今的中国古书，不但有研究版本学的价值，而且能

---

①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第 5 页。

② 此几段引语均转自李福清、孟列夫《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的发现及其意义》，见曹雪芹《石头记》(列藏本)第 1 册，中华书局，1986 年，第 3、4 页。

够反映中国文学在俄国流传的情况，确是极珍贵的资料。

附带说明，据李福清的调查，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各图书馆的藏书中，有中国俗文学作品 150 余种，如弹词、鼓词、子弟书、大鼓书、牌子曲等，还有章回小说若干种。详情见其所著《中国文学体裁目录的补充资料》（《亚非人民》1966 年第 1 期，第 204—222 页）。当然这里并不一定都是旧俄时期所藏，其中也包括苏联时期搜集的。

二、瓦西里耶夫院士撰世界首部中国文学史

（一）首版珍本的发现

1987 年笔者在苏联作学术考察时，曾到达鞑靼自治共和国的首府喀山市，有幸在喀山大学图书馆珍本部看到一部初版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这是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①]系用十月革命以前的旧俄文字印行，大 32 开计 163 页。译成中文当有十多万字。由圣彼得堡斯塔秀列维奇印刷所 1880 年出版。封面右上角有作者瓦西里耶夫的亲笔题字："佛洛林斯基惠存　谨表敬意　作者赠"。

为寻访这本书，我有过一番很有意义的经历。那年是应莫斯科大学的邀请去访问的，当安排行程时我就提到了喀山。承东道主热情照顾，还派了外事处礼宾科长全程陪同。先去南方参观了基辅市再折返北方。由于天气的原因，飞机推迟好几个小时，本来应该晚上到达的，结果让前来迎接的喀山大学副校长科诺普廖夫教授在机场等候，一直等到将近黎明。

从机场去学校的路上，汽车走了很久。副校长对于我的来访似乎有点不解。他悄声地问我的莫大陪同：不知客人为何要来喀山，有何意图。那位年轻的陪同居然脱口而出，说道："谁晓得这位李教授打什么主意，克里米亚、南俄城市不去，偏要来喀山。"他认为喀山是个普通的北方城镇，没有景色可看。他大概忘了我懂俄语，才会如此发牢骚。我立刻向主人解释，来此地的动机之一是参访俄国汉学的发祥地喀山大学，查阅有什么珍贵的汉学史料。

我的真诚态度令主人至为感动。因为喀大自从 1855 年被撤销汉语和

① 李明滨《中国文学在俄苏》，花城出版社，1990 年，第 13、22 页。

东方语言专业，完全并入圣彼得堡大学之后，汉学中心也早已向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转移。喀大昔日的辉煌如今已风光不再。没想到一百多年之后竟有一位中国人来作汉学访古。副校长不但安排我看了校图书馆、展示了中国文学藏书，而且让我径直进了珍本部，看到已是为数不多的第一代俄国汉学家手稿和那本首版的中国文学史。

应该说这种安排也是特殊的。由于中苏交恶近20年，那时刚刚复交不久，外国人要看到属于“保密”的珍本，没有长时间的申请、审批的手续是不可能的，我那次的机遇真是幸运。

我带着如此重要的收获，回到北大就作宣传。先师王瑶教授，治中国文学史的权威学者听了介绍后也非常兴奋，毫不迟疑地赞同说：这肯定是世界第一部。[①] 过去由于信息不足，以为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是西方学者写的，其实他们是20世纪初才完成的，英国人翟里斯写的《中国文学史》出版于1901年，德国人顾威廉写的同名书出版于1905年，都比瓦西里耶夫的著作晚了20多年。

至于中国人自己写的本国文学史，出版的时间还要晚。北京大学教习黄人写的《中国文学史》（国学扶轮社，1900—1914年）和东吴大学林传甲写的《中国文学史》（武林谋新社，1910年）是最早的两本，毕竟也比瓦西里耶夫迟了二三十年。而且论体例和概括性均不如瓦著。

两年后我再度访问喀山大学，报告了考察结论。第一副校长乌斯曼诺夫教授特地设宴庆贺，要我就地写出评论文在该校学报发表，以便写入校史彰显瓦西里耶夫的功绩。乌教授是鞑靼族著名的学者，而《纲要》的作者恰好出现在鞑靼地区的首要学府，更令他激动。他举杯祝贺时讲出的一句话尤为耐人寻味：“凡是鞑靼的利益我都会竭尽全力捍卫！”

此后我曾多次重访喀山，如今，当年第一个接待我的科诺普廖夫副校长早已晋升为正校长、科学院院士。

（二）作者在俄国开创中国文学研究

俄国汉学的重要成就之一，在于造就了瓦西里耶夫等一批汉学家，而

---

① 李明滨《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纪念〈中国文学史纲要〉问世110周年》，载《文史知识》1991年第12期；《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的发现》，载《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第92页。

瓦西里耶夫的突出贡献,则在于写出了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

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В. П. Васильев, 1818—1900)出生于俄国下新城(尼日尼诺夫戈罗德),1834年入喀山大学历史-语文系东语科学习,1837年毕业留校。他学的是蒙语,但毕业时正值喀山大学校长、著名非欧几何学创始人之一的洛巴切夫斯基(1792—1856)倡议建立汉语教研室之际,他便接受任务,加修汉语。应该说洛巴切夫斯基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校长,在他的任期(1827—1846)内,喀山大学陆续开设了蒙语、汉语、满语、梵文等多种科目,给喀山大学带来了国际声誉。他还提出,在该校设立藏语和犹太语教研室,1843年甚至决定增设东方语言学院。可惜后来因政府决定把该校东语各科并入彼得堡大学而未能实现。

1839年,瓦西里耶夫教授受派遣随东正教使团前往中国,1840年到达北京,并作为学员继续学习汉语、满语、中国史地与中国文学,后来回校任教。1855年,他又随着系科合并转入彼得堡大学,任该校东方系汉语教研室主任、教授。瓦西里耶夫知识渊博,精通汉、满、蒙、梵等几种文字,甚至掌握了朝文和日文,任教50年内为俄国培养了大批汉学和东方学人才,撰写了大量书籍和文章,为推动喀山大学和整个俄国东方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瓦西里耶夫一生著述甚丰,广泛涉及中国历史、宗教、地理、文学。其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此外还有《佛教教义、历史、文献》(1857—1869)、《十至十三世纪中亚东部的历史与古迹》(1857)和《东方宗教:儒、释、道》(1893)等。他于1866年当选为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1886年晋升院士,也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俄国汉学家中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

瓦西里耶夫为从事汉学研究曾作了长期的准备。在北京留学期间,竭尽全力搜罗图书资料,每购到一种书籍,必先仔细阅读。回国时,带走汉、满、藏、蒙文书籍凡849种,2737册。他曾得意地说,凡在北京市面上能见到的满文书籍,他都已经尽数购到了。这样,他一回国便能立刻开设讲述中国国情的课程,并成了欧洲最早的系统讲授中国文学史的人。据调查,欧洲在1893年以前还没有别的高等学校开设此课。在1850年12月10日,他所讲的"序论"是《论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意义》。他指出,在俄国甚至知识界都不太了解中国,"看不到站在我们身边的巨人"。甚至痛切地说,"难道不应该为此感到惭愧吗!"正是出于这种远见,瓦西里耶夫极力

主张“把汉学研究引进教育领域”。

但是,把一生献给了汉学的瓦西里耶夫,在中国却不大为人所知,甚至在俄国也未能充分发表其科研成果。在十月革命以前,他的许多著译无法发表。例如他费尽心血译出的玄奘《西域记》,因为无人问津,只完成初稿就停笔了;印刷厂也因为没有在俄文中插排的汉字,而不能承印。它连同许多文章手稿,放在箱子里存着。

有一天,他发现箱子里已经空空如也。原来,为他做饭的老女仆,把他的手稿拿去生火炉子了。老一代汉学家的学术遭遇,于此可见一斑。

(三)主要内容简介

他在1880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原是为柯尔什和李克尔主编的《世界文学史》而写的,这一部分将和古埃及、印度文学史合为该书第一卷。

《纲要》曾单独印行。全书163页,约10万字,由斯塔秀列维奇印刷所在圣彼得堡出版。《纲要》一书依照内容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属于“引言”性质,有“几句开场白”,“中国人的语言和文字”,“古代汉语和文献问题”等3节,叙写中国文献产生的背景和条件,说明作者著述的意图。

第二部分是重点,以儒学的发展为线索,分为“儒学的第一个时期”和“儒学的第二个时期”两部分。实际上,详细评述了中国的儒、释、道学。前者极为详细地介绍了儒家学说,设有“孔夫子及其贡献”、“儒家的宗教和政治”、“三部古诗:《诗经》、《春秋》、《论语》”、“儒家伦理道德基础《孝经》”、“体现儒家精神和治国理想的《书经》”和“《孟子》”等节。紧接着,作者用“同儒学不相容的道教哲学家”和“佛教学说”这两节,分别介绍了道学和佛学。这样,论述儒释道占的篇幅最大,约为全书的二分之一。

第三部分谈论科技和美文学,有“中国人的科学发展”、“语言学、批评、古籍”、“中国人的农书、自然科学、兵书”、“中国人的诗文”和“民间文学:戏曲、小说、章回小说”等节。这一部分是该书的另一重点。对我们而言,当然介绍美文学的部分更值得重视,它占的篇幅虽然不是很长(占全书的一半弱),却对中国文学作了全面系统的评介,而且历史脉络清楚,不乏精辟的论断。

这一部分首先对文学的地位和作用做了高度和深刻的概括:“中国人对美文学的尊崇也许要远胜于我们。他们从美文学中看到了人的至善至

美，认为它不仅是人的智力的体现，而且是人的整个道德方面的体现。”

接着分别论述了诗文、戏曲和小说。

《诗经》介绍占突出地位，并大量译介《风》、《雅》、《颂》，引作例子以阐释这三类诗的内容和形式特点，并指出毛承、欧阳修、孔颖达、朱熹等人的注解有些地方值得商榷。他指出，《诗经》是一部民间诗歌集，认为，“如果有人对中国今日的民歌也加以注意，那将是很有意义的……在中国各地区，必定存在着富有地方色彩的歌谣”。他对各体诗文也逐一作了介绍，从《昭明文选》、《文苑英华》、格律诗、赋（《两都赋》、《盛京赋》）等，直到“诗体小说”（《锦上花》、《再生缘》、《来生福》），以及“小型百科全书”《三字经》、《千字文》等。瓦西里耶夫充分肯定中国古典诗歌的繁荣，他说，“倘若我们（按：指俄国人）知道并且高度评价普希金、莱蒙托夫、科里佐夫的一些短诗，那么中国人在绵绵两千年里出现的诗人，像普希金他们写的那种短诗就有成千上万……这里只需列举司马相如、杜甫、李白、苏东坡等”就够了。

《纲要》首次向俄国读者简单而系统地讲述了中国戏剧。作者指出，中国人对戏剧怀有异乎寻常的爱好，他们“酷爱戏剧，几乎每一个稍微像样一点的村庄，至少一年一度，都要请个戏班子来唱戏。目前北京总共有13座戏馆，戏班子则多达150余个。他们全靠流动演出来维持生计”。作者对中国戏曲剧场和戏曲创作产生的历史，也有相当地研究。他说：“可以设想，有科白和唱词而可以称之为戏曲的作品，从隋代起就流传于民间。官方得知民间的创造，总是为时较晚的。”中国的戏曲作品浩如烟海，他却能选择王实甫的《西厢记》作为典型。他指出，《西厢记》之所以受人重视，主要因为它语言优美。然而剧本的价值不仅在于语言，也在于关目、曲词和主题。他说：“如果撇开语言不谈，单拿情节和剧情的发展来同我国最优秀的歌剧比较……即使在全欧洲恐怕也找不出多少这样完美的剧本。”

《纲要》所论中国小说，涉及《列仙传》、《搜神记》、《太平广记》、《聊斋志异》等短篇，《水浒传》、《红楼梦》、《金瓶梅》、《品花宝鉴》、《好逑传》等长篇，以及《开辟演义》、《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论述的内容相当丰富。他特别重视《红楼梦》和《金瓶梅》，专为这两部小说编写了故事梗概，收入书中介绍。他还说明，“只有《红楼梦》和《金瓶梅》这类长篇小说……才能使我们充分了解当时的生活，戏剧则不能做到这一步，因为戏剧不能提供同样的细节”，但像“《好逑传》这类小说则很难反映中

国现实生活”。

瓦西里耶夫并未局限于介绍和评论，而是进一步探索戏曲的历史起源。他提出“戏剧是从印度传来的”、“小说由传说到中篇、由中篇到长篇的发展，其源头可能也是外来的”等看法。但是他从历史研究得出了如下的结论：“无论在戏剧还是小说领域里，中国人都不是单纯的模仿者，这是一个一贯保持着独立自主精神的民族，对一切异邦和外来的东西，她都以自己的眼光加以检验，以自己的方式加以改造，因此，戏剧和小说总是呈露出中国的精神，表达着中国人自己的世界观。”

（四）后人的评说

关于此书的内容，后代学者有所议论，如说这部书“有一些明显的不足，瓦西里耶夫不是一个文学理论家”，所以他把文学看作“是一切文章典籍的总合”；如说作者受时代的限制，他对中国文学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儒家的思想立场出发，而不是从文学创作的语言艺术角度出发等等。不过，在我们看来，作者之所以这样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受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把《论语》、《孟子》之类著作也算作文学，是有他自己的考虑。在“几句开场白”里，他解释说，既然定名为文学史，人们必定会要求作者多多介绍像古希腊、古印度人写的那种长诗，或者小说和戏曲。对此他断然表示不能同意，因为“不能把那些在一种文学中是主要而在另一种文学中却是附属的著作摆到首位”。他认为，儒学在中国占主导地位，“全部中华文明，整个广博而多样的中国文学书籍的基础是儒学”。而属于“美文学”的民间文学（包括戏曲和章回小说），由于种种原因而长期被忽视，不能登上高雅的文学殿堂，因而倒可能是附属的了，这种想法使得这本《纲要》从总体上更像是一部中国文化史或典籍史。不过，作者在介绍各种典籍时也常注意把握着文学分析的尺度，例如说到《广群芳谱》时指出，它“也许应当视为纯文艺的作品，因为其中植物学描述所占的地位不如题咏诗词重要”。

从1585年西班牙人门多萨发表《大中华帝国史》，使西方人首次全面看到这个东方大国的形象以来，尚无专门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因此瓦西里耶夫的这部著作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尽管它在内容的安排上不够均衡，但它对中国文学史的宏观概括，对诗文、戏剧和小说的具体分析，以及它按照现代体裁分类讲述的框架，均具有开拓意义。而其他国家学者撰写的

"中国文学史"则是在本世纪初才出现,如英国翟理斯的著作(1901 年出版)、德国顾维廉的著作(1905 年出版)。我国学人自己所写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出现得就更晚些,如黄人的《中国文学史》(1900—1914)、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10)。因此,可以说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学史纲要》系世界文学上划时代的著作。

三、托尔斯泰对中国文学的接受

(一)孔、孟和老子的重大影响

俄国汉学通过多种文字、多种渠道引进中国信息的局面,为不懂汉语的学界人士反倒是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他们既可以看俄文译本,又可以看其他文字的译本,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接受和消化反而更加深入,更加细致。俄国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Л. Н. Толстой, 1828—1910)对中国文学和文化实质的理解和接受,在世界上如果不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最突出的一个。他对中国文化、历史、哲学是作过深刻研究的。[①] 1891 年 11 月,彼得堡一位出版家写信询问他,世界上哪些作家和思想家对他影响最大,他回答:中国孔子和孟子的影响"很大",老子则有"巨大"的影响。[②] 1844 年 3 月 27 日,他在日记中提到:"我认为我的道德状况是因为读孔子,主要是读老子的结果。"

托尔斯泰从 19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接触孔、孟著作。1882 年 6 月,他致信文学评论家斯特拉霍夫,感谢后者给他寄去有关孔子的书。不久他便着手研读。1884 年 2 月末,他在给好友切尔特科夫的信里说:

> 我坐在家里,发着高烧,得了重感冒,第二天读孔子,很难想象,这是多么不同寻常的道德高峰。看到这一学说有时竟达到基督学说的高度,你会感到快慰。[③]

在这一年的日记中,有多处记载他研读孔子,他曾表示"应该使这一学

---

① 参阅戈宝权《托尔斯泰和中国》,载于《托尔斯泰研究论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年。

② 《托尔斯泰全集》,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28—1958,第 66 卷第 68 页(以下简称《全集》)。

③ 同上书,第 83 卷第 30 页。

说成为公共财富"(3月30日日记)。这一年,他写出了《论孔子的著作》、《论〈大学〉》等文章。他说:"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不想占有别人的东西,他们也不好战……因此,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①由此可见,孔子的著作引起了他对中国多么好的印象。

托尔斯泰还从英文转译了《大学》,其底本是英国汉学家理雅各所译的《中国经典》。理氏译著问世之时,恰好托尔斯泰对中国古代贤哲的思想发生兴趣,便不失时机地加以利用。其实在托尔斯泰之前近一个世纪,《大学》早有列昂季耶夫的译本(彼得堡,1780),不过,当时俄国汉学尚未成熟,列氏开拓性的译本未能流传。托尔斯泰只有借助英译本来了解孔子的思想。

1900年11月12日,他在日记里说:"身体很好。什么也没有写,研究孔子,感到很好。吸取精神力量。很想写出我现在所理解的《大学》、《中庸》。"②1904年,"媒介"出版社出版了布朗热所著的《孔子·生平及其学说》一书。此书由托尔斯泰编辑,书中附有《中国学说述评》一文,据云从文章的内容看,证明此文是作者以托尔斯泰的文章草稿为基础写成的。③

与此同时,托尔斯泰也研读孟子。迄今所知,孟子著作的俄译本,直到1904年才由波波夫选译出版,书名为《中国哲学家孟子》(俄译并注,附孟子传略),而在1884年4月9日的日记里,托翁早就写到:"开始研究孟子。非常重要,非常好。"④看来他所读的还是理雅各的英译本。

在1893年11月5日致切尔特科夫的信中,他又提到了中国古代的另一位贤哲墨子,他告诉友人,已"开始研读墨子",并且说"我重新阅读了老子,现在开始阅读理雅各的书中包括墨翟的一卷,我想写一本关于中国智慧的书,特别是关于人性善和人性恶问题的讨论……"⑤托尔斯泰非常欣赏墨子"兼爱"的思想,在1910年出版了他编选而由布朗热编著的《中国哲学家墨翟·论兼爱的学说》。

---

① 《托尔斯泰全集》,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28—1958,第25卷,第532页。

② 同上书,第25卷第532页。

③ 参阅任子峰《托尔斯泰与孔老学说》,载于《国外文学》1990年第1期。

④ 《托尔斯泰全集》第49卷,第80页。

⑤ 同上书,第87卷第80页。

(二)亲手选编和翻译

托尔斯泰编写了不少有关中国古代哲学的文集或资料,在1884年到1910年将近20年当中,这方面的撰著和编辑将近10种。他编选的《每日贤人语录》和《阅读园地》,"还引用了大量中国的格言、谚语,以及老子、孔子等人的箴言。他继续进行这项研究和编辑的工作,直到最后逝世时为止。"①

《道德经》是道家的重要著作,托尔斯泰在研读孔子之前,已有接触。1878年1月20日,斯特拉霍夫②写信向他介绍儒莲的法译本《道德经》。信中说:"我从儒莲的《老子所著〈道德经〉》一书援引了老子。根据某些词句,我觉得这本书是很深刻的,但是我还没有很好研究。"③托尔斯泰便阅读了这个译本,圈定了拟翻译的章节,某些章节还写了批语:"玄学极妙"、"非常好"、"好"等。

1884年是托尔斯泰对中国古代思想家"大发现"的一年,从文献资料看,他在这年里研究的不但有老子,而且有孔孟等"中国的智慧"。④ 1884年3月,他开始翻译《道德经》。3月6日和9日的日记里分别记载着"翻译老子,没有达到我想象的那种结果","……读老子,可以翻译,但无法全部翻译"。⑤ 此外,在1884年和1886年的日记中,还有多处提到老子。

应该说,从1884年起,托尔斯泰是把老子和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优秀思想的总体代表,一并来接受的,他在谈到这类话题时往往二者相提并论。这一年3月,他给切尔特科夫的信中说:"我正沉湎于中国的智慧之中。极度想告诉您和大家这些书籍给我带来的精神上的裨益。"⑥3月15日,在给后者的信中他再次申明:"我认为我良好的精神状态也是由于阅读了孔子和老子著作的缘故。"

同时他在信中首次提出,为了读者的道德修养急需划定专门的"读书范围",其中应该包括福音书、佛教典籍,罗马人马可·奥勒留和法国哲学家帕斯卡的著作,还有老子的著作。在4月10日的日记中,他又写到:"读

---

① 戈宝权《托尔斯泰和中国》。

② 斯氏当时在彼得堡公共图书馆任职,并充当托尔斯泰寻检书籍的助手。

③ 《托尔斯泰全集》第24卷,第833页。

④ 参阅李谢维奇《列夫·托尔斯泰与老子》,载于《国外文学》1991年第4期。

⑤ 分别见《托尔斯泰全集》第49卷,第64、65页。

⑥ 《托尔斯泰全集》第85卷,第30页。

了孔子的著作,它们更深刻、更优秀。没有孔子和老子,福音书便不是完全的。而没有福音书,孔子学说也就没有意义。"

作为虔诚的基督徒,他如此推崇孔老著作,直至将其视为可与福音书相互补充,可见他醉心于"中国智慧"的程度。

然而,托尔斯泰接受孔老学说的出发点毕竟还是基督教,所以他说:"老子学说的实质与基督教是相通的。"①他认为,"两者的实质都是以禁欲方式显示出来的构成人类生活基础的神圣的精神因素。因此,为使人类不成为苦难而能成为一种福祉,人就应当学会不为物质欲望而为精神而生活。这也正是老聃所教导的。"②看来,他所看重于老子的正是基督教教义所宣传的拒绝"诱惑"的思想。依照托尔斯泰的理解,"道"这个字既是上帝的标志,又是通向上帝的道路。

那么基督教义相通的地方便是"上帝就是爱",而爱别人正是通向理解上帝之路。③

但是托尔斯泰第一次试译《道德经》的工作并不顺利。直到1886年7月,他还因为材料不足而焦急地写信问切尔特科夫:"除了我手头已有的,还有没有其他关于老子的书籍。"④他曾经告诉后者,他研究的范围相当广:"我不仅忙于研究佛教,还有婆罗门教、孔子和老子。"⑤到1888年,他已经以懊丧的心情给鲁萨诺夫写信说:"我早就具有翻译和出版他们的可能性,但我却什么也没有去做。我可以举出孔子,老子……还有许多其他人的名字,但这些书的俄译本却一本也没有。"⑥

事情延缓到1893年终于有了转机,他和年轻的助手波波夫一起来翻译。他9月21日向妻子描述他"怀着喜悦而紧张的心情"反复校订译文的

---

① 《托尔斯泰全集》第40卷,第350—351页。

② 《托尔斯泰全集》第40卷,第350—351页。

③ 自然,这种理解未必正确,当代汉学家李谢维奇就表示怀疑:"我为托尔斯泰对老子的解释感到担心。明显的理由之一是:人们往往是先入为主的",同时他又肯定其精神,"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托尔斯泰从比较的角度去处理的,是他全然陌生的文化材料,这种对属于极为相异的信仰传统之神圣文本所作的文化比较,能使作家如此成功地克服语言障碍,从而深入到文本的实质中去,对此我们唯有表示惊叹。"参见李谢维奇《列夫·托尔斯泰与老子》(《国外文学》1991年第4期,第108—112页)。

④ 《托尔斯泰全集》第85卷,第370页。

⑤ 《托尔斯泰全集》第85卷,第356页。

⑥ 《托尔斯泰全集》第62卷,第152页。

工作："波波夫在替我抄写手稿。我和他在重读和修改深刻的思想家老子的作品的译文，我每一次都怀着巨大的喜悦，聚精会神地去理解，用心地去翻译，我是参照法文译本和更加出色的德文译本工作的。"他摘引《老子》的语句，并加以赞叹："这不是太美了？"[①]此项工作持续到1894年5月。但是同年在《哲学与心理学问题》第3辑上，发表了丹尼尔·科尼西译的《道德经》俄译本。托尔斯泰便不急于发表译作。直到1910年，其译作才由"媒介"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列·尼·托尔斯泰编选·中国圣人老子语录》，主要部分是老子言论摘选（共选入64段语录），还附有两篇论文，一篇是托尔斯泰所写的前言《论老子学说的本质》，一篇是伊·戈尔布诺夫—波萨多夫所写的短文《关于圣人老子》。他去世以后，1913年又有人据以再版，名为《老子道德经或道德之书》，并注明列·尼·托尔斯泰编，京都大学教授丹·皮·科尼西译自中文，谢·尼·杜雷林增补注释。

需要指出的是，老子在俄国是"诸子百家"中最受重视的一个。其《道德经》早在19世纪上半叶即由喀山大学教授丹尼尔·西维洛夫译出，但未发表。后于1915年由扎莫塔依洛以《丹尼尔（西维洛夫）档案资料中未公布的〈道德经〉译文》为题予以发表（载《敖德萨图书志学会通报》1915年第4卷第5~6册）。由此看来，《道德经》在俄国的早期传播主要得力于托尔斯泰的编译本。

（三）欣然接受孔老学说

作为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的思想既深刻又复杂，那是在他毕生追求"人生的真谛"过程中逐渐形成和成熟起来的。从总体上看，他的思想广泛吸收了东西方文化的各种成分，很难划定哪些思想是受到哪方面来的影响，或者说是二者多少有点关系。狭义上的托尔斯泰主义是指"不以暴力抗恶"、"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和"博爱"等项主张，而孔老的学说恰恰就有"仁"、自我"省身"、"道"、和"无为"等思想，它们极受托尔斯泰的注意和推崇，被他视为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的精粹，自然也可以说他已经接受其影响。

进一步看，其中某些影响可以从托尔斯泰本人的论述中得到印证。即以其所撰《论老子学说的本质》译文为例，他就提到："'道'的获得要通过

① 《托尔斯泰全集》第84卷，第196—197页。

节制一切个人的、肉的东西”,“老子学说与基督学说,其实质是相同的,二者的实质在于通过一切肉的东西而显示构成人的生活之基础的灵和神的本质”。[①] 这就是说他和老子一样,后者说他接受了老子的主张,“都强调了道德修养中必须节制和克服肉的、物质方面的贪欲,才能攀登灵的、精神的境界”。[②] 又如关于老子“上善若水”的观点,托尔斯泰发挥说:“就应该这样。如老子所说,应该像水那样。没有阻碍,它就流;一遇堤坝,它就停止。堤坝被冲垮,它又流;遇到方形容器,它是方的;遇到圆形容器,它就是圆的。正因为如此,它比所有的东西都更为重要,更有力量。”[③]再如,从他1893年以《无为》为题写的文章中,更可以看出老子的直接影响。他说:“根据老子的学说,人们的一切灾难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做应该做的,而是因为他们做了不应该做的。因此,假如人们奉行无为,那么他们就能摆脱个人的,尤其是社会的一切灾难。”从这里出发,“无为”必然与托尔斯泰的“不以暴力抗恶”相通了。

四、诸子散文俄译的开始

19世纪俄译诸子百家作品已初具规模:

(1)《大学》最早有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译的《四书解》,由汉文和满文译成俄文,1780年版。内有康熙帝的“前言”之俄译,《大学》的译文并注释。还译出《大学·大学注》,载《科学院消息》1779年5月第11期。该译文后又以《大学,或包含中国高级哲学的大科学》为题收入《爱说真理,或圣人的袖珍本》一书中,1801年版。

(2)《中庸》最早的译文是阿列克谢·阿加封诺夫的《忠经》(或称《论忠的书》),由俄罗斯帝国外交委员会译员阿列克谢·阿加封诺夫于1784年译于伊尔库茨克(在开辟该总督区时),于1788年出版。同年还有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的《中庸,即确定不移的法则》(摘自中国哲人孔子的传说),外交委员会办公厅高级文官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译自汉文和满文,圣彼得堡1784年。内有《中庸》的译文及注释。还有一种题为《中间和忠实》(孔子弟子的圣书),由德·科尼西译自中文并注释,载《哲学和心理学

① 《托尔斯泰全集》第40卷,第251页。

② 任子峰《托尔斯泰与孔老子学说》。

③ 《托尔斯泰全集》第49卷,第65页。

问题》杂志1896年第4册。

(3)《孙子》最早的译文是格里鲍夫斯基由法文转译的《谋攻篇》,载《近卫军司令部出版军事杂志》1818年第2册。

(4)《论语》最早的译文是瓦·瓦西里耶夫院士(王西里)的译注,1884年版。波波夫的《孔子及其门徒的格言》(译并注),1910年版。

(5)《孝经》德·科尼西译。题为《论孝敬父母的书》(节选),载《哲学和心理学问题》杂志1896年第3册。

(6)《孟子》最早的译文是波波夫译的《中国哲学家孟子》(译并注),1904年版,书中先有孟子传略,接着是译文和注释,计选译第一、二、四、五、六篇。

(7)《韩非子》最早的译文是阿·伊凡诺夫的《中国哲学资料,引言,法家,韩非子》,1912年版。包括韩非子传,其学说分析及《韩非子》译文,并附原文和索引。

(8)《道德经》的翻译,《老子》为诸子中在俄国最受重视的一家,投入翻译和研究的力量也多,不亚于《论语》。

早在沙俄时代,汉学家丹尼乐(西维洛夫,1798—1871)就已译出《道德经》,1915年由喀山大学教授扎莫塔依洛以《丹尼尔(西维洛夫)档案资料中未公布的〈道德经〉译文》为题予以发表,载《敖德萨图书志学会通报》,1915年第四卷第5、6册。文中注明"据喀山大学手稿,系原作第一至四十六章的俄译文"。较西维洛夫译得晚,但发表得早的德·科尼西教授所译《道德经》,载《哲学与心理学问题》杂志1894年第3册。

苏联时代较为流行的是杨兴顺的译著《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及其学说》,1950年版。书中收有《道德经》的原文和俄译。该俄译文还曾节选若干片段分别收入《古代东方史文选》(司徒卢威院士和列德尔主编,1963年)和《中国文学文选》(第1卷第95-100页,1950年)两书中。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著名作家托尔斯泰曾亲自编选老子的论述并写文章评介。

第三章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

一、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全面开拓

在俄国汉学界有“翰林”之尊的阿列克谢耶夫，属于俄苏汉学史上三个划时代的人物之一。前两个是比丘林和瓦西里耶夫，各代表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上半叶和19世纪下半叶两个时期。阿列克谢耶夫则代表20世纪上半叶，为第三个时期。比较来说，比丘林时期属于俄国汉学的草创阶段，大多数出身于东正教使团的学者，从事汉学研究系出于爱好，只有“报道描述情状，没有研究的举动”（阿翰林语）。当然，比丘林应除外，他是注意到研究的。瓦西里耶夫提出了“在当时是崭新的纲领”（阿翰林语），使第二时期的汉学跨进了一步，不但有明确的研究目标，而且人员都经过高校规范的汉语训练。他们已经贡献了研究中国佛教、汉语结构、中国文学史以及汉俄词典等一批颇有分量的成果，翻译了数量可观的文献资料。但瓦西里耶夫强调一切靠自己独立研究，不借鉴、援引他人的材料和结论。这有时会失之偏颇，导致同世界汉学相隔绝，走向自我封闭。阿翰林时期又前进了一步，他把俄国汉学摆到世界汉学的应有地位上，对其任务、目标和方法都有新主张，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教学和研究方法，对俄苏汉学作了全面的开拓。因而被视为苏联新汉学的奠基人，同他一起工作和受过他培养的人形成了“阿列克谢耶夫学派”①。其中著名的有已故汉学家

① 维·彼得罗夫《阿列克谢耶夫论汉学的科目、发展途径及其研究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纪念阿列克谢耶夫诞生一百周年文集），莫斯科，1983年，第19页。

休茨基、王希礼、弗鲁格、龙果夫、什图金、拉祖莫夫斯基、阿·彼得罗夫、施普林钦、杜曼、布纳科夫、维·彼得罗夫、艾德林等，以及活跃于苏联汉学界的费德林等一大批学者。阿翰林不但对苏联汉学的教学和研究有新的见解，已经培养了大批学生，而且本人的科研成果水平高，在苏联汉学界开了一代新风，为汉学家们所景仰。

（一）阿列克谢耶夫的新开拓

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阿列克谢耶夫（В. М. Алексеев，1881—1951）有光辉的学术生涯，他出生于彼得堡职员家庭，1902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1916年获硕士学位，1918年为教授，1919年未经答辩获语文学博士学位。1923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29年当选为院士。1910—1951年长期在彼得堡—列宁格勒任教，其间还曾兼任莫斯科东方学院教授、亚洲博物馆中国部主任等职。曾于1904—1905、1906—1909、1910、1926年在中国进修，1907年和1912年分别到过中国河南省和东南部从事科研工作。他在五十年的科研活动中，翻译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撰写了许多论著，有多方面的成就。共发表著述约260种。苏联汉学界称之为“翰林”，既由于他当了科学院院士，也有尊他为最大的汉学家之意。

阿翰林总结俄苏汉学的历史经验，就汉学这门科学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见解。在他为苏联大百科全书写的条目《汉学》[①]中指出，汉学是“以中文原文（资料）为依据的各门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包括史学、文艺学、考古学、词汇学、语文学、古文手稿字体学、史料学、社会学等）的总和”[①]。

这里首先把汉学的新概念同以往的旧概念区别开来。以前人们把研究中国的文学和语文学理解为汉学，那当然要狭窄得多。如今阿翰林提出的概念则指汉学应当是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语言文字诸学科的总和。[②]他在另一篇长文《苏联汉学》中就进一步阐明：“……把汉学等同于中国语文学，这将是对这门学科作错误的限制……我们应当在这方面彻底摆脱西方汉学和旧汉学的局限，他们把一切非语文学领域的成果统统视为非汉学

①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版，第51卷，莫斯科，1945年，第174—175页。

② 按：现在也称为“中国学”。本书为行文方便和前后一致，仍沿用习惯译法“汉学”。

的成果……”[①]此种看法极关紧要，尤其是从20世纪初以来，汉学研究出现分科化的倾向之后，对中国的史学、文学、语言文学、词汇学、哲学、艺术学等各分支学科的研究，自然均应视为汉学的组成部分。

阿翰林的概念还有另一层意思：汉学研究必须首先而且主要是依据中国（中文）的材料，即原文资料[②]。因此。他认为必须将从事中国研究的汉学家同描写中国的著作家相区别。前者掌握了汉学（懂中文），有完整的中国文化知识和理论，能直接利用中文的原始资料，而且运用自如，完全不必借助于翻译或其他第二手材料。而后者只是描写中国，不一定都要掌握中文的原文资料。

由此出发，阿翰林认为，评价一个汉学家的水平应当看他对原文的理解和掌握程度。说：“汉学仍然是最难的学科之一，因为要研究原文资料，就要求有最复杂的训练准备和熟练技巧”。他屡次告诫学生：汉学家不能靠“突击”或“心血来潮”，而要钻进原文里去。说：“对于汉学家来说，原文是一种特别的专业，”“应该经过（亲身）翻译、研究和综合，把原文转化成我们的思想。这才是汉学家的道路！”[③]这些主张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它有力地指导了苏联汉学家的成长。

此外，阿翰林还就汉学家应该具有扎实的有关中国的基本知识和开阔的眼界，同时又具有欧洲的知识，以便实行比较研究等诸多问题作了论述。

在这里，有关阿翰林是否注重当代情况的研究，说法不一。这一点已引起他的学生们的不安。十几年前，索罗金似乎为了澄清问题，特别列举阿翰林一系列以当代为题的论文，说明后者的“思想一直关注着目前的、现实的中国问题”[④]。几年前，阿翰林另一名得意门生，已故的彼得罗夫，他花了大量精力，细心整理阿翰林的遗著，他更明确指出，曾经有过阿翰林重古代文学而忽视当代中国的说法，“是远离事实的”“庸俗的神话”[⑤]。他证明，阿翰林尽管主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但不忽略当代，而且注意古今结

---

① 阿列克谢耶夫《东方学》，莫斯科，1982年，第116页。

② 维·彼得罗夫《阿列克谢耶夫论汉学的科目、发展途径及其研究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第21、24页。

③ 阿列克谢耶夫《东方学》，莫斯科，1982年，第353页。

④ 索罗金《阿列克谢耶夫的遗产和中国文化的当代问题》，《中国文学与文化》（纪念阿列克谢耶夫诞生九十周年文集），莫斯科，1972年，第103页。

⑤ 《中国传统文化》，第29—20页。

合，并以此思想来指导门生。

还有，重视西方知识，以便作东、西方对比而深化研究，避免囿于对象国一国的情况等原则，也是阿翰林所主张的。他除了到过中国，还曾多次到英国（1911、1923、1928）和法国（1911、1926）进修。后来写出中国诗学同西欧诗学比较的文章，丰富了他的研究成果。

（二）一部论司空图《诗品》的巨著

阿翰林第一部重要作品是论司空图《诗品》的硕士学位论文，1916年出版。全名是：瓦·米·阿列克谢耶夫著，《中国论诗人的长诗——司空图（837—908）的〈诗品〉》（*Китайская поэма о поэте. Стансы Сыкун Ту*）。附中文《诗品》，唐司空图撰，译和注。彼得堡，德列斯列尔珂罗版和铸字版印刷所，1916年。

此书是他的成名作，反响很大，备受推崇。它一发表便使作者在苏联汉学界断然占据了首屈一指的地位。

1. 成书过程

在1906—1909年，当年轻的阿列克谢耶夫在中国进修的时候，曾拜一位中国先生为师，学习难度很大的中文原作。正如前面所说，他是主张对原文狠下功夫的。自己理所当然要选择需要费脑筋、钻进去仔细琢磨、慢慢体会的作品。他跟一般初学中文的人一样，常常碰到这样的文句：字面上每个字都认得，但什么意思却看不懂。他去请教中国先生。先生的解释往往出人意料。他问先生：这个意思就是最有权威的《康熙字典》里也没有啊？先生便回答他；“我就是字典。”接着引经据典、列举许多文句，说明从这些词组和句子中，结合上下文来看，就隐含着先生自己所讲的那个意思。这使阿列克谢耶夫大为开窍。从此他知道先生所指点的《佩文韵府》的妙用。

阿列克谢耶夫选择中国古典文学中最难懂的作品之一，即司空图的《诗品》为攻读的对象，下决心彻底弄懂。他逐字查《佩文韵府》，看有什么意义，以前的作品中怎样使用的。他为每个字所摘抄的在以往作品中出现过的词组，既有助于他理解原文，又是对原文作注的重要资料，后来他统统收进书中作为附录。

有时他也查阅《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等，从中寻求答案。经过几年刻苦钻研，终于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工作。

2. 内容安排

这是一本有790页(16开本)的巨著。当时印数不多,革命后虽经汉学家们几次呼吁,出版社始终未能响应再版①,目前几乎是不多见的珍本,因而有必要简略介绍其内容安排。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评论。设四篇十四章。其中第一篇有四章,分别论述《诗品》的历史、内容、艺术技巧和它在中国文学以及世界文学上的地位。重点是系统阐释《诗品》的内容及其深刻含义,在分析长诗采用的语言手段和其他艺术手法时,也写得相当精彩。第二篇有五章,分别介绍《诗品》的版本、注家、仿作(即续《诗品》等)和它的英译本。文中贯穿着比较研究的观点和方法。第三篇评述司空图其人。从他生活的历史时代、经历及传记材料、作为人和作为诗人的品格以及他的其他诗作,也分为五章。这里面涉及司空图同陶渊明、李白、韩愈等作家的相互关系或所受影响。第四篇从方法论上论述如何对待这部长诗。指出汉学家们,特别是英译本译者的缺点,往往是对原作没有弄懂,或者学得肤浅,因而闹笑话。他提出自己在本书中打算怎样处理译和注,怎样看待《佩文韵府》、各代注家和英译者等,也有四章。从中可以看到阿列克谢耶夫在方法论上所作的更新。

第二部分是翻译和注释。共分两篇。第一篇是《诗品》的译和注。按二十四品为序,每一品都有综合分析(题解)、直译(照字面逐字翻译)、意译(并参照俄诗的音节和韵律修改润饰)和注释四部分。这里面的直译和意译固然要紧,往往能显示译者的功力,注释部分也不简单,每个词、每一句、每一段以至从总体来说每一品都有注释,其篇幅往往比翻译部分大十几或几十倍。以第一品《雄浑》为例,题解、直译和意译共合为2页,注释部分则有22页。总之注释不厌其详,都是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里有出处的引文和注文。第二篇是三部仿《诗品》之作,即《画品》(黄钺)、《书品》(杨景增)和《续诗品》(袁枚)的译和注。当然,这三部书都只摘选若干片段。

书的后一部分附入《诗品》原文和作者摘录的大量中文资料(用以注解本文的)。注解资料与本文(原作)之比为132页比14页,几近十倍。

---

① 孟列夫《阿列克谢耶夫——中国文学史家》,《中国传统文化》第33—34页。阿氏该书已于2008年再版。

最后还有人名书名和词语的索引(俄文、中文各一份)。全书看来不但有严密的体系,而且是认真编撰的学术著作。印刷设计之精良也令人赞叹。力求完善,其中文部分特地拿到中国哈尔滨,由当时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印刷厂承印,而且提前于1915年印刷出来,然后于1916年俄文、中文两部分合璧成书。仅此一例便可证明这本著作的力求尽善尽美。

3. 特色和意义

这本著作是评注译三者有机结合的整体。注释之精到自不必说,翻译之独具匠心,用诗体作出直译和意译两种译文,又有中文原作附后以资对照检验,实为汉学上之独创。评论一项很值得好好介绍。

它的评论具有文学史家的眼光和高度,把司空图的《诗品》放在中国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来考察,从南朝梁钟嵘的《诗品》、唐李嗣真的《画后品》到司空图以后的各种仿作理出纵向的历史脉络,以论述司空图作品的文学地位和价值。又从横向来对照花品、茶品、鱼品、书品、画品……以指明"诗品"这类作品的特点。由此作者认为"不要把《诗品》等同于司空图的其他诗作,而应作为独立的专著来研究"。他引证苏东坡、王士祯、张之洞等的评语,以论述《诗品》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认为这部长诗无论"从欧洲和从中国的观点来看,都是一部杰作"。

阿列克谢耶夫还从文艺理论角度来评价《诗品》,说长诗既然是一部专著,就不要像对待一般的诗那样去挖掘诗人的内心和做对比形象的工作,而应当作理论著作来分析。认为它可以同欧洲人贺拉斯①、布瓦洛②论诗的著作相媲美。说:"司空图的长诗在世界文学上应当占有一个极其荣耀的席位"。

阿列克谢耶夫评论的重点放在揭示《诗品》的内涵上,推崇它重视诗歌的艺术风格和意境,包括比较抽象的诗艺特点,说司空图的诗歌理想在俄国只有19世纪的诗人阿·托尔斯泰③和丘特切夫④可与之相比。同时他还分析了《诗品》的哲学思想,指出它与道家思想的关系,认为它还具有教育意义。他归结指出,《诗品》无论从其哲学内涵,还是从其形象化的艺

① 贺拉斯(公元前65—前8年)古罗马诗人,著有《诗艺》。

② 布瓦洛(1636—1711)法国诗人,著有《诗的艺术》。

③ 阿·康·托尔斯泰(1817—1875),俄国作家,擅长写抒情诗。

④ 丘特切夫(1803—1873),俄国诗人,擅长抒情风景诗。

术表现形式来看,都堪称一部内容丰富的古代诗歌经典。

像阿列克谢耶夫这样研究司空图的《诗品》,无论在世界,还是在中国,都是空前的。他的研究方法有师承"中国先生"的成分。这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在苏联的影响。

阿列克谢耶夫不是孤立地研究这部作品,而是把它放在各种思想的联系中来考察,包括同以往的儒家和道家的思想与文学、同陶渊明的创作、同中国古代的文学思想、同司空图本人的其他创作、同以后出现的同类著作等的联系和影响,同时结合作者的时代与经历,广泛参考各派注家的评语来作研究。有的苏联汉学家已经指出,阿列克谢耶夫的论著,是汉学的文学研究领域中专著的范例,它"具有方法论的意义"。①

(三)三部文集和阿氏论著两卷本

阿翰林一生多方面的研究成果,除已发表的外,未发表的,以后由他的门生编成三部文集陆续出版。

对中国文学作宏观研究的成果相当多,已汇集成《中国文学》论文选(Кит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8 年, 595 页)。费德林曾概括其特点,说"在阐明中国文学问题时,他努力遵循先进的方法论——唯物主义世界观。这就使他同其前辈,如瓦西里耶夫的方法论有明显的区别。瓦西里耶夫是从儒家世界观的立场出发来研究中国文学的"。② 文集包括五部分:①"中国古典文学",带有探讨文学史问题的性质。对诗歌、小说、戏剧,李白、高适、王勃、柳宗元,以及更早的屈原、司马迁等许多名家都有文章论及。②"中国三部诗论——作家、画家、书法家谈灵感与风格",除收入谈《诗品》的文章,还有论黄钺(1756—1841)《画品》的文章《中国诗画家谈个人灵感与景物描写》,以及论杨景增(清初人)《书品》的文章《书法家和诗人谈书法艺术之奥秘》。③"比较研究",有《罗马人贺拉斯与中国人陆机论诗艺》、《法国人布瓦和同时代的中国人论诗艺》等文章。④"中国的幻想小说",主要收录有关《聊斋》的论文。⑤"中国古典文学中论及的中国文学史"和⑥"翻译原则"等。后一部分是作者的经验之谈。阿翰林是位出色的翻译家,毕生翻译了大批作品,尤以译诗见长,译文高超,一向为苏联汉学家所

---

① 李谢维奇:《阿列克谢耶夫是中国文学思想的研究者》,《中国的文学与文化》,第 40 页。

② 《苏联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与翻译》,《远东问题》1986 年第 4 期。

推崇。他译李白、陆机、司空图、文天祥、欧阳修等人的作品以及《聊斋》的经验,都有所论述。

《中国民间年画——民间绘画中反映的旧中国的精神生活》(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картина: Духовная жизнь старого Китая в народных изображениях, 1966)收入论中国民间绘画、民间戏剧、传说、神话、宗教、迷信等的论文,可以说是一部民间文学论文集,260页。还收入105幅民间绘画(其中8幅是彩色的),系从埃尔米塔什和宗教及无神论历史博物馆的藏品中复制的。

第三部文集是不久前出版的《东方学》(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 1982),是文章、文件和书信汇编,535页。文集的前两部分论述东方学和汉学,以及它们的任务和研究的问题,也论及汉学教学、培养汉学家的原则和方法。最后,第三部分以"我怎样学习和研究中国的"为题,收入阿翰林的自传及传记材料,可以看出他毕生耕耘汉学的劳绩。

这三部文集从一个侧面反映他在汉学各个领域的成就:语文学、民族学、史学、诗学、民间文学、美文学以及翻译理论和实践。

《中国文学论著》(Труды по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两卷本)系阿氏的主要论文选集,最近由其女班科夫斯卡娅和门生李福清编选,并于2003年出版。

(四)《聊斋志异》的翻译和研究

半个多世纪以前,阿翰林就指出,瑰丽宏大、卷帙浩繁的中国文学尚未为俄国读者所了解,当务之急是大量翻译出版中国文学名著。他本人也重视从事翻译,有许多译作,其重点除了诗歌,就是《聊斋志异》(Избранные рассказы Ляо Чжая)。

在从《聊斋》选译的头一本集子《狐媚集》(1922)的前言中,他概括了故事人物中的几种基本类型,如狐仙、书生等,评述了作品的风格。接着,在《僧术集》的前言中又分析了另一种类型的人物,即和尚和道士。同时指出作品的艺术风格和文学手法:用根本听不懂的文言来表现民间故事、日常生活题材以及人物之间的对话,"把幻想与现实的冲突激化到异常尖锐的程度","把民间的迷信传说改写成典雅清新的文章",展示了人物的"情欲同戒律、理智发生冲突时的心理状态",还有"对儒夫的谴责和对英雄的赞美"。后来,他在翻译的另一本集子《异人集》(1937)前言中继续谈

论《聊斋》的风格和艺术特点。

阿翰林还写过两篇文章:论《〈聊斋〉中儒生个性与士大夫意识的悲剧》和《谈中国旧文学的通俗化史》。后者提出,用白话翻译、加注、改编成曲艺以让群众听懂,就可以达到使《聊斋》这类文言小说通俗化的目的。

值得一提的是,阿翰林提出"像公文一样准确"的原则,即要求从字面上和精神上都忠实于原文的原则,他自己在翻译中身体力行,就是《聊斋》的译作也一再修订,直至成了范本,所以能长期流传。在他死后,译本仍一再出版:《狐媚》(1955、1970)、《僧术》(1957)、《异人故事》(1954)、《聊斋志异》(1970、1973、1983)。

二、俄国汉学学派的形成

阿翰林对苏联汉学的特殊贡献,是孜孜不倦地建设汉学学科和严格认真地培养汉学人才。从整理出来的许多手稿资料可以看出,他在彼得堡大学(后为列宁格勒大学)、莫斯科东方学院等处任教和工作时,总是利用一切场合来宣传他对汉学的一套理论原则,向学生传授他的治学方法。从制定教学大纲、编写教材、讲授功课、考核成绩,直至指导、批改学位论文和主持论文答辩,始终坚持他的传授和诱导的工作。当今苏联汉学界的知名学者中,有不少人都在理论修养和治学方法上承受过他的恩泽,所以也可以称他为汉学教育家。一个人要兼有翻译、研究和教育的成果,是很不容易的。而他恰好在这三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并在苏联汉学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在他死后,门生们为纪念他诞生80周年、90周年和100周年而举行的报告会、出版的文集中,大多不是为纪念而纪念的应景文章,而是都能从他的文化遗产里不断挖掘出一些有益的思想,或是按他提出的思想原则去探索而获得的成绩。

在阿翰林的指导和影响下,苏联已形成一支汉学家的队伍。这些人都经过高等教育的培养,有综合的基础知识和中国语言文学的专业训练,以攻读副博士、博士学位为前进的阶梯,通过艰苦的论文写作和接受严格的考核,尔后得到晋升。所以虽然人少但能量大,在科研上能单独作战。如今,仿佛有统一部署分工似的,已自然地形成由五六十年代和50年代之前培养出来的汉学家各自"雄踞"一方的局面。从古代到当代,从雅文学到俗文学,从宏观的文学发展史到微观的单个作家作品,几乎都有人注意到。由于人少分摊不过来,面对浩瀚的中国文学,仍然留下不少空白。但凡是

重点均已有人研究。一般说来，大多能拿出专论、专著，或者在译作之外有认真的分析文章。不少人学风严谨，力求占有尽可能全面的资料，注意分析，从实际出发，论述有根据，体系比较严密，他们科学工作的方法也有值得借鉴之处。

由于阿翰林对俄国汉学的特殊贡献，他对汉学学科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孜孜不倦地建设汉学学科和认真严格地培养汉学人才，已形成了“阿列克谢耶夫学派”。

在阿翰林身后，齐赫文院士（B. M. Тихвинский，1918—　）成了这个学派的主导人物，据他的界定，该学派的主要成员有：研究哲学的休茨基、阿·彼得罗夫，研究文学的鲍·瓦西里耶夫（王希礼）、什图金、费德林、艾德林、费什曼、齐别罗维奇、克立夫佐夫、瓦·彼得罗夫、孟列夫、谢列布里亚科夫，研究语言的龙果夫、鄂山荫、施普林钦、雅洪托夫，研究汉字的鲁多夫，中、日兼研的聂历山、康拉德、孟泽勒，研究图书资料的弗卢格、布纳科夫，研究艺术的卡津、拉祖莫夫斯基，研究经济的施泰因，研究历史文化的杜曼、齐赫文、维尔古斯、李福清。①

这份名单实际上还应该包括推动 20 世纪下半叶汉学走向繁荣的一批骨干，他们已不是阿翰林的嫡传，而是再传弟子了。例如曾是齐赫文的学生，目前任职于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史学家米亚斯尼科夫院士（1931—　），又如曾在北大受业于冯友兰先生的哲学家、现任远东所所长的季塔连科（1934—　）院士。季氏是当前俄国汉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他主持编纂大型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六卷本），从 2006 年起陆续面世，至 2010 年已出齐。这在国际汉学界中属于首创。

三、中国文学译介在 50 年代趋向繁荣

从 20 世纪初起，在苏联时代，中国文学的传播呈现着日益繁荣的趋势。从 1917 年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文学界对中国给予极大的关注。1918 年，高尔基向列宁提议成立专门研究东方问题的高等学校，列宁很快做了批示，同意在莫斯科设立东方学研究所，其任务之一就是首先研究中国语

① 齐赫文斯基《瓦西里·米哈依洛维奇·阿列克谢耶夫：科研和教学活动简介·序》，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1 年；中译文见李明滨《俄国汉学史提纲》，载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四集，中华书局，2000 年，第 63 页。

言文学。1919 年,高尔基又提议设立“世界文学”出版社,译介世界各国的文学名著。其中,中国文学作品的选目,由阿列克谢耶夫(阿翰林)负责,而由多名汉学家通力合作。据一本《中国书目》(斯卡奇科夫编;1960 年)统计,在前期短短的 30 多年里,苏联就出版了约百部书,大大超过了 19 世纪的汉学成果。当然,这是就整个汉学而言,不限于文学研究一项。

(一)50 年代译介中国文学的热潮

随着中国大陆的解放,客观条件改善和主观研究力量的剧增,苏联对中国文学的引进便在 50 年代出现了浩荡的“洪流”。在这 10 年里出版的译作品种繁多,包括从古代至现、当代的作品,每一种印数均达 5 万或 10 万册。有什图金的《诗经》首次全译本(1957),费德林主编的四卷本《中国诗集》(1957—1958),所选诗歌上起古代下至 20 世纪 50 年代。第一卷收入《诗经》的“风”、“雅”、“颂”(选),楚辞,曹操、曹丕、曹植五言诗,陶渊明诗和汉乐府。第二卷为唐诗,有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王维、孟浩然、韩愈等名诗人的作品。第三卷包括宋、明、清三个朝代,有苏东坡、欧阳修、柳永、陆游、李清照、辛弃疾直至近代林则徐、黄遵宪的名诗。第四卷为 1949—1957 年的新诗,入选的是郭沫若、萧三、田间、臧克家等人数众多的诗作。这部诗选,第一次向苏联读者展示了中国诗歌全貌。其选择之精和全,迄今仍为国外所仅见,也为后来苏联编辑中国诗选和单个诗人的选本提供依据,并为研究者确定重要研究对象提供根据。它的出版成为苏联汉学界乃至文学界在 50 年代的一大盛事。

此外,还在出版一些大诗人的单行本,如艾德林译《白居易诗集》(1958),吉托维奇译《杜甫诗集》(1955)、《李白抒情诗集》(1956)和《王维诗集》(1959),阿列克谢耶夫等译《屈原诗集》(1954)等。

此时,几部中国重要古典小说也有了俄译本:帕纳秀克译《三国演义》(1954)和《红楼梦)(1958),罗加乔夫(罗高寿)译《水浒传》(1955),以及他同科洛科洛夫合译《西游记》(1959),沃斯克列辛斯基(华克生)译《儒林外史)(1959),费什曼等译《镜花缘》(1959)。有些还是西方较少译介的清末章回小说,如谢曼诺夫译《老残游记)(1958)和《孽海花》(1960)。

现、当代的大作家如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老舍、叶圣陶、丁玲等都有了俄译本:四卷本的《鲁迅选集》(1954—1955),两卷本的《老舍选集》(1957),一卷本的《郭沫若选集》(1955),三卷本的《茅盾选集》(1956)以

及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9)等。一些在西方还很少介绍的作家如马烽、李准、周立波、杨朔、艾芜、陈登科、秦兆阳、冯德英等在苏联也都得到了译介。像苏联如此规模宏大、时间集中的中国文学译介工作,在世界汉学史上怕是少有的。

友好的中国也给苏联汉学家的来华提供了优厚的条件。俄罗斯汉学界的中年以上学者,大都或长或短地在中国逗留过,在资料和指导上都获益不小。即以到过北京大学进修的人为例,指派的导师都是第一流的,如切尔卡斯基受王遥、施奈德受曹靖华、查瓦茨卡娅受宗白华的指导,资料则是丰富而齐备的。汉学家李福清很怀念 1965 年在北京大学进修时每天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查资料,每周一两次进城逛书店和到天桥听说书的日子。况且,提供资料方便的何止北京大学。李福清在 50 年代中期开始研究孟姜女的故事,缺乏资料,就给中国各省的文联写信,请代为搜集,不多久,几乎每个省都给他寄去了有关孟姜女的资料:民歌、传说、地方戏,直至古迹的照片。时隔 30 多年,李福清还由衷地说:"中国朋友的关心和帮助,使我非常感动,永生难忘。"

苏联汉学家已推出了一批研究性的论著。综合性的文学史书有费德林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观》(1953),《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纲要》(1955),艾德林的《论今日中国文学》(1955)。作家专论有波兹涅耶娃的《鲁迅》(1957)和《鲁迅的生平与创作(1881—1936)》(1959),索罗金的《鲁迅世界观的形成·早期的政论作品和〈呐喊〉》(1958),谢列布里亚科夫的《杜甫评传》(1958),费什曼的《李白的生平和创作》(1958),彼德罗夫的《艾青评传》(1954)等。

(二)最早注意现代文学

苏联是最早注意"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国家之一。

1. 王希礼翻译《阿 Q 正传》

1925 年,北伐战争前夕,第三国际派来了顾问团,其中有一位年轻的苏联汉学人员华西里耶夫(B. A. Васильев, 1899—1937),中文名王希礼。当他踏上中国的国土,立刻感到要学一点中国的东西,把中国"现在的文化生活"带回苏联,介绍给世界。

中国当时的革命据点有三个:广州、开封、包头。分别驻有国民军第一、二、三军。三个据点中都有第三国际派的顾问团,顾问均为俄国人。当

时，曹靖华在开封第二军任翻译，王希礼恰好在第二军顾问团中。

他们在共同的劳作之余，常交流共同的喜好，相互切磋。王希礼希望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却不得其门而入。他问："你们的新文学，首先应该看谁的作品？"曹靖华立即答道："你最好先看看《阿Q正传》。"并将手边的一本《呐喊》送给他。

这本书使王希礼立刻激动起来："了不起！了不起！鲁迅，我看这是同我们的果戈理、契诃夫、高尔基一样的世界大作家……"

他便利用休息时间，把它译成俄文，并请曹靖华解答某些疑难。曹靖华还把王希礼译书的经过、提出的疑难，写信给鲁迅先生，并请他为俄译本写一篇序和自传。这些，鲁迅先生都照办了。

王希礼当时写信给曹靖华，称赞鲁迅是中国的"一位伟大的国民作家！他是心灵的照相师，是民众生活的记录者！……他不只是一个中国作家，他还是一个世界的作家！"这封信发表在当年的《京报副刊》上。①

王希礼的《阿Q正传》于1929年，由列宁格勒出版社出版。同年，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也出了另一种《阿Q正传》的俄译本，经戈宝权查证，系苏联汉学家科金与中国人高世华合译的，被收在《当代中国中短篇小说集》一书中。同书收入的还有《孔乙己》以及郁达夫、腾固、骞先艾等人的作品。

2. 王希礼开讲中国现代文学

1925年，国民革命第二军失利，王希礼随顾问团回国。1927年，曹靖华为躲避反动势力的白色恐怖，也到了苏联。两位好友在列宁格勒相逢。嗣后，王希礼又翻译出版了《中国小说集》。曹靖华也在教学之余，利用假期，埋头于苏联进步文学作品的翻译。1928年初，他将爱伦堡的《共产党员的烟斗》连同其他10个苏联短篇译成中文，编成一集，易名《烟斗》，交未名社出版。当年的形势不得不去掉"共产党员"几个字。

他们两人都在列宁格勒大学和东方语言学院授课。曹靖华的家就在东方语言学院里，王希礼授课之后，常来曹家小坐。两人的友谊，就在这共同的工作中加深。曹也帮助王开出了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新课程。

3. 阿列克谢耶夫初评胡适新诗

据李福清考证，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比王希礼更早，或者大体同时介绍

① 彭龄《而今百龄正童年——记曹靖华》，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34页。

中国现代文学。阿氏在1925年第五辑《东方》(列宁格勒,从1922年起出版的不定期杂志)发表短文《你研究新诗否?》,文中介绍"东亚出版社"出的康白情、俞平伯、汪静之等人的白话诗,并提到"著名改革派胡适、刘延陵等为新诗集写的序文"。

1926年阿氏应邀去巴黎讲学,曾经介绍和分析了胡适的《尝试集》。此次讲稿后于1937年在法国出版,题为《中国文学》。他对胡适的学术研究方法,一方面加以赞扬,肯定其对传统方法的批判,另一方面指出胡适的观点有矛盾和缺陷。后来阿氏又几次评介胡适的白话诗集。不过,李福清也断定,"阿列克谢耶夫院士介绍胡适白话诗主要在国外,在国内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是王希礼"。①

四、宣传介绍中国文学概况

(一)丁玲等五人荣获斯大林文艺奖金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1951年苏联政府就将斯大林文艺奖金颁授5位中国作家——丁玲、周立波、贺敬之、丁毅、刘白羽。这也是中国作家首次获得苏联的国家奖。

1949年9月,莫斯科高尔基电影制片厂导演格拉西莫夫和苏联中央文献纪录片电影制片厂导演瓦尔拉莫夫率队来和我国合拍《解放了的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胜利》两部大型影片,1950年10月完成。1951年两片荣获苏联国家奖斯大林文艺奖金一等奖。担任两片文学顾问的周立波和刘白羽以及音乐顾问、助理导演、摄影师等我方人员均获奖。

其中一位奖金得主作家刘白羽,1950年在莫斯科与苏联电影工作者一起创作电影剧本《中国人民的胜利》,以中俄两种语言问世。同年,莫斯科儿童文学出版社又出版刘白羽短篇小说集《政治委员/回家》。至1959年莫斯科军事出版社出版刘白羽的中篇小说《无脚拖拉机手》(俄译名《永不熄灭的火焰》,斯米尔诺夫译),10年间苏联共出版刘白羽的包括《政治委员》、《勇敢的人》、《无敌三勇士》、《火光在前》等主要中短篇小说在内至少有10种。索罗金和艾德林评论刘白羽的"描写人民英雄主义的小说",夸赞"他的作品自然、朴素、真实"。

---

① 李福清《中国现代文学在俄国》,《汉学研究》第一集,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年,第345页。

其他人如丁玲系因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奖，周立波则由于小说《暴风骤雨》（周共两项获奖），贺敬之、丁毅由于歌剧《白毛女》获奖。

为什么苏联会如此重视现、当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用莫斯科大学教授华克生（沃斯克列辛斯基）的话说：这种热潮，“表明了苏联学者和全体人民对中国命运的深刻关注，以及他们同中国人民扩大文化交流的强烈愿望。”在50年代苏联引进中国文学的“洪流”中，现代文学占很大比重，现代文学10大名家鲁郭茅，巴老曹，沈艾张赵，除沈从文、张爱玲未作介绍外，均已被翻译。已出现有《鲁迅选集》（四卷）、《郭沫若文集》（三卷）、《茅盾文集》（三卷）、《老舍选集》（两卷）、《曹禺剧作选》（一卷）、《艾青诗选》和《赵树理小说选》，其他如叶圣陶、丁玲等大家都有介绍。其规模之宏大，时间之集中，在世界汉学史上极为罕见。鲁迅被称作中国的“高尔基”或“果戈理”，其研究既多且深，独得学界青睐。而在60—80年代，切尔卡斯基持续不断地编译诗集，恰好组成了一个介绍现、当代诗歌的完整系列。所编四本诗集选诗人逾百名，规模相当可观。“文革”之后，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文学创作的勃兴立刻引起汉学家的注意。从70年代末起，苏联又出现了译介中国文学的热潮，特别是反映改革开放的作品。据不完全统计，这时汇编成书的作品集，有七种中短篇小说，十种中长篇小说，一部诗集，收入作家诗人数十名。当代作品的俄译本印数很多，常常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俄国学者肯定我国的新时期文学，认为它有暴露阴暗面和反映开放改革成就的作用，竭力向读者推荐新一代作家。关于艺术手法的继承与创新，他们的探索也很细腻。李福清、索罗金、谢曼诺夫、热洛霍夫采夫等人特别强调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的融合。

总之，俄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大体包括文学史、作家论和作品分析等范畴，由于涉及面广，成果丰硕，已经形成了相当完整的学术体系。其学术特色是密切联系时代思潮，重视思想性、民主性、进步性和革命精神。这也是他们选择研究对象的标准，因此某些西方很少介绍的作家，苏联都有译介和研究。

（二）介绍文学概况

1. 费德林和他的《中国文学史纲要》

出版介绍文学概况的书籍，是最好的宣传办法。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向苏联读者就中国文学作全面综合介绍的人是费德林。他已有多部论著

问世，是当代苏联著名的汉学家之一。

费德林（Н. Т. Федоренко，尼古拉·特罗菲莫维奇·费多连科，1912—2002）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同年当上了阿列克谢耶夫的研究生，副博士论文题目是《论鲁迅的创作》。1939 年赴苏联驻华使馆任职，来到中国战时的首都重庆。这使他得到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极好条件。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学者名流云集陪都重庆，费德林得以同他们交流，眼界大开，受益匪浅，学术上也有长足的进步，1943 年即以《屈原的生平与创作研究》论文获博士学位，该文并于 1944 年和 1946 年在中国的杂志《中原》和《中国学术》上发表，使得这位年轻的博士在中国也享有名声。他在中国一直工作到 1948 年。解放以后，1950—1952 年他又来驻华使馆任参赞，客观条件继续有利于他的研究工作，还能同中国作家合作，促进学术交流，如与诗人艾青合作为《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撰写“中国文学”概述条目等。

最引人注意的是 1953 年发表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观》，这是苏联第一部介绍抗日战争到新中国初年文学的书，评论界立即夸它是急于了解中国的广大苏联读者“急需的书”，因为它讲的是“新中国的文学”。接着 1955 年发表的《中国见闻录》（1958 年出补充二版）又使读者更进一步了解“中国大地”。书中所记同茅盾、老舍、郑振铎、梅兰芳、齐白石、郭沫若等文艺界人士的会晤或交往，如今已成为宝贵的历史资料。此外，还有 1956 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要》。所有这些书，在 50 年代增进苏联人民了解中国、加强两国人民友谊的潮流中，恰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费德林长时期内没有专门时间研究中国文学，只能在外交工作之余从事翻译和研究。他甚至可以称为“业余的”汉学家，但却很有成就。这主要靠他勤奋，善于利用时间。当年北大俄文系系主任曹靖华教授曾赞许说：“你看费德林在重庆的时候，公务那么忙，公文包里还随时带着中国文学作品，一有机会遇到中国人，就请教和讨论起来。”

这也决定了他论著的特点是注重当代，联系当时的形势比较紧密。在这方面有许多论文，如：《论鲁迅文艺创作的特点》（1946）、《论中国的新兴文学》（1949）、《高尔基的文学遗产和苏联文学在中国》（1951）、《郭沫若》（1952）、《伟大的中国作家鲁迅》（1953）、《论老舍的作品》（1954）等。

但是他也尽可能注意古典文学，并逐步加重分量。陆续写出一批论

文,主要的如《中国古典诗歌〈唐朝〉》(1956)、《屈原问题》(1958)、《〈诗经〉的风格和中国诗的传统》(1958)、《伟大的中国剧作家关汉卿》(1958)、《〈红楼梦〉俄译本前言》(1958),特别是写出了专著《〈诗经〉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更是他兼顾古今的标志。

1958年,他终于以优异的成就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费德林在苏联外交界工作近30年(1939—1968),除了到过中国,还担任过苏联驻日本大使(1958—1962)、常驻联合国及安理会代表(1963—1968)。但一直坚持汉学研究工作,发表不少论文,如《英雄史诗〈三国演义〉》(1960)、《中国旧文学中的自然哲学思想》(1960)、《象形文字的造型形象性》(1961)、《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1962)、《中国神话的题材特点》(1967)、《〈诗经〉、〈书经〉、〈易经〉》(1969)、《传统与遗产》(1970)、《中国文学研究问题》(1974)、《中国的文学遗产与现时代》(1981)。后来,他的论文已集成两卷的《费德林选集》,于1987年出版。费德林晚年为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兼任《外国文学》杂志主编。

从论文看,他涉猎的范围相当广,包括历史、哲学、文化在内,但主要专业还是中国文学史。

2.《中国文学史纲要》

此书的全名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纲要》,出版于1956年,是以1953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观》为基础扩充而成的。

1953年版只讲"五四"以来的文学。费德林作为常驻中国的外交工作人员,有机会直接了解中国40年代创建新文学以及文学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服务的事实,对于作家作品的理解比较深刻,对内容的概括准确,出版后反响也大。但是缺乏古典文学部分,因而1956年版便加了"文学遗产"一章,扼要系统地介绍从《诗经》到"五四"运动以前的文学。其他各章也作了若干补充。按内容可分为三类:属于描述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有三章,即"文学革命"、"新阶段"和"为反对资产阶级对文学的影响而斗争和人民中国的文艺学"。属于概括文学创作现状的有四章,其中小说两章,题为"农村改造题材"和"工人阶级题材";"诗歌"和"戏剧"各一章。属于作家专论的有六章,分别对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赵树理、艾青的创作做分析。此外还有一章是"俄苏文学在中国"。

全书15章,内容依然是当代文学为主,不过有一章介绍古典文学,使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历史有简要了解。

作者在分析文学运动、文学创作和作家作品时，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的。后来，他进一步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要求文学研究工作者在对艺术创作的分析过程中，做到美学观点与社会—历史观点的统一。一部作品的思想内容同艺术表现形式之间，塑造的形象同典型人物之间有着紧密的相互联系，并有机地相互制约。因此，只有对各种文学现象和事实持广泛的社会学观点，同时，又要对文学创作中生动形象的艺术表现手法进行分析，才符合科学文艺学的要求。"[①]这实际上也是费德林自己在写作《中国文学史纲要》时所遵循的原则。

苏联著名作家费定在《庆祝学者六十寿辰》一文中赞扬费德林的主要成就是在基础研究（中国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研究（中国诗学）两个方面。[②]

3. 艾德林和索罗金的《中国文学（简编）》

苏联最早发表专著论述中国文学发展问题的人，还有另一位著名汉学家列夫·扎尔曼诺维奇·艾德林（Л. З. Эйдлин，1909—1985）。他于1955 年发表的《论今日中国文学》一书，从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各个方面论述中国新文学。它从延安时期开始至新中国初期的文艺思想和政策，创作方法、文学创作，新文学与民族传统，新文学接受外国文学主要是俄苏文学的影响等问题都作了分析，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白毛女》以及赵树理的一系列小说为例，剖析新文学的特点。全书材料丰富，又用理论统率，显然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论著。

艾德林一向以严谨的学风著称。曹靖华教授时常夸他是"非常勤奋的人"。艾德林 1956 年访华时，曹靖华特意邀请他到北大俄文楼作报告，介绍他没有到过中国却能把汉语讲得那么好，究竟是怎么学习的。报告深受学生欢迎。

他 1937 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42 年以《白居易的四行诗》获副博士学位，1969 年获博士学位。1937—1952 年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学院、军事外语学院任教，1969 年升为教授。他的研究重点是中国文学史和诗歌。一生发表论著在 150 种以上。

---

① 费德林《苏联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远东问题》1986 年第 4 期。

② 费定《庆祝学者六十寿辰》，《苏联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庆祝费德林六十寿辰文集），莫斯科，1973 年，第 3 页。

文学史方面，除专著《论今日中国文学》以及与索罗金合著的《中国文学（简编）》一书，还有数量可观的论文，重要的如《新中国的文学发展概述》（1960）、《郑振铎和中国的文艺学》（1971）、《三至十三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1973）、《中国中世纪文学诸问题研究》（1973）和《社会思想在中世纪文学中的表现》（1974）等。

论诗歌的文章重要的有《陶渊明诗歌创作中的传统和革新问题》（1960）、《论毛泽东的诗词》（1958）、《白居易的抒情诗》（1965）、《中国的古典诗歌》（1975）、《艾青的诗及译法》（1983）等，其中最有分量的当然是专著《陶渊明和他的诗歌》（1967）。

其他方面还有《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曹雪芹》（1964）、《鲁迅笔下的中国》（1969）、《论鲁迅有情节的散文》（1971）等文章。

艾德林所有这些论著都围绕着一个中心：为编写中国文学史作准备。

同时，作为文学翻译家，他不但有白居易、陶渊明诗的译作被视为精品，多次再版，出过《艾德林译中国古典诗歌》集（1984），而且写过《论象形文字诗的翻译问题》（1967）等谈翻译理论和经验的文章。

艾德林的学生索罗金研究另有重点，主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和古典戏剧（元曲）方面。弗拉基斯拉夫·费多罗维奇·索罗金（В. Ф. Сорокин，1927—　）现为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50 年毕业于东方学院，1958 年以论鲁迅早期创作的文章获副博士学位，不久又获博士学位，在 50 年代已是有名的青年汉学家，发表过专著《鲁迅世界观的形成》（1958）和《茅盾的创作道路》（1962），还有一系列中国现代文学的论文。

索罗金 50 年代末向古典戏剧领域开拓，1964 年曾来中国进修，得到著名戏曲史家周贻白的指导。20 多年中陆续发表《元曲：角色与冲突》（1969）、《14 至 15 世纪中国戏剧中的佛教题材》（1970）、《13 至 16 世纪的中国古典戏剧》（1973）、《元代戏剧中的人和命运》（1977）等论文，直至写成专著《13 至 14 世纪中国的古典戏剧：起源、结构、形象、体裁》（1979）。

索罗金结合研究工作翻译过鲁迅、关汉卿等的作品，不久前还译了钱钟书的小说《围城》（1980）。

索罗金与艾德林合作写成一部篇幅不大（小 32 开本 251 页）的《中国文学（简编）》（1962）。两位作者参照中国的文学史书及有关的资料，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作了简要的描述，条理清楚，有历史的脉络，同时适当注意重点，能给人以鲜明的印象，适合于普及；也有一些精辟的论述，如中国

文学的进步传统，中国文学中现实主义因素的积累过程。对《金瓶梅》的生活真实性与艺术真实性，对《红楼梦》的突出成就的见解独到，如说《红楼梦》是中国文学达到了“现实主义长篇心理小说水平”的标志，两位作者发挥各自所长，对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对各种体裁的创作分析和概括均比较精当。其意义在于“这是用俄文写的第一部上自《诗经》下迄今日的中国文学全部历史的系统叙述的著作”。[①] 它虽为通史，可惜仅是“简编”，不过仍然起到介绍推广的作用。

① 李福清《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小说、戏曲）》，第4页。

第四章
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

一、60—70年代起文学译介的扩大与深化

(一)作品翻译

进入60年代以后,由于中苏关系变冷,两国的文化交流深受影响。不过,由于有中年一代汉学家的努力,中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仍然坚持下来,而且有所发展。在翻译方面,这20多年,逐步扩展到各种体裁的作品,似乎可以说是在50年代的基础上做了"填平补齐"的工作。古典诗词仍然是重点。陆续出版的作品有:艾德林译《白居易抒情诗集》(1965)、《白居易诗集》(1978)、《陶渊明抒情诗集》(1964)和《陶渊明诗集》(1975),切尔卡斯基译曹植《七哀诗集》(1973),戈鲁别夫译《陆游诗集》(1960)、《苏东坡诗词集》(1975),巴斯曼诺夫译《辛弃疾诗词》(1961)和李清照《漱玉词》(1974)等。也有多人合集的诗选,如艾德林译《中国古典诗歌集》(1975)和巴斯曼诺夫译《梅花开(中国历代词选)》(1979)。

在小说方面,既有旧小说和笔记(古文小说),如吉什科夫译六朝小说干宝的《搜神记》(1977),李福清等译《紫玉(中国一至六世纪小说集)》(1980),费什曼、吉什科夫译《唐代传奇》(1960),索科洛娃译《浪子与术士》(又名《枕中记》)(1970),戈雷金娜译沈复的《浮生六记》(1979)和瞿佑的《剪灯新话》(1979),费什曼译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1974);也有通俗小说(白话小说),如帕纳秀克译钱采的《说岳全传》(1963)和石玉昆的《三侠五义》(1974),维尔古斯和齐别罗维奇合译《今古奇观》(1962),

左格拉芙译《十五贯(中国中世纪短篇小说集)》(1962),罗加乔夫译《碾玉观音)(1972)等。还有80年代出版的帕纳秀克译罗贯中、冯梦龙的《平妖传》(1983)。此外,在1977年出版了马努辛译的删节本《金瓶梅》。有趣的是苏联也如同我国一样,为了在少年儿童中推广文学名著,在七八十年代出了几种小说名著的节译本或缩写本,计有:《水浒传》(1978)、《西游记》(1982)、《三国演义)(1984)等,均系以50年代已出的全译本为基础作的缩改。

在散文作品方面,有杨希娜译《山海经》(1977),维亚特金和塔斯金合译司马迁的《史记》(1972、1975),索科洛娃译《韩愈柳宗元文选》(1979),谢列布里亚科夫译陆游的《入蜀记》(1968)等。在《中国古代诗歌与散文集》译本(1979)中,除收入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汉乐府的选译外,还有司马迁、伶玄、贾谊、赵晔等人的散文作品。

戏曲和民间文学方面,重要的有孟列夫译王实甫的《西厢记)(1960),彼得罗夫等译《元曲》(1966)收入关汉卿、马致远等8位作家的11部剧作。索罗金等译《东方古典戏剧》(1976)中收入洪昇、孔尚任、汤显祖等6位作家的6部剧作,均系摘译。民间文学有如李福清辑译的《中国民间故事》(1972)和《东干族民间故事与传说》(1977),鲁波—列斯尼琴科和普济斯基合译的袁珂《中国古代神话》(1965),以及李福清为《世界各民族的神话》(1980)编写的"中国神话",约共200则。

现、当代文学的翻译要比古典文学少,重要的有切尔卡斯基译的中国诗集系列(含近六七十年来的诗选):《雨巷(20—30年代中国抒情诗)》(1969)、《五更天(三四十年代中国抒情诗)》(1975)、《四十位诗人(20—40年代中国抒情诗)》(1978)和《蜀道难(50—80年代的中国诗歌)》(1987),共选入100多位诗人的诗作。另一个重点是小说,新译出的有:伊万科译茅盾的《幻灭》(1972),谢曼诺夫译老舍的《猫城记》(1969)和《赵子曰》(1979),切尔卡斯基译张天翼的《鬼土日记》(1972),罗果夫和克里夫佐夫译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和《小二黑结婚》(1974),索罗金译钱钟书的《围城》(1980)以及几本短篇小说集,分别选入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丁玲、王鲁彦、王统照、谢冰心、吴组缃、许地山、老舍等人的小说。此外,还有施奈德译《瞿秋白选集》(1975)和热洛霍夫采夫译邓拓的《燕山夜话》(1974)。

(二)文学研究成果

各类专著有:李福清著《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1961)、《中国的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1970)和《从神话到章回小说》(1979),热洛霍夫采夫著《话本——中国中世纪的市民小说》(1969),费什曼著《中国讽刺章回小说(启蒙时期)》(1966),谢曼诺夫著《中国章回小说的演变》(1970),谢列布里亚科夫著《中国10—11世纪的诗词》(1979),索罗金著《中国13—14世纪的古典戏曲》(1979),戈雷金娜著《中国中世纪的短篇小说:题材渊源及其演化》(1980)和《中国中世纪前的散文》(1983)。

文学理论和美学问题的论著有:戈雷金娜著《中国美文学理论)(1971)和李谢维奇著《中国古代与中古之交的文学思想》(1970)。有些著作虽为编译,但其注释和选材、序文也具有研究的深度。如《中国古代的无神论者、唯物论者、辩证法家——杨朱、列子、庄子》(1967,波兹涅耶娃编译)、《晚期道家论自然、社会和艺术》(1979,波梅兰采娃编注)。

综合性研究论著有:费德林的三部著作《中国文学研究问题》(1974)、《中国古典文学名著》(1978)和《中国文学遗产与现时代》(1981)。施奈德著《俄国古典作品在中国》(1979)。还有集体撰写的论文集,如《中国古典文学论文集》(1969)、《中国和朝鲜的文学体裁与风格》(1969)、《中国文学与文化》(1972,纪念阿列克谢耶夫90周年诞辰文集)、《苏联对中国文学的研究》(1973,庆祝费德林60寿辰文集)等。

作家专论有古代作家和现代作家评述。古代作家论有艾德林著《陶渊明及其诗歌》(1969),切尔卡斯基著《曹植的诗》(1963),谢列布里亚科夫著《陆游传论》(1973),马良文著《阮籍》(1978),别任(巴德尔金)著《谢灵运》(1980),费什曼著《中国17—18世纪的三位小说作家·蒲松龄、纪昀、袁枚》(1980)。

现代作家论有:施奈德著《瞿秋白的创作道路(1899—1935)》(1964),索罗金著《茅盾的创作道路》(1962),谢曼诺夫著《鲁迅和他的前驱》(1967),安季波夫斯基著《老舍的早期创作·主题、人物、形象》(1957),马特科夫著《殷夫——中国革命的歌手》(1962),阿直马穆多娃著《郁达夫和"创造社"》(1971),苏霍鲁科夫著《闻一多的生平与创作》(1968),齐宾娜著《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的剧作》(1983),尼古利斯卡娅著

《巴金创作概论》(1976)和《曹禺创作概论》(1984)等。

(三)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热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创作的迅猛发展立即引起汉学家们的注意。从70年代末起,苏联各种报刊就陆续译载反映我国改革之后社会巨变的作品,至80年代中期似乎已形成热潮。其翻译数量越来越多,仅以汇集成书的统计,至1987年,已翻译出版的中国当代小说,中短篇集有7部,收入小说60篇;长篇小说3部,诗集1部(收入22位诗人的30余首诗)。至于散见于各地报刊的则种类和篇数繁多,不计其数。不但有俄文,而且有乌克兰文等苏联其他民族文字的翻译。这种中国当代文学热一直持续到世纪末。

汉学研究力量已充分发展,形成一支强有力的汉学家队伍,陆续选出了4名科学院院士:齐赫文院士和米亚斯尼科夫院士、季塔连科院士和李福清院士。他们分别在史学、哲学和文学领域成为汉学研究的领军人物。而李福清院士还于2003年12月22日获中国教育部颁"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成为首位荣获我国政府奖赏的俄国汉学家。

二、莫斯科大学编出中国文学史教材

(一)教材简介

莫斯科大学从60年代初开始编撰出版四卷本的《东方文学史》,经高等教育部批准作为大学的通用教材。其中的中国文学部分篇幅相当大,共有700多页(大32开本)。

这四卷一套的教材分别定书名为:《古代东方文学》(Литература древ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62,修订版1971)、《中世纪东方文学》(Литература Востока в средние века, 1、2册,1970)、《近代东方文学》(Литература Востока в новое время, 1975)和《现代东方文学》(Литература Востока в новейшое время, 1977)。中国文学部分前三卷由波兹涅耶娃主编,后一卷由谢曼诺夫主编。执笔者多数为莫斯科大学的汉学家,有波兹涅耶娃、波梅兰采娃、马努欣、林林、乌斯金、古谢娃、沃斯克列辛斯基(华克生)、斯科罗鲍加托娃、谢曼诺夫、齐宾、德尔洛夫和尼科里斯卡娅等,还有科学院的杨申娜、鲍列夫斯卡姬、切尔卡斯基等。

这套书之所以值得重视，不仅因为中国文学部分数量大，还因为体例和内容都有特色，是全面系统而且比较深入的介绍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著作。

其一，分期不是中国传统的朝代分法，而是按世界历史的大时代分期，计分四个时代，即：

(1)古代文学，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2世纪，夏商周、战国和汉代文学。

(2)中世纪文学，从3世纪到17世纪前半期，六朝小说和诗、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

(3)近代文学，从17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即清代文学。

(4)现代文学，从1917年到1945年。

其二，体例按概述和专论两类安排。以古代文学卷为例。概述有：民歌(《诗经》)、演讲艺术(诸子)、编年史(《春秋》、《左传》)、乐府和理论等五章，分别综述各体裁的创作及发展概况。此外单设一章专论，用四小节分别论述屈原、宋玉、贾谊、司马相如4位早期诗人。又如近代文学卷，除“引言”和“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文学”这两章是概述文学发展情况外，其他六章都是专论，分别论李渔、洪昇与孔尚任、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李汝珍的创作。

(二)主编波兹涅耶娃

莫斯科大学教授波兹涅耶娃在中国文学教学、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研究上成就杰出，尤其编有这部别具一格的中国文学史教科书，是享有世界声誉的汉学家。

柳鲍芙·德米特里耶夫娜·波兹涅耶娃(Любовь Дмитриевна Позднеева，1908—1974)出生于俄国圣彼得堡的一个汉学世家，其父德·波兹涅耶夫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汉满蒙语专业，长期任教于东方语言各专业，曾任海参崴东方学院院长(1904—1906)，获中国颁授双龙勋章。伯父阿·波兹涅耶夫是蒙古学家，为海参崴东方学院的创校校长(1899—1903)。波兹涅耶娃1908年6月2日出生于日本，当时其父正携家眷在日本从事讲学和研究，1910年全家返回彼得堡。

波兹涅耶娃在中学和中等音乐学校毕业后考入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至1932年毕业。她在这里受业于俄、中两国本学科的两位大学者，即“苏

联首屈一指的汉学家”(郭沫若语)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和中国苏联文学翻译的先驱曹靖华教授。当年曹先生在参加北伐战争失败后,为逃避国内反动政府的白色恐怖而流亡苏联,任教于列宁格勒。波氏在大学 5 年始终由曹讲授汉语语言文学。她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是曹靖华的得意门生。后来,曹先生曾夸奖她是“难得的多面手,很有才气”。说她开卷能读古文,开口能讲白话,提笔能写很好的中文文章。当她 1956 年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曹先生正好在莫斯科出差,便欣然应邀出席她的答辩仪式。

波兹涅耶娃大学毕业后,从 1932 年至 1943 年在海参崴市任教,执教于中国师范专科学校、中国列宁学校和远东大学。后来两校校名分别译为“远东边疆国际师范大学、中国部”(见曹靖华《自叙经历》①)。在这里她结识了时任师范大学副校长兼中国部主任的张锡俦先生,后遂与之结婚。张回国后,解放初期就任刚成立的北京俄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前身)院长,成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首任校长。

远东大学撤销后,她便来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办的学校教中国学生俄语,同时为列宁军事政治学院教授中文,兼任外国文学出版社编辑。正是从此时,1935 年起时常发表作品:翻译了鲁迅、丁玲和老舍等现代作家的小说。她也为《世界文学》杂志撰稿。1943 年考入苏联科学院东方学所研究生班,并于 1944 年开始在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任教,以后转到语文系(亚非学院),仍教授中国语言文学。长期担任中国语文教研室主任。直到 1974 年 8 月 25 日去世,任教达 40 年。

波兹涅耶娃于 1946 年以《元稹的〈莺莺传〉》论文获副博士学位,1956 年以《鲁迅的创作道路》论文获博士学位,并于 1957 年和 1958 年先后晋升高级研究员和教授。以优异的成绩先后获颁罗蒙诺索夫奖金(1952)、罗蒙诺索夫奖状(1959)和奖章(1973)。

1. 教学工作上的一系列革新

波氏从 1949 年到 1959 年担任教研室主任,先是历史系东方语教研室,后为语文系中文教研室。再后来莫斯科大学成立亚非学院,她便成了学院的中国语言文学教研室主任(相当于今日之系主任)。她主管教学期间,以其远见卓识对教学工作实现了一系列改革。她认为,学生在具备中文实践能力之外,还应加强相关的理论修养和广阔的知识面。因此,在语

① 上海鲁迅纪念馆编《曹靖华纪念集》,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07 年,第 415 页。

言教学中引进汉语史和方言学课程，在文学方面则不局限于设范文选读课，而是在莫大，乃至于全苏率先开设了系统的中国文学史课程，同时增设西方文学和俄罗斯文学史等课。她从教学大纲、课程设置到教学讲义实现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使得该校培养出来的汉学人才在理论、知识和技能方面三者兼备，既可适应职业部门实践工作的需要，又有能力从事学术研究。这样，便引起教学工作面貌焕然一新。而且此项改革，还扩及整个东方语言文学的教学，波氏被视为东方学教学的改革家。

即以文学教学而言，莫大的文学史教程从横向上看，有东方文学的全貌，包括中国、日本、印度、波斯等所有东方国家文学；从纵向上看，以中国文学为例，即从古代、中世纪、近代到现代，呈现了发展历史的脉络。如今该校保存有一部完整的东方文学史，由四卷（五册）组成：《古代东方文学》、《中世纪东方文学》（1、2 册）、《近代东方文学》和《现代东方文学》。其中的中国文学部分系由波氏主编的，她同时和其他东方语文教授合力促成这部巨著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问世。这也是俄国高校使用唯一的大型中国文学史，正是波氏留给后代的一座永远纪念的丰碑。

从 1959 年至 1973 年，波氏虽然不再担任教研室主任的职务，但已是众望所归的学科带头人。她不断地促进教学改革工作的完善。在莫大任教 30 年，培养出一批批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

2. 编纂别具一格的中国文学史教材

波氏的学术研究一向兼顾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1949 年翻译出版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该书 1951 年获得苏联国家奖即斯大林文艺奖金（也是中国作家首次获苏联国家奖）提供了文本条件。1954 年她编选《鲁迅选集》四卷本（近 1500 页）并翻译了其中 1/3 的作品，她写出详尽的《跋》（“序”为费德林所作），其独特的见解甚至引起国外注意，还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表。在 1956 年以鲁迅为题的博士论文通过后，很快就于 1959 年出版为《鲁迅评传》[①]（三编九章 50 节，译成中文长达 56 万字），这是一部很有分量的力作。当这部著作在 40 多年后译成中文出版时，我国著名的鲁研学人林非教授就称赞：这位“俄罗斯汉学前辈，实在称得上是勤奋踏实和严肃认真地从事学术研究的榜样，她涉及的材料之广博，论述的笔法之精细”，列出的鲁迅文章之出处和背景材料，“真可以说

① 波兹涅耶娃著，吴兴勇、颜雄译《鲁迅评传》，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年。

是做到了无一字无来历,这种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确实是十分令人钦佩的",林非先生又说"鲁迅先生是一位博大精深和浩瀚无际的伟大作家和思想家……对他进行如此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无疑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劳作,何况还是出自她这位外国汉学家之手,就更令人惊叹不止了"。(《鲁迅评传》中译本序)

鲁研学人译者颜雄教授盛赞波氏数十年如一日,"勤奋谨严,实事求是的学风铸就了本书的学术品位",而且与同时代人相较,它是鲁研中"一部篇幅最大的评传式专著"(1959),56万字,而此前已出版的同类著作仅有:"曹聚仁《鲁迅评传》(1937)约20万字;小田嶽夫《鲁迅传》(范泉译,1946),不到10万字;王士著《鲁迅传》(1948),近35万字;朱正《鲁迅传略》(1956)是作略传写的,约10万字。"(《鲁迅评传》中译本后记)

此外,波氏还为苏联的"伟人丛书"撰写了一册《鲁迅》(1957)流传很广,后来在1971年为纪念鲁迅诞辰90周年,还被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

波氏在古典文学研究的著译甚丰,重要的有1954年为北京大学王力教授《中国语法纲要》俄译本作的序,由于纲要一书的例句大多数采自《红楼梦》,为便于俄文读者理解,波氏不得不在序文中全面而详细地评论那部古典小说,结果序文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迅即被我国评论界看中,由邢公畹译为《论〈红楼梦〉》于1955年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

波氏所译《列子》和《庄子》(1967)是俄国首次全译本,被她汇编成《公元前6世纪至4世纪中国古代的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和辩证法家——杨朱、列子、庄子》一书出版。

不过波氏的惊人之举还在于她所编的文学教材破除了中国文学史的传统体例。

在苏联,东方文学研究界中也持有欧洲文学"文艺复兴"的观点,起先是康拉德院士提出的(《中国文学史概论》1959)。此论一出,当年在苏联汉学界立刻舆论哗然,有不少人持反对的意见。汉学家费德林说:"就现有的资料来看,欧洲发生过的那种复兴或文艺复兴,对中国并不是必然的,我们有权把中国的文学艺术发展过程视作人类进化的世界性规律的实现,但绝不是欧洲模式或标准的某种变异。"(《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文学史的分期问题》,1968)①

① 赵永穆编选《费德林集》,奉真、董青子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页。

但在长期的争论中，波氏一直力挺康拉德。她不但赞成中国文学史上有“文艺复兴时期”，认为该时期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8—10世纪，即唐、宋代，为爱情自由抒情诗和短篇传奇小说流行；第二阶段在10—12世纪，宋末元前，盛行政论散文和哲理小说。而且她进一步发挥，主张中国文学史上还有“启蒙主义时期”（类似欧洲18世纪的启蒙主义文学）。当然，那也给这场论争激起更大的波澜。

论争归论争，波氏并不满足于空口议论，而是立即付诸行动：用欧洲文学的理论和观念来构建中国文学史的体例，编撰莫斯科大学版的中国文学史（乃至东方文学史）。

（1）分期，按世界历史的大时代划分为四个时代。

①古代文学，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2世纪，包括夏商周、战国和汉代。②中世纪文学，从3世纪到17世纪前半期，包括六朝和唐、宋、元、明代。③近代文学，从17世纪前半期到20世纪初，即清代。④现代文学，从1917年到1945年。

（2）内容，撰述按概论和专论两类安排。

她解释破除中国文学史传统体例的理由，认为那套传统的体例，其公式是“分期按朝代，分类看体裁”，有很大的缺点。一是那样的分期并不切合文学发展的过程，因为王朝的覆灭并不表示某种文学过程的终结。况且朝代分期失之过细，到底不如古代、近代、现代等大历史时代的概念清晰。再则，那样的分类只能反映某种体裁的“极盛时期”，如唐诗、宋词、元曲；不能告诉人以该体裁的发展过程，例如，戏曲不可能是在蒙古人入主中原那80年内才创造出来的，它在此前和此后如何？此外，旧的写法只能使人注意每一个国家文学的特点，却妨碍人去看待联结各国文学的共同特点。如果坚持每个民族按自己的朝代计算纪年，那就不能按历史的大时代来对各国文学的发展作总体的研究。如果坚持每个民族传统的体裁概念，那就看不到某种文学现象的共同点。

在比较文学界历来流行三种代表性的学术研究方法，即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类型学研究，分别代表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和俄国学派。不过多年以前有中国学者主张，还有第四种，系代表中国学派的研究方法，曰诠释法，即用欧洲文学的理论和观点来解释中国文学现象。如若此说成立，那么俄国汉学家应该早就开始实践了。波兹涅耶娃正是用了欧洲的文学史观来破除中国文学史的体例，并与她的同仁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撰写

了一部别样的中国文学史。不管它里面对一个个具体的中国文学现象的诠释是否正确，或是有某些过分比附之处，而且在俄国汉学界也还有断然相反的论辩；但它那种按大历史时代的分期，确实是俄国和欧洲汉学界向来的习惯，便于他们理解。一个“古代文学”的概念就便于他们联想世界文学范围内的相同背景，比单独去弄懂“楚”辞、“汉”赋的朝代观念要轻易得多。这不也是一种比较文学吗？所以波氏主编的那部文学史巨著能使俄苏学生接受。这可能也是为外国学者书写中国文学史提供了一个试验，即如何适应和引导本国读者更快地理解他们比较陌生的中国文学史提供了例子。

三、20 世纪末翻译和研究成果的归结

俄国在一个世纪内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有两项重大成果可以作为归结。翻译成果为“中国文学丛书”40 种，而研究成果则是《世界文学史》九卷本内之中国文学部分，或可视之为研究成果的结晶。

（一）“中国文学丛书”40 种

俄国翻译中国文学名著，从 18 世纪初开始，经过几代汉学家的努力，至 20 世纪 80 年代，此项工程已基本完成。译介的对象从古代文学诗经楚辞开始，延及近代，一直扩展到现代文学，从大师巨匠，扩展到中小作家，从书面文学扩展到口头文学。有的作品经过多人多次翻译，译品精益求精。有的名著通过多次翻译，达到返还原貌。例如某些章回小说曾经漏掉“有诗为证”部分诗词（因为难译），再版时已加以补足。《金瓶梅》70 年代初版时，译本为“洁本”（做了大量的删节）。90 年代再版时，已依据中文本从《绘图本金瓶梅词话》对第一版俄译本作了修订，补译了被删去的全部文字，以及附上所有绘图。译介作品也从零散走向集中的系统。从 80 年代起由国家文学出版社推出系列化的包罗古今名著的“中国文学丛书”（Библиотека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40 种，分批陆续问世。如《元曲》选本一册，为一种，而《金瓶梅》四册，也算一种。在苏联解体前的 90 年代初，大部分选目业已出书。这在当年依计划建设的年代，算是国家文学工作的一项重大工程，影响巨大而深远。

(二)中国文学史九卷本

文学研究的深化和研究成果的多面和配套,使得创作系统的文学通史成为可能。由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主导编撰了一部大型的《世界文学史》(История всемир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九卷,从1983年起分卷问世,至1995年已全部出齐。其中每一卷都有中国文学部分,串起来就是一部从古迄今的中国文学通史。具体内容为:

第一卷　中国古代文学的起源,包括商、周至秦朝文学。

第二卷　古代和中世纪,包括汉代至唐代和北宋文学。

第三卷　从文艺复兴时期,即13世纪末14世纪初至17世纪,包括宋末至清初文学。

第四卷　启蒙主义时期起和向近代过渡时期,包括清代前期文学。

第五卷　18世纪即清代中叶文学。

第六卷　法国大革命时期起至19世纪中叶,包括清代末叶文学。

第七卷　19世纪下半叶,包括清代末叶文学。

第八卷　1890—1917年时期,属于清末民初文学。

第九卷　从十月革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1945),为现代文学。

执笔者均系当代汉学家,每卷都有一位名家作主编,或撰写引论、综述,如有康拉德、谢列布里亚科夫、费什曼、李福清、谢曼诺夫等。每卷印行6万册。这是继莫斯科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科书(四卷本)之后,又一部巨型的中国文学史书,份量弥足珍贵,或可称之为"院本"。

只是那种按照欧洲历史分期观念来切割中国文学历史的各个时期,过分比附,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是故俄罗斯似应还需要写一部单叙中国文学的国别文学史。

四、李福清院士在中国文学研究上的贡献

李福清院士在2003年12月22日接受了我国政府教育部授予的"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这是授予国外最为杰出的汉语教育工作者和汉语语言文化研究者的专门奖项。李福清是俄罗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人。

（一）李福清中国文学研究的成就

李福清氏从民间文学开始，逐步扩展研究领域至俗文学、古典文学，进而中国传统文化。发表过一系列文著，其中主要著作《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Сказание о Великой стене и проблема жанра в китайском фольклоре）、《中国的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论三国故事的口头和书面异体》（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эпопея и фольклорная традиция в Китае. Устные и книжные версии《Троецарствия》）、《从神话到章回小说》（От мифа к роману. Эволюция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персонажа в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业已全译或部分译成中文。还有直接出版的中文著作《中国神话故事论集》、《李福清论中国古典小说》、《关公传说与三国演义》、《从神话到鬼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增订本改题为《神话与鬼话》）。

在专著以外，当然还有数量巨大的文章。近期出版的中文本《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中华书局，2003）则是从他的文章和著作选编出来的，篇目并经作者亲自审定，可以说是他的著作代表。

我同李福清氏交往数十年，读过不少他惠赠的著作，深感其研究方法独具特色。他运用俄罗斯文学、文化理论，乃至欧洲的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尤其是将俄国的历史诗学理论、系统研究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引进到中国文学研究之中，寻找到一条适合于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路子。这自然使他的研究别开生面，当然也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经验，可资借鉴。

俄国著名汉学家李福清研究中国文学的成就杰出，对汉学的贡献巨大。主要的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其研究涉及中国文学的各个领域，从古典文学到现当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研究，都广有建树。包括翻译、介绍、辑录、评论和阐释，他对中国文学的理解是创造性的，用比较的方式来分析中国小说，角度独特，提法新颖，很有内容。作家王蒙称赞李福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技巧在当代小说中的运用，分析得细致精当，有些议论则发前人所未发，甚至超过了中国同行。[①] 二、中国民间文学和俗文学，始终是他研究的一个重点，为不断探索和阐明对象，其成绩尤显突出。

---

① 晓蓉《王蒙盛赞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文艺报》1986年11月29日。

其理论所涉及的领域，有些在我国的同行中也颇感生疏。著名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教授认为，李福清提出许多民间文艺学上的问题，有的在中国民间文艺学者或不曾想到，或未曾涉及，可以说已成为他独特的一家之言了。[①] 三、对台湾原住民文化的研究，把它同大陆各族文化作比较分析。这是李福清氏近期在研究工作上更为辛苦，因而在成绩方面也更上了一层楼。他本来对台湾原住民并不了解，在60岁之后还不辞辛苦到当地去做田野调查，深入布农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中去访问、采录，搜集到大量素材，仔细整理，反复对比和分析研究，取得了超越前人的巨大成就。他也是超越了自己以往的研究路子，不仅仅是依靠书本的和典籍的资料，而是着重于田野调查，这正是他有别于当代其他俄国汉学家而独树一帜的重要标志，也是继承前辈导师阿翰林深入实地调研优良传统的体现。四、中国民间艺术研究。他非常熟悉中国民间艺术，研究卓有成效，不仅在论著中大量引用历代民间艺术，包括石刻、画像砖、墓雕、壁画、帛画、神像、戏剧道具、各种插图等，而且着重搜集并整理中国年画资料，开展专题研究。其搜集中国历代年画的范围不但有俄国的，而且遍及日本、德、英以及捷克、丹麦等国家，重点在中国已失传的年画，所获的种类和数量也是惊人的。艰苦的劳作造就了他敏锐和准确的鉴别力，其所编《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②]就是从5000多幅旧年画中挑选出来的200幅在我国已失传的珍品，最能说明他在年画研究上的功力。如今该书已在世界各国受到重视和珍藏，在中国大陆有的年画博物馆还盛情请他当顾问，而台湾还有民间艺术博物馆拟延聘他去当馆长。李福清氏在年画研究上继承了阿翰林的传统，并且在许多方面有了创新。

除中国文学之外，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文学，李福清氏也有评论和介绍，这从《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一书所附作者著述目录都可以看得出来，因而可以说他已超出汉学研究范围，足可称为东方学家了。

（二）在治学方法上

其中，值得提出他的学术研究方法，特别是深广开掘、比较研究和田野

---

① 李福清著，马昌仪编选《中国神话故事论集》，钟敬文《序言》，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

② 李福清、王树村、刘玉山编选《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

调查三种方法。

1.“选题要小，开掘要深”

李福清师承俄国著名民间文学理论家普罗普的传统，尤其铭记导师契切罗夫的指导：“选题要小，开掘要深”，从研究工作一开始，就精选题目，注意集中明确，避免笼统和作泛泛而谈。他的第一部专著《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1961)，[①]就是把孟姜女故事久远的传说资料，依照古代、近代、现代的历史脉络梳理下来，并且分类归纳，说明它在民间文学各种体裁中出现的情况，无疑是一部孟姜女故事流传过程的编年史，成了该题目研究史上罕见的一种专著。

李福清研究方法的特点是占有资料力求详尽，分析和处理材料力求细致，面面俱到，作深广的开掘，然后从小题目的论析，逐步提升到学术上的大道理，即所谓“由小见大”，从孟姜女故事一个具体题目，得出中国民间文学流传上的一般规律和总的理论问题的结论。

这样做的效果也是很明显的，令人感到资料翔实，论说有据，可以信服，而又不囿于一个题目的范围，可以看清一类学术问题的总规律。

其一，我们从该书书后附录的参考书目查看，除了路工《孟姜女万里寻夫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5)所用资料外，还有我国的同行研究者未曾用过的许多材料。他共用四类材料：

第一，散文体传说，计有刊本五种和钞本两种。分别采自《民俗》、《民间月刊》、《山东民间故事》(1937)、《民间故事》(1929)、《中国民间故事》(1958)等刊物和书中不同内容的《孟姜女故事》，还有陕西省文联钞本的《宜君县哭泉镇一带关于孟姜女的传说》。

第二，民歌，计有刊本和钞本各六种。有来自已出刊的湖南、甘肃、新宁、常州等地的孟姜女民歌，有江西、四川、浙江、河南等省文联和内蒙古文联的钞本当地孟姜女民歌，还有湖南孝歌《孟姜女送寒衣》等。

第三，说唱本，计有刊本六种和钞本两种。其中有“宝卷”的，有文明大鼓书、鼓词，还有河南坠子和福建评话的孟姜女唱本。

第四，戏曲，有刊本两种、铅印本三种和钞本九种。如云南省滇剧团、江西省赣剧团、北京市戏剧编导委员会等单位铅印的孟姜女地方戏。分别由七个省文联提供的钞本九种如：南昌采茶戏、湖南湘乡花鼓戏、山东茂腔、

① 见《中国神话故事》第274—295页。

山东二夹弦(荷泽新艺剧团)、川剧以及长沙市花鼓戏等的孟姜女地方戏。

他选择材料的方法是兼顾古今各种资料,不但有书面的,而且还有口头流传的,凡与孟姜女有关的各种体裁的材料统统搜集起来,加以利用。

其二,只要有丰富的材料为基础,李福清就可以对研究课题进行深入探索,多方考察,穷追究竟。正如他的导师契切罗夫所指出的:"研究工作要从小题目开始,题不要大,但挖掘要深"(《作者自序》第3页)。[①] 这个特点同样在李福清的这部专著中表现得很清楚。只要列举它的章目就足够说明:

第一章 孟姜女传说的研究;第二章 古代、远古文献、古诗、汉代散文有关杞梁妻以及乐府、汉赋有关万里长城的传说;第三章 唐代、文史典籍、敦煌资料、变文里的孟姜女传说以及唐代诗有关万里长城的题材;第四章 宋、元时代所记孟姜女传说、宋代民间艺人和文人作品中的孟姜女、宋元关于孟姜女的戏曲创作;第五章 明代传说、歌谣、戏曲里的孟姜女的形象;第六章 清代传说、宝卷、子弟书、鼓词、弹词、民歌、戏曲里的有关孟姜女以及历史文献中孟姜女题材;第七章 现代传说、散文、抒情叙事歌以及戏曲作品孟姜女的形象。

李福清在作了这样细致的历史考察之后,就得出有根据的结论:①中国民间文学最富有生命力(孟姜女故事流传了13个世纪,经久不衰);②人民所喜爱的故事情节往往有各式各样的表现形式和体裁。

正如作者所说,专著解答了他预设的两个问题:一是一个故事情节在口头传说中可以存活多长时间;二是一个故事情节在各种体裁中的不同表述。第一个问题有俄罗斯或其他西方民族的材料无法解决,因为没有像中国那么久远的记录。他把敦煌孟姜女变文的情节与现代流行的民间孟姜女故事加以比较,发现该故事至少存活了1000多年。

第二个问题,鉴于中国汉族民间文学有一个特点:同一个情节(plot)在各种体裁中反复出现,如孟姜女故事,有民歌,有鼓词,有弹词,有宝卷,还有地方戏等,可以研究这个题材在各种体裁中情节如何变化,如在传说中,孟姜女到长城的行程叙说得很简略,而在戏曲里则很详细,因为在戏曲里,可以用各种唱腔表达人物的感情。后来他了解到,庙里常演孟姜女戏,

① 本节中的页码均见于《中国神话故事论集》。

因为她走路与死人去阴间相似。[①]

其三，有了这样的研究基础，李福清就能有根有据地对中国的同行学者，从老前辈顾颉刚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学史》(1958)的作者们提出质疑、论驳，甚至指出某些人的若干谬误。这是这部专著的另一个特点，也是李福清引起我国学者重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2. 比较研究

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学术界曾以为苏联的文艺评论乃至学术研究都是只谈思想内容不讲艺术形式和艺术性，甚至是仍然实行庸俗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往往一言以蔽之，曰"教条主义"。这是看了50年代翻译过来的文章后产生的印象。殊不知近来已大有改变。我们不能说有上述弊病的文著已经绝迹。不过，自从20世纪50年代"解冻文学"思潮产生以后，文坛空气变换，文艺界重视艺术性已蔚然成风，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界对艺术性、艺术方法的理论问题也作了比较切实的研究。不但有俄国的现实主义理论问题，而且有西方的艺术理论、艺术方法论问题。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文学界对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也发生了强烈的兴趣，有使用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的和信息论方法的；心理学、社会学、价值学等观点的文艺著作也有不少种类问世。李福清的神话专著成书于70年代，恰好是这种变化的一个鲜明的例证，尤其是普遍使用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它表现在论析中国神话的两部专著中。

(1)用结构分析来作比较研究。他在博士论文即专著《中国的讲史演义与中国民间文学传统——论三国故事的口头和书面异体》(1970)[②]就是成功的例证。《三国》故事在作家文学作品和民间文学各种口头创作体裁中有多少变异，该书通过对比研究，便显得极为清楚。

他用结构分析的方法，把一个故事(段子)分成若干最基本的情节"成分"——包括时间地点(或场面)、人物(多少)、动作、彼此发生的联系等，即"情节素"。同一个故事的其他异文、异体也划分成细小的情节素，然后放在一起对比研究。例如《三国演义》的小说文本故事，与民间说书艺人同一故事的讲本作分析对比。这样，内容相同的故事，其表现手段(艺术手

---

① 李福清著，李明滨编选《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中华书局，2003年，第2—3页。

② 中译本书名是《〈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年。

法)的异同,就看得很清楚。李福清的独具匠心,也使人明显感到用结构分析的方法来比较研究作品的艺术手法会更加切实。

李福清用结构分析法不但说清了书面文学对口头文学的影响,而且具体探明了书面文学是如何利用民间文学中的情节、艺术手段以及语言的。

(2)从形貌的前后变化来作比较研究。他的另一部专著《从神话到章回小说——中国文学中人物形貌的演变》(1979)。[①] 据作者说,他从神话人物(伏羲、女娲、神农、大禹等)开始,包括七种宋元平话,直到《三国演义》和明代的神话小说,都作了比较研究,主要论题是探讨人物外貌描写的演变,从动物形态、半人半兽形态到完全的人身外貌,研究小说人物怎样保存古代人物的某些外貌特征。[②]

该书的《人类始祖伏羲女娲的肖像描绘》一章,对伏羲和女娲肖像的分析便是突出的例子。作者在"审视起于太古时期、止于古代的讲史演义中的人物肖像"后,得出结论:"中国对文化英雄的理解通常表现在对神话人物的肖像描写上。"其变化过程为"神话性英雄从兽形变为人兽合形,最终变为完全的人形"。

李福清几次谈到,他研究神话人物肖像,曾受了季羡林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里的印度传说》(1949)[③]一文的启发。一是发现了纬书的妙用。他说在其他古籍里"没有找到古代中国人想像伏羲外貌的任何线索"(第18页),[④]而"纬书……提供了从伏羲开始的神话人物的更详细的形象描绘"。二是发现了伏羲这位"始祖的纯兽形形象"。他进而阐明,中国许多神话始祖在他们以人形或人兽共体出现以前,都经历过一个纯兽形阶段。

正因为广泛分析对比了丰富的神话资料:典籍神话、活神话、文献的、书面的、口头的、文学的(小说、讲史、演义、平话、说唱文学)、艺术的(墓雕、石刻、壁画、年画、插图等)神话,在此比较分析的基础上他才能把中国神话从总体上分成四大体系。

此外,近期在论述台湾原住民的民间文学中,也还是采用了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从他1992年应邀到台湾清华大学讲学起,用了六七年时间

---

① 该书《作者的话》,《第一章 人类始祖伏羲女娲的肖像描绘》、《结论》的中译文见《中国神话故事论集》第13—83页。

② 《古典小说与传说》第5页。

③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87—94页。

④ 本节中的页码均见《中国神话故事论集》。

调研资料，分析研究，完成了一部专著《从神话到鬼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1998)。据作者说："在这本书中，我把台湾原住民神话和民间故事与中国大陆各族及菲律宾、大洋洲民族神话作比较，有些神话从黑龙江两岸少数民族到台湾许多民族都有，如射太阳神话，虽然后羿射日神话记载很早，但作比较研究可以证明古代中国后羿神话不是原始的，是在人类发展的较发达阶段形成的。"①

不但如此，在早期他就依据比较的方法发现过《红楼梦》在我国已失传了的一个抄本。"1963年初，我到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看到我的同学、好友孟列夫在整理那里收藏的敦煌文献。孟列夫说他发现了新的变文，还有其他友人说发现了别的文献。我很羡慕他们。夜间睡下，我就想，我是否也试着作一点调查，也许能发现什么孤本。我拿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作比较，看看我们是否有在中国和日本没有保存下来的古典小说版本。第二天到东方研究所，马上发现了1832年一位留学生库尔良德采夫从中国带回的《石头记》80回抄本。1986年，这部书由中华书局影印，称为'列藏本'"。②

3. 田野调查

应该说，李福清从进入中文专业起，就学习和养成了重视田野调查的优良传统。从当年千里迢迢由圣彼得堡横跨欧亚大陆来到中苏边境的东干族居住区采录民间文学，到近年由俄国远渡大洋到我国台湾岛采集原住民的口头文学创作，他都认真做着这项脚踏实地的工作。他回忆当年说道："1950年我进入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开始学习中文。那时没有中国老师，没有会话课，主要是读书，天天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一天，我在中文教研室看到一个人，像汉族人，但又有些异样，系'东干人'。原来他们是居住在苏联中亚地区的吉尔吉斯和哈萨克两个加盟共和国的中国甘肃、陕西回族移民的后代，其祖先是19世纪70年代迁居到这里的，甘肃来的说甘肃话，陕西来的说陕西话。我马上产生一个念头：利用暑假去学口语。"

"我来到一个甘肃回族人居住的集体农庄，叫米粮川。与农民一起劳动，学会话。第一次听到各种中国的民间传说、民间故事和民歌，如姜太公

① 《古典小说与传说》第8页。

② 影印本书名是《苏联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共六册，中华书局，1986年。

卖面、孟姜女哭长城、韩信传说、'男学生与女学生'(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由此,我对中国民间文学发生了兴趣。我把他们的传说、故事和民歌记录下来,回到列宁格勒大学,在图书馆找材料,但所获不多。1953 年和 1954 年,我又去了中亚,继续学习甘肃话、陕西话,并且专心搜集民间文学的口头资料,作记录既用拼音,又用汉字。大学的年级论文和毕业论文,我用上了搜集的这些材料,四年级的论文是《东干传统民歌初探》(1956 年在《苏联东方学》发表),五年级毕业论文是《中国成语、谚语和歇后语》,既参考中国出版的书籍,也用了自己搜集的材料。1958 年在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简报》发表的《韩信传说——东干人中流行的中国历史传说之一》,把我在米粮川记录的传说与书面材料作了比较研究。此前,除了广州《民俗》(周刊 66 期 1929,第 6—8 页),发表过张冠英《传说与史实——关于萧何、韩信的故事》之外,没有关于韩信传说的记录,我的记录可以说是最早的。1977 年,我与两位东干族学者合作,选编了《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我用自己记录的《白袍薛仁贵》与平话《薛仁贵征辽事略》、章回小说《薛仁贵征东》、薛平贵戏作比较,探讨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现一些故事情节由平话演变为小说,从小说演变为说书,又从专业的说书返回到民间流行的故事这样一个有趣的循环发展过程。"①

至于赴台湾的调研,他说得更为形象和充满艰辛:"我研究台湾的原住民(大陆总称高山族,实际上是九个不同的民族)民间文学,到台湾之前,我对那里的原住民差不多是一无所知,后来我从调查布农族开始,发现布农族民间文学非常原始,比台湾其他原住民还原始。布农族没有什么神,直到日据时期部落也无头目,他们不但跟其他台湾原住民一样没有笑话、谜语,甚至连谚语也没有,民间故事也很少,有时可以看到由神话演变出来的民间故事。他们的神话故事情节简单。我一共搜集了 150 个神话故事,后来我又调查了原住民部落,写了一些文章。"①

李福清氏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自取了中国名字就很能说明问题。这个名字在我国已经传开,为学界所熟知,以至于人们不大注意他的俄文原名 Борис Львович Рифтин,翻译过来应是鲍利斯·李沃维奇·里弗京。如今已是俄国汉学界文学领域学衔最高的人。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执着,则是他获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动力。

---

① 《古典小说与传说》第 2、8 页。

下　篇

第五章
中国神话、民间文学和俗文学在俄罗斯

一、俄罗斯的中国神话研究综述

（一）先有神话观才有神话

我国古代本来有丰富的神话故事，因为孔夫子主张“勿语怪力乱神”，影响到后人很少去记载、搜集和整理，未能留下如古希腊神话那样系统的神话典籍。反而是外国人较早注意中国神话，作过探寻和考察，出了成果。俄国汉学家即可为例。他们已据史料试行重构古代神话，开展神话研究，提出了颇具见地的观点。

圣彼得堡大学教授、汉学家格奥尔吉耶夫斯基早在1892年就写出第一部中国神话研究专著《中国人的神话观和神话》。他是讲授中国古代史的，依据散见于《诗经》、《尚书》、《礼记》、《搜神记》、《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献通考》等古籍里的神话资料，探讨了范围广泛的神话，提出了一种见解，认为在中国“神话观先于神话而存在”，只有“天空是倾斜的”这种观念为主导，才可能产生共工氏的神话。有了神话观作前导，人们才会相信神话、传播神话。

他说：“中国人曾经认为星空中也存在着同地上一样的事物，”并具体描述了从天空的观念逐步转化为天帝的观念。于是从太阳神话、月亮神话到帝王神话便一系列展开，无限丰富地发展起来，所有伏羲、神农、黄帝、帝喾、尧、舜等帝王形象都是依照中国人的神话观创造出来的神话故事。不过，后来孔子加以利用，塑造成理想的帝王形象，千古不绝地流传下来了。

从格氏开始,100多年内,俄国研究中国神话的文著络绎不绝,举其大者,如1918年海参崴东方学院讲师马佐金著文《中国神话中帝王与图腾崇拜》。60年代莫斯科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希娜推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题材》系列论文,并于70年代翻译出版了《山海经》俄译本(1977),她对这部保存神话故事最多的古书还做了大量的注释。东方学所另一位汉学家李谢维奇也在60年代写出一系列论文《中国神话的宇宙模式与五行学说》、《古代皇帝神话与外星人假说》等。还有中国当代学者袁珂编的《中国古代神话》全书被译出了俄译本(1965),在俄罗斯及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流传和引起研究的兴趣。

这之中,成绩最显著者当属俄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李福清,他为80年代出版的俄编《世界各民族神话百科辞典》撰写了系统的中国神话词条200余条,提出了重构古代神话的理论,并且试行构建,至90年代又进一步发展,出了《从神话到鬼话》(台湾出版,1998)一书。

(二)重构古代神话的必备条件

鉴于中国神话未曾完整地集中记录在某一部书籍里,但神话故事又十分丰富,今人负有依据史料将其恢复和重构的任务。为了重新构建,李福清主张,神话"要以整体的观点去研究",即散见于各处的神话故事,"典籍神话,活神话,文献的,口头的,文学的(包括小说、讲史、演义、平话、说唱文学等),艺术的(含墓雕、石刻、壁画、年画、插图等),大凡与古神话有关的,都是构建中国古神话的材料,不可偏废"。

李不但提出总的构建理论,而且做了重构古神话的尝试,其专著《从神话到章回小说》就可为例证。该书有一章《人类始祖伏羲女娲的肖像描绘》就因使用了"纬书"的材料而显得有深度。据李说,注意神话人物肖像,是受了北京大学名教授季羡林先生一篇文章的启发。季羡林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里的印度传说》(1949)一文中曾引用《春秋纬合成图》所载一则材料:"伏羲龙身牛首,渠肩达掖,山准日角,大目珠衡,骏毫翁鬣,龙唇龟齿,长九尺一寸。"认为"纬书时代所记大人物相貌奇异怪诞,事实绝不可能有的",都是从印度传说中来的。

李福清由此注意神话人物相貌,进而去查纬书,终于有两大收获。一是发现了纬书的妙用。他说,在其他古籍里"没有找到古代中国人想像伏羲外貌的任何线索",在纬书里却有,而且纬书中"提到的神话未必是纬书

作者们想出来的，极有可能是他们……采用了起源于古代神话和传说的传统观念”。这样，纬书“对于我们这个论题特别有意义”，因为“纬书……提供了从伏羲开始的神话人物的更为详细的形象描绘”。二是发现了伏羲这位人类“始祖的纯兽形形象”，他进而阐明，中国神话始祖在他们以人形或人兽共体形出现之前，都经历过一个纯兽形阶段，这个发现对于构建古神话无疑是重大进展。

“纬书”者，“伪书”也。以往文人因为它“伪”，历来不予重视。它对于写正史，也许不足为凭，但对于构建古神话来说，它却也有特殊的作用。李福清通过科研实践证实了自己理论的正确。

（三）神话为小说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在《人类始祖伏羲女娲的肖像描绘》一章，李福清对伏羲和女娲肖像的分析，是认真依照神话人物研究的方法进行的。他考察了起自太古、止于古代的讲史演义，专注于其中的人物肖像，经过归纳和分析后得出结论：“中国对于文化英雄（按，即文化人物，或神话人物）的理解，通常表现在对于神话人物的肖像描写上。”这就是说，这类人物的肖像是如何被描绘的，或描绘成什么形状，往往体现了人们对它的态度、看法，体现了人们对它承认的程度。依据古人对它的观念之变化过程，就使得其肖像也有了变化的过程：“神话英雄（神话人物）从兽形变为人兽合形，最终变为完全的人形。”此其一。

其二，“古代神话人物的肖像属于典型的静态描写”，随后逐渐演变，发展到后期，在“章回体的小说中，才有了情态肖像”，随着“肖像情态的加强，已是文学中具有个性特征的现代英雄人物即将出现的标志”，也即“现代型英雄人物造型的萌芽”了。

这里谈的是神话，但李福清已引向文学（小说）的结论。这正是《从神话到章回小说·中国文学中人物形貌的演变》（1979）这部专著的特色。

中国章回小说向以肖像描写见长，历代评家、注家，如胡应麟、冯梦龙、金圣叹等，对此有过许多精彩的评述。对于三皇五帝以及其他帝王的相貌特征，史书、纬书、历代笔记小说中也不乏记载。但是专门从人物肖像描写入手，对自远古神话开始，到元、明两代的讲史演义和章回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都作历史的、全面的考察，揭示二者的渊源关系，进而论述人物形象和艺术流派是如何演变的，李福清则是第一人。

李氏作为神话专家,他有特别的视角:从人物肖像描写入手追踪中国章回小说的缘起,这也是他这部专著的特色。所以中国社科院神话学专家马昌仪研究员称赞李福清"《从神话到章回小说》把我们带进一个崭新的、过去极少有人涉足的领域"。①

(四)中国神话四大体系

俄国学者研究中国神话,注重使用系统研究的方法:一方面要有微观的探索,细致入微,涉及各个层面;另一方面善于作宏观概括,梳理出体系。前者如俄国民间文学专家和神话学家普罗普、契切罗夫所提倡的"选题要小,开掘要深",逐个个案都研究钻透。后者即李福清所试验的,把中国神话从总体上分成四大体系,即:

1. 中国远古神话。其特征是"神话人物的历史化",即把传说中虚构的神话人物,解释成历史上实际存在过的人物。"地位显赫者成帝王,次之为臣相,余则类推"。

2. 道教神话。公元初年,道教哲学家把古代民间崇拜与多神教信仰熔于一炉,道教神话中的主要人物就是"形形色色的驱鬼道士"和"成千的仙人"以及"各路神祇",他们受辖于"老子、黄帝和盘古"。

3. 中国佛教神话。"公元初年佛教传入中国,同时带来一整套发达的神话体系"。逐渐演变出一批以中国人为主人公的佛教人物,如观音菩萨。

4. 后世民间神话。即"形形色色古老的或再生的民间信仰",以及"儒家所信奉的圣人以及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各路英豪"。如孔夫子变成文昌帝君,关羽变成关公(关帝君)。

李福清认为,唐代以后,几个神话体系日趋融合,"把道教、佛教、民间神话以及儒家所信奉的英雄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以李福清为代表的俄国神话学派已受到我国学者的重视和肯定。著名民间文艺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敬文(1902—2002)曾为李福清的《中国神话故事论集》中文本作序,盛赞李的成就,说"他理论所涉及的领域,有好些在我们也是颇感生疏的","他指出了许多民间文学上有意味的问题,有的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看了作者的论述,很佩服他的眼光和学力。"

---

① 李福清著、马昌仪编《中国神话故事论集》"编者的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8 年,第 9 页。

李福清院士则自称："我的旨趣在于用俄罗斯文学理论研究中国文学，尤其是民间文学、通俗小说、戏曲和俗文学。"自然，中国神话只是其中的一个研究领域而已。

二、俄国人撰写的第一部论中国神话的专著

（一）格奥尔吉耶夫斯基著《中国人的神话观和神话》（Мифические воззрения и мифы китайцев，СПб，1892）

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教授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格奥尔吉耶夫斯基（С. М.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1851—1893）在俄国第一个开始研究中国神话，并有独到的见解。他于1873年在莫斯科大学毕业，1875年又入圣彼得堡大学，受到瓦·瓦西里耶夫的培养，毕业后不久，即讲授汉语和中国史，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重要论著除《中国初史（迄于秦始皇）》（1885）、《对反映古代中国人民生活史的象形文字的分析》（1888）外，还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研究中国神话的专著《中国人的神话观和神话》（1892，圣彼得堡）。

在这部专著中，作者指出：神话观先于神话而存在。例如共工氏的神话，只有在"星空是倾斜的"这种观念的主导下才能产生。有神话观为基础，人们才会相信神话、传播神话。

格奥尔基耶夫斯基依据《尚书》、《诗经》、《礼记》、《搜神记》、《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献通考》等书的资料，对中国人的神话观及其演变过程作了描述。例如怎样从天空的观念转化为天帝的观念。他说："中国人曾经认为星空中也存在着同地上一样的事物。"

该书探讨的神话范围相当广，从太阳神话、月亮神话到黄帝等帝王神话，材料丰富，对后来的研究者很有启迪作用。例如它论述远古流传下来的民间神话同后来文人们"幻想"出来的故事之间的关系，指出道家文人"常常以民间神怪传说为基础，把那些已经脍炙人口的情节加以敷演铺陈"而成小说。而后又重新进入民间与早先流传的神话并存。我们可以从当代学者李福清把中国神话分成四大体系（中国远古神话、道教神话、佛教神话与近世民间神话）中，看出格奥尔吉耶夫斯基观点的若干影响。

格奥尔吉耶夫斯基认为伏羲、神农、黄帝、帝喾、尧、舜等帝王形象，是依中国人的神话观所形成的民间神话中的形象，后来孔子加以利用，塑造

成理想的帝王形象。这种观点也是很有见地的。[①] 格奥尔吉耶夫斯基由研究中国史,进而形成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观,认为对中国持傲慢甚至敌视的态度是错误的,并且他主张与中国友好将造福于世界。这些看法也是很可贵的。他具有学者的开阔眼光,第一个提出汉学应是研究中国的多部门学科的总和的见解。

(二)其他人的神话论文

俄国人写的另一篇论著是马佐金的论文《中国神话中帝王与图腾崇拜》(载《东方学院师生纪念建校 18 周年论文集》,符拉迪沃斯托克 1918 年出版)。文中推断,中国神话中帝王相貌具有动物特征,与希腊古代神话中的图腾概念残余是同一类现象。这种看法曾是启发当代学者李福清注意考察中国古代神话英雄人物的形象的一个因素,例如他在《从神话到章回小说》一书中考察"人类始祖伏羲女锅的肖像描绘"等。

苏联时期投入较多精力研究中国神话的有杨希娜(Э. М. Яншина, 1924—)。她是东方学研究所研究员。曾以《中国古代神话》论文(1965)获副博士学位,此外还写过《论汉墓浮雕的某些形象(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 2 世纪)》(1961)、《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题材》(1963)、《关于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1974)等论文。最能集中体观其研究成果的要算是《山海经》(Каталог гор и морей) 的翻译注释工作。《山海经》是中国现存古籍中,保存神话故事最多的一本古书,其神话资料最为丰富,而且未经多少改动,比较接近古神话的原始面貌,故极为珍贵。苏联汉学家早就注意到它的价值,但直到杨希娜经多年努力,才于 1977 年第一次出版了俄文的全译本。她做了大量的注释,包括解释神话词汇、植物矿物、山川地理名词等。同时,她写了一篇前言,详细回顾了该书的研究史,广泛介绍中国和欧洲研究者的各种见解,也有对该书结构的分析。这应该说是译者长期研究心得的汇集。

主要研究先秦文学的汉学家李谢维奇也写过《中国神话中的宇宙模式与五行学说》(1969)[②]、《古代黄帝神话与外星人假说》[③]、《以宇宙时代人

---

① 参阅李福清《中国神话论》"中国古神话研究史初探"一节。

② 载《东方文学的理论问题》文集,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1969 年,第 262—268 页。

③ 《今日亚非》, 1974 年第 11 期,第 44—46 页。

的眼光看古代神话》(1967)[①]等论文。

谢列布里亚科夫的文章《论古代中国的美学概念》(1967)[②]也兼论中国神话问题。

还有费德林的论文《中国神话的题材特点》(1967)。[③]

袁珂《中国古代神话》一书的俄译本在1965年出版(由李福清作序)也促进了中国神话在苏联的传播和研究。此外,已译成俄文的还有干宝《搜神记》(Гань Бао: Записки в поисках духов, 1994),孟列夫译。

当前,在这个领域成就最大者当推李福清。

三、李福清关于中国神话的论著

(一)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李福清(鲍里斯·李沃维奇·里弗京,Б. Л. Рифтин, 1932—　)不仅研究中国神话,主要还研究中国俗文学和民间文学,有着多方面的成就。他中学时就喜爱文学,尤其想学汉语,以便将来研究中国文学。1950年考入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中文科,1955年毕业后到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工作,研究东方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他初上大学时,就已经从过去由中国境内移居俄国的回族人学习汉语口语。那些中国回族的后代聚居在苏联中亚地区,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境内,称为东干人。他们所使用的东干语是在甘肃和陕西方言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李福清到了那里,既学会话,又采录他们的口传民间文学。他大学期间在阿翰林门下受过正规的汉学教育,在古汉语、古文字学、史学等方面都有坚实的基础。后来又得到著名民间文艺学家、神话学家普罗普、契切罗夫等的指导。

他在50年代搜集到大量有关孟姜女故事的资料,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综合,写成《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长篇论文(1961),获得副博士学位。接着从民间文学转向中国通俗小说,探讨两者的关系。在认真分析大量有关"三国"口头的和书面异体的基础上,写出

---

① 《苏联民族学》1976年第2期,第139—150页。

② 《亚非国家语文学和史学·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庆祝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科学讨论会论文提纲》(文集),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48—50页。

③ 《历史、语文研究·庆祝康拉德院士75岁寿辰文集》,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1967年,第381—390页。

《中国的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论三国故事的各种口头和书面异体》(1970)专著,获得博士学位。随后他对中国古代通俗小说进行历史溯源,以研究所得写成《从神话到章回小说·中国文学中人物形貌的演变》(1979)。至此,李福清已完成他的三部主要论著。

他在神话研究方面,还有《中国神话论》(1987)和为《世界各民族的神话》百科辞典(上下册,1980—1982)撰写的有关中国神话的词条200余条,其中作为绪论的《中国神话》条尤其受重视。

他除了上述专著,还写了许多关于中国原始文学、民间文学、通俗文学、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文章。中国文学之外,像蒙古、日本、朝鲜、越南等国文学,他也做了评论或介绍。从这点看,他不仅是汉学家,而且是东方学家。

后来李福清又发表另一本著作《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小说、戏曲)》(1987)。他已发表的著译近180种。学术成绩卓著,是一位有国际影响的汉学家。他于1987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2008年晋升院士,成了在俄苏以研究中国文学而被推举为科学院士崇高地位的第三人(前两人是瓦西里耶夫院士,阿列克谢耶夫院士)。

李福清现为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在李福清多方面的学术成果中,为他赢得国际声誉的,主要是有关中国民间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著述。现在,有关他在中国民间文学,包括神话方面的学术成果,已由我国民间文学专家马昌仪编选成《中国神话故事论集》,并翻译出版,[①]这为我国专家和读者提供了方便(本章以下各节所引资料,凡未另注出处者,均引自该书)。

我国著名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教授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给李福清以高度的评价,认为后者知识博洽、有科学敏感性、论证的态度严肃与公允相结合,以及其科学的分析能力,特别是善于采用系统论观点和结构分析方法。这位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老前辈赞赏李福清"对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的探索和阐明",说:"他理论所涉及的领域,有好些在我们已是颇感觉生疏的,如对于文学,特别群众文学体裁间关系的研究,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第4页)。"还说,李福清"指出了许多民间文学上有意味的问题,有的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看了作者的论述,很佩服他的眼光和学力"(第6

① 李福清著,马昌仪编《中国神话故事论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

页)。

李福清搜集研究资料之多和全面。也极受我国专家的称赞,例如他所搜集的有关孟姜女的故事及材料,有许多是我国孟姜女研究者从未提及的。我国郑振铎和顾颉刚这两位前辈学者为此对当时只有20多岁的李福清大加赞扬(马昌仪:《编者序》第4页)。又如他为苏联《世界各民族的神话》百科辞典和《神话辞典》撰写的有关中国神话的词条达数百条之多。"有一些是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中所没有的"(第11页)。

马昌仪则断定李福清的研究有"其独特的个性",那"就是把苏联历史诗学传统运用于中国文学的分析和研究"(第14页)。其具体表观为:"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文化理论(特别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为依据。二、重视系统研究。内容与形式关系密切,根据不同的材料,不同的研究对象,采用不同的方法:结构论、符号学、统计学等,但方法只是手段,不能成为指导原则而起主宰作用。三、遵循历史诗学原则,把在发展中研究(历时的)与在联系中研究(共时的)有机结合起来。四、从诗学的、审美的角度研究民间文学,强调民间文学的社会功能和认识功能。五、作风严谨,重视资料工作(第16页)。"

同时,李福清有关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也得到我国专家学者的肯定。他的《论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及其作者》①、《中国当代小说中的传统因案》②、《兰陵笑笑生和他的长篇小说〈金瓶梅〉》③等文以及研究蒙古、回族创作的文章都已译成中文介绍给我国读者。当他1986年应邀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在大会上作《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传统成分》报告时,曾倍受赞扬。著名作家王蒙认为他对中国文学的理解是创造性的,用比较的方式分析中国小说,其手法与古典暗中契合。他的角度独特,提法新颖,很有内容。王蒙说,李福清"对于中国古典小说传统技巧在中国当代小说中的运用分析得细致精当,在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中国人"④。

---

① 中译文见《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2期。

② 中译文见《当代文艺探索》1987年第2期。

③ 中译文见《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4期。

④ 晓蓉《王蒙盛赞中国文学国际讨论会》,《文艺报》1986年11月15日第1版。

（二）《中国神话》和《中国神话论》

李福清对中国神话学的贡献，马昌仪在《编者序》中概括成三个方面：一是“向苏联及世界读者介绍中国神话。为中国神话进入世界神话之林，进入各国神话学家、民族学家、原始文化史家的视野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体现在翻译、编撰和评介有关中国神话的辞书上。二是“对中国神话的理论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专著《从神话到章回小说》就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三是“为构建中国古神话作了努力”（第 11 页）。按照他的主张，神话“要以整体的观点去研究，典籍神话，活神话，文献的，书面的，口头的，文学的（小说、讲史、演义、平话、说唱文学等），艺术的（墓雕、石刻、壁画、年画、插图等），大凡与古神话有关的，都是构建中国古神话的材料，不可偏废”（第 12 页）。

《中国神话》（《世界各民族的神话》百科辞典上册，1980 年）是李福清论神话的重要作品之一。他把中国神话从总体上分成四大体系，即一、中国远古神话，借几部古籍中的（片段）记载得以重构，其特征之一是“神话人物的历史化”，神话人物“被阐释成上古的历史人物。地位显赫者成帝王，次之为臣相，余则类推”。作者说：“神话英雄的人化是中国神话所特有的现象，而神话的历史化加速了这一人化的过程”（第 84 页）。二、道教神话，公元初年“道教哲学家把古代民间崇拜与萨满信仰熔于一炉，演变为宗教”。他们按自己的需要吸收某些古神话形象（黄帝、西王母），认为蓬莱、方丈、瀛洲这三个神山的传说，“其观念是从中国远古神话中借用来的”，又说道教神话的主人公主要是“形形色色的驱鬼道士”和“成千的仙人”以及“各路神祇”。他们受辖于三种抽象而神秘的象征：太初、太素、太易，后来逐渐人化，“变成老子、黄帝和盘古”（第 92、93 页）。三、中国佛教神话，“公元初年佛教连同一整套发达的神话体系自印度经中亚传入中国，它“适应中国条件的需要”，“利用了中国古神话的某些情节，逐渐出现了一批以中国人为主人公的佛教人物，如观音菩萨”等。还有，“在中国，对地狱及名目繁多的审判的细节描写，则是佛教影响的产物”（第 93、94 页）。四、后世民间神话，即“形形色色古老的或再生的民间信仰”以及“儒家所信奉的圣人以及全国性或地方性的各路英豪”。与远古神话人物的历史化过程相反，“各式历史人物经历了神化的过程”（第 94 页）。李福清认为“10 世纪末，中国原有的几个神话体系日趋融合”，“把道教、佛教、民间

神话以及儒家所信奉的英雄联合成一个统一的体系”(第95页)。

这种四大体系的分法,尽管还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甚至不会都被接受(编者序第12页),但作为国外的学者,能提出这样系统的看法,也显示了他的功力和研究的独特性。

《中国神话论》是为袁珂《中国古代神话》一书俄译本再版(1987)写的后记。这篇八万多字的长文,进一步发挥了李福清的中国神话理论,包括比较研究方法在神话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其中《中国古神话研究史试探》一节系统论述了中国和各国神话学者所著中国神话文、论中的主要观点,并分析其得失。虽然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已具有历史的轮廓,有着开创的意义。文后所附中国神话研究目录索引,据李福清说,它比正文的意义更大,因为这是迄今最全的目录,俄文、西文、中文(中国大陆、中国港台、新加坡等)的书(文)目已尽数囊括于其中。[①]

(三)《从神话到章回小说》(От мифа к роману. Эволюция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персонажа в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本书的特色,正如马昌仪所概括,是从人物肖像描写入手追踪中国章回小说的缘起。“中国小说向以肖像描写见长,历代评家、注家(如胡应麟、冯梦龙、金圣叹等)对此有过许多精彩的评述。对于三皇五帝以及其他帝王的相貌特征,史书、纬书、历代笔记小说中也不乏记载。但是,专门从人物的肖像描写入手,对自远古神话开始,到14—16世纪讲史演义与章回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特征进行历史的、全面的考察,揭示二者的渊源关系,从逻辑概括的角度展示人物形象以及艺术思维的发展演变过程的,却自李福清始。《从神话到章回小说》把我们带进一个崭新的、过去极少有人涉足的领域”(第9页)。

该书的《人类始祖伏羲女蜗的肖像描绘》一章,对伏羲和女蜗肖像的分析便是突出的例子,也是该书的重要内容。作者在“审视起于太古时期、止于古代的讲史演义中的人物肖像”后,得出结论:“中国对文化英雄的理解,通常表现在对神话人物的肖像描写上。”而其变化过程为“神话性英雄从兽形变为人兽合形,最终变为完全的人形”(第73页)。

---

① 见袁珂《中国古代神话》俄译本,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7年。

此外,“古代神话人物的肖像属于典型的静态描写”,然后发展到后期,在“章回体的讲史小说中,就有了情态肖像”,“这种肖像情态的加强,是文学中已具有个性特征的现代型英雄人物的概括反映的萌芽”(第74、76页)。

这里还有一件趣事值得一提。李福清几次谈到,他研究神话人物肖像,是受了北大季羡林先生一篇文章的启发。季羡林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里的印度传说》(1949)①一文中曾引用《春秋纬合诚图》所载一则材料:“伏羲龙身牛首,渠肩达掖,山準日角,麟目珠衡,骏毫翁鬣,龙唇龟齿,长九尺一寸”,认为“纬书时代所记大人物相貌奇异怪诞,事实决不可能有的”,都是从印度传说中来的。李福清由此注意神话人物相貌,进而去查纬书,终于有两大收获。一是发现了纬书的妙用。他说在其他古籍里“没有找到古代中国人想象伏羲外貌的任何线索”(第18页),而纬书中“提到的神话未必是纬书作者们想出来的,极有可能是他们……采用了起源于古代神话和传说的传统观念”。这样,纬书“对于我们这个论题特别有意义”,因为“纬书……提供了从伏羲开始的神话人物的更详细的形象描绘”(第19页)。二是发现了伏羲这位“始祖的纯兽形形象”(第19页)。他进而阐明,中国许多神话始祖在他们以人形或人兽共体出现以前,都经历过一个纯兽形阶段。这无疑是重大进展。

四、戈雷金娜论中国古代神话志怪小说的专著

戈雷金娜(К. И. Голыгина,1935—2009),生于莫斯科,1959年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1966年以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理论的论文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1966年起为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员。1970年代起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传奇与笔记小说。著作:《19—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理论》(1971),《中世纪中国的短篇小说:题材渊源及演化》(1980),《中世纪前的中国散文》(1983),《太极——1至14世纪文学与文化中的中国世界模式》(1995)。译作:《剪灯新话》、《浮生六记》(1979)。

戈雷金娜的《太极——1至14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中的世界模式》(《Великий предел:Китайская модаль мира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культуре Ⅰ-ⅩⅣвв.》М., Вост. лит., 1995, 363 с.)运用原型批评和文化人类学的

①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87—94页。

观点与方法，把中国古代神话、诗歌以及后世的小说与远古时代的宗教祭祀仪式和占星术联系起来考察，提出了不少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

我国学者李逸津对该书内容写了一段精要的概括：

“《太极——1至14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中的世界模式》一书共363页，除前言与结语外，分为六章：第一章《仪式的记录——文章中的〈萨满书〉》，讨论‘祭司之言’及其在艺术与文学中的作用，仪式与占星术，仪式的记录——文章中的《萨满书》阶段，建立在‘祭司之言’上的文学中的第一批形象，在传统语文学理论词语中流行的宗教仪式的反映和文章起源的观念等问题。作者提出《易经》是古代巫师祈祷祭祀用的《萨满书》的变体，在《春秋》、《庄子》、杨雄《太玄经》中都有对古代占星术的记录，《山海经》具有记录古代仪式的文献功能，《楚辞》实际上是《祈祷书》。而《诗经》中的许多诗篇，都可以从古代祭天仪式的角度加以解读。第二章《在文学中的历史意识，历史的人的揭示》，通过《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燕丹子》、《赵飞燕外传》等取材于历史故事的六朝志怪小说，研究了历史传记与志怪小说的关系。第三章《3—6世纪的神话故事：文化密码和基本叙事结构的形成》，论述了3—6世纪短篇小说的特点，这一时期短篇小说的基本叙事结构和叙事逻辑，小说中的世界模式和文化密码的形成，本体论的世界观念和文学理论等问题。第四章《小说叙事的形成，7—9世纪的短篇小说》，研究7—9世纪短篇小说的一般特点，故事情节在小说叙事形成中的作用，这一时期小说中民俗神话因素的变换和日常生活情节的开发等问题。第五章《10—14世纪初的叙事小说》，从讨论这一时期的小说选集、文本及作者入手，研究了10—13世纪小说中的传统象征及对作者个人因素的探寻，宋代小说中的政治乌托邦和权利与义务的观念，小说中的‘新’‘旧’英雄，书面与口头传统在10—14世纪初小说中的反映，神话原稿在10—13世纪小说中的命运等问题。第六章《在10—13世纪世界观探索中的世界和人的形象》，论述了宋代哲学家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和朱熹等人学说中的世界模式和自然与人的观念。”①

① 李逸津《戈雷金娜对中国古代神话志怪小说的文化人类学解读》，《俄罗斯文艺》（三十周年增刊），2009年10月；闫纯生《汉学研究》第十二集，学苑出版社，2010年，第328—329页。

五、李福清论民间文学孟姜女和三国故事

（一）《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Сказание о Великой стене и проблема жанра в китайском фольклоре）

李福清研究中国民间文学的特点，是占有资料力求详尽，处理材料的方法独特。这从《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一书中看得非常清楚。该书于1961年由东方文学出版社出版（莫斯科），主要内容已由马昌仪作了译述（第274—293页）。从书后附录的参考书目看，除了路工《孟姜女万里寻夫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5年）所用资料外，还有我国的同行研究者未曾用过的许多材料。他共用四类材料：

1. 散文体传说，计有刊本五种和钞本两种。分别采自《民俗》、《民间月刊》、《山东民间故事》（1937）、《民间故事》（1929）、《中国民间故事》（1958）等刊物和书中的不同内容的《孟姜女故事》，还有陕西省文联钞本的《宜君县哭泉镇一带关于孟姜女的传说》。

2. 民歌，计有刊本和钞本各六种。有来自已出刊的湖南、甘肃、新宁、常州等地的孟姜女民歌，有江西、四川、浙江、河南等省文联和内蒙古文联的钞本当地孟姜女民歌，还有湖南孝歌《孟姜女送寒衣》等。

3. 说唱本，计有刊本六种和钞本两种。其中有“宝卷”的，有文明大鼓书、鼓词，还有河南坠子和福建评语的孟姜女唱本。

4. 戏曲，有刊本两种、铅印本三种和钞本九种。如云南省滇剧团、江西省赣剧团、北京市戏剧编导委员会等单位铅印的孟姜女地方戏。分别由七个省文联提供的钞本九种，如南昌采茶戏、湖南湘乡花鼓戏、山东茂舶、山东二夹弦（荷泽新艺剧团）、川剧以及长沙市花鼓戏等的孟姜女地方戏。

他选择材料的方法是兼顾古今各种资料，不但书面的，而且口头流传的，凡与孟姜女有关的各种体裁的材料统统搜集起来，加以利用。

有丰富的材料为基础，李福清就可以对研究课题进行深入探索，多方考察，穷追究竟。正如他的导师契切罗夫所指出的：“研究工作要从小题目开始，题不要大，但挖掘要深”（《作者自序》第3页）。这个特点同样在李福清的这部专著中表现得很清楚。只要列举它的章目就足够说明：

第一章　孟姜女传说的研究
第二章　古代关于杞梁妻的传说与孟姜女故事
　远古文献中杞梁妻的形象
　古诗中杞梁妻的形象
　汉代散文体作品中有关杞梁妻的传说
　乐府中有关万里长城的题材
　4—7 世纪诗歌里关于长城的传说
第三章　唐代记载的孟姜女传说(7—10 世纪)
　文史典籍中的孟姜女传说
　敦煌资料中有关孟姜女的民谣
　变文里的孟姜女传说
　唐代诗歌里有关万里长城的题材
第四章　宋、元时代所记载的孟姜女传说(10—14 世纪)
　宋代民间艺人的创作
　宋代文人作品中的孟姜女
　12—14 世纪关于孟姜女的戏曲创作
第五章　　明代关于孟姜女的传说(1368—1644)
　有关万里长城的歌谣
　明代戏曲里孟姜女的形象
　作为典范的孟姜女的形象
第六章　清代关于孟姜女的传说(1644—1911)
　宝卷中有关孟姜女的作品
　子弟书中有关孟姜女的传说
　鼓词里的孟姜女
　弹词里有关孟姜女的传说
　清代民歌和戏曲里的孟姜女形象
　历史文献中关于孟姜女传说的题材
第七章　现代记载的孟姜女传说
　散文体传说
　关于孟姜女的抒情叙事歌
　关于孟姜女的戏曲作品

李福清在作了这样细致的历史考察之后,就得出有根据的结论:一是

中国民间文学最富有生命力(孟姜女故事流传了13个世纪,经久不衰);二是人民所喜爱的故事情节往往有各式各样的表现形式和体裁。

有了这样的研究基础,李福清就能有根有据地对中国的同行学者,从老前辈顾颉刚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学史》(1958年)的作者们提出质疑、论驳,甚至指出某些人的若干谬误。这是这部专著的另一个特点,也是李福清引起我国学者重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中国的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论三国故事的口头和书面异体》(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эпопея и фольклорная традиция в Китае. Устные и книжные версии《Троецарствия》)

李福清的这部专著详细考察了三国故事各种口头的和书面的异体、异文;分析民间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之间的关系,证明不是只有前者影响后者,而是二者相互都有影响。这种研究在民间口头文学领域也具有开拓的意义。此外,本书从方法论上来看也有特殊的意义。

在一段时间里,我国学术界曾以为苏联的文艺评论乃至学术研究都是只谈思想内容不讲艺术形式和艺术性,甚至是仍然实行庸俗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往往一言以蔽之,曰"教条主义"。这是看了50年代翻译过来的文章后产生的印象。殊不知近来已大有改变。我们不能说有上述弊病的文著已经绝迹。不过,自从"解冻文学"思潮产生以后,文坛空气变换,文艺界重视艺术性已蔚然成风,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界对艺术性、艺术方法的理论问题也作了比较切实的研究。不但有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问题,而且有西方的艺术理论、艺术方法论问题。[①] 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文学界对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有使用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的和信息论方法的;心理学、社会学、价值学等观点的文艺著作也有不少种类问世。[②] 李福清这本专著成书于70年代初,恰好是这种变化的一个鲜明的例子。

他用结构分析的方法,把一个故事(段子)分成若干最基本的情节"成

---

① 梅特琴科《继往开来——论苏联文学发展中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布罗夫《艺术的审美本质》,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56年。《苏联现实主义问题讨论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

② 阿·奥干诺夫《反映论和艺术》,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78年,第4页。

分”——时间地点(或场面)、人物(多少)、动作、彼此发生的联系等,即马昌仪所译的称为“情节素”(编者序第 9 页)。同一个故事的其他异文、异体也划分成细小的情节素,然后放在一起对比。这样,内容相同的故事,其表现手段(艺术手法)的异同,就看得很清楚。李福清的独具匠心,也使人明显感到用结构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作品的艺术手法会更加切实。

试以诸葛亮看周瑜病的故事为例。①

他把《三国演义》第 49 回的这一段子分成 26 个情节素,而在民间说书艺人的讲本中,这同一段子分成的情节素数目大不一样,扬州的康重华是 109 个,苏州的唐耿良是 60 个,苏州的陆耀良是 93 个。从对比中看出,说书人讲的基本动作均来自《三国演义》,但在讲的过程中,结构发生了变化,有的段落被捏合,有的被展开。加强了描写性,尤其是人物内心的描述。增加间接引语、插叙等口头说书时所必需的艺术手段。结果作品当然就扩展开来了。

李福清用结构分析法不但说清了书面文学对口头文学的影响,而且具体探明了书面文学是如何利用民间文学中的情节、艺术手段以及语言的。

然而作者并不限于表现形式上的研究,而是仍然要谈思想内容。他所实行的系统研究方法,就是把作品当作一个系统,对思想内容、语言以及其他各种表现方法都加以研究。

应该说,结构分析和系统分析是本书在方法论上两个最值得指出的特点。

六、斯佩什涅夫的《中国俗文学》

列宁格勒大学教授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斯佩什涅夫(Н. А. Спешнев, 中文名司格林, 1931—　　)所著《中国俗文学》(Китайская простонарод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科学出版社,1986 年,320 页),是苏联第一部这个领域里的专著。它是以综合论述中国当前流行的说唱文学为主旨的。苏联在这个领域的工作开展得比较晚,这是由于研究文学的汉学家人数不多,主要都投入古典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了。此外,说唱文学对于外国人来说是比较难的一个领域,不但汉语要好,而且要有直接听和看的机会,才能帮助理解。这就不是所有汉学家都能做到的。别看说唱文学(曲艺)在中

① 《中国的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70 年,第 405—421 页。

国相当普及，是通俗化的范畴，在苏联却是“阳春白雪”。《中国俗文学》这部专著只能印行2600册。

比较来说，斯佩什涅夫确有研究说唱文学的优越条件。他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1987年在列宁格勒，我们看到当地报纸报道他刚当选为由北京大学朱德熙教授领导的“世界汉语教学研究会”（苏联）常务理事的消息。[①] 他为此感到自豪。据他说，小时候（三四十年代）就在北京街头听过流浪艺人和乞者的弹唱，在60—80年代又有机会几次重来中国，而且都能看到舞台演出的曲艺节目。所以他研究说唱文学，不但得到著名相声演员侯宝林的指导，有许多古今的印本材料，而且有亲自录下和搜集到的磁带以及唱片等有声资料作依据。他的专著就很有特色，由于此书他获得了博士学位。

（一）国外研究中国俗文学的情况

斯佩什涅夫在书中简要回顾了国外研究中国俗文学的历史。他指出，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正式研究中国俗文学的工作，是在新中国诞生以后才开始的。

然而在旧俄，零散的工作已有人做过。在19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汉学家德明在其《中国纪行》中已经写到演唱民间文学作品的情况（第38页和302页的注11）。[②] 瓦西里耶夫院士19世纪中叶逗留中国期间曾搜集不少弹词及其他小型的民间文学作品。伊凡诺夫斯基则在20世纪末搜集到一些鼓词。在里加的国立拉脱维亚大学历史语文系保存一份唯一的中文手稿，系著名汉学家施密特（1869—1938）所搜集的。该手稿是一位中国人的手迹，不但有曲，而且有“书帽”，即说书人一边开讲一边等听众到齐时所说的那段故事前的开场白（第38和304页的注88）。

汉学家和蒙藏满学家潘克拉托夫（1892—1979）搜集到一批数来宝，是他的一位中国同行30年代在北京直接从民间艺人的演唱中记录下来的，大约有200多件作品。这批珍贵的数来宝藏品已于1968年由他转赠列宁格勒一位汉学家尤·李·克罗尔（1931—　）收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和传统的数来宝相比，从内容和形式上看都有所不同（第39页）。

---

① 《列宁格勒真理报》，1987年9月6日。

② 尼·斯佩什涅夫《中国俗文学》，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6年。本节下引页数同见此书。

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中国民间风情录》(1966)等书中对说唱文学也有所记载。费德林的《中国见闻录》(1958)则写到他遇见著名盲说书人韩起祥的情景。

中国俗文学真正作为苏联汉学家的科研对象,则是在50年代末。孟列夫第一个向苏联翻译和阐释了"讲唱文学"这个术语。[①] 谢罗娃论述京剧有许多地方同讲唱文学相近,而讲唱文学则常常从京剧里移植一些曲调。而孟列夫则对宋代的诸宫调和唐代的变文都有所研究,写了一组论变文的文章。它们对这些中国讲唱文学的体裁之兴起和发展历史作了概要的叙述。经孟列夫整理出版的俄文译本变文已有三种。在《维摩碎金(维摩诘经文残卷)》和《十吉祥》(莫斯科,1963)的前言中,他论析了变文韵文部分的韵律。在《双恩记》(莫斯科,1972)前言中,他谈了变文的思想内容(佛教与孝道)和结构。在《妙法莲华经变文》(莫斯科,1984)中则谈到变文的讲唱方式和讲唱人等问题以及变文词汇的特点。

热洛霍夫采夫研究宋代话本时提到它的起源是民间文学中一种"说话"的体裁。李福清则主要考察评话与评书这两种体裁的来龙去脉。对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之一评话进行研究的还有巴甫洛夫斯卡娅。而斯图洛娃则研究宝卷,索罗金接触到民间文学的另一种体裁"杂剧"(见第40—41页)。但这些研究多涉及以前的历史,而且也没有形成集中论述俗文学的专著。

其他国家研究中国俗文学的也是自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的。首先应提到捷克汉学家普实克院士。他从50年代起多次来华,直接听和看过各种曲艺表演,曾写过一组论文,后来又于1967年出版一本论中世纪话本的专著。[②] 其他两位捷克汉学家赫尔德里奇卡和赫尔德里奇科娃也写过不少论述中国民间讲唱文学的文章,前者着重谈大鼓词,后者谈旧中国民间说书人的师徒关系以及怎样培养说书人。这些文章也多发表于五六十年代。

近年来西欧也开始注意中国说唱文学。如法国汉学家、巴黎第七大学教授莫里歇特·劳尔·居拉里和巴黎第三大学教授雅克·皮姆潘诺研究

---

① 孟列夫《论诸宫调体裁和刘致远的诸宫调》,《苏联与东方各国的语文学和史学问题》文集,莫斯科,1961年。

② 普实克《话本的起源和作者》,布拉格,1967年。

中国的相声(第42页、311页的注286)。在1982年,苏州的评弹甚至到意大利的威尼斯参加汇演,在当时举行的评弹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有60多位研究东方艺术的专家参加。

美国对中国说唱文学也很关注。有美国汉学家史清照(译音)于1956年到台湾进修四年,向著名女艺人张翠凤(译音)学习大鼓词。[①] 史现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副教授,写过《大鼓词》的学位论文。加利福尼亚大学东方语系中文和比较文学教授西里尔·贝尔奇也研究说唱文学。著名中国学者赵元任的女儿赵如兰(现为哈佛大学教授)专门研究单弦。哥伦比亚大学的珍里·施密特则研究西河大鼓。

在美国,从1969年8月起出版一本《中国口头文学与舞台表演文学新闻》(年刊),后于1976年改名《中国口头文学与舞台表演文学报》。该年刊系由著名学者赵元任和30年代曾在燕京大学任教英国文学史的哈罗德·舍狄克倡议创办的,专登中国说唱文学(讨论消息、报道以及理论研究等)方面的文章。

(二)《中国俗文学》的主要内容

在这部首次用俄文写的系统介绍说唱文学的专著中,斯佩什涅夫解释郑振铎提出的俗文学概念,包括从远古流传下来的民谣,11至12世纪的戏曲,以及各式各样的讲唱文学体裁如唐代的变文,12至13世纪的鼓子词和诸宫调,晚些时候的宝卷、弹词和子弟书。郑著《中国俗文学史》在30年代末出版,写的正是这类文学的历史。而斯佩什涅夫的专著则是对中国现在流行的讲唱文学,即从1949年中华全国第一次文代会起使用的术语"曲艺",作综合的论述和分析归类。因为中国讲唱文学的种类,包括各地的品种实在太多,专著只能把长江以北地区最流行的体裁作为研究的对象。

全书分四章,还有引言和结束语。第一章综论"讲唱文学的特点及其在中国当代生活中的地位"。其他三章则把说唱文学划成三类分别作介绍。

关于分类,斯佩什涅夫在书中介绍了中国传统的分法有七大类,分别为大鼓,渔鼓道情,琴书,弹词,牌子曲,时调小典,走唱(第22—23页)。

---

① 张翠凤《大鼓生涯的回忆》,台北,1967年。

正如有的中国研究者所指出的，这一分类法“有分类过细，界限不够清楚的缺陷”，[①]所以又出现另一种分类法，“分为相声、快板快书、鼓曲、评书四大类”。[②] 而斯佩什涅夫在专著中则将它分为“唱体”、“韵诵体”（诗体）和“散文讲体”三类。

第二章论述的“唱体”（唱词）有大鼓、河南坠子、牌子曲或单弦儿，以及鼓曲的前身子弟书。本书和同类的中文著作（侯宝林等著《曲艺概论》）一样，也以河北民歌改编为鼓曲唱词的《小两口抬水》为例，说明这种体裁的特点。但是作者援引李福清1951年夏天在苏联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的一个叫米粮川的村子里采录到的东干族民歌《十岁的丈夫》来作对比，说明同样是十八岁的小大姐嫁给十岁的小女婿的内容，这来自甘肃的回族后裔东干人的民歌与河北的民歌有密切的关系（第46—48页和304页的注94）。作者在叙述“大鼓”时，提到了它的15种地方曲种：京韵大鼓、梅花大鼓、京东大鼓、木板大鼓、西河大鼓、乐亭大鼓、唐山大鼓、东北大鼓或辽宁大鼓、安徽大鼓、山东大鼓、梨花大鼓、胶东大鼓、河洛大鼓、湖北大鼓、长沙大鼓，并尽可能作了介绍。可见本书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第85—91页）。

第三章论述的“诗体”包括数来宝、快板、快板书、山东快书、金钱板、天津快板，以及这种“诗体”的起源——莲花落。其中快板又细分为小快板、单口快板、多口快板和快板曲，这些都一一作了介绍。

第四章“散文讲体”着重介绍评书和相声这两种形式。尤其是相声，作者举了大量实例以说明这种形式的特点，它在中国流行的情况。所举相声实例大多是在中国很受欢迎且流传很久的节目，如《连升三级》、《打电话》、《照相》等，均全文引入书中。

当然，正如作者所说，“本专著所考察的仅仅是中国北方最流行的一些典型的说唱文学体裁。对于中国南方为数众多的说唱文学体裁未能予以顾及”（第300页）。他意识到，这还不是“中国俗文学”的全部内容。要做到与书名所标示的内容相一致，还有待于作者将来进一步搜集资料、扩大范围和深入研究（第301页）。

---

① 侯宝林、汪景寿、薛宝琨《曲艺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6页。

② 侯宝林、汪景寿、薛宝琨《曲艺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6页。

第六章
先秦文学在俄罗斯

一、古代诗歌传俄综述

古代诗歌是俄国研究中国诗歌的三个重点之一(另两个重点为唐诗和现代诗)。有许多汉学家从事古诗翻译。《诗经》、《楚辞》、汉赋、乐府、《古诗十九首》以及晋诗的名篇都已译成俄文,并已有了分别论《诗经》、乐府、屈原、曹植和陶渊明的专著五部。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汉学家,在概括其成果和经验时对中国文学有高度的评价和精辟的论断。费德林就说:"中国的《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等优秀文学著作是任何一个国家所望尘莫及的。"

《诗经》(Шицзин)的翻译最早可追溯到1852年,《莫斯科人》杂志以《孔夫子的诗》为题登载了《诗经》选译。此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已知的选译就有15种以上。全译本出现于1957年,由什图金译,科学出版社出版,共610页。

《楚辞》的大部分作品也已译成俄文。最集中的两种译作是由费德林编并作序的《屈原诗集》(Цюй Юань, Стихи),分别出版于1954和1956年,各为159页和304页,选入《离骚》、《九歌》、《天问》、《九章》、《卜居》、《渔父》、《招魂》等,并附译自《史记》的《屈原列传》。在1958年出版的吉托维奇译的《中国朝鲜诗选》中又选译《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惜诵》、《涉江》、《哀郢》、《神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等。宋玉作品的俄译有《对楚王问》、《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五篇,见于阿列克谢耶夫编的《中国古典诗歌》一书。

乐府的译介始于1935年。有休茨基译的《古诗为焦仲卿妻所作》(Стихи о жене Цзяо Чжун－цина),载于康拉德编的《东方》第一卷。该卷书中共选入了20首乐府诗:《有所思,乃在大海南》、《孤儿行》、《上山采蘼芜》、《迢迢牵牛星》、《饮马长城窟》、《陌上桑》、《十五从军行》、《青青陵山柏》、《东门行》、《妇病行》、《董娇娆》、《孔雀东南飞》、《驱车上东门》、《悲愤诗》、《客从远方来》。乐府诗最集中的译本是由瓦赫金译并序的两种。一为《乐府·中国古代诗歌选》(Юэфу. Из древних китайских песен),1959年出版,全书406页,其中汉代乐府占80页。另一种为《乐府·中国中世纪抒情诗选》,1969年出版,111页。

汉赋中只有司马相如和贾谊的部分作品译成俄文。司马相如被译介的较多,有《天子游猎赋》、《子虚赋》、《大人赋》、《哀秦二世赋》、《长门赋》等篇。贾谊被译介的仅《吊屈原赋》和《鹏鸟赋》两篇。以上均见于费德林编选的《中国诗歌选集》第一卷,1957年出版。

建安文学俄译本的代表作是切尔卡斯基译的《七哀〈曹植诗集〉》(Семь печалей: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Цао Чжн),于1962年和1973年各出一版,分别为143页和166页。曹植诗的名篇如《七步诗》、《薤露篇》、《泰山梁甫吟》、赠《白马王彪》、《洛神赋》、《弃妇诗》、《野田黄雀行》、《怨歌行》、《美女篇》等都一再被译载于诗选或刊物中。曹操的《观沧海》、《短歌行》、《苦寒行》,曹丕的《燕歌行》,王粲的《登楼赋》,蔡琰的《悲愤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籍的《清思赋》等也被译成俄文。

晋诗的翻译以陶渊明的作品为最多。自1935年休茨基翻译《桃花源记》(Персиковый источник)以来,至1984年统计,已发表的陶诗的俄译有22种。其中以艾德林译并序的两种单行本为最流行。一为《陶渊明抒情诗集》(Тао Юаньмин. Лирика),1964年出版,151页。一为《陶渊明诗集》,1972年出版,238页。艾译陶诗选本之所以受重视,是因为它已包括了诗人的主要作品,如致亲人诗、致友人诗、咏怀咏史诗等,特别是广为传诵的名篇诸如《归园田居》、《归去来兮辞》、《杂诗》、《饮酒》、《止酒》、《拟古》、《读山海经》、《咏贫士》、《桃花源记》等。

俄国对中国古诗的研究相当重视。老一代汉学家许多人是从译介和研究古诗起家的,特别是研究《诗经》。第一个以研究中国文学成绩卓著而当选为科学院院士的俄国汉学家瓦西里耶夫(1818—1900)对《诗经》下的工夫极深,他在《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中最早全面系统地向俄国读

者介绍《诗经》,以大量的翻译作品为例,详细阐释了“风”、“雅”、“颂”三类诗的内容及特点,连带讲述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国情。他指出:“《诗经》,特别是《国风》部分,基本上是中国古代民间口头创作的典籍。”并以古论今,说:“如果有人对中国今日的民歌也加以注意,那将是很有意义的……在中国各个地区,必定存在着富有地方色彩的歌谣。”

论《诗经》的专著有费德林通讯院士所著《〈诗经〉及其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Шицзин” и его место в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该书全面评论了《诗经》,包括它的来源、历代对它的理解以及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等。他认为,《诗经》表明古代中国人民的民间口头创作已经具有高度的艺术水平,充满正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他说《诗经》是“绵延三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的发轫阶段,是中国文学优良传统的开端”。

这部专著篇幅不大,全书共166页。但论述相当深入,除前言和结束语外,有四章分别论述“风”、“小雅”、“大雅”和“颂”几种体裁的特点,另有两章叙写《诗经》的起源和《诗经》的诗学及中国的诗歌传统。尤其是后一章对俄文读者更有帮助,使他们从总体上认识中国文化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

费德林不但对《诗经》,而且对《楚辞》也很有研究。几年前出版的他的专著《屈原》(1986年,156页)就是个例子。此书可以说是他近50年积累的研究心得。早在1943年他就以《屈原的生平与创作研究》论文获博士学位。他的近著则从中国的文学史背景,即从宏观上来论述屈原。作者认为屈原的创作渊源于中国的神话和《诗经》,因而首先对中国神话展开论析,同时也利用原先的基础谈论《诗经》,然后对屈原的生平和创作,尤其是诗人的名篇作了深入浅出的讲述。虽然费德林利用了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但把屈原的作品放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来考察,也使人读出了新意。①

中国文学的渊源,特别是古代诗歌的起源问题吸引了不止一位俄国汉学家的注意力,就此专题发表论著者不少,瓦西里耶夫和阿列克谢耶夫两位最有名的汉学家都曾著文涉及。当代的汉学家李谢维奇经过多年的研究,完成了专著《中国古代诗歌与民歌》(1969年)。他在这部著作中集中探讨了“乐府”这种诗歌形式是怎样由中国古代的民谣俗曲,逐步演变成

① 赵永穆编选,奉真、董青子等译《费德林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

“文学上”的乐府的。对乐府作如此详尽系统的分析，在苏联还是第一次。在形成专著以前，作者已经发表过论乐府的系列文章，如《中国古代的民间格言歌》、《弹唱和中国古代民间创作的若干问题》、《中国早期诗歌的形式和内容问题》、《中国文学体裁概念的产生（风、雅、颂）》等。专著不过是在此基础上深入一步，进而谈论乐府的艺术特色，包括艺术手法、诗节和韵律等。论述乐府的还有瓦赫金、波兹涅耶娃等人，但以李谢维奇为突出。

探讨诗人的创作同民间诗歌的关系，也是俄国汉学家注意的一个问题。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员切尔卡斯基的专著《曹植的诗》（1963），可为例证。作者写作此书的重点内容之一即是论述曹植诗歌同民歌的关系，在第四章“民歌与曹植”中就分析了曹植诗受《诗经》、乐府和古诗的影响，揭示它是怎样从四言诗逐步过渡到五言诗的，然后进一步论述曹植是如何创新的。当然《曹植的诗》一书所谈的不限于此，它是俄国对曹植的创作做出全面分析的唯一专著。

晋诗的研究重点是陶渊明。1916 年阿列克谢耶夫在论《二十四诗品》的专著中就提到司空图受陶渊明的影响，接着在 1920 年的《中国文学》一文中再次论及陶渊明，说陶“在中国诗歌上显然起到了俄国的普希金的作用”。费德林在 1957 年论中国古典诗歌时肯定了陶渊明的示范作用。艾德林在 1957 年发表的专著《陶渊明和他的诗》（494 页）则是俄国全面论述陶诗的唯一著作。该书融评、注、译于一炉。前半部书是评论部分，设 16 节系统分析陶渊明的生平与创作，尤其重视陶诗的风格，认为它在中国诗歌史上开了一代新风，并以《归田园居》、《归去来兮辞》、《拟古》、《咏贫士》、《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等名篇为重点进行分析，讲解陶诗的风格及特点。同时，作者还把陶渊明同俄国诗人茹科夫斯基、苏联诗人布洛克作对比，以便更鲜明地揭示陶诗的风格，还用托尔斯泰追求“自我完善”的思想来对比陶渊明世界观中的儒释道思想，进而分析陶的“退隐田园寄情山水”的实质，指出陶的“遁世”并不是消极的，而是“更积极、更富有战斗性地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在教学领域，系统讲授中国古诗并把它引入高校课堂的则有瓦西里耶夫和波兹涅耶娃两位教授。前者于 19 世纪在喀山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执教时曾系统讲授中国文学史，并编出教材《中国文选·翻译和注释》三卷（1896、1884、1882）。其中 1882 年出版的第三卷有 160 页，标明“《诗经》的翻译和注释”，它同作者的《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配套，对《诗经》作

了深入的讲解。后者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莫斯科大学执教时，在她主编的《东方古代文学》教材（1962年）中设了专节分别讲述《诗经》、《楚辞》（屈原、宋玉）、汉赋（司马相如、贾谊）、建安文学以及陶渊明等，是俄国第一次最详细讲授中国古代文学的高校教材。

除此之外，费德林1956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要》中有一章“文学遗产”从《诗经》讲起，扼要地介绍了中国古代至五四运动以前的文学。艾德林和索罗金合著的《中国文学》（1962年出版，251页）一书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作了简要的描述，其中对《诗经》、《楚辞》、乐府、汉赋、晋诗、建安文学等，包括屈原、曹植、陶渊明等作家和其作品都作了论述。它在俄国起到了普及中国文学（包括古代文学）的作用。

二、《诗经》（Ши цзин）的俄译和费德林的《〈诗经〉及其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

《诗经》传入俄国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出过不少译本（全译或节译）和研究者，而写出专著者唯有老资格的汉学家、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费德林（1912—2002）。

（一）《诗经》的译介

苏联汉学家研究中国诗的情况，从文学史上来说有三个时期是他们注意的重点：古代诗歌（包括公元3世纪以前）；唐代诗歌（大体从7世纪至9世纪）；现代诗歌，即20世纪的诗歌。

在古代诗歌中，《诗经》尤其受重视，已知的节译本（或诗篇）就有15种以上。①

最早的研究者是瓦西里耶夫院士（1818—1900）。他毕业于喀山大学语文系东方科。1840年随同东正教派驻北京的教士团来华学习，在北京居留十年，接触到中国古代的灿烂文化，广泛搜集各种典籍。回国后先后担任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教授，讲授汉语、满语和中国史地与文学，成为俄国第一个中国文学研究家。

---

① 此处的统计仅截止到苏联解体前的80年代。1991年解体后成果的发表已分散到各独立国家，或由民营出版社运作，难有集中的资料计算，甚至有挂一漏万的情况，是故不再追踪统计。以下各章节同此理，不另逐一注明。

瓦西里耶夫的讲稿后来汇集成《中国文学史资料》和《中国文学史纲要》出版。后一种书于1880年问世。其中有一章介绍“儒学的三部古书——《诗经》、《春秋》、《论语》”。作者认为“全部中国文明，整个广博而多样的中国文学之基础是儒学”，因为“儒学跟中国人可以说已是血肉相连的了”。不过他之所以重视《诗经》，还有文学本身的原因。他认为《诗经》是中国文学之精华，在书中大量译介《风》、《雅》、《颂》的篇和段作为例子，详细阐释三类诗的内容及特点，对各代的注家也提出意见。指出毛亨、欧阳修、孔颖达直至朱子（熹）等人的注解有哪些地方值得商榷。瓦西里耶夫的结论为：《诗经》是一部民间诗歌集，并且希望“如果有人对中国今日的民歌也加以注意，那将是很有意义的……在中国各个地区，必定存在富有地方色彩的歌谣”。研究中国民间文学的当代苏联汉学家李福清非常重视瓦西里耶夫的见解，认为这种看法在当年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指瓦氏）说这番话还是在刘半农等五四时代人物在全国开展搜集民歌活动的30年以前”。

单篇的译文最早发表的，是1852年第1卷的《莫斯科人》杂志上所载的《诗经》选译（《孔夫子的诗》）。

后来有米哈依洛夫、米勒尔等人译的《诗经》五首，载入《中国和日本及其诗歌》一书（1896）。在收入此诗集前，这五首译诗已先期发表在杂志和别的书中。米勒尔译诗见《国民教育部杂志》1861年第2期，米哈依洛夫译诗见其《诗集》，柏林出版（1862），及《诗集》，圣彼得堡出版（1890）等。

革命前出版的还有《诗经·淑女》，载入叶戈里耶夫和马尔科夫的《中国之笛》一书中（1914）。

革命后的译文有《中国诗人的诗经选·压迫》，奥列宁译，载《银幕》1925年第45期。波兹涅耶娃译《七月》、《硕鼠》，载《世界古代史文选》第1卷（1950）。伊茨译《破斧》、《伐檀》等首，载《世界古代史文选》（1956）。波兹涅耶娃、斯特拉塔诺维奇译的《七月》等14首，载《东方古代史文选》（1963年）。

《诗经》全译本出现于1957年，由科学院出版社出版，610页，包括译文和注解。译者是著名汉学家什图金（1904—1964），他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后到东方学院任教，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的《诗经》译本很受欢迎。同年又由国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译本节选，298页。

研究《诗经》的论文作者主要有阿列克谢耶夫、德鲁梅耶娃、李谢维奇、费德林等。

(二)费德林的专著

费德林于(Н. Т. Федоренко) 1958 年出版的专著《〈诗经〉及其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Шицзин" и его место в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166 页),除"前言"和"结束语"外,计分六章,分别论述《诗经》的起源、"风"、"小雅"、"大雅"、"颂"以及《诗经》的诗学和中国诗歌传统。

作者对中国历史上研究《诗经》的著作有系统的了解,广泛使用它们的材料并借鉴历代名家的论点,从汉毛亨,唐孔颖达,宋王应麟、朱熹、欧阳修、苏辙,直至清王夫之、段玉裁、王国维,以及现代的郑振铎、郭沫若、陆侃如、冯沅君、王瑶等,凭借着深厚的基础,对《诗经》作了全面系统的评述,就该书的来源、历代的理解(包括儒家的某些曲解),以及思想内容、艺术特点都有涉及。在苏联是第一本系统的《诗经》学术论著,也是很好的普及读物。

该专著写于50年代后半期,已是"解冻文学"思潮流行多年之后,它已带有时代的印记,避免了以往苏联评论界只谈作品思想不谈艺术性的缺陷,也不再受庸俗社会学的影响而贬低某些作品的艺术成就。费德林很注意对《诗经》的体裁和艺术风格的分析,仔细分析它同民间口头创作像民歌、歌谣、故事、谚语、传说、格言、寓言等形式的关系。他同时借鉴俄国汉学家的经验,赞同瓦西里耶夫院士的观点:"《诗经》,特别是《国风》部分,基本上是中国古代民间口头创作的典籍。"①(第 25 页)

但是费德林也指出过去汉学家对《诗经》的艺术评价不足,说"这里仍然应当指出,从瓦西里耶夫的译文和注解看,他对《诗经》的艺术价值还未能有充分的认识。未能对这部绝无仅有艺术极高的诗歌作品给以应有的评价……瓦西里耶夫从'中国文学不可能同以往的世界古代文学平起平坐','它在创造精神的程度、形象的和科学的叙事方面都比希腊和罗马文学逊色'②这种观点出发,当然不可能对《诗经》有足够的评价"(第 26 页)。

---

① 瓦西里耶夫《中国文学史纲要》,第 32、50—56 页和 1—2 页。

② 瓦西里耶夫《中国文学史纲要》,第 1—2 页。

阿列克谢耶夫则很强调《诗经》的艺术性。

费德林也对俄苏翻译《诗经》的情况作了评述，认为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米·米哈依洛夫翻译《诗经》的几首诗是很有意义的。著名作家梅尔察洛夫和米勒尔、叶戈罗夫和马尔科夫，还有奥列宁等都译过《诗经》的一些诗，这有利于普及。但是可惜这些人都不是从中文直接翻译的，而是从别的文字转译，结果思想内容相去甚远，也很难据以谈论原作的艺术性。他赞扬什图金的《诗经》全译本（1957）不但是第一部俄译本，而且是第一流的译作（第29页），并以它为例论述了译诗的技巧问题。

该书作者考察，《诗经》的全译本已有英文、法文和日文的，在各国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书中也有不少评述《诗经》的章节。但是"由其他的外国汉学家写的《诗经》专论或专著则还没有"（第33页）。

作者在谈论《风》、《雅》、《颂》的艺术特点时，有一大部分篇幅论述古诗的韵律和词汇特色。这也只有像费德林这样精通汉语的汉学家才能办得到。

费德林论述《诗经》的专著，概括起来可以得出以下几个要点：

（1）从现实主义的文艺批评观出发，把作品和时代、社会紧密联系起来考察，并得出结论："《诗经》所揭示的中国人民古代历史，也许要比许多描写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民族学著作以及其他著作都要充分和深刻得多。"

（2）由于诗经内容的丰富和它多方面地反映生活，以至于"在中国和在国外都有从不同观点和角度来研究《诗经》的"。有的人把它当作历史典籍，因为它包含丰富珍贵的历史资料，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民情风俗以及西周时代的物质文明发展的情况。有的人把它看作是儒学经典，从它大量的注疏材料中可以看出儒学内部各派的斗争以及儒家思想的演变。语文学家可以把它看作古老的汉语典籍。它有珍贵的材料可用以揭示古代的语音，还可以研究古汉语的历史及其演变。

（3）从文艺性的角度来看。《诗经》又是一部中国古代文学的典籍，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部分。"《诗经》首先向我们无可辩驳地证明；从西周（前1122—前770）初年至'春秋'（前772—前481）中叶这段时期内，中国人的民间口头文学创作，已经具备高度艺术的诗歌形式，而且充满正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尖锐的冲突和深刻的社会基调"（第144页）。

作者还指出,《诗经》可以证明,中国文学最早出现的体裁(抒情诗和叙事诗)是以民间诗歌为基础的,也是同人民的田间劳动、部落战争行动以及崇拜神灵等仪式相联系的民间生活所产生的。此外,《诗经》体裁和题材的发展,艺术手段的改善,特别是从集体创作逐渐过渡到个体创作的诗歌,都反映了时代的冲突和发展、思想斗争和哲学问题。因而可以说《诗经》是"绵延三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的发轫阶段,是中国文学优良传统的开端"(第145页)。

费德林的专著篇幅不大,但谈到的问题却广泛而有深度。

三、楚辞的翻译和研究

楚辞(Чу цы, Чуские строфы)

楚辞的俄文翻译集中在屈原和宋玉两人的作品中,分别列示如下。

屈原的作品译成俄文的有近十种。如《卜居》和《渔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译,载《星火》杂志1953年第24期和《中国古典散文》一书,1959年。《哀郢》,艾德林译,《新世界》1954年第4期。《九歌》和《九章》,吉托维奇译,收入《中国和朝鲜诗歌选》,1958年,以及同一译者译的《湘夫人》,载《列宁格勒文艺作品选集》第6册,1953年。

入选篇目最多而且比较流行的译作是《屈原诗集》,1954年出版,选译了《离骚》、《九歌》、《天问》、《九章》,《卜居》、《渔父》、《招魂》,并有译自《史记》的《屈原传》。译者有阿列克谢耶夫、艾德林、费德林等。还有一本《屈原诗集》,1956年出版,系以前一本译作为基础扩大篇幅而成。

楚辞新近的论著有克拉夫佐娃《古代中国诗歌·文化学试析》(第51—59页,1994年),谢列布里亚科夫《论屈原与楚辞》,载《古代中国文学》(第172—204页,康拉德与李谢维奇编选文集,1969年),费德林《屈原创作的源泉与问题》(1986)。连同此前论析屈原作品的论文计有40篇左右。论者中还有杜曼、艾德林、波兹涅耶娃、费什曼、李谢维奇等人。

宋玉(Сун Юй)宋玉的生平与创作曾由波兹涅耶娃在莫斯科大学的教科书《东方古代文学》中辟为专节(1962年版,第389—396页)作了评述。作品的俄译有《对楚王问》、《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五篇,载阿列克谢耶夫编的《中国古典诗歌》一书,1959年出版。

论宋玉的文章,比较集中的是莫斯科大学教本《古代东方文学》(1971年,第249—388页)的"古代中国文学"一章,系波兹法师耶娃、波麦朗采

娃和杨申娜合写的。

四、先秦诸子散文的译研

由于古文教学、历史和文学史教学的需要，先秦散文被选译的数量最多。同时，还有一批人着重研究先秦的历史、思想和文艺思潮，所以先秦散文的所有篇目几乎都有了节译。

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 有波兹涅耶娃译的《卜辞》和谢尔金娜译的《铜器铭文》的译文15条，分别收入《世界古代史文选》(1950，斯图卢威编)和《东方古代史文选》(1963，斯图卢威和列德尔编)等书中。

《易经》(Книга перемен，И－Цзин)

《易经》有休茨基(Щюцкий Ю. К)的《中国古典的〈易经〉》(翻译和研究)，康拉德序，1961年。

同书1993年第二版。卢基扬诺夫译《易经》，1994年，和《易经》(翻译与研究)，2005年。卢氏并编有《中国古代哲学的起源——易经、道德经、论语》，1994年。此外，有维诺格拉茨基编并译《易经——文王的教诲》，2006年。80年代以后，论著则有科勃泽夫的《中国古典哲学关于象征与数的学说》，1994年，及其他人的论著共九部。

《春秋》(Чунь－цю，Вёсны и осени)

《春秋》有波兹涅耶娃译的《春秋选》，收入《东方古代史文选》一书中，1963年。

《儒家的编年史〈春秋〉》，莫纳斯德廖夫译并注，1999年。论文有卡拉别江茨的《中国古代文献的观点来看〈春秋〉》(1988)等四篇。

《左传》(Цзо чжуань，Комментарий Цзо)

《左传》有波兹涅耶娃译的《左传选》，收入《东方古代史文选》一书中，1963年。

西尼钦译《左传选》(1—6节)，载《中国古代哲学》第2卷，1973年。

《国语》(Го юй，Речи царств)

《国语》波兹涅耶娃选译了《周语》、《越语》、《吴语》和《齐语》的若干节，收入《东方古代史文选》一书中，1963年。

全译本有塔斯金译、序并注的《国语》，1987年。

还有刘克甫的《国语》选译(第1章之6、16、21节)，载《中国古代哲学》第一卷，1972年。论文有克·瓦西里耶夫的《战国平面图》(研究与翻

译),1968 年,等七篇。

《论语》(Лунь юй,Конфуций"Беседы и суждения")

《论语》最早有瓦西里耶夫院士的《论语》译注,收入《中国文选第二册注解》,1884 年;波波夫译《孔子及其门徒的格言》(译并释),1910 年。今人有康拉德和波兹涅耶娃分别译的《论语选》,各收入《中国文学文选》(1959)和《东方古代史文选》(1963)两书中。

80 年代以来连续出版几种全译本:《孔子的〈论语〉》,佩列洛莫夫译,研究并注释,1998 年;《孔子的论语》,瓦西里耶夫、波波夫、克立夫佐夫、谢缅年科、卢基扬诺夫译,圣彼得堡,1999 年;《儒学·论语》,马尔登诺夫译,第 2 卷,2001 年;《儒家的〈四书〉》,莫斯科,2004 年。专著则有《儒学在中国》,1982 年;《孔子:生平、学说、命运》,佩列洛莫夫著,1993 年;《孔子的箴言》,谢缅年科著,1987 年。

《孙子》(Сунь Цзы,Искусство войны)

《孙子》有康拉德译《孙子兵法选》,分别收入《世界古代史文选》、《中国文学文选》等书中,见于 1950、1956、1959,1963 年不同版本七种。最早的译作是格里鲍夫斯基从法文转译的《谋攻篇》,载《近卫军司令部出版军事杂志》,1918 年第 2 册,第 1—5 页。

康拉德的译文后来收入《康拉德著作选集·中国学》(第 5—304 页),1977 年。此前已有西多连科译《孙子》,1955 年。后有克平译《西夏文本〈孙子〉》,1979 年,以及马良文编并译《孙子·中国的兵家战略》(译文见第 118—210 页),2002 年。

《老子》(Лао-Цзы,ДАО ДЭ ЦЗИН, Канон Пути и благодати)

《老子》在"诸子"中,在俄国和苏联受到重视的程度最大。投入翻译和研究的力量都比较多。早在帝俄时代,汉学家丹尼尔(西维洛夫,1798—1871)就已译出《道德经》,后于 1915 年由扎莫塔依洛以《丹尼尔(西维洛夫)档案资料中未公布的〈道德经〉译文》为题予以发表,载《敖德萨图书志学会通报》,1915 年,第 4 卷,第 5—6 册,第 209—245 页。文中注明"据喀山大学手稿",系原作第 1—46 章的俄译文。

1894 年又发表德·科尼西教授译的《道德经》,载《哲学与心理学问题》,1894 年,第 3 册。

革命后出版较为流行的是杨兴顺翻译先后出版的三种:(1)《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及其学说》,1950 年。此系杨的译著,书中收入《道德经》的

中文和俄译。(2)《道德经》节译,有康拉德的序文,收入《中国文学文选》一书中,1959 年。(3)《老子》节译,收入《东方古代史文选》一书中,斯图卢威和列德尔编,1963 年。

有趣的是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醉心于老子的学说。他不但细心阅读、钻研,而且亲自动手选编。由他选编出版的老子书有两种:(1)书名为《老子·道德经或道德之书》,列·尼·托尔斯泰编,京都大学教授德·彼·科尼西译自中文,谢·尼·社雷林增补注释,1913 年。(2)书名为《列·尼·托尔斯泰选编,中国圣人老子格言》,1910 年。内附两篇论文,一篇是托尔斯泰本人写的《论老子学说的本质》,另一篇是伊·戈尔布诺夫一波沙多夫写的《关于圣人老子》。全书主要篇幅是老子的言论摘选。

在当代,《道德经》的俄译本已出版的有 20 种左右,译者分别为杨兴顺、托尔琴诺夫、李谢维奇、马斯洛夫、谢缅年科、特卡琴科、马良文、卢基扬诺夫、维诺格拉茨基、库夫申诺夫、苏哈鲁科夫、萨夫鲁欣。还有四种以诗形式的译者分别为巴尔蒙特、佩列列申、巴统诺夫、康德拉绍娃。

《墨子》(Мо-цзы)

有波兹涅耶娃译的《墨子选》,收入《东方古代史文选》一书中,1963 年。

贝科夫的《墨子·谈音乐》译并序,载《东方国家音乐美学》,1967 年。季塔连科选译的几种《墨子》片断,分别载《中国古代哲学》(1973)第 1 卷,第 175—200 页和第 2 卷,第 166—171 页;《古代东方诗歌与散文》(1973),第 328—331 页。曾以研究墨子论文获副博士学位的季塔连科,近来又多次写出评述墨子哲学思想的文著,收入季氏主编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的第 1 卷(第 352—355、359—361 页,2006 年)和《中国哲学》(第 226—229、231—235 页,1994 年)等。

《孟子》(Мэн-цзы, Учитель Мэн)

有波兹涅耶娃译的《孟子选》和波波夫译的《孟子选》(康拉德作序),分别收入《东方古代史文选》(1963)和《中国文学文选》(1959)书中。单行本有施泰因译《孟子》节选(第 1、2、3、5、6 篇),见施泰因《管子》(研究与翻译)(1959)一书第 319—328 页。

帝俄时期的译本有波波夫的《中国哲学家孟子》(译并注),1904 年。书中先有孟子传略,接着是译文并注释,计选译第 1、2、4、5、6 篇。

七八十年代起再版波波夫旧译《中国哲学家孟子》(1998);李谢维奇《孟子》选译,载《古代东方诗歌与散文》(1973);新出科洛科洛夫译《孟子》(1999);马尔登诺夫和佐格拉芙译并注《经典儒学》第2卷(2000年,第7—140页)。还有《儒家〈四书〉》(2004)一册。论文有《古代中国的个体与政权》(鲁宾作,1999)共八篇。

《庄子》(Цжуан-цзы)

苏联汉学界非常重视这部道家经典,《庄子》(第1—33篇)已全部译成俄文,由波兹涅耶娃译、注并序,收入其所编《中国古代的无神论者、唯物论者、辩证法家》一书中,1967年。她还写了论文《中国古代外交官的教诲》,载《史学语文学研究·庆祝康拉德院士七十寿辰文集》,1967年。此外,还有扎瓦茨卡娅写的论文《〈庄子〉的哲学言论》,载《东方文学研究的理论问题》一书中,1968年。

还有马良文译《庄子、列子》(1995)一书。

《荀子》(Сюнь-цзы)

《荀子》最早被译成俄文的是《劝学篇》(费奥克吉斯托夫译),载《东方文艺作品集》第二册,1958年。接着有施泰因译的《荀子》节选,收入其所编《管子》(翻译与研究)一书中,1959年。

费奥克蒂斯托夫的几种选译,分别载于《东方文艺作品集》第三册(1960)、《东方国家音乐美学》(1967)、《古代中国哲学》(1973),及其所著《荀子的哲学与社会政治观》(研究与翻译)(1976,第二版2005)。

《商君书》(Шан цзюнь шу, Книга правителя область Шан)

有佩列洛莫夫译、注并序的《商君书》,作为"东方文化典籍"丛书第22卷出版,1968年。

佩氏的《商君书》译、序并注释的单行本于1993年出版。

《韩非子》(Хань Фей-цзы)

有帝俄时期由阿·伊凡诺夫的《中国哲学资料·引言·法家·韩非子》,1912年出版。包括韩非子传、其学说分析及《韩非子》译文并附中文原作和索引。

今人有季塔连科选译的《韩非子论管理国家、道德诸问题》(见《世界哲学文选》第一卷,1969);李谢维奇选译《韩非子》(见《古代东方诗歌与散文》,1973);斯尼钦和斯皮林合译《韩非子》第8、11、12、43、49、50、51节(见《古代中国哲学》第2卷,1973年),以及马良文编译、序和注解《管理的

艺术》(2003)。

《吕氏春秋》(Люй－ши цунь цю，Вёсны и осени господин Люя)

有波兹涅耶娃译《吕氏春秋》选，收入《东方古代史文选》一书中，1963年。贝科夫译《吕氏春秋》二则，收入《东方各国音乐美学》一书中，1967年。

还有维亚特金与杨兴顺分别选择《吕氏春秋》第6和4节，收入《古代中国哲学》第2卷(1973)。全译本为特卡琴科所译《吕氏春秋》(2001)。

《战国策》(Цжан го цэ，Планы сражающихся царств)

有波兹涅耶娃译《战国策》选，收入《东方古代史文选》一书中，1963年。专门研究者克·瓦西里耶夫曾发表论文五篇并于1966年写的副博士论文《〈战国策〉和公元前五至三世纪的古代中国》。

后由克·瓦西里耶夫出版《战国策(研究与翻译)》(1968)一书。

《礼记》(Ли цзи，Книга ритуалов)

其中的《乐记》已由鲁宾译出，收入《东方各国音乐美学》一书中，1967年。

李谢维奇、维亚特金、布罗夫各选译数节《礼记》(见《古代中国哲学》第2卷，1973)。苏霍鲁科夫《礼记选译》(见《圣贤书摘》，1987年)。

《列子》(Ле－цзы)

译文有四种：(1)《列子》节译(《汤问》)，康拉德译并序，收入《中国文学文选》第一卷，1959年。(2)《列子》节译，波兹涅耶娃译，收入《东方古代文学史文选》一书中，1963年。(3)《列子》(第五卷《汤问》片断)，贝科夫译并序，收入《东方各国音乐美学》一书中，1967年。(4)最全的译文是《杨朱》、《列子》(1—8卷)，波兹涅耶娃译、注并序，收入《中国古代的无神论者、唯物论者、辩证法家》一书中，1967年。

波氏该书后来再版(1994)，又有马良文译、序并注释的《庄子、列子》(1995)。

《管子》(Гуань－цзы)

有施泰因译的单行本《管子》(研究与翻译)，1959年出版。另有同一位译者的节译《管子》，收入《世界古代史文选》(斯图卢威编)，1950年。

《书经》(Шу цзин，канон почтенных писаний)

即《尚书》，有波兹涅耶娃、斯节普金娜、弗拉德金娜译的《书经》选(5篇)，分别收入《东方古代史文选》(1963)和《缪斯》1796年第4期(第

193—195 页)。

《大学》(Да сюэ, Великое учение)

最早有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译的《四书解》。从汉文和满文译成俄文,1780 年出版。其中有康熙写的前言的俄译文和《大学》的译文并注释。还有同一年译出的《大学·大学注》,载《科学院消息》1779 年 5 月,第 11 期,第 59—101 页。此译文后来又以《大学,或包含中国高级哲学的大科学》为题收入《爱说真理,或圣人的袖珍本》一书中,1801 年出版,第 27—64 页。

今人第一位实现全文俄译本的是科勃泽夫《〈大学——儒家基础教本〉》(载《历史哲学年鉴》,1986 年,第 97—124 页,为《大学》译文),后收入《四书》俄译本中(2004)。随后科氏又加译了朱熹(2002、2004)和王阳明(1982、2002)对《大学》的注解。

《中庸》(Цжун юн, Учение о середине)

最早的译文是阿列克谢·阿加封诺夫的《忠经,或论忠的书,由俄罗斯帝国外交委员会译员阿列克谢·阿加封诺夫于 1784 年译于伊尔库茨克(在开辟该总督区时)》,出版于 1788 年。同年还有阿·列昂季耶夫所译《中庸,即确定不移的法则。摘自中国哲人孔子的传说,外交委员会办公厅高级文官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译自汉文和满文》,1784 年,圣彼得堡。内有《中庸》译文及注释。还有一种译文题为《中间和忠实》(孔子弟子的圣书),德·科尼西译自中文并注,载《哲学和心理学问题》杂志,1896 年第 4 册。

今人有马尔登诺夫的译本《儒家的信条〈中庸〉(翻译与研究)》(2003)。

《孝经》(Сяо цзин, Канон сыновней почтительности)

也由科尼西译出,题为《论孝敬父母的书》(节选),载《哲学和心理学问题》杂志,1896 年第 3 册。

《吴子》(У-цзы)

有康拉德译的《吴子·论军事艺术》,译并注,1958 年出版。另有康译的节选,收入《中国文学文选》第一卷(1959)。

此前已有西多连科译的《吴子》(1957)出版。

五、李谢维奇编选《圣贤书摘·中国古代散文》

《圣贤书摘》(Из книг мудрецов)是一本译作选集(320 页)。李谢维奇选编这本集子,当是为进一步论证他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提供原始资料,这从书的序言《圣贤之言》和书后对每篇选文的详细注解中都可以看得出来。此外,从体系的安排也可证明编者的构思。他把古代"诸子"的学说分成三大编:

第一编是"儒学圣贤的著作",入选的有《论语》、《孟子》、《礼记》。第二编是"道学圣贤的著作",入选的有《道德经》、《庄子》、《列子》、《淮南子》、《抱朴子》、《申子》。第三编是"各派思想家著作",选入《墨子》、《孙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国语》、《战国策》、《朱子》。从精心选材来看,它像是一本著作,它能够说明编选者对古代哲学流派和文学经典分类的观点。

但是这确是一本译著,译者多为苏联时代汉学家中从事中国史、中国哲学研究的人,当然也有不少文学研究者。主要的有苏霍鲁科夫、波梅兰采娃、托尔钦诺夫、季塔连科、特卡琴科、康拉德和克留科夫等。

这本书作为大型的"中国文学丛书"中的一种,1989 年由莫斯科文学出版社出版。

第七章
秦汉文学在俄罗斯

俄苏汉学家在秦汉文学中下功夫最多的是《史记》和《汉书》,其次是两汉乐府,其他作品则只有零星的文章论及,翻译也不少。

一、两汉乐府、汉赋和秦汉散文的翻译

(一)两汉乐府(Юэфу)

翻译作品主要的有两种:(1)《乐府·中国古代诗歌选》,瓦赫金译,1959年。全书406页,其中"汉代乐府"占80页,是选译得最多的本子,并有译者的序和注释。(2)后来又有同一译者出的另一个译本《乐府·中国中世纪抒情诗选》,1969年版,111页。

但是零散的乐府作品译作要早得多,第一个译者是休茨基,他译的《古诗为焦仲卿妻所作(中国3世纪长诗)》收入康拉德编的《东方》第1集,1935年。书中同时载入一首《陌上桑》。后来,1957年出版的《中国诗歌选集》第1卷已经选译了比较多的乐府诗,共20首。如: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孤儿行》、《上山采蘼芜》、《迢迢牵牛星》、《饮马长城窟》、《陌上桑》、《十五从军征》、《青青陵上柏》、《东门行》、《妇病行》、《董娇娆》(宋子侯)、《孔雀东南飞》、《驱车上东门》、《悲愤诗》、《客从远方来》等。

在1959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文选》第1卷中也收入《十五从军征》、《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4首。

研究乐府的汉学家主要的有瓦赫金和李谢维奇两人。瓦赫金的研究工作与翻译相结合。他的副博士学位论文就是《汉代和南北朝乐府——中国诗歌的古籍》(1959)。

李谢维奇从事的研究领域比较宽，发表一系列论著，如《乐府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1961)、《中国古代的诗歌与民歌(公元前3世纪末——公元3世纪初的乐府)》(1969)、《中国古代民歌与诗歌的相互关系问题》(1967)等，他的副博士学位论文也是有关乐府的，题为：《中国古代诗歌与民歌的联系(公元前3世纪末至公元3世纪初民间口头的和书面文学上的乐府)》(1965)。

此外，波兹涅耶娃在其所编《东方古代文学》(1962年，莫斯科大学教科书)中辟有专节论述乐府。李福清在其专著《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中也有一节论及乐府。新近克拉夫佐娃在其《中国文化史》(2004)一书中论及乐府。

(二)汉赋 (Ханьские фу)

辞赋家只有司马相如和贾谊的作品有了俄译。

司马相如　　有《天子游猎赋》、《子虚赋》、《大人赋》、《哀秦二世赋》、《长门赋》等篇译为俄文，分别载入《中国文学文选》第1卷(1959)、《中国诗歌选集》第1卷(1957)和《东方国家音乐美学》(1967)等书中。译者为阿达里斯。

在波兹涅耶娃主编的莫斯科大学教科书《东方古代文学》中辟有专章评述司马相如的创作。

贾谊　　贾谊的赋译成俄文的有两篇：女诗人阿赫马托娃译《吊屈原赋》和阿达里斯译《鹏鸟赋》，载入《中国诗歌选集》第1卷(1957)。

《汉赋》的论文主要为李谢维奇的《汉赋与司马相如的创作》载《古代中国文学》文集第222—230页，康拉德、李谢维奇编，1969)。

(三)秦汉散文

秦汉散文家受到重视的有司马迁、班固和王充三人，译成俄文的作品也不多，仅《史记》、《汉书》、《淮南子》和《论衡》四种，多为节译。

《史记》(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 Ши Цзи)

司马迁的《史记》比较早引起重视，俄国汉学的奠基人比丘林早就写文章《历史笔记，史记》加以介绍，当时为手稿，后于1950年发表，载《古代中亚各民族历史资料集》(比丘林著)第1卷，1950年版。同书还有比丘林所译《匈奴列传》一篇。该书的第2卷(1950)又有一篇比丘林译的《朝

鲜列传》。这都是帝俄时代的译稿。

革命后的译作就多了，据不完全统计有 11 种。主要的有两种：

(1)《司马迁〈史记〉选译》，帕纳秀克译，1956 年，359 页，选入的内容较多。(2)《司马迁〈史记〉》(全译本)，第 1—2 卷、维亚特金和塔斯金译。两卷分别于 1972 年和 1975 年出版，共 439 页。

其他入选内容较多的还有：

《史记选》，选了《秦本纪》、《西门豹列传》、《商君列传》、《吕不韦列传》、《李斯列传》、《陈涉世家》、《高祖本纪》、《司马相如列传》、《季布栾布列传》等十篇，收入《东方古代史文选》一书中(1963)。

《司马迁〈史记〉》，选了《匈奴列传》、《李斯列传》、《韩信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李将军列传》、《主父偃列传》，收入《匈奴史资料》一书中，1968 年，编选者和译者是斯塔金。

《司马迁史记选》，由波兹涅耶娃选译《商鞅变法》和《李斯列传》两篇，载入《世界古代史文选》第 1 卷(1950)。

司马迁《李斯列传》和《吴起列传》，载《中国文学文选》第 1 卷(1959)。

这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阿列克谢耶夫院士选译的《中国古典散文》(1959)一书，它选了《史记》的如下篇目：《报任少卿书》(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滑稽列传》、《酷吏列传序》、《屈原列传》、《伯夷列传》、《外戚世家赞》、《孔子世家赞》、《五帝本记赞》、《项羽本纪赞》、《秦楚之际月表》、《高祖功臣侯年表》、《管晏列传》、《游侠列传序》等，或截取其中的片段，或取其前言和说明辞，或选出后记，均以文学价值为准。编选者所依据的是《古文观止》。顺便说说，《古文观止》历来是俄苏汉学家很重视的一部书，尤其常用作古文教材和读物。

研究《史记》的汉学家主要的有康拉德、克罗尔。康拉德写了论文《波里比阿和司马迁》，载《古代史通报》1965 年第 4 期，后又收入其文集《西方与东方》中(1966)。此文把司马迁同古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前 200—前 120)作对比，文章写得很有意思。波里比阿著有《通史》，写希腊、罗马、马其顿、小亚细亚及其他国家的历史，共 40 卷，仅存 5 卷。康拉德擅长于比较的方法，把中国的史学家、文学家放到世界范围内去研究，同相近的别国名家作对比。更能阐明中国史学家和文学家的特点。这不但是康拉德的长处，而且也反映了苏联时代汉学家研究方法的一个特点，其经验很值得吸取。

克罗尔发表过一系列文章，如《论司马迁〈史记〉采用史料方法的若干特点》(1961)、《司马迁是否为历史人物虚构言论》(1963)及专著《历史学家——司马迁》(1970)。

写过有关司马迁论文的还有杜曼、李谢维奇、克留科夫、施泰因等人。

《汉书》(Хань шу, Книга об эпохе Хань, История Хань)

《汉书》的俄译文有十种(比《史记》少三种)，第一个译者是比丘林。他写了《前汉书》的介绍文章，载于革命后出版的著作《古代中亚各民族历史资料集》第1卷(1950)，同时收有他译的《匈奴列传》(《前汉书》第94卷上和下)。在该书第2卷(1950)中又收有一篇他译的《朝鲜列传》(《前汉书》第95卷)。此外，还有一篇比丘林译，后经伊茨校改的《前汉书选》，内容是讲中国古代同邻国交往的，即张骞出使中亚各国的《西域列传》(《后汉书》第96卷上、下)。

《汉书》俄译选本中内容较多的有两种：(1)《前汉书选》内容有：波兹涅耶娃译《货殖列传》、《贾谊列传》、《董仲舒列传》、《张骞列传》、《成帝纪》和《王莽列传》(三篇)包括王莽传、王莽的变法及经济措施(《前汉书》第99卷上、中、下)，载《世界古代史文选》第1卷(1950)。(2)《前汉书选》内容有：《高祖本纪》、《食货志》、《贾谊列传》、《董仲舒列传》、《张骞列传》、《李广利列传》、《王莽列传》等。由斯捷普金娜等译，载《东方古代史文选》第1卷(1963)。

《淮南子》(Хуайнань - цзы, философ из Хуайнани, Учитель из Хуайнани)

研究《淮南子》的文章有波麦朗采娃写的两篇：《论〈淮南子〉的若干修辞特点》和《〈淮南子〉文章的修辞特点》。分别载于《中国和朝鲜文学的体裁与风格》(1969)和《远东各国文学的体裁与风格》(1966)两本文集。

《盐铁论》(Яньтелун, Спор об управлении соли и железа)

施泰因译《盐铁论》选，曾收入《世界古代史文选》第1卷(1950)中。后来施泰因在其所译《管子》(研究与翻译)一书(1959)中又选译了《盐铁论》的第1、2、3、4、5、6、8、9、14、15、36章。

(四)汉代文学理论批评

王充的《论衡》已被译成俄文。有杨申娜译的《论衡》选，载入《东方古代史文选》(1963)一书中。

克里夫佐夫则写了论文《王充的美学观点》,载《古代和中世纪美学思想史略》一书中(1961)。

二、古代散文研究综述

(一)中国古代散文的翻译与研究概述

俄国对中国古代散文的翻译相当重视,先秦散文已译成俄文出版单行本的有:《管子》,施泰因翻译并注释,东方文学出版社 1959 年出版,380 页。《周易》,休茨基译,东方文学出版社 1960 年出版。《孙子兵法》,康拉德译并注释,苏联科学院 1950 年出版,401 页。《战国策》,克·瓦西里耶夫翻译并注释,科学出版社 1968 年出版,253 页。《商君书》佩列洛莫夫翻译并注释,科学出版社 1968 年出版,350 页。《中国古代的无神论者,唯物论者,辩证法家(列子、杨朱、庄子)》,波兹涅耶娃编译,国家文学出版社 1967 年出版,231 页。

此外,由司徒卢威和列德尔编选的《古代东方史文选》(1963)一书收入了所有先秦散文文集的选段,其中有《春秋》、《左传》、《国语》、《论语》、《孙子》、《老子》、《孟子》、《墨子》、《庄子》、《荀子》、《吕氏春秋》、《战国策》、《列子》,译者是波兹涅耶娃。

在《古代世界史文选》(司徒卢威编,1950)、《中国文学文选》(康拉德编 1959)、《古代东方诗歌与散文》(1972)、《远东诗歌与散文》(1973)等书中都选译了若干先秦散文。《远东诗歌与散文》里还增译了《韩非子》节选。

对《史记》的翻译尤为重视,先后出过两种版本:《司马迁文选》,帕纳秀克译,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0 年出版,136 页。司马迁《史记》(两卷本、439 +357 页),维亚特金·塔斯金译,科学出版社分别于 1972 年和 1975 年出版。

除了《史记》,秦汉散文中的《淮南子》、《盐铁论》、《汉书》也有节译,被收入《古代世界史文选》(司徒卢威编,1950)一书中。

阿列克谢耶夫编选并翻译的《中国古典散文》(科学出版社,1958 年,387 页)一书精选了司马迁的名篇:《报任少卿书》、《太史公自序》、《滑稽列传》、《酷吏列传序》、《屈原列传》、《伯夷列传》、《外戚世家序》、《孔子世家赞》、《五帝本纪赞》、《项羽本纪赞》、《秦楚之际月表》、《管晏列传》和

《游侠列传序》等。

此外,《中国古典散文》俄译本还收入屈原、宋玉、司马相如、汉武帝、李陵、王羲之、陶渊明、谢庄、王勃、李白、李华、韩愈、柳宗元、刘基、苏洵、王安石等22人的散文,整本文集共有散文63篇,这是迄今最全的俄文选本。阿列克谢耶夫的译笔也精湛,一向为汉学家所称道。

在中国历代的散文作家中,作品被译成俄文者最多的是司马迁、韩愈和柳宗元三人。此外,陶渊明和陆游也是比较受重视的两位。这些作家散文作品的俄译分别见于《中国古典散文》(1958)、《韩愈柳宗元文选》(1979)、《入蜀记》(1968)等书中。

苏联汉学家研究中国古代散文的有:阿列克谢耶夫院士(1881—1951)、康拉德院士(1891—1970)、施泰因(1890—1964)、休茨基(1897—1941)、杨兴顺(1908—1974)、克·瓦西里耶夫(1932—)、佩列洛莫夫(1928—)、克罗尔(1931—)、李谢维奇(1932—2000)、波梅兰采娃(1938—)等。但角度各不相同,从经济、哲学、历史、文学角度研究的都有。其中写出的专著有杨兴顺的《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及其家说》,科学出版社1950年出版,158页;克罗尔的《司马迁——历史学家》,科学出版社1970年出版,446页。

先秦散文在俄国颇有影响,诗人普希金就对儒家的教育思想感兴趣,称赞"中国的贤人孔夫子"。作家托尔斯泰则承认老子对他的影响"巨大",而孔孟之道对他的影响也"很大"。他迷恋中国古代的精神文化,甚至有时运用道家和儒家学说的部分原理来论证自己的理论。

(二)阿列克谢耶夫编选《中国古典散文》

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编选并翻译的《中国古典散文》一书(Китайская 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проза),由科学出版社于1958年和1959年各出一版(387页)是迄今最全的俄文选本,收入的中国古代散文作家和篇目最多,计有:

屈原的《卜居》、《渔父》。宋玉的《宋玉对楚王问》、《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司马相如的《长门赋》。汉武帝的《汉武帝求茂材异等诏》。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太史公自序》、《滑稽列传》、《酷吏列传序》、《屈原列传》、《伯夷列传》、《外戚世家序》、《孔子世家赞》、《五帝本纪赞》、《项羽本纪赞》、《秦楚之际月表》、《高祖功臣侯年表》、《管晏列传》和《游侠列传序》等。李陵的《答苏武书》。王羲之的《兰

亭集序》。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归去来辞》、《五柳先生传》、《闲情赋》。谢庄的《月赋》。王勃的《滕王阁序》。李白的《春夜宴桃李阁序》。刘禹锡的《陋室铭》。李华的《吊古战场文》。韩愈的《杂说》、《祭鳄鱼文》、《柳子厚墓志铭》。欧阳修的《秋声赋》、《醉翁亭记》。周敦颐的《爱莲说》。苏轼的《稼说》、《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喜雨亭记》、《石钟山记》。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桐叶封弟辨》、《捕蛇者说》、《梓人传》、《永州韦使君新堂记》、《小石城山记》、《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等 14 篇。刘基的《卖柑者言》、此外还有苏洵、王安石等的作品,共收入作家 22 人,散文 63 篇。

三、李谢维奇关于乐府和古代文论的两部专著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诗歌的产生有更遥远的历史。这个问题曾经引起不少俄苏汉学家的注意,从瓦西里耶夫到阿列克谢耶夫院士都曾在其文学史书或论著中涉及,但就此问题写成专著的,李谢维奇是俄苏汉学家中的第一位。

(一)李谢维奇的古代文学的论述和翻译

伊戈尔·萨莫依洛维奇·李谢维奇(И. С. Лисевич, 1932—2000)1955 年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即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56—1959 年在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任教,1963 年起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工作。他像我国 50 年代出来的一大批苏联学家一样,没有机会到所学外国语言的国家去进修和见习,完全靠自己刻苦努力在本国国内的条件下奋斗成名。但他恰好在比较困难的领域"古文"作品方面取得成就,成了先秦文学的专门研究家。

李谢维奇在中国古代诗歌和古代散文两个方面都有成果。副博士学位论文是《中国古代诗歌与民歌的关系(公元前 3 世纪末至公元 3 世纪初的民歌:乐府)》(1965),此外,有一系列论古代诗歌的文章,重要的如《乐府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1961)、《中国古代的民间格言歌》(1963)、《"弹唱"和中国古代民间创作的某些问题》(1965)、《中国早期诗歌的形式和内容问题》(1968)、《中国文学体裁概念的产生(风、雅、颂)》和《汉赋及司马相如的创作》(1969)等。作为这方面的代表作,是专著《中国古代诗歌与民歌(乐府)》(1969)。

在古代散文领域,除了翻译《礼记》(1973)和为选编的译本作注释

时对散文有所论述外，就是以他独特的角度，从散文看古代的文学思想或文艺思潮，这是苏联汉学界其他人未曾集中注意的问题。李谢维奇的研究既是新开拓，又很有特色。在帝俄时期，瓦西里耶夫院士曾经触及这方面的问题，但囿于儒家的传统观点。李谢维奇则从现代文艺科学的观点出发，探讨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其重要论文有：《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片断》(1962)、《中国古代口头民间创作和文学散文》(1969)、《东方国家的伊索寓言题材》(1971)和《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中亚影响》(1973)等。而专著《古代和中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思想》(1979)则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此外，他于1988年11月来我国参加古代文论学术讨论会(广州)时，又赠我的一本《圣贤书摘·中国古代散文》(1987)，也可以说他在这方面又有了进展。

李谢维奇还兼作苏联汉学研究的综合分析工作。有《苏联的中国文学研究、成果与展望》(1968)、《苏联对中国诗歌的研究》(1970)等文著。他最后的任职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员。

(二)《中国古代诗歌与民歌(公元前3世纪末至公元3世纪初的乐府)》(Древняя китайская поэзия и народная песня: Юэфу конца Ⅲ в. до н. э.——начала Ⅲ в. до н. э.)

在这部专著中，李谢维奇集中探讨了“乐府”这种诗歌体裁怎样由中国古代的民谣俗曲，逐步演变而产生“文学上”乐府的。对乐府作如此详尽系统的论述，在苏联还是第一次，而且依据的材料又是中国用古代汉语记载保存下来的古代歌谣(这样遥远的古代作品，其他民族保留的不多，因而更显得珍贵)。李谢维奇的专著自然备受重视。后来汉学家们的论文常常提到它。

全书分三章。第一章叙述中国远古时代，即“公元前3世纪末至公元3世纪初”的民间歌谣创作。第二章写“文学上”的乐府的产生和发展，具体阐述由民歌到文人创作乐府的变化过程，以及二者的相互影响。第三章谈乐府的艺术特色。包括结构上的艺术手法、比喻、形象和诗节、韵律等。

（三）《中国古代与中世纪之交的文学思想》（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мысль Китая на рубеже древности и средних веков）

李谢维奇在这部长达265页的专著（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9）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何理解同本民族思维方法有重大差异的异族文学和文化。

他解释说，很久以前欧洲人就对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对他们感到陌生的中国精神文化以及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特点表示惊讶。有的欧洲汉学家“对中国人思维的非逻辑性”感到不可思议，就连大名鼎鼎的黑格尔①在看了《易经》这样的中国古代哲学典籍之后，居然也这样说：“我是为了好玩才来详细叙写这些道理的……我解说这些‘卦’（按：指‘八卦’）的意思，是想说明它是多么肤浅。”黑格尔读过孔夫子的《论语》之后还说：“为了他的名誉，最好不要把它翻译过来。”同样，中国的古典文学对于欧洲读者也不是那么好懂，因为它也有欧洲读者所不习惯的表现模式，如果不懂得他的规矩，那么读起来就会觉得“索然无味”，更不用说会将它拒之于门外了。有一个民族学家在20世纪初甚至说：“中国的散文作品弥漫着一层地道的沉闷气氛，那里面程度不同地集中了千篇一律、令人难受的粗野、迂腐和平庸的东西。这种文学作品比抒情诗更能够证明它是属于一个古老的，而且其智慧已经腐朽了的民族。”怎样来看待这种论调呢，李谢维奇认为只要用鲁迅的一句话来加以概括就够了，那就是“门外文谈”。它说明一个非行家来评论其所不懂的艺术会走得多么远。

俄国人在想到世界上最难的事时，总喜欢用“中国的文字”这样的话来比喻。但李谢维奇认为，这里面的难题要比“中国文字”多得多，事实上，欧洲读者要理解中国古代文学还存在更多的障碍，其中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找出历史上形成的那些思维模式，指出那些重要的有价值的概念或范畴。李谢维奇所说的“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恰恰是指这些概念的内容。

他选出十余个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学概念、体裁模式和美学范畴，在专著中展开详尽的论析。

第一章谈“宇宙之路——大‘道’及其表现‘德’以及它在文字上的体现‘文’”。第二、三章谈“气”和文学创作以及宇宙的“风”进入诗歌范围，

① 黑格尔（1770—1831），德国哲学家。

从而形成“风骨”。第四、五章谈描写手段“赋”、“比”、“兴”。第六、八章谈体裁，从“颂”、“诗”直到“小说”。总起来说，他着重谈到的有：道、德、文、风、风骨（风格）、赋、比、兴、颂、诗、小说等概念（或文学术语、范畴）。最后第九章归结到“文学与时代”，“古代与现代”，“从伦理学标准到美学标准”。

我想，俄文的读者看了这样系统又有充分根据的论述之后，再来阅读中国的古代文学作品，一定会觉得容易接受得多，会读懂作品中更多的东西。他们一定会对李谢维奇的观点表示折服。

除此之外，李谢维奇所提出的问题还具有普遍的意义。不同民族文化传统的人对异族文化的不理解是常有的事，这种不理解是相互都有的。在中国也是如此。据阿列克谢耶夫的《在旧中国》一书所记载 他在旧中国曾遇到一些名人把欧洲歌剧中唱咏叹调比做是“老虎叫”，把歌剧中的奥涅金和连斯基看作是可笑的怪物。这种情况恐怕在生活中也有。“要了解另一个民族的艺术，就应掌握那种艺术藉以立足的文化符号”，李谢维奇这样说。他为了证明自己论点的正确而利用的阿列克谢耶夫的话：“重要的不是我们看见什么，而是中国人看见什么。只有当我们终于看懂了为什么中国人感到是美的享受而我们却觉得惘然的时候，那时我们才能开始发议论”，也是值得借鉴的。

四、克罗尔论《史记》的专著《历史学家司马迁》

（一）《史记》的翻译与研究

司马迁（Сыма Цянь）的《史记》（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 Ши Цзи）一向受到俄国的重视，早在19世纪上半叶，俄国汉学的奠基人比丘林就在《古代中亚各民族资料汇编》（分两卷，于1950年公开出版）中选译了《史记》中的《匈奴列传》和《朝鲜列传》两篇。苏联时期选译《史记》的有关篇章收入历史、哲学、文学等各种文集出版的有11种47篇次。其中，选译篇数最多的是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编选并翻译的选本《中国古典散文》，计选译自《史记》14篇：

《报任少卿书》、《太史公自序》、《滑稽列传》、《酷吏列传序》、《屈原列传》、《伯夷列传》、《外戚世家序》、《孔子世家赞》、《五帝本纪赞》、《项羽本纪赞》、《秦楚之际月表》、《高祖功臣侯年表》、《管晏列传》、《游侠列传

序》等。

《史记》俄译文以单行本出版的有两种，一种是帕纳秀克（1924—）译的《史记选》，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6 年；另一种为维亚特金和塔斯金合译《史记》，科学出版社，分三卷分别于 1972 年、1975 年和 1982 年出版，系首次的俄文全译本。

评论司马迁的文章至 1980 年统计共发表 21 篇，论者有比丘林、阿列克谢耶夫、杜曼、康拉德、克留科夫、李谢维奇、波梅兰采娃等，以克罗尔（八篇）为最多。论题广泛涉及司马迁的生平与活动、《史记》的史料、风格、笔法以及各具体篇章的分析，也有从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等不同角度对《史记》做分析的文章。

（二）克罗尔的专著《历史学家司马迁》

尤里·利沃维奇·克罗尔（中名科洛利，1931—）出生于列宁格勒职员家庭，1954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1957 年起在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现为东方文献研究所）工作，现为该所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两汉的古籍《史记》和《盐铁论》。1963 年以《司马迁——秦亡后的历史学家》一文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1970 年出版专著《历史学家司马迁》，对《史记》及其作者做了全面系统的评述。后以《〈盐铁论〉——汉代的文化典籍》（1991）一书晋升为博士。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为“俄国形式主义学派”正名，于是流行起什克洛夫斯基、托马舍夫斯基等创立的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方法和巴赫金创立的“复调小说”理论。

克罗尔在其专著中运用什克洛夫斯基和托马舍夫斯基的方法，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分析《史记》。在“《史记》的文艺学分析”和“司马迁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①]章节中，阐明了《史记》是一部“无情节”的作品。他认为司马迁写史传的方法是“题材上的串连”，即把史料汇集起来，按照某些题材分门别类，并依据某一题材把有关的史料串连在一起，或以它为中心布局谋篇，当然其中也含有一定的原则，如时间的原则、官阶等级的原则、逻辑和主题连贯性原则和两极对比原则。

同时，克罗尔依据巴赫金的文学批评理论，发现《史记》也有类似“复

① 克罗尔《历史学家司马迁》，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0 年，第 40—75 页。

调小说”的特点。巴赫金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时说过:“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在他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而是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中,而互相不发生融合。”①克罗尔认为,这段话也适用于说明《史记》。它里面就有“作者的声音”和“书中人物的声音”,司马迁就用了两种不同的、独立的声调对读者说,“太史公”的音调充满激情,而“据传说”的声调则平淡中和。此外,书中各种人物的声调是依据其各自的身份,甚至依照所摘引史料出处的叙事者之声调。

克罗尔又从文化概念的角度来考察《史记》,他力图弄清司马迁在作品中所袭用的文化范畴,并具体地研究了对司马迁作品有影响的两个文化概念:“意”和“类”,即公羊家们所特有的“意,志”范畴和“类”以及“同类相招”范畴。克罗尔经过研究得出结论,公羊学派所提出的“意”是司马迁写史时所奉行的重要原则,这位史家选择史料都是为了表现这个传主或那个传主的意志和愿望,因而对传主的评价也是首先依据该传主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其意志和愿望,从作传者方面来看,司马迁的文学理论也足以说明,他写史是出于一种传诸后代的愿望,让后代了解他有什么样的意志,并寄希望于后代给他以死后的哀荣。克罗尔从《史记》中的许多传记判断:司马迁构思作品时遵循古代中国人固有的文化概念“类”和“同类相招”——史家作传时既注重表现同一“意”如体现在人物的言论与行动中,更注意表现同一“类”人的意志,而不是仅仅表现孤立的个人,这样他就把个人放在“类”别中,并依照“同类相招”的原则来为某一类人选择史料,串实题材直至构思作品的结构。

克罗尔还从史家的情趣出发来研究《史记》,认为司马迁的世界观中有一种“追求奇异”的因素,或曰“爱奇”、“猎奇”。这是非儒家的观点,而更接近于道家。然而,这种观点却直接影响到司马迁对一系列“世家”和“列传”的传主人物之选择。

克罗尔对于《史记》的翻译本也作了一番考察,他对比了俄文和英文两种译本,并提出若干改进的意见。除了专著,他还有其他文章论及《史

①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年,第29页。

记》,如《论司马迁〈史记〉中利用文献资料方法的若干特点》(1961)、《论联想思维对〈史记〉一书的影响》(1974)、《论汉代文学中对待史料的两种传统态度》(1975)、《司马迁关于"六家"的考证》(1977)等。

此外,克罗尔还写过《桓宽〈盐铁论〉中争论的空间概念》(1978)、《北京歇后语分析和转写经验》(1964)等,其研究的领域是比较广阔的。

五、《中国古代文学》论文集

苏联时代汉学家惯于把中国文学按大的时代,即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划分时期。他们划定的"古代文学"指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3世纪,即从"前文学"到"建安文学"这一段时期。总的说来,苏联汉学家投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人力最多。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古代文学。研究成果除了一些专著,如费德林的《〈诗经〉及其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李谢维奇的《中国古代诗歌与民歌》等外,集体的成果就是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和东方学研究所合作编写的《世界文学史》(九卷本)的第1卷(古代文学部分,包括中国文学)及其配套著作《中国古代文学》论文集(Литература древнего китая: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9,288页)。

论文集收入11位作者的论文,分别从不同方面论述古代文学。论述中国古代文学的起源之一神话问题的有李福清的《中国古代神话与小说的演变》。与这个问题相近的是李谢维奇的《中国古代的民间口头创作和小说》和瓦赫金的《古代书面典籍是文学作品》。前者探讨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之一民间口头创作和民歌。后一篇文章涉及的是远古后期几类最重要的典籍。第一类有《诗经》、《楚辞》、乐府等。第二类有《书经》、《易经》、《礼记》、《论语》、《大学》、《孟子》、《庄子》、《道德经》、《孙子》、《荀子》、《史记》、《国语》、《列子》等。瓦赫金认为,这些在中国统称为"文"的典籍,无论是表现周围世界还是内在思想,都是真实的,都反映了某个地方、某个时候真正存在的现实,因而对读者都起着教诲、示范、广泛隐喻的作用,这是中国古代文学和古希腊、罗马文学的重要差别,亦即它具有深刻的历史主义特点。因而不管上述几类典籍是儒学经典、是自然哲学,还是兵书,就其艺术性来说都可视为文学作品。瓦赫金(1930—1981)1954年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毕业后,即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翻译与研究,曾以汉魏南北朝乐府的论文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出版过其所译《中国

古代乐府选集》两种，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具有自己的见解。

有些论文是评具体的典籍的。如费德林的《〈书经〉、〈诗经〉、〈易经〉》，季塔连科的《〈墨子〉是文学典籍》，谢列布里亚科夫的《论屈原和楚辞》，李谢维奇的《汉赋和司马相如的创作》，克罗尔的《〈史记〉是文学作品》等。

还有一些论文是论述一般的理论问题，如瓦赫金的《汉朝的民间文学》讲到文学作品的概念，李谢维奇的《中国文学中体裁概念的产生（“风”、“雅”、“颂”）》涉及文学开始分出体裁差异的问题。

切尔卡斯基的文章“建安文学”所论的时期，正是“三曹”和“建安七子”创作的盛期（192—219）。作者认为，“在汉魏（三国，220—280）和六朝（375—583）之交，文学发生重大变化”、“根本改变了中国文学的面貌，从而进入了中世纪时期，当然，还存留许多旧文学的痕迹”（第 260 页）。所以康拉德解释说：“建安文学属于公元 3 世纪的事，在这个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古代的终结和中世纪的开始。”“但因为这个（分期）问题还不能认为已经彻底解决”，所以在《世界文学史》中把“建安文学列入第 2 卷”，即中世纪时期，“而我们则把建安文学放到论文集的第 1 卷”，即古代时期（《序言》，第 5 页）。

第八章
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文学在俄罗斯

俄罗斯汉学家所划定的中国中世纪，系起自3世纪初，止于17世纪上半叶，即指三国、南北朝、隋、唐、五代和宋、元、明等朝代。本章所写的包括三国后期、南北朝文学。

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学在俄国和苏联时代得到重点研究的有陶渊明和六朝小说。

一、建安文学的译研

（一）曹氏父子诗俄译

“建安文学”中有曹植一人在苏联时代得到比较多的关注，翻译也有一定的数量，还有不少评介文章。其他人被零星译介的，有曹操、曹丕、蔡琰、王粲、陈琳、阮籍等人的诗。

在文学史和文学评论中常提到的还有陆机的文艺理论。

1. 曹植（Цао Цжи）

最流行的选本是《七哀（曹植诗集）》，切尔卡斯基译，于1962年和1973年各出一版，后者在篇幅上略有扩大。

其他译文有：叶戈里耶夫和马尔科夫译《美女篇》，载《中国之笛》1914年版。吉托维奇译《薤露篇》、《七步诗》、《泰山梁甫行》、《赠白马王彪》等六首，载《中国古典抒情诗集》（1962）。阿达里斯译《洛神赋》、《弃妇诗》，茹拉甫列娃译《野田黄雀行》、《怨歌行》等，载《中国古代诗集》（1957）。

曹植诗的俄译本（及选本）迄今已有八种。

2. 曹操（Цао Цао）

有茹拉甫列娃译《观沧海》、《短歌行》、《苦寒行》三首，载《中国古代

诗集》(1957)。

3. 曹丕 (Цао Пи)

有茹拉甫列娃译《燕歌行》,载《中国古代诗集》(1957)。

费德林编四卷集《中国诗选》第1卷(第303—319页,1957)、吉托维奇《中国古典作家抒情诗新译》(费什曼编,1962)、孟列夫译《中国诗》(2003)等均选译有曹植诗若干首。

费德林编四卷集《中国诗选》第1卷(第281—284页,1959)、《中国文学选读》(第138—143页,1979)也选译有若干首曹诗。

新论有克拉夫佐娃《古代中国诗:文化学观试析,文学翻译文集》(1994)涉及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的诗及其俄译文。

90年代以来的俄译有李谢维奇翻译并注解曹丕的《典论论文》,载《东方诗学(文本、研究、注解)》(1996)。

(二)建安七子中的其他人

"建安七子"中有王粲的《登楼赋》(雅罗斯拉夫采夫译)、《七哀》(斯塔罗斯金娜译),蔡琰的《悲愤诗》(茹拉甫列娃译)、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阿杜耶夫斯基译)等的俄译,载《中国古代诗集》(1957)。此外,该诗集还选译了阮籍的《清思赋》。

(三)切尔卡斯基著《曹植的诗》(Стихи Цао Цжи)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员列昂尼德·叶甫谢耶维奇·切尔卡斯基(1925—2003)的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诗歌。他1961年毕业于军事外语学院,早期研究古典诗歌。1962年以论文《曹植的诗》获副博士学位,1963年作为专著出版。1965—1966年来北京大学进修,同我国诗评家、中文系当时的青年诗人谢冕成为好友。后来切尔卡斯基转向现当代诗歌研究和翻译,1971年以论文《中国的新诗(20年代)》获博士学位。1973年以该论文为基础形成专著《中国的新诗(20—30年代)》。这本书同他在1980年出版的专著《战争年代的诗歌(1937—1949)》恰好成为一组,对中国30多年的现代诗歌作了系统的考察。现在这两本书即将出中译本,1988年秋天,他重返阔别20多年的北大,高兴地说:"谢冕教授当年对我的帮助很大。"

曹植的创作是我国古典诗歌中绚丽的篇章,切尔卡斯基一直作为研究

的重点之一。他曾翻译曹植诗集《七哀》(1962,143 页),后来又出版(1973,166 页),还发表过论文《曹植的政治观和文学观》(1961)。很有意思的是他把曹植同罗马诗人奥维德作了对比研究,写出《罗马的流放者和魏朝的漂泊者——奥维德(前 43 年—17 年)和曹植(192—232)》,载《历史语文学研究》(纪念康拉德院士七十五周年诞辰文集,1967)。

作者在《曹植的诗》一书中提出以下的目标:揭示曹植诗同民歌的有机联系,评述诗人的创作道路,阐明曹植诗的创新意义和美学价值,论析曹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前两项目标在第二、四章,即《民歌与曹植》、《诗人生平》中论述。《民歌与曹植》一章系统叙述了诗人所受《诗经》、乐府、古诗的影响,并从四言诗逐步过渡到五言诗。《诗人生平》写到曹植的思想矛盾、生活追求,以及诗人的儒、道世界观和文学观。

后两项目标则在第一、三章体现。第一章《建安文学》对从汉末"建安"开始直至二三世纪的文学状况作了历史的介绍,指出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巨大作用。第三章《曹植的诗歌遗产》则分析了曹诗的创新意义。

总的看来,切尔卡斯基认为曹植的诗歌充满仁爱精神和抒情色彩,其诗歌中包含着诗人各种互相矛盾的思想情绪:对生活的热望变成抑郁的沉思,建功立业的雄心变为忧伤的叹息。曹植诗的感情基调,它的灵魂,便是激昂和忧伤,渴求和失望。从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看,重要的体裁形式五言诗,本来产生于民间诗歌,但到了曹植写的诗中,已使五言新诗体臻于完美。

二、艾德林著《陶渊明和他的诗》

关于 3 世纪初叶,即三国时期文学究竟划入中国古代,还是归为中国中世纪,在苏联研究文学的汉学家中,看法还不一致。这里我们只根据他们通行的中国文学史书的划法,把它归入中世纪。但是"建安文学",包括"三曹"及"七子"的创作已在上一章论述古代文学时涉及,这里不再重复。受到重视并已有译作和专著论及的陶渊明(365—427),属于晋朝诗人,放在本章叙述。

陶诗俄译主要有三种,均艾德林所译:《抒情诗》(艾氏译并序,1964);《诗集》(艾氏译、序,1972);《秋菊·陶渊明诗集(4—5 世纪)》(艾氏译、序并注解,2000)。

最早的陶诗俄译为《桔枝影》一首，载叶戈罗夫、马尔科夫的《中国之笛》(第111页)1914年。其他的较早选译有休茨基一首(1935)。

艾德林选译为最多，分别载于不同杂志或文集，依次为：1首(1954)、5首(1957)、2首(1957)2首(1958)、2首(1959)、4首(1961)、2首(1966)、7首(1972)、76首(1975，此次选译数量最多，见于艾德林译《中国古典诗集》(第47—160页)、13首(1977)、2首(1981)计11种116首，其中有的诗系前后年代重译的。

还有阿列克谢耶夫译3首(1958)，康拉德译1首(1959)、休茨基译1首(1959)，吉托维奇(1961、1962、1968)分别译有1首、1首和2首，以及戈雷金娜译4首(1975)。

艾德林(Л. З. Эйдлин)于1967年出版专著《陶渊明和他的诗》(Тао Юаньмин и его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494页)。此书包含两部分。前半部为论述(148页)，后半部为陶诗的俄译(346页)。

艾德林仿照他的老师阿翰林论司空图《诗品》的做法，在专著中熔评论、翻译、注解于一炉。在前半部集中体现其研究成果，用16节的篇幅全面系统评论陶渊明其人及其创作，从身世时代、代表作品《归田园居》、《归去来辞》、《拟古》、《咏贫士》、《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直至田园诗的“自然”题材，咏怀咏史诗中的诗人命运，以及陶诗平淡自然的风格都论及。而且，作为翻译中国古诗的行家，作者专门用一节阐述他的翻译原则和经验，结合陶诗的译例来讲更感真切，这在汉学家的专著中尚属少见。

在后半部，作者积几十年翻译和研究中国古诗的经验，选译了陶渊明作品的精华。他按题材把选译出陶氏的作品分成13个栏目，同时按写作年代的先后排列，计有：致亲友，《命儿》，致友人，《归田园居》，《杂诗》，《饮酒》，《止酒》，《拟古》，《读山海经》，《咏贫士》，咏荆轲，咏怀咏史，《桃花源记》。作者说：“陶诗流传下来的有160首，本书后半部选译了77首，即占一半”(第460页)，如果加上前半部分在论述时引用(有时是全文引入)的诗，还有后半部分在选译“组诗”中的一两首时，往往对全组诗作了概括的介绍。这样，涉及的作品就不止他的半数了。

艾德林的专著成书于60年代后期，正是苏联文学批评界广泛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的时候，他也不例外。所以此书虽是单个作家的专著，但作者已将它置于整个文学历史背景之中。既谈到陶渊明的前辈，说陶继承了汉魏以来诗言志的传统，但又有创新，如他的田园诗就为后代开了新风；又谈

到后人，特别是各个朝代的诗人如何师承陶诗的。这就向俄文读者展示了4—5世纪中国文化与生活的广阔图景，从前后对比、对照中看出陶渊明对中国文学的巨大影响和历史地位。艾德林赞同他老师阿翰林的提法："陶渊明在中国诗歌上显然起到了我国普希金的作用（第116页）。"①

除了在中国文学上作纵向对比外，还把陶渊明与世界文学，特别是俄国文学中的诗人作对比，如与茹科夫斯基、布洛克对比诗歌的风格。而陶渊明思想中的儒释道精神则被拿来同列夫·托尔斯泰对比。认为他们这两位古典作家从儒学和道学中接受了共同的东西——"善的思想"（第122页）。② 艾德林转引托尔斯泰读了老子书中的某个地方时所说的一段话："这里的意思是，人为了达到伟大，就应该做小事；但要相信，从这小事之中不但他个人，而且整个世界都能得救。就让人仅仅为了自己而去追求完善吧，他相信这种完善正是整个世界所需要的，于是他就完成了伟业——拯救世界"。③

接着艾德林便说到陶渊明："陶渊明秉性不好自夸，他自我作表率，做着大事的时候，他想的是正在做小事。但是拯救人，使人从'尘世浮华'的羁绊中解脱出来——这正是他所希望达到的目的，他也为此献出了生命和诗歌。他抛开了和他不相容的那个社会而走向人民，但不是走向归隐。这就是为什么他采取了道教的表面精神——遁世，却没有成为'消极的革命者'。倘若从'诗人的事业就是他的言论'来看，那么很难设想有比陶渊明更积极、更富有战斗性的为自己理想而斗争的卫士了。即便在生前，无论他离开哪里，他的声音仍然在那里回响（第122—123页）。"艾德林就是这样用对比托尔斯泰的方法精辟地分析陶渊明"退隐田园寄情山水"思想的实质。

这本专著的文笔优美，富于抒情性，有些章节几乎可以说是用优美的散文写成的。例如第二节《诗人的家乡》就很像是一篇游记。艾德林访问中国时到过陶渊明的家乡江西省九江西南的浔阳柴桑。他把访问陶氏家乡的过程同记叙与诗人有关的地方联系起来，同时引用不少后代诗人凭吊

---

① 阿列克谢耶夫《中国文学》，《东方文学》，第2卷，国家文学出版社1920年，第30页。

② 阿·什弗曼《列夫·托尔斯泰与东方》，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88页、63—64页。

③ 阿·什弗曼《列夫·托尔斯泰与东方》，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88页，第63—64页。

陶渊明故里时写的诗句，使得全篇更具有浓厚的抒情气氛。对于谈诗的著作来说，不使用论文体，而用抒情的叙事文体也许更适合，更便于普通读者接受。因而艾德林的著作兼有学术性和普及性，出版后很受欢迎。

翻译诗的工作是比较难的，正如在中国一样，在苏联对译诗也常常发生“直译”和“意译”之争。艾德林在本书中专门用一节来谈翻译问题。他认为“诗可以有多种译法，有多少译者就有多少译本，但是每一个译者总应该竭力用与原作相同的艺术手法写成的诗，来表达原作的思想和诗意。而且要力求使译诗变成本国文学的现实”（第 133 页）。他认为，中国古典诗的特点是古老和短小。“古老”就有一个当代人能否接受其思想感情的问题，“短小”则每个词都很宝贵，而且用词多寓意。为此，翻译中国古诗的人应该注意在译作中表达出两种优点：既要表达原作那个时代人的优点，又要表达译者当代人的优点。在这里，注解虽然可以解决表达优点和揭示词的寓意问题，但往往缺乏诗意的连贯性。最好的办法是将翻译与注解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说明他本人翻译陶诗时就是力图这样做的，至于是否成功则另当别论。

三、戈雷金娜的专著《六朝小说》

在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苏联女汉学家当中，成绩显著的除已故的波兹涅耶娃和费什曼外，就数当今的戈雷金娜了。

还有一批人如齐别罗维奇、古列维奇、左格拉芙、凯平、斯图洛娃、杨申娜、谢罗娃、马里诺夫斯卡娅、巴甫洛夫斯卡娅以及林伯渠的女儿林林等也相当活跃。但是若论专著还是戈雷金娜多。

卡里娜·伊凡诺夫娜·戈雷金娜（1935—2009）迄今已发表著作五部：《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的中国文学理论》（1971），《中国中世纪的短篇小说：题材渊源及其演化》（1980），《中国接近中世纪的短篇小说》（1983），《太极——1—14 世纪文学与文化中的中国世界模式》（1995 年）和《中国文学研究在俄国》（2004 与索罗金合著）。还有译作《剪灯新话》和《浮生六记》（1979）以及一大批论文。

她 1959 年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初期注重中国文学理论，曾写论文《林纾的美学观》（1964）、《20 世纪初中国文艺美学思想史（王国维和鲁迅）》（1965）等，1966 年以《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中国文艺理论的基本倾向》论文获副博士学位。70 年代起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传奇与笔记小说。

她写的两部有关的专著，涉及古代及六朝小说、唐代传奇和宋代、明代传奇，形成了系统的论述。

她的专著《中国接近中世纪的小说（3 至 6 世纪的神话小说及故事情节的起源问题）》（239 页，1983），中文书名为《六朝小说》，实际上就是研究古代和六朝的小说。

苏联时代对汉、魏、六朝小说的研究起自谢列布里亚科夫 1958 年的文章《中国古代文学的珍贵文献——干宝〈搜神记〉》①，他是根据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图书馆藏《津逮秘书》本二十卷和《稗海》本八卷这两种版本，对《搜神记》进行研究的。到戈雷金娜做研究和发表论著时，六朝小说已出了《古镜（先唐传奇集）》（吉什科夫、帕纳秀克译，1963），《搜神记·异怪故事（先唐传奇集）》（吉什科夫译，1977）和《紫玉集（中国 1—6 世纪小说集）》（李福清、李谢维奇译，1980）等几种俄译本了。

戈雷金娜的专著设三章，分别论述 3—6 世纪小说的结构、神话小说故事情节的起源和神话小说的艺术特点。它详细论析民间文学和神话中反映的公元初年中国人的世界观，以及这种世界观对形成小说艺术境界所起的作用。书中涉及六朝小说中的冥府观念、图腾崇拜残余的反映、“事前注定”主题、古代嫁娶及殡葬礼俗等对题材形成的作用，也谈到自然哲学、宗教观念对六朝小说的影响，还有六朝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等。

专著的特点不是作各种小说内容的综述，而是深入具体的艺术问题，从中国小说艺术境界的形成，小说人物的体系，叙事的结构到六朝小说在中国小说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都作了分析。专著起了配套研究的作用，古代神话有李福清等研究，唐代传奇以及宋、明传奇有费什曼、索科洛娃和戈雷金娜自己研究过，而六朝小说由这本专著来补缺，正好组成一个系列。

四、文论、散文译介和《文心雕龙》的诠释

（一）古代文论

1. 曹丕《典论论文》（Рассуждение о классическом）有李谢维奇的译并注，1991 年。其他还有阿列克谢耶夫、戈雷金娜、克拉芙佐娃论文或

① 《列宁格勒大学学报》，1958 年第 8 期。

译注。

2. 陆机《文赋》(Вэнь Фу, Ода изящной словесности) 克拉芙佐娃的译文,载《雕龙:六朝诗歌(3—6 世纪)》,圣彼得堡,2004 年。还有阿列克谢耶夫、李谢维奇、戈雷金娜的论文。

3. 刘勰《文心雕龙》(Лю Се. Дракон, изваянный в сердце словес),李谢维奇译,载勃拉金斯基编《中世纪东方文学的类型学问题》(莫斯科,1991 年)。此外,有戈雷金娜的论文。

4. 钟嵘《诗品》(Чжун Жун: Ши пинь, Категории стихов)有阿列克谢耶夫、克拉芙佐娃、李谢维奇的论文。

5.《抱朴子》(Гэ Хун. Баопу - цзы)有托尔琴诺夫翻译并注释的葛洪撰《抱朴子》,圣彼得堡东方学所出版,1999 年。此前已有李谢维奇编选并翻译的《圣贤书摘》(1986 年)收入《抱朴子》的选段。

(二)南北朝作家

庾信(Юй Синь),主要有托米海著《庾信传》(1988 年,107 页)。此前已有阿列克谢耶夫的论文、艾德林和孟列夫的译诗,以及托米海编庾信论文选。

(三)《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мысль и ваяние дракона)由于内容庞博,理论内涵艰深,文字也不易透彻理解,要找到适当、对等的俄文词汇来翻译,非常困难。这使得有志于翻译的人感到手足无措,所以至今没有俄译本。但是汉学界对于中国第一部系统阐述文学理论的巨著还是给予充分注意的。有一批汉语,特别是古汉语造诣高的学者对它作了研究。如阿列克谢耶夫在论中国诗学的文著中,就曾多次提到该著作。当时汉学家费德林、艾德林、索罗金等在评述中国古典文学成就时亦曾列举。戈雷金娜写过《文艺的定义——中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中的“文”》(1974)等论文,李福清等人在《世界文学史》第 2 卷(1986)中介绍“5—6 世纪的中国文学”一章里也有专谈刘勰的段落。通过这类评论文字,俄国读者可以了解到中国这部重要论著。其中作用最大的,恐怕是波兹涅耶娃为莫斯科大学教科书《中世纪东方文学》写的详细评介《文心雕龙》的文字和李谢维奇的专著《古代和中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思想》中对刘

勰文学理论的分析。这两种著作，一是作为汉学专业的基本教材；一是联系中国的古代文学思想来阐释，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因而《文心雕龙》虽然没有俄译本，但经过汉学家们的研究和评介已经在俄文读者中传播开来。

1. 关于译名和释名

俄国学者首先遇到的难题是书名的翻译，莫斯科大学教授波兹涅耶娃（1908—1974）指出刘勰的“文”是个模糊的概念。波兹涅耶娃出生于圣彼得堡的汉学家家庭。1932 年于列宁格勒大学毕业后又成为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研究生，先后受过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和曹靖华教授的培养指导，古文功底很好，又长期从事汉语语言文学的教学；先秦文学、诸子百家的思想是她研究的一个重点，对刘勰的理论也有比较深的了解，最早指出了“文”的模糊性和多义性，她在其主编的《中世纪东方文学》（Литература востока в средние века，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70 年，第 50—59 页）一书中阐释了“文”的概念，认为“文”既指自然界里龟甲虎皮上的花纹、鸟禽的脚趾痕迹、蝌蚪昆虫直至天体的形状，又指人的活动中从人体的文身、汉字的书法、文章文献、广义上的文字直至文艺作品等。因而它既是大自然本身的热点，也是作为自然一个组成部分的人的特点的形象化，因创作则是“模仿”自然界的“形象”。

同时她又解释：刘勰已经把“文”同道家的世界观（“文与天地并生”）联系在一起，并加进了色（玄黄）、形（方圆）、声（泉石）。而人又是从“五行”产生出来的最优秀者，具有性灵。所以，人“很自然地”一出现了思想便产生言论；而有了言论便可以成文。于是刘勰把“言”和“文”从哲学领域引向美学。既然动植物界万品无须画工锦匠的巧饰就具有五彩缤纷千姿百态的“华美”，那么，人也就能“自然地”产生“美好的言辞”。

按照波兹涅耶娃的解释，书名既指内容（“文心”），也指表达内容的语言技巧（“雕龙”），所以，她把书名译为“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мысль и ваяние дракона”，意思是“文学的思想和龙的雕塑”。

随着引用者理解的不同，在俄文的评介文章中，对该书的译名也出现了许多种译法。

最为通行的是“Резной дракон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мысли”，意思是“文学思想雕刻成的龙”。它与波氏译法的不同点是不把“文心”与“雕龙”并列，而是分成主次，一个修饰一个。共同点在于都把“文心”理解为“文学作品

的思想”。

然而，李谢维奇对于这种译法不以为然。他认为，“我国最流行的这种译法应当说是很勉强的，因为‘心’并不是思想，而‘文’也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文学”。他还指出，有的英文本把书名译成“The Literary Mind and Its Carving of Dragons”（意为：文学的心智及其雕龙）（纽约，1959），或“The Literary Mind: Elaborations”（意为：文心：精雕细镂的作品）①，都“带有诠释的性质，而且把书名肢解成两部分也不很合适”。

李谢维奇在其专著《古代和中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思想》（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мысль Китая на рубеже древности и средних веков），科学出版社 1979，第 18、46 页）中进一步解释道：这里所说的“文”在中国人看来是由词语和文字组成的美丽的花纹。如同其他任何一种物品一样，这种花纹也具有它构成的中心，即中央，或“心脏”，也即“文心”。而刘勰不同于那些只能靠用华丽辞藻雕出一些可怜“小虫”的人，他“呼吁把龙的形象置于这个‘中心’，其意在于吁请人们创作强劲的、有分量的作品”，因为龙就是宏伟的象征，它能够在无际的苍穹里飞腾，是阳刚之气的象征。“这样看来，俄文译名中的‘雕刻成的龙’就不能使用了。因为它顶多只能突出精雕细刻的思想和样式上的华丽”。

李谢维奇还说明了另一层意思：考虑到汉字的“文”使书名带有“一般的形象性”，而且会令人把作品同“蝌蚪文”相对比，为避免这种误解，他只好选择“文字”这层意义。因为文字既是构成文学作品的符号，也是组成文学花纹的符号。因此，他提出了书名的新译法：“Дракон, изваянный в сердце письмён”，意思是“在文字组成的心脏（中心）塑造起来的龙”。李谢维奇认为“这样的译法既没有脱离汉字的字面意思，又能够传达出刘勰的基本思想”。

李谢维奇对中国古代文学有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他自 1955 年大学毕业后，就专攻古文和古典文学，先在莫斯科大学任教，后来成为东方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曾发表过《中国古代诗歌与名歌（乐府）》（Древная китайская поэзия и народная песня ——юэфу）、《中国文学体裁概念的产生（风、雅、颂）》、《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片断》等著作和论文，其论著的特点是从现代文艺科学的观点出发来探讨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而刘勰便是

① J. 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芝加哥—伦敦，1975 年，第 21 页。

他研究的一个重点。有宽厚的汉学基础，又经过长期的研究，他自然能够形成独立的简介而为汉学界所重视。他是俄国最为全面系统论析过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学者之一。

2. 简要而系统的论述

在教科书《古代东方文学》单辟的专章“中世纪初的中国文学”中，波兹涅耶娃用了长达十页的单篇讲述该时期的中国“诗歌艺术理论”，主要的介绍对象是刘勰。波兹涅耶娃就《文心雕龙》对文艺创作的本质和发展历史、文艺创作的民间来源、作品内容与形成的关系、文艺作品的分类、体裁形式与艺术手法、作家评论家与读者等一系列问题所提出的理论以及该著作对后世的影响等，作了系统的论述。这是她多年研究中国古典文论成功的结晶。由于没有译本，俄文读者要了解《文心雕龙》，主要是借助于她的评介。

波氏认为，在中世纪初期（3 世纪起），中国文学从文体混杂的状态中逐渐分出一个诗学分支，人们开始根据古代的典籍提出若干诗学原则或原理，这是重大的进展。其中，“对于该时代的艺术实践作出最高概括的是刘勰的论著《文心雕龙》五十篇”。

她认为，刘勰把创作的发展同文字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从有关龙、龟的深化，主人公奇妙的现象起直到经籍所记的有关孔夫子的传说止，创作的发展史也同传统的“历史”学说本身相结合，凡是引用孔子言论的都是为了借其名义来“阐释”刘勰本人以道家观点为出发点而提出的理论概念。承认一切过程的“自然性”（客观性），把关注大自然放在首位，人对自然的模仿以及相信人的智慧具有无穷的能力（“生命是有限的，但知识是无限的”）等论断，“都可以证明刘勰的美学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前提的”。

她指出了刘勰观点的实质，说从刘勰反儒学的论题就可以证明他是持道家观点的，例如他认定孔子是老子的学生，又如尽管纬书为经书作辩护，但“在许多场合下，刘勰是把这两种敌对的学派结合起来的，这是因为当时任何意见从全民创作的典籍采用出来的东西都被认为是儒家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诗学特点都具有世界观的双重性；儒家作为正统的标签，道家作为内在的理想和追求。因而刘勰的道家观也不得不用儒家的词句来掩饰”。刘勰理论的这种特点在他涉及的其他美学问题中随处可见。他也不反对文学有教化作用，而这种观点是儒家所固有的。

关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波氏指出，从书名把“雕龙”和“文心”并列就可以看出，作者是主张二者相统一的。因为“文心”就是文学思想，也即内容，而“雕龙”则指用语言来表达内容的技巧。可见“刘勰从追求美的愿望导致承认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即“巨大的思想和美好的形式”必须兼备。为此，刘勰引入了新的术语：风骨。她解释道，“风”指思想，也指“空气”（风），“骨”指“正确的联词”（结言端直）。从刘勰用文学作品与鸟禽作比喻看，有文采而缺乏风骨的作品，犹如五彩斑斓的野鸡，飞不起来；有风骨而缺乏风采的作品，则如苍鹰，高翔在天，也不能供人欣赏。“无论是鸣凤，还是文学作品，都应当达到‘藻跃而高翔’的地步。这个比喻也显示了刘勰美学概念中形式与内容应当结合的标准”。

接着，波氏解释了刘勰对作家、批评家和读者的论述。她认为，在谈到作家时，《神思》篇和《才略》篇几乎完全重述了陆机的思想，但已经加以发展，不把创作活动看得那么神秘，而是清晰地叙述了过程：“用听觉和视觉感知事物……逐渐积累知识……丰富才智……然后静思凝虑，便使创作幻想飞跃，思想涉及以往千年，眼光遍及周围万里。”同时能把这种想象表现于文辞之中，使之更能被人理解，犹如车轮工匠或厨师的技巧，他们是由丰富经验作依据的。波兹涅耶娃发现，“刘勰在评价作家的才能上是师承曹丕而不赞成钟嵘的”，他的优点是“指出了作家对不同体裁的创作各有所长”，比如说“孔融气盛于为笔，祢衡思锐于为文 ”。此外，刘勰还把作家的才能分为“缓慢的”和敏捷的“即兴赋诗”能手两类。

至于谈到批评家和读者，波氏分析了《知音》篇论批评家和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原理，说刘勰尖锐地批评了“贵古贱今”和反对新生事物的倾向。“这种儒家的风气和曹丕所指出的‘文人相轻’的弊病却导致了刘勰的结论：知音千载难逢其一。”不过刘勰批评家要提高修养：开阔眼界、增广知识，要能抛弃偏见，对于正统的和非正统的作品都要善于理解，以便于对其作出正确的诗学评价，即做到“平理若衡，照辞如镜”，使评价既公允又独到。

她说，刘勰把读者接受作品的过程描绘成是与创作作品的过程正相反的认识活动，即“诗人是先产生情感，然后形之于言词；而读者是先开卷阅读，然后才出现情感”。欣赏就要善于深入体会作者的构思，即追踪其思绪的波浪，使得隐藏的东西也能外露。这样善于欣赏的罕见的“知音”就以刘勰所举的钟子期听琴为例。此外，刘勰还论述欣赏能力来自于现实的需

求(“衣食”)、艺术(“音乐”)和思维(“思想”)等活动。

最后,波兹涅耶娃集中论述了《文心雕龙》对文学作品的分类和中国文学常用的艺术手法。她说刘勰把文体分为诗歌(有韵律的)和散文(无韵律的)是一大进步,刘勰和孔子以及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的不同点,是指出了不应轻视谜语和谐辞隐言等民间创作,尽管它们比较粗俗;还应当接受历来被排斥在“高雅诗歌”艺术殿堂之外的“小说”。接着她详细解说了刘勰对具体的文学体裁和艺术手法的论断,如赋、比、兴、风、雅、颂,书记、事类、史传……以及它们各自的来源。她还指出,“刘勰看待经书,与其说是从伦理学的角度,即当作‘古训’,不如说是从美学的角度——当作‘艺术作品的宝库’”。

此外,波兹涅耶娃还列举了刘勰著作的积极影响。她说,在《文心雕龙》等一系列诗学论著的影响下,萧统和萧纲开始按照这些理论进行文学活动。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就是把文学作品同民族学、哲学和史学的著作分离开来的实践。

波兹涅耶娃的分析和阐述是否全都准确和符合作品的原意,尽管还可以讨论,但对《文心雕龙》作如此详细和系统的论述,在俄文书刊里还是第一次。这是她在介绍中国古典文论中不可磨灭的功绩。

3.从独特的角度分析

针对《文心雕龙》等古典文论难度大的情况,李谢维奇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何理解同本民族思维方法有重大差异的异族文学和文化。他的专著《古代与中世纪之交的文学思想》便是以这个问题为中心展开的。

首先,李谢维奇列举中国文化在欧洲人眼中显得怪异的事为例,说明问题的严重。他说,很久以前欧洲人就对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对他们感到陌生的中国精神文化及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特点表示惊讶。事实上要让欧洲读者理解中国古代文学,还需要克服更多的障碍,其中关键问题之一是找出历史上形成的中国思维模式,讲解那些有价值的重要的中国文学概念和范畴。

接着,李谢维奇便从古典文论及文学作品中挑出若干个中国传统的文学概念,包括体裁模式、艺术手段的术语和美学范畴,分章逐个加以论述,从而阐明中国古代至中世纪之交的文学思想。他广泛引述古典名家孔子、庄子、老子、刘勰、刘向、司马相如、司马迁、班固、曹丕、屈原、钟嵘、陆机、杨

雄、董仲舒、王充、朱熹、郑玄等几十人的论著，集中说明以下12个文学概念："道"、"德"、"文"、"气"、"风"、"风骨"、"赋"、"比"、"兴"、"颂"、"诗"、"小说"。

李谢维奇的专著论析的文学概念，可概括为四个方面：①认为"道"、"德"、"文"是总论，既是世界观，又是文艺观。"道"指宇宙之路，即大道，其具体表现为"德"，在文字上体现为"文"。②"气"、"风"、"风骨"把宇宙和文学创作联系起来。"气"是一种以太，在宇宙形成为"风"，"风"进入诗歌创作范围便成了"风骨"。③"颂"、"诗"、"小说"等概念是属于文学体裁的，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主要文学样式。④"赋"、"比"、"兴"则是谈艺术手法，即描写手段的。

李氏的专著虽然不是专门论《文心雕龙》的，但征引《文心雕龙》原文多达50余处，而引文的翻译本身就起到了介绍和传播原作的作用。李谢维奇在征引《文心雕龙》时所作的诠释，也反映了他对刘勰的理解，总的看来，也可以说他是从独特的角度（从文学思想）来分析《文心雕龙》的。这里试以他征引最长的一段为例。

在专著的开头，李谢维奇根据《道德经》、《易经》、《说文解字》等书详细讲述了"道"、"德"、"文"各自的来源、含义以及在古籍中使用情况之后，便征引了《文心雕龙》中《原道》篇一段很长的文字（译成俄文）：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琦，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他认为，这段文字全面描绘了"道"、"德"和"文"三者之间关系的全面图景，说"除了引用刘勰原文是最好的说明外，任何的转述或诠释都会显得苍白，而且还不如原文鲜明和生动"。同时，根据这段文字不难判断，刘勰是把文字看作某种"文学思想"来体现的，那种思想是宇宙所固有的，只是后来在其逐步演化过程中才呈现出来。接着李谢维奇又往下引用一段文字来证明这种思想：

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

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人文之元,肇自太极。

他指出,"刘勰在这里明白揭示'文'的最初来源是现实生活之外的太极",而"道"也是来自于太极。李谢维奇得出结论:这种关于"文"、"道"起源的观点从所引文章已经看得再明白不过了。

李谢维奇在阐释古代传统的文学概念时,总是在适当的机会以引用《文心雕龙》的论断为证。这里还可以举"风骨"为例。他依旧先根据《诗经》解说"风"的起源、演变以及它的几层意思,然后说明是刘勰加进了新的含义,即增加了"骨",创作了新的概念"风骨",同时引用《风骨》篇的一段话(译成俄文)以讲解这个概念的含义:

夫翬翟备色,而翾翥百步,肌丰而力沉也。鹰隼之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风骨乏采,则鹜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若能……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

他以此说明,"风"已在《文心雕龙》中增加了新的意义,被看作作品内部的某种基因。缺乏这种基因,文采便毫无用处。同时,他也看到"风"与"骨"的关系。

总之,李谢维奇在专著中使用《文心雕龙》为材料,只是作为例证,目的在于阐明他对中国文学思想的看法。专著最后的归结是"文学与时代"、"古代与现代"、"从伦理学标准到美学标准"等原则。俄文读者看了这部系统、充分地讲解中国传统的文学概念和术语的论著之后,不但可以了解古代的中国文学思想,而且有助于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能读懂和接受更多的东西,同时,也可以增加对《文心雕龙》的理解。

但是《文心雕龙》毕竟是一部宏大精深的文论巨著。俄国汉学界人士也承认对它还研究得不够,虽然有些人曾经涉足于其中,但像波兹涅耶娃、李谢维奇这样有成就的研究者,在目前仅是凤毛麟角。有鉴于此,一些有识之士已决意要改变这种状况。莫斯科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尤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在1990年曾经同笔者谈起,他准备用吸收中国学生参加并

加以培养成为博士的办法，让两国学者在这过程中通力合作，出版完全的《文心雕龙》的俄译本，为在俄国开展深入的研究创造条件。

4. 出版选译本

李谢维奇毕生关注中国古代文论的翻译与研究，曾于20世纪80年代连续两次来华参加《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第一次，1988年在广州，提交论文《刘勰与赋、比、兴的概念》（另一位苏联学者戈雷金娜的论文为《〈文心雕龙〉所体现的中国古代文心和典雅文学模式》），第二次，1993年在北京，提交论文《〈文心雕龙〉在俄罗斯的阐释》。

根据俄文本《中国文化史》作者、年轻的汉学家克拉芙佐娃提供资料，李谢维奇晚年已译出《文心雕龙》的大部分篇幅，书名为《Лю Се. Дракон, изваянный в сердце словес》，收入勃拉金斯基编的《中世纪东方学的类型学问题》一书中（В. И. Брагинский, Проблемы типологи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х литератур Востока М. 1991），可惜译者已于2000年去世，再无法完成全译。克拉夫佐娃不无惋惜地说到，俄文本的全译文得有待于后人了。

第九章
隋唐五代文学在俄罗斯

一、唐诗俄译和研究综述

俄国很早就注意中国文学，这在俄国汉学的先驱比丘林的著作中可以得到印证。早期的中国文学作品俄译本或转译自满文，或从其他欧洲文字移译。对唐诗的译介则始于19世纪。王勃的《滕王阁序》(О павельоне князя Тэн)的俄译本(共10页，交通部印刷厂)于1874年在圣彼得堡问世。1880年瓦·巴·瓦西里耶夫在其所著《中国文学史纲要》中盛赞中国古诗的繁荣，首先向俄国读者介绍中国唐代诸多大诗人的名字。他写道："倘若我们懂得并高度评介普希金、莱蒙托夫、科里佐夫的短诗，那么中国在绵绵2000年里出现的诗人，像普希金等人写的那样的短诗就有成千上万……这里仅举司马相如、杜甫、李白、苏东坡等为例就够了。"此后，俄国和苏联时代对唐诗的译介持续不断，其中在20世纪初和50—60年代还出现过两次成果丰硕的时期，使唐诗研究和鲁迅研究一起成为苏联时代汉学成果最为丰硕的两个领域。

(一)大量翻译和多种译法

苏联时代对唐诗的翻译是比较系统的，尤其是杜诗。首先是1916年阿列克谢耶夫全文译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十月革命后他又倡议开展中国诗歌研究，特别是对难度较大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1920年他提出了一个翻译中国文学名著的宏大规划，包括"全中国都敬重的伟大的杜甫的诗"。20年代起他陆续翻译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孟浩然等大诗人的诗，分别刊载于各种报刊和诗集中。以后又逐步扩大译介的范围，其中包括一般的诗人。

唐诗俄译本最流行的有50年代出版的两种。一种是1956年出版的《中国古典诗歌集——唐代》(Китайская 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поэзия. Эпоха Тан.),系费德林编选并作序,由亚历山大罗夫、马尔科娃、巴斯曼诺夫等15人翻译,共430页。另一种是1957年出版的《中国诗歌集》(Антолог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поэзии)第2卷(唐诗),郭沫若和费德林编选,共376页。这两本书均由国家文学出版社在莫斯科出版,第一次印刷均为35000册,在苏联流传很广。

这两本诗集中入选的诗人最多,所选均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前一本选入58位诗人的181首诗,其中最著名的诗人入选的诗最多,如李白18首,杜甫20首,白居易18首,王维17首。其他重要的诗人也有三四首或七八首不等,如孟浩然、刘长卿、岑参、韦应物、刘禹锡、柳宗元、元稹、杜牧、李商隐、温庭筠和南唐词人李煜等。别的入选的诗人也都有一首或两首名诗,从初唐到晚唐依次有王绩、卢照邻、骆宾王、王勃、杨炯、沈佺期、贺知章、王翰、崔国辅、李颀、王湾、王之涣、王昌龄、高适、常建、李嘉祐、钱起、张继、顾况、戴叔伦、张志和、孟郊、韩愈、王建、李贺、李绅、曹邺、皇甫崧、聂夷中、杜荀鹤、牛希济等。

后一本和前一本入选诗人大同小异。后一本仅未收李煜的诗,增加了张若虚、陈子昂、张九龄、皮日休等,总入选诗人扩大为61位,诗作共202首。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又出版过几种有关唐诗的选集:1975年艾德林译的《中国古典诗歌集》(文艺出版社,352页),1975年斯米尔诺夫编选的《中国8至14世纪抒情诗集》(科学出版社,286页),其中有王维、苏轼、关汉卿、高启等人的作品,1984年出版的《中国3至14世纪写景诗集》(莫斯科大学出版社,320页)和艾德林译的《中国古典诗歌集》(文艺出版社,373页)。此外,1977年出版的《世界文学丛书·中国古典诗集》(文艺出版社)也收有一部分唐诗。除了诗,在1979年由巴斯曼诺夫译的《梅花开——中国历代词选》(Цветёт Мэйхуа,425页)中也选入了李白、白居易、李煜、温庭筠填的词。

同时,为下列几位唐代大诗人都出了专集。

(1)李白。李白诗单首的俄译最早出现于1896年,诗集有《李白抒情诗选》(Ли Бо. Избранная лирика.,吉托维奇,А. Гигович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6年和1957年各出一版,均174页)。

(2)杜甫。杜甫诗单首的俄译最早出现于1896年,诗集有《杜甫诗集》(吉托维奇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5年和1962年各出一种,分别为222页和276页)、《杜甫抒情诗集》(吉托维奇译,文艺出版社1967年,174页)。

(3)王维。王维诗单首的俄译最早出现于1922年,诗集为《王维诗集》,有两种版本,一种为吉托维奇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144页),另一种为苏霍鲁科夫译(文艺出版社1979年出版,237页)。

另有《唐诗三人集——李白、王维、杜甫诗三百首》(Три танских поэтов,东方文献出版社1960年出版,494页)。

(4)白居易。白居易诗的单首俄译最早出现于1910年。白居易作品集的俄译本最多,共有六种版本,均由艾德林译,计有《白居易绝句集》(Бо Цзюйи. Четверостишия)三种版本(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于1946年、1949年和1951年各出一版,分别为144页、223页和240页),《白居易诗集》两种版本(国家文学出版社于1958年和1978年各出一种,分别为262页和303页)和《白居易抒情诗集》(文艺出版社1965年出版,211页)。

苏联时代有计划地大量译介唐诗,结果也造就了一批唐诗及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家,并且出现了几种不同的翻译方法。汉学家中从事诗译的人多数采用直译法,虽忠实于原文,但在修辞和表达方面有时未能符合俄文读者的习惯。少数人是结合研究进行翻译,既忠实原文,又注意传达诗情韵味,如阿列克谢耶夫、艾德林、费德林等。阿氏在翻译司空图《诗品》时特意提出直译和意译(有诗韵)两种译文,并附录中文原文,以供比较和鉴赏。艾德林1937年于莫斯科东方学院毕业后就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1942年即以《白居易的绝句》论文获副博士学位。他长期从事研究与翻译工作,不但有多种译作和论陶渊明、白居易的专著,而且就汉诗的俄译问题发表许多文章,论述如何译得忠实又传神。他的翻译经验也为苏联汉学家们所肯定,被视为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权威。还有一种译法是由作家与汉学家合作,但以前者为主,其译本大多符合俄诗的规范,很受读者欢迎,流传也最广,如著名女诗人阿赫马托娃、作家巴斯曼诺夫等。他们本身就会写诗,借助于汉学家译述的素材进行翻译,实际上是一种再创作,但又不脱离原意。这种译本也为汉学界所赞许。例如诗人吉托维奇多年与汉学翻译者合作,对中国古典诗歌的俄译文进行诗的加工,出版了李白、杜甫、王维等诗集的译本,至今仍是最受欢迎的唐诗译本。

（二）综合论述与专题研究

苏联时代对唐诗的研究，如若同大量的翻译相比，论著就显得逊色。虽然至今还没有一本综合性的研究唐诗的专著，仅在1967年发表了艾德林写的一篇长文《唐诗》（载《东方各民族的文学和民间口头创作》，莫斯科版，40页），其中有扼要的介绍。但是如果考察汉学界对几位唐代大诗人的研究，不难发现也已具有相当的规模。迄今已出版了研究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和司空图的五部专著，发表了评介唐诗的论文和资料性文章138篇，并有了一批著名的研究家，如阿列克谢耶夫、艾德林、费德林、费什曼、达革丹诺夫、蒙泽勒等。

1. 综合评价：唐诗的高度成就

汉学家对唐诗成就的论述，以科学院通讯院士费德林最具代表性。他在1972年纪念白居易诞生1200周年的文章中写到唐诗发展的趋势，介绍它繁荣的情况时写道："继陶渊明之后，唐代诗人陈子昂也反对旧的形式和题材，提倡克服矫揉造作、晦涩难懂的习气，主张恢复三国时期曹植、阮籍的诗风和韵律规则。随着诗歌题材的进一步扩大，诗歌的形式也更加丰富多彩。8世纪便出现当时最杰出的风景诗巨匠、诗人和画家王维"，这个时期"最伟大的诗人李白在绝句和七律上已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并对以后数百年的诗歌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接着，费德林写道，在安史之乱导致唐朝衰落之后，出现了"旧的诗歌传统的继承人和新的诗歌创始人杜甫。他表现了对祖国命运的忧虑，对人民利益的深切关怀和对孤苦无依者遭遇的同情"。他称杜甫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而"白居易的创作则经常从取之不尽的民间诗歌，从伟大的前辈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等人的经验中汲取养分"，其结果"使白居易的诗成为唐朝在民间最为普及的诗"。"这使唐代著名诗人元稹不禁称赞白居易，说白诗从达观贵人到牧民马夫'妇孺皆知'，争相传诵"。费德林在历数了几位大诗人对唐诗的贡献，概括地描述了唐诗的发展脉络之后，便肯定这几位唐代诗人的诗"已经超越时代和国界"，成为无数国家和人民的精神财富。

费德林的论断是以丰富的汉学实践经验为基础的。他1937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随后成为阿列克谢耶夫的研究生，不久就被派到驻中国的苏联外交机构任职，20世纪四五十年代长期在华工作，对中国的国情与文化有较深的了解。同时，从事大量的研究工作。他不但是当年苏联唐诗

翻译工作的组织者，而且是著名的翻译家和评论家，他广泛涉足于中国文学的各个领域，从诗经到当代文学，写过许多文章和论著，主要著作有《当代中国文学概观》(1953)、《中国见闻录》(1955)、《中国文学史纲要》(1956)、《诗经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1958)、《中国文学研究问题》(1974)、《中国古代文学作品》(1978)、《中国文学遗产与现时代》(1981)、《费德林文集》两卷(1985)等。还为四卷本《中国诗选》、《诗经》、《红楼梦》以及鲁迅、茅盾、老舍文集的俄译本作序。他不仅对唐诗，而且对整个中国文学都有很高的评价。1989 年他曾概括其研究工作的体会，写道："我一辈子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没有中断过，为人类文化宝库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在文学和文化方面是值得自豪的国家。中国的诗经、楚辞、唐诗、元曲等优秀著作是任何国家所望尘莫及的"。

关于唐诗的成就，除费德林之外还有艾德林也作过精辟的论述。他在专著《陶渊明和他的诗》(Тао Юань - мин и его стихотворрения，1967)中曾论述唐诗繁荣的源泉。他认为一方面汲取了古老传统诗歌的营养，另一方面继承晋朝陶渊明首创的自然和朴实之风。唐诗的特色则是"善于表现人民丰富而崇高的精神境界"。艾德林与索罗金合著的《中国文学》(1962)和长文《唐诗》中，一再勾勒唐诗发展的历史脉络。他指出，唐朝"诗歌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它无所不在"，"论多面性，李白就如我国的普希金"，"李白以至整个唐诗的细腻抒情、朴实和人道主义，特别强烈地表现在当时已发展到极致的体裁'绝句'中"。他又说："唐诗由于有了杜甫，就可以说它已经为农民的贫苦而大声疾呼了。在杜甫之后，白居易才可能发出唐诗中揭露性最强的话语。"

2. 传统的评论法：论李白、杜甫

苏联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专著多从社会学批评的观点出发，虽然兼论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但重点在思想性，尤其强调诗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人民性。列宁格勒大学教授叶·谢列布里亚科夫的《杜甫评传》(Ду Фу: Критико - Биографи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1958)是个突出的例子。该书的"序言"指斥以往评论者的通病，他写道："西方和旧中国的资产阶级文艺家力图把杜甫说成仅仅是形式上的大师，而绝口不谈他首先是爱国主义诗人，是中国最早的真正人民诗人之一，他热爱普通人，为他们贡献了最优秀的作品。"

谢列布里亚科夫在评传中指出，杜甫“继承屈原、陶渊明，包括初唐诗人的传统”，并加以发扬，“在中国诗歌史上打开了新的、光辉的一页”。他对诗人作了这样全面的总评价之后，便联系时代背景来谈诗人高大形象的社会作用。他说杜甫在长安的十年失意，“其命运并不是一个失意者的遭遇，而是一个具有高尚理想的人在封建时代的典型命运，他的理想同现存制度势必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他的诗中暴露出社会的一个侧面。

作者着重分析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兵车行》、《石壕吏》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一批诗作的思想内容，指出“杜甫希望看到祖国的土地从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因而诗中大大提高了爱国主义基调”。同时，由于诗人接近人民，才“使他的诗具有人民性”，“在诗中歌颂普通人并鞭挞官吏的残暴”。他把诗人的艺术成就归结为：“杜甫的抒情诗中塑造的是诗人自身的形象——这是一个能深切体会他人的苦乐、关心祖国人民的命运，在当时堪称进步人士的形象。”

我们发现，作者也用于相当大的篇幅来分析杜诗的艺术性，肯定杜甫作为诗人“有娴熟的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创造了准确、鲜明的形象，达到了诗歌叙事的最大容量和集中概括”。不过作者注意从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角度进行分析，认为这样高的艺术成就仍然跟时代有关，一方面唐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著名的诗人就有2000多位，流传下来的诗也有4.9万首，杜诗正是这股诗流中的突出代表，是众多诗人经验的荟萃。另一方面杜甫个人的成就也是当年诗坛各种条件促成的。当时情况复杂，流派纷呈。有人单纯模仿前人，格调单一；有人盲目追求形式而无思想内容；有人无病呻吟，消极颓废；有人苟且偷安，力图摆脱安史之乱后出现的复杂局面，不敢面对现实；当然也有人继承民间创作《诗经》和乐府的传统，能够广泛地概括现实，反映阶级社会的不平等和人民的苦难。杜甫恰好是在这许多互相对立的诗歌流派和传统中作出了正确的抉择，才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谢列布里亚科夫在肯定杜诗的艺术成就的同时，强调指出了杜甫诗的社会价值或社会功能。例如他夸赞杜甫的山水诗，尤其是杜甫漂泊西南、寄寓成都郊外草堂时期吟咏自然的诗。他说：“杜甫写村居生活的诗比陶渊明还要质朴，还要鲜明”，“他绝少用带有书卷气和文绉绉的语言，他能从容不迫地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望江亭》一诗恰似在同挚友谈心”。而且“杜诗大大丰富了中国的山水诗”，它“把歌颂祖国大地之美、歌颂普

通农夫的生活等基调同诗人对自身命运和国家大事的思考结合在一起”。

书中进一步探讨杜诗对后代的影响，说“杜甫是唐代‘社会派’诗歌的创始人。这一派诗人深化了杜甫的创作原则，创造了许多社会题材的诗歌”。同时，“杜诗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很大”，后代诗人向他学习的正是“爱祖国、爱人民的思想和高超的诗艺”。谢列布里亚科夫在这部专著中始终强调杜诗的思想及社会价值。他正是从社会功利主义高度来强调杜诗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他说：“这位古代优秀作家的诗句至今还能激励读者，在他们心中激起高尚的思想和情操”，因此可以说“杜甫的声誉已经超越中国国界”。

同时于1958年出版的女汉学家费什曼（1919—1986）的专著《李白的生平与创作》（Ли Бо: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也具有同样倾向。这本仅有50页篇幅的读物系统地介绍了李白的一生，从他读百家，好剑术，喜爱隐居山林到醉心于道家思想；从他浪游黄河、长江一带，直至仕途波折等经历，都一一作了介绍，多方面论述了李白的诗歌创作，对吟咏自然山水、表达爱情友谊、描述历史变迁、反映现实人生等题材的诗作出分析，注意引用诗句为例，写得生动具体。最后归结的赞语是“李白的爱国主义和人民性”，她论述的要点也是侧重于作品的思想性。费什曼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已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传奇和笔记小说。1980年出版的专著《17至18世纪三位中国短篇小说作家：蒲松龄、纪昀、袁枚》已经改变风格，更多地探讨几位作家的写作方法和技巧，著作本身显得更为丰富和多样。看来她先前写成的李白评传确是带有50年代学术潮流的印记。

费德林写于1973年的文章《伟大的李白》以及为唐诗选所作的序文中倒是着重指出其艺术成就，例如他认为李白是“具有无穷的创作幻想力、高昂激情和塑造鲜明形象的能手，他的创作是唐代诗歌的杰出代表”，“李白的绝句和七律已经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李白的抒情诗非常美，其特点是朴实简练而感情真挚……李白的创作对后来几百年中国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传统评论的突出成果之一是别仁（原名为列昂尼德·叶甫盖尼耶维奇·巴迪尔金）所著《杜甫传》（Л. Е. Бадылкин, Ду Фу. 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87年，共271页），被列入《名人传记》丛书，它面向广大青年读者并负有思想品德教育的目的，足见对杜甫的重视。这套丛书自从1933年高尔基创办以来，中国作家中只有杜甫和鲁迅（1957）最早享受到这样的殊荣。

书中介绍诗人的生平业绩也是突出其热爱祖国、接近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以及其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全书除前言、后记外，共有八章，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了诗人的经历和创作。

作者别仁是诗人兼汉学家，他出生于莫斯科，1972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副博士(1975)，在东方民族艺术馆任职，主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艺术。著有《4 至 5 世纪的中国诗人：谢灵运及其时代》(1975)，《谢灵运》(1980)等书。

别仁对杜甫有过长时间的研究，除了译杜诗，还参考中国作家的创作，特别是冯至的《杜甫传》、陈贻焮的《杜甫评传》、萧涤非的《杜甫研究》以及傅东华的《李白与杜甫》等书，把俄文版的杜甫传写得深入浅出，生动感人，很适合青年读者阅读。别仁说，中国古代的传记与西方的写法完全不同，它几乎不注意人物的内心感情和生活细节，而只记叙传记主人翁的丰功伟业和高洁品行，几乎就是一部“成名史”。因而他写这部传记时就要弥补不足，兼顾两个方面，既写言行，也揭示内心。

别仁解释其写法，认为这样去写杜甫并不难。因为杜甫并不是“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相反他是力图走出去，到各个生活领域里去，无论担任公职，还是种地割稻，无论外出远游，还是作文写诗，他都努力实践，同时把这些实践反映在其诗中。从诗中可以看出杜甫的外貌瘦削的脸形，稀疏而斑白的头发和胡须……可以捉摸到他的灵感直接来源于尘世的生活，他的诗中充满喜怒哀乐等一切人类的感情——他和妻子儿女如何幸免于安史之乱，他如何在贵州孵小鸡以及如何带着猎鹰去追逐猎物，这一切在诗中写得非常逼真，犹如中国古代画家的写生，同时又充分反映诗人的感情，把一切传达得栩栩如生。此外，杜诗还把祖国和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尤其富于表达民族的风情、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婚葬仪式，杜诗是研究中国民族史的宝贵资料。在别仁看来，杜诗正是“历史、神话、传说和民间口头创作的综合，杜诗是一面真实的民族之镜。它既反映民族的过去，也反映它的现在和将来”，恰好可以充当青年爱祖国、爱人民和爱生活的教材。

3. 新的观察角度：王维与禅学

从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尤其是从民族文化传统的背景来考察文学，这是学术界多年以来出现的新现象。1984 年在新西伯利亚市科学出版社分社出版的一本论唐代诗人的专著《王维创作中的禅佛思想》(Чань - Буддизм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Ван Вэя. 134 页)正是这种新现象的反映。作者是

新起的汉学家达革丹诺夫(Г. Б. Дагданов,1948—2002),曾于1980年以论文《大乘佛教对唐代诗人创作的影响——以王维和白居易为例》获副博士学位。此后,他继续研究佛教对唐代文学的影响,注意到王维的作品《画学秘诀》早在1923年就有了俄译本(如今王维诗已有俄、日、英等多种外文译本)。各国汉学界也颇重视对王维的研究,虽然已有论者指出王维的诗同佛教学说有密切关系,但迄今无人以此为专题进行研究。因此他写这部专著恰巧是为了填补空白,只想抓住这个侧面去探究王维的创作,也可避免面面俱到,重复老调。

达革丹诺夫的专著分成三章。第一章"中国佛教史上的若干情况"叙述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佛教文学的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佛教思想。第二章"王维是诗歌中禅派的长老"。第三章"王维文学创作中对禅佛的赞颂",从诗人生平阶段的划分、世界观中的"空灵"根源、创作中的意境、隐居诗人的情趣、诗人同和尚们的交往以及王维写佛教的诗等方面深入探讨,既由作品所表现的禅佛思想入手,又归结到王维同佛教的相互关系。这种论述角度新,是以前汉学家未曾使用过的,书问世后很快就引起人们的注意。同时,这样论述集中,观点鲜明,重点突出,也是很少有的。

作者指出,王维为人正直,有理想和抱负,但未能实现,为官又屡遭贬谪。他本来就信佛,后半生长期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便以诗来表达这种感受,寻求内心的安宁,诗中尽力超越现实,表现"空灵",直至陶醉于佛教禅说那般空寂的境界。随着思想日趋消极,其佛教信仰也日益发展。然而王维毕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艺术造诣高超,尤其是山水诗表现了闲逸潇洒的情趣和静谧恬淡的境界,还是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里作者所涉及的问题,虽然是以往论者所谈到的王维思想感情,即他的山水田园诗中的闲逸情趣恬淡境界和禅学寂灭的佛理以及王维的遁世思想,但因是从新的角度来论述的,故能给人以新鲜感。

这本专著不仅从唐诗研究来看显得新颖,而且就俄国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而论也是独具特色的。

4. 中西比较诗学的开端:司空图研究

汉学家研究唐诗成绩最突出的是阿列克谢耶夫院士。他早年潜心研究唐诗十年,完成著作《中国诗论·司空图〈诗品〉》(Китайская поэма о поэте Стансы Сыкун ту. 1916),于1916年出版。这是一部融评、译、注于一炉,有790页(16开本)之巨的专著。它不但在俄国是第一部研究中国

古典诗歌和诗论的巨著，而且在世界上也是空前的。该书使作者获得硕士学位，出版后三年内又使他提升为圣彼得堡大学教授和博士，到20年代末就成为科学院院士。

该书分为评论和翻译两个部分。评论部分分设四篇。第一篇有四章，分别论述《诗品》成书的历史、作品的内容和艺术技巧以及它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中的地位。第二篇有五章，分别介绍《诗品》的版本、注家、仿作（如《续诗品》等）以及它的英译本。第三篇有五章，评述司空图其人，包括其生活的历史时代、生平际遇及传记材料，论述作为人和作为诗人的司空图品格。第四篇从方法论上来阐明如何看待这部作品，提出这不是寻常的长诗，而是一部“诗论”。

这部著作的特色有两个：

第一，把《诗品》与中国早期的文学思想、前辈诗人的创作和司空图本人的其他作品联系起来考察，对《诗品》作出全面与科学的分析。作者具有文学史家的眼光，把司空图的《诗品》放在中国文学发展史的长河中来研究，从南朝梁钟嵘的《诗品》、唐代李嗣真的《画后品》到司空图以后的各种仿作，理出纵向的历史脉络，借以阐明司空图《诗品》的地位和价值。又从横向来对照花品、茶品、鱼品、书品、画品，以指明“诗品”这类作品的特点。由此得出结论：“不能把《诗品》和司空图的其他诗作等量齐观，而应看作是独特的专著。”阿列克谢耶夫认为这部长诗无论“从欧洲和从中国的观点来看，都堪称一部杰作”。这部专著第一次阐明文学活动与社会发展及与整个文化的关系。

第二，从诗学的高度来评价《诗品》，并与欧洲文学中的诗论作对比，开了中西比较诗学的先河。阿列克谢耶夫从文艺理论的角度来看待《诗品》，指出它既然是一部诗论，就不能像对待一般诗歌那样去挖掘诗人的内心和分析形象，而应看作是一部理论著作。接着便阐明《诗品》可以同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前65—前8）的《诗艺》和法国诗人布瓦洛（1636—1711）的《诗的艺术》相媲美。阿列克谢耶夫赞扬《诗品》说：“司空图的长诗在世界文学上占有一个极其荣耀的席位。”

此后，阿列克谢耶夫不断深化比较研究的观点，在40年代重译了司空图的《诗品》，新译了陆机的《文赋》，写出重要论文《罗马人贺拉斯和中国人陆机论诗艺》、《法国人布瓦洛和同时代中国人论诗艺》等，形成了系统的中西比较诗学的观点。概括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倡导开展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最早从理论上阐明这种比较研究的意义。他指出，比较研究不应该有任何限制，所谓“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二者任何时候也不能混淆”、“中国很特殊，比较研究往往不能见成效”等看法是错误的。他认为“如同其他国家的文学一样，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比较研究是一项重要工作”。他提出比较研究工作的意义：从比较对象的相异处可以说明诗人们各自的特色，从比较对象的相同处可以理解整个世界、人类和文学。

第二，把司空图、陆机和贺拉斯、布瓦洛放在一起对比，尤其具体地对比了《文赋》和《诗艺》：一方面对比出不同点，从他们如何对待文学前辈，也即继承传统，创作过程中的用词习惯，对诗剧的认识，对音韵的看法以及诗人的气质、文章的述说语气等方面分析两位诗人的差异，从而说明这些差异正好构成他们各自的艺术风格。另一方面注重寻找中西诗人的共性。他分析了陆机和贺拉斯的共同点：①相同的理想。把古代理想化，以古诗人为楷模。②相同的诗学原则。主张诗要朴实、和谐、能打动读者心弦，诗应高尚、雅致、质朴、明快、色彩调配相宜，诗应有大胆的幻想、出奇的比喻，以形象感人，诗人应是一位超人，而不是平庸之辈，反对诗人以诗取宠于帝王。③相同的创作观点。重视继承优秀传统，诗人既要有天才，又要能刻苦实践，应放弃盲目模仿而崇尚独创。诗应以“美”取胜，并以“娱乐人和教益人”为原则。

通过对比，他得出结论：“被全部历史条件所隔绝的两位诗人，用同一题材各自写下了非常相似而又无疑是互相补充的诗论。”他说：“在中国诗学里，当我抹去了使东西方为之隔绝的异国色彩时，便看到了具有全人类性的手法。”

第三，尤为可贵的是，阿列克谢耶夫作为欧洲人，并没有简单地套用西方诗学的原则来分析东方诗人，而是从中国诗歌的实际出发，切实地论述中国诗艺。他从论析陆机入手，高度赞扬陆机这位中国诗人和诗论家，分析陆机那非凡的艺术想象力和艺术灵感，超俗的眼光，他认为诗人“处于如痴如狂的艺术灵感之中”，“似乎置身于世界的中枢，从那里用独特的、非尘世的、永恒的像宇宙一般混沌的眼光看事物。他的想象张开翅膀，在广阔的天空遨游，志趣高尚。这种艺术想象，片刻之间，可以纵观古今，也可历览四境”。又说陆机是一位超人，“他的文思不受疆域的限制，涉过亿万年的桥梁……它随天机而运动，来自激荡胸中的风暴，泉水似的涌现生

活”。他甚至夸赞陆机是“宇宙的预言家,能把宇宙的一切概括在形象之内,把美的事物表现在自己的笔端”,也夸赞陆机作为诗人的高尚修养、情操和气质。

接着,阿列克谢耶夫指出司空图以及一大批中国后世的诗人及诗评家都和陆机同属一类,他们的“全部文学作品都充满了陆机的思想,乃至他们的用语”。这样,阿列克谢耶夫的评论就有概论中国诗学艺术的性质。

从阿列克谢耶夫精辟的论述和最先实行的比较研究工作看,可以说他是中西比较诗学的先驱。

唐诗在俄国传播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俄国汉学界在研究唐诗上投入的力量和获得的成果都相当可观。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文化在俄国的影响之深。目前的问题是--批有造诣的汉学家年事已高,而青年汉学人员有志于文学者为数甚少,况且古文难,古典诗歌的理解和翻译尤为不易,往往使人却步不前。

二、费什曼著《李白的生平与创作》

女汉学家奥尔加·拉扎列夫娜·费什曼(1919—1986)毕生研究中国古典文学,1941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语文系之后,先后以两篇古典文学的学术论文获副博士和博士学位。前者是《欧洲学术中的李白》(1946),后者为《启蒙时代的讽刺小说》(1965),去世以前在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工作了近30年,翻译了大量古典文学作品,主要有唐代传奇、《阅微草堂笔记》(1974)、《新齐谐(子不语)》(1977),合译《镜花缘》(1959)。

她的研究重点是中世纪文学,除了论文,主要成果为三部专著:《李白的生平与创作》(1958)、《中国的长篇讽刺小说(启蒙时期)》(1966)、《17至18世纪三位中国短篇小说作家:蒲松龄、纪昀、袁枚》(1980)。

评介李白是她的第一本书,篇幅不大,只能说是普及性的小册子。它全面介绍了李白的一生,从他读百家、好剑术,喜欢隐居山林,醉心道家思想,到浪游黄河、长江一带,直至仕途波折等等,都有简要介绍。对诗歌创作则评述其吟咏自然,表达友谊爱情,描写历史,反映现实等各种题材的诗作,最后归结为“李白的爱国主义和人民性”。这带有50年代某些评论中只侧重于谈思想内容的印记。不过,只有50页左右的小册子,仅三万字上下的长文,也不可能要求容纳更多的内容。本书的意义在于它是一本苏联首次全面评介李白的读物。

三、杜诗评介和谢列布里亚科夫的《杜甫评传》

杜甫的译介，如果不算零散的译品，比较集中的有1955年出的《杜甫诗选》（吉托维奇译）和稍后出的《唐朝三诗人：李白、王维、杜甫》（蒙泽勒编选、译注，1960年，495页），1967年又出版由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译的《杜甫抒情诗集》。

列宁格勒大学教授叶甫盖尼·亚历山大洛维奇·谢列布里亚科夫（1928—）的研究重点在宋代诗词，有许多译作，如陆游的《入蜀记》（1968），并写了专著《陆游的生平与创作》（1973）和《中国10至11世纪的诗词》（1979）。但是他早期的研究工作却是以杜甫为起点的。他1950年于列宁格勒大学毕业，1954年即以《8世纪伟大的中国诗人杜甫的爱国主义与人民性》论文获副博士学位。1958年又以论文为基础扩展成专著《杜甫评传》（文学出版社，163页）。他发挥学位论文的观点，继续论述杜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性。不过，带有50年代的共同倾向，着重点仍然在于作品的思想性。他在评传的“前言”里说道：“诗人有娴熟的各种艺术手法，创造了准确、鲜明的形象，达到诗歌叙事的极大容量和集中概括。”但是“西方和旧中国的资产阶级文艺家力图把杜甫说成仅仅是形式上的大师，绝口不谈他首先是爱国主义诗人，是中国最早的真正人民诗人之一。他热爱普通的人，为他们贡献了最优秀的作品。”（第4页）

专著分《在家乡》、《长安十年》、《哀伤和愤懑的诗作》和《流浪的岁月》四章，依次叙述诗人早期的生活、在首都十年的活动、在“安史之乱”后的见闻与感受以及晚年漂泊南方的情况。这是第一部向苏联读者全面介绍我国大诗人杜甫的论著，其特点是简明扼要，又有一定的深度。

作者告诉俄文读者，唐诗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唐朝诗人知名的就有2000多人，留传下来的诗有4.9万首左右。因此，为了评价杜甫，就需要简要介绍杜甫年轻时必须在诸种互相对立的诗歌流派和传统中作出选择的情景。这里一方面有模仿前人单一的格调，有盲目追求形式，“无病呻吟”的颓废诗作，有寻求短暂的欢娱而力图摆脱当代复杂社会问题的贵族诗歌（尤其在安史之乱动荡时期）……但是另一方面却有来自民间创作首先是《诗经》的，还有乐府的优良传统，其特点是能广泛概括现实、反映阶级压迫时代人民的苦难，包括农民的贫困和士兵不堪征战之苦，也能反映人民的爱、勇敢和士兵的英勇（第9—10页）。作者认为，杜甫选择的

恰巧是后者，即由屈原、陶渊明，包括初唐优秀诗人所继承下来的传统，杜甫加以发扬，“在中国诗歌上打开了新的光辉灿烂的一页”（第 13 页）。

作者介绍杜甫在长安奔走 10 年仕途上毫无进展的情况时说：“杜甫的命运并不是一个失意者的遭遇，而是一个具有高尚理想的人在封建时代的典型命运，他的理想同现存制度不可避免要发生冲突。”（第 36 页）所以他的诗便开始表现出暴露社会的基调。

作者分析和评述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兵车行》、《石壕吏》等“三吏”、“三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以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一大批代表诗作。认为“杜甫希望看到祖国的土地从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因而他的诗中便大大加强了爱国主义基调”（第 101 页）。同时，由于杜甫接近了人民，便“在诗中歌颂普通人的精神美和鞭挞官吏的残暴”（第 102 页），这使得他的诗具有人民性。

谢列布里亚科夫把诗人的艺术成就归结起来说：“在杜甫的抒情诗中塑造的是诗人自身的形象——这是一个能深切体会别人的苦乐、关心祖国人民命运的、那个时代的进步人士的形象”（第 102 页）。

作者还指出，杜甫也擅长于山水抒情诗，特别是在漂泊西南时期，当诗人安居于成都郊外草堂的时候，写了不少吟咏自然的诗。说“杜甫写村居生活的诗，比陶渊明还要质朴和鲜明”，“他很少采取书卷气的形式和文绉绉的词语。他能轻松地、从容不迫地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江亭》一诗就像是在同很亲近的朋友谈心似的”。（第 118 页）因而“杜甫的诗大大丰富了中国的山水诗”（第 104 页）。不过，在杜甫的山水诗中，“歌颂祖国大地之美、歌颂普通农夫的生活的基调往往同诗人对于自己命运和国家大事的思考交织在一起”（第 103 页）。

谢列布里亚科夫说：“杜甫是唐代‘社会派’诗歌的创始人，这一派诗人深化了杜甫的创作原则，创作了许多社会题材的诗歌”（第 152 页）。他认为，“杜诗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很大”，后代诗人向杜甫学习的东西是爱祖国、爱人民和高超的诗艺（第 103 页）。

该书作者指出，“杜甫的声誉已经超越中国国界”，“这位古代优秀作家的诗句至今还能激励读者，在他们心中激起高尚的思想和情操”（第 158、159 页）。

在普及和评介杜诗方面，俄苏的汉学家也是不遗余力地做了工作。阿列克谢耶夫在 1920 年就提出了一个翻译中国作家优秀作品的宏伟计划，

其中包括“全中国都敬重的伟大杜甫的诗”。[①] 费德林则概括地分析了杜诗的主要特点，有助于读者理解已译成俄文的诗人作品。[②] 而苏联研究杜诗的主要成就，按谢列布里亚科夫的归纳，是在于“确定了杜甫创作的主要思想倾向和高度评价诗人在发展文化中的作用”（第 158 页）。

四、杜甫研究专题综述

我国唐代诗人杜甫（712—770）的诗在俄罗斯和苏联都曾广泛流传，他是俄文读者最欢迎的世界著名诗人之一。

1. 最新的评价

1987 年，俄文版新编的《唐诗集》问世。这是苏联外国文学翻译界的一件大事。它不但收入的作品多，印数大，计选入唐代 54 位诗人的 610 首诗，印数达五万册，而且有当代资格最老的汉学家艾德林（1909—1985）写的一篇长约二万字的序言，系统地评介唐诗，简要而精辟。其中，评论杜甫的文字也富有代表性，反映了苏联汉学界对杜甫的最新评价。主要部分摘录如下：

杜甫的创作通常分成四个时期。35 岁以前是求学和流寓时期，了解祖国风土人情，结识李白、高适并曾一起游历。据保存至今为数不多的杜甫青年时代诗句判断，他是很有抱负，对自身的力量和才能充满信心的人。随后，是落魄长安 10 年，至 42 岁为逃避安史之乱才离开。杜甫在首都长安时生活困窘，仕途无望，但比起人民的苦难来，他个人的不幸已不算什么了。他倒是在某些地方预见到唐代王国即将覆亡，于是产生了《兵车行》这首谴责好战者的名篇。这是首前无古人的诗作，以相送出征开篇，以战死者新魂旧鬼的哭泣与怨诉结尾。杜甫提出要求罢征战……

在安史之乱以前不久，诗人所写一首长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其中有一著名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感情——诗人为自己安宁的生活而感到羞愧。

不过，安史之乱所造成的苦难，还未能使思想上业已成熟的诗人进一步发展下去。杜甫创作的第三个时期自他从叛乱者手中逃出开始。他陷于贼手时曾哀哭国家的覆亡。逃出之后便写成《羌村》以及“三吏”、“三

---

① 《中国文学》，见《东方文学》论文集，世界文学出版社，1920 年，第 2 卷，第 31 页。

② 《中国文学》，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6 年，第 101 页。

别”(共六首)等著名的诗篇。这些记事的诗作对诗人的家庭和平民百姓都作了真实的描写。他在《新安吏》中描述到被驱赶上战场去的几乎都还是孩子。诗人告诉做母亲的:哭也没用,“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他的“三别”诗就是凄惨的独白。这些诗都表达了为人民和国家的灾难忧心如焚的心情。诗中大量的“散文句子”,以及由这一切所组成富于诗意的现实图景,使得人们把杜甫的创作称为“诗史”。

杜甫创作的最后一个时期可以从759年,即从他弃官之后于年底来到成都时算起。他在成都西郊建成了“草堂”。然而,他的生活并未安定下来,他还是在流寓的途中去世。在最后11年中,他写了1000多首诗,其中有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个人生活的不幸导致诗人期望有一座广阔的大厦,以便使普天下的穷苦人能够得到救助,到那里去躲避风雨: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里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同情心,不是在饱受苦难的人面前为自己的安宁感到羞愧,而是明白地表示,为了穷苦人的福利,假如需要,他愿意牺牲自己。这里也不仅仅是杜甫个人思想感情的进步,而且也是中国诗歌在其对人的态度方面的发展。自我牺牲的意愿此时还是相当抽象的,因为诗人还看不到改善人民生活的真实途径,自然他只能寄希望于君王的善心……不过我们后面还可以看到,就连白居易这样的诗人对于最高统治者也是存有希望的。而他对于现实的揭露已经比杜甫具体得多了。

为农民而焦虑,期望他们得到富足,以及对自身的安宁感到内疚——这一切即便在杜甫吟咏自然的诗歌中也时有表现。……在一首诗中,他对于暴雨冲走他的茅屋态度很冷静,但愿雨水能够使庄稼长起来,但到暴雨已经成灾时,他便思考起庄稼人的不幸……

杜甫也写过吟咏友情、吟咏山水的诗歌。这类诗句总是鲜明、朴素又具体。

杜甫的创作对于中国诗歌有着长远而巨大的影响……我们觉得，杜甫的影响比李白要大，因为李白尽管具有令人惊叹的独特个性，但总还是传统的东西；而杜甫虽然在多面性和鲜明性上稍逊一筹，但由于他在运用自己巨大才能上目标专一，第一次真正地把流离失所的人们引进了中国诗歌。诚然，在此之前也有人对颠沛流离的人们表示关注，但从来没有（像他）如此的专一和深切。①

2. 新编与旧译

这部由艾德林新编选的《唐诗集》选入杜诗62首，基本上包括了杜甫各个时期和各种题材的诗歌。既有寄寓长安时天宝未乱以前的诗《画鹰》、《春日忆李白》、《赠高式颙》、《赠卫八处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羌村》等，也有安史之乱后的诗《月夜》、《春望》、《天末怀李白》、《新安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还有至成都以后的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江亭》、《落日》、《可惜》、《病柏》、《枯柟以》等。此外，诗人出峡入湘时、居夔州时的诗也有入选的，如《白马》、《孤雁》、《晓发公安》等。从诗体上看，入选的诗也兼顾古诗、乐府，以及近体诗的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七言绝句等各个方面。比起50年代出版的两种唐诗的俄文译本来，这是选译杜诗最多的版本之一，因而极受欢迎，第一次印行的5万册立即销售一空。以往的两种译本则各印出3.5万册。

不过，杜诗的俄译很早就有了。最早的译作是《羌村》等四首，载于1896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诗歌里的中国和日本》一书。不久之后，在圣彼得堡出版由叶戈里耶夫和马尔科夫翻译的诗集《中国之笛》又选入《赠李白》等四首。此后，不断有书刊登载杜诗的俄译，至80年代（1983）统计，已发表了28种。其中，可以分成三类：

一是杜甫单个人的诗集，共有三种：

①《杜甫诗集》，费德林主编，吉托维奇译，谢列布里亚科夫序，蒙泽勒注释，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5年出版，224页。

②《杜甫诗集》，吉托维奇译，蒙泽勒编选并注释，莫斯科、列宁格勒两地国家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276页。

③《杜甫抒情诗集》，吉托维奇译，谢列布里亚科夫序，蒙泽勒注释，列宁格勒，文艺出版社1967年出版，175页。

---

① 艾德林《唐诗》，见《唐诗集》，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13—16页。

杜甫是在苏联出版过个人诗集的一位著名唐代诗人之一，其他三位是李白、王维、白居易。

二是各种类型的中国诗集收有杜诗的，影响较大的有六种（1987年的新编本《唐诗集》除外）：

①《中国古典诗集（唐代）》，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计收入吉托维奇翻译的杜诗《春日忆李白》、《春望》、《自京赴奉先县咏怀》、《白马》等20首。

②《中国诗集》第二卷（唐诗），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收入杜诗20首，内容同上。

③《中国朝鲜诗选》，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收入吉托维奇译的杜诗《前出塞》、《后出塞》、《月夜》、《对雪》、《羌村》、《客至》、《晓发公安》等80首。

④《中国文学作品选》，莫斯科，1959年出版，第一卷，收入吉托维奇、蒙泽勒课的杜诗《垂老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括枘》、《孤雁》等20首。

⑤《唐诗三人集（李白、王维、杜甫诗歌三百首）》，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1960年出版，收入吉托维奇译杜诗《春日怀李白》、《赠高式颜》、《赠卫八处士》、《前出塞》、《后出塞》、《梦李白》等87首。

⑥《印中朝越日古典诗集》，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1977年出版，收入阿列克谢耶夫、吉托维奇译杜诗《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梦李白》等14首。

其余为第三类，属于报刊发表的译诗，或一二首，或三四首不等，像《星》、《外国文学》、《涅瓦》、《共产党人》等杂志都曾先后译载过杜甫的诗。

苏联几代汉学家中都有人为翻译杜诗而尽力，先后出现过知名的杜诗译者阿列克谢耶夫、休茨基、吉托维奇、艾德林、蒙泽勒、鲍勃罗夫等。

3. 评论与专著

至1983年统计，汉学界已有论杜甫的文章17篇公开刊载，比较有影响的是康拉德院士论《杜甫的秋兴八首》，载《中世纪》一书，1960年，莫斯科；尼科里斯卡娅《论杜甫的诗〈丽人行〉》，载《莫斯科大学学报》东方学版1979年第1期，以及为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艾德林《杜甫：一千二百五十周年诞辰纪念》，载《文学报》1962年4月12日、索罗金《中国诗歌的天才》，载《真理报》1962年4月21日、切尔卡斯基《穿越

12 个世纪》,载《星火》杂志 1962 年第 18 期。

然而,这种评论文章的影响到底不如教科书和文学史书大。从 50 年代以来,先后出版的有关中国文学史的著作,都评述了杜甫的生平与创作,其中,流传最广的是艾德林、索罗金著《中国文学简编》(1962)、费德林著《中国文学史纲要》(1965)和莫斯科大学的教科书——波兹涅耶娃主编《东方文学》中国文学部分。在后一部书中,波兹涅耶娃写了专节《王维、李白、杜甫》,系统介绍我国唐代三位大诗人的创作,其中"杜甫"约占三分之一篇幅(近 5000 字)。文中结合杜诗《梦李白》、《丽人行》、《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前出塞》、《新安吏》、《石壕吏》、《垂老别》、《客至》等具体阐述了诗人的创作特点。作者把杜甫的创作分成三个阶段:寓居长安及到长安以前时期,安史之乱后时期,迁居成都以后时期。而分析《丽人行》一诗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由此看到杜诗的现实主义特色,则是这一节的重点。作者兼顾诗与诗人、作品与社会、点与面诸方面,有助于学生理解杜甫的作品及其成就。

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远东大学等校,不但在课堂上讲授杜诗,而且有学者已经写出评论杜甫的专著。其代表是列宁格勒大学教授谢列布里亚科夫的《杜甫评传》(1958)。此外,近年则有青年汉学家别仁著的《杜甫传》。

(1)《杜甫评传》[①]俄罗斯汉学家在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专著,多从社会学批评的观点出发,兼论杜诗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重在论思想性,尤其强调诗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人民性。《杜甫评传》是个突出的例子。该书的"序言"指斥以往论者的通病时说:

"西方和旧中国的资产阶级文艺家力图把杜甫说成仅仅是形式上的大师,而绝口不谈他首先是爱国主义诗人,是中国最早的真正人民诗人之一,他热爱普通人,为他们贡献了最优秀的作品。"

作者谢列布里亚科夫在评传中指出:杜甫"继承屈原、陶渊明,包括初唐诗人的传统"并加以发扬,"在中国诗歌史上打开了新的光辉灿烂的一页"。他对诗人作了全面的总评介后,联系时代背景来谈诗歌形象的思想意义。他说,杜甫在长安的十年失意,"并不是一个失意者的遭遇,而是一个具有高尚理想的人在封建时代的典型命运,他的理想同现存制度势必发

① 谢列布里亚科夫《杜甫评传》,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8 年。

生不可避免的冲突”，他的诗便显出暴露社会的倾向。

作者着重分析《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兵车行》、《石壕吏》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一批诗作的思想内容，指出杜甫希望看到祖国的土地从侵略者手下解放出来，因而诗中大大加强了爱国主义基调。同时，由于诗人接近人民，才“使他的诗具有人民性”。“在诗中歌颂普通人的精神美并鞭挞官吏的残暴”。他把诗人的艺术成就归结为：“杜甫的抒情诗中塑造的是诗人自身的形象——这是一个能深切体会他人的苦乐、关心祖国人民的命运，在当时堪称为进步人士的形象。”

作者也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分析杜诗的艺术性，肯定杜甫作为“诗人有娴熟的，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创造了准确、鲜明的形象，达到诗歌叙事的最大容量和集中概括”。不仅如此，作者还注意从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这样高的成就依然跟时代有关：一方面唐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著名的诗人就有2000多人，流传下来的诗也有4.9万多首。杜诗正是这股诗歌洪流中的突出代表，是众多诗人经验的荟萃。另一方面，杜甫个人的成就也是当时诗坛各种条件形成的。当时情况复杂，流派纷呈。有人单纯模仿前人，格调单一；有人盲目追求形式而无思想内容；有人无病呻吟，消极颓废；有人苟且偷安，力图摆脱安史之乱后出现的复杂局面，不敢面对现实。当然，也有人继承民间创作《诗经》和乐府的传统，能够广泛地概括现实，反映阶级社会的不平等和人民的苦难。杜甫恰好是在这许多互相对立的诗歌流派和传统中作出正确的抉择，才取得了如此的成就。

书中从艺术上肯定杜诗时，强调指出杜诗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功能。例如它夸赞杜甫的山水诗，尤其是杜甫漂泊西南，寄寓成都郊外草堂时期吟咏自然的诗，“比陶渊明还要质朴和鲜明”，“他绝少书卷气和文绉绉的语言，他能从容不迫地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江亭》一诗恰似在同挚友谈心”。而且“杜诗大大丰富了中国的山水诗”，它“把歌颂祖国大地之美、歌颂普通农夫的生活等基调同诗人对自身命运和国家大事的思考结合在一起”。

书中进一步探讨杜诗对后代的影响，说“杜甫是唐代‘社会派’诗歌的创始人。这一派诗人深化了杜甫的创作原则，创造了许多社会题材的诗歌”。同时，“杜诗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很大”，后代诗人向他学习的正是“爱祖国、爱人民的思想和高超的诗艺”。谢列布里亚科夫在这部专著中

始终强调杜诗的思想及其社会价值。他正是从社会功利主义的角度来强调杜诗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位古代优秀作家的诗句至今还能激励读者,在他们的心中激起高尚的情操。”因此,可以说:“杜甫的声誉已经超越中国国界。”

谢列布里亚科夫要算是苏联汉学家中研究杜诗成就最大的一位。他1950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留校任教后即以杜甫诗为研究的起点,1954年完成论文《8世纪伟大的中国诗人杜甫的爱国主义与人民性》,获副博士学位。接着,不断深入研究,扩展规模,形成专著。后来,研究的重点虽然转移到宋词上,但唐诗和杜甫却仍然是他关注的领域,在长期的教学中一直注意加以讲授。

(2)《杜甫传》[①]这是苏联评介杜甫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为东方民族艺术博物馆研究员青年汉学家别仁所著。《杜甫传》被列入“名人传记”丛书,是负有思想品德教育使命的读物。书中突出强调诗人热爱祖国、接近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以及其现实主义的创作。别仁认为,中国古代的传记与西方的写法不同,几乎不注意人物的内心感情和生活细节,而只记叙传主的丰功伟业和高洁品行,因而他写这部传记时就要弥补其不足,兼顾两个方面:既写言行,也揭示内心。

别仁写杜甫并不遵奉古时候的信条:“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相反,杜甫力图走出去,到各个生活领域里去,无论担任公职或种地割稻,无论外出远游,还是作文写诗,他都努力实践,同时把这些实践反映在诗中。从诗中可以看出杜甫的外貌细节:瘦削的脸形,稀疏而斑白的头发和胡须等,一切都可以捉摸得到。此外,杜甫也不像中国古代的游僧隐士,在“忘却尘世生活或者从参禅之中去寻找诗的灵感”。相反,他的灵感直接来源于尘世的生活,他的诗中充满着喜怒哀乐,一切人类的感情——他的妻子儿女如何幸免于安史之乱,他如何孵养小鸡,以及如何带着猎鹰去追逐猎物,在诗中都写得非常逼真,犹如中国古代画家的写生,同时又充分反映诗人的感情,把一切写得优美动人。此外,“杜诗还把祖国和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尤其富于民族的风情,包括风土人情、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婚葬仪式,是研究中国民族史的宝贵资料”。因而,杜诗正是“历史、神话、传说和民间口头创作的综合,杜甫是一面真实的民族之镜。它既反映民族的过去,也反

① 别仁《杜甫传》,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87年。

映它的现在和将来”，恰好可以充当青年爱国、爱民和爱生活的教材。

五、达格丹诺夫著《王维创作中的禅佛思想》

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布里亚特社会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根纳吉·巴托罗维奇·达格丹诺夫于1984年发表的专著《王维创作中的禅佛思想》（诺沃西比尔斯克，科学出版社西伯利亚分社出版，134页）是苏联研究唐代诗人的最新成果。在此之前，达格丹诺夫已经以论文《大乘佛教对唐代诗人创作的影响。以王维（701—761）和白居易（772—846）为例》（1980）获副博士学位。他还先后发表过《白居易创作中所反映的佛教题材》（1979）、《王维创作中所反映的佛教题材》（1980）和《论唐朝诗人白居易的世界观》（1983）等文。现在的新著则是其成果的综合。

专著除第一章是介绍“中国佛教史上的若干情况”，包括“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佛教文学的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佛教思想”等一般的情况。第二、三章就专谈王维的创作。两章题目分别为《王维是诗歌中禅派的长老》和《王维文学遗产中对禅佛的赞颂》。

作者说明，王维诗的研究在各国汉学界均占有显著的地位，王维诗已译成俄、日、英等各种文字。尽管有许多评论家都指出王维的诗同佛教学说有密切的关系，但是这方面的问题迄今仍无人作专题研究。本著作恰好重在研究这个方面（而不涉及王维的全部著作），这样他就可以集中探讨重要问题，避免面面俱到，做到突出重点，观点鲜明，这是本书的特色。书中从诗人生平的几个阶段、世界观的来源“空灵”、隐居诗人以及他与和尚们的交往等方面来阐述诗人与禅佛的关系，并分析了禅佛诗歌。同时，还着重论说王维诗中对于佛教（学说）的赞颂。

过去，往往从思想内容的角度来谈王维山水田园诗所流露出来的闲逸情趣、恬淡境界和禅宗寂灭的思想感情，指出诗人遁世而从山水和佛理中寻求寄托。现在达格丹诺夫则换了一个角度：阐述王维同禅佛的关系，既谈禅佛对诗人的影响，也谈诗人反过来在诗中赞颂禅佛，这无疑是新的角度，也有比较研究的性质。它不但开阔了眼界，给人以启发，而且使得对王维的研究增加了一个重要的方面，从而促使了研究的深入。

除以上所述，如果加上阿列克谢耶夫研究司空图《诗品》的专著（见本书第三章），索科洛娃译《韩愈柳宗元文选》（1979）和古沙罗夫著《韩愈的散文遗产》（1971），那就可以说唐代文学是苏联汉学家研究的方面最广、

成果最多的一个阶段。

六、阿列克谢耶夫论司空图《诗品》的巨著

这是一本有790页(16开本)的巨著。当时印数不多,革命后虽经汉学家们几次呼吁,出版社始终未能响应再版,[①]目前几乎是不多见的珍本,因而有必要简略介绍其内容安排。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评论。设四篇十四章。其中第一篇有四章,分别论述《诗品》的历史、内容、艺术技巧和它在中国文学以及世界文学上的地位。重点是系统阐释《诗品》的内容及其深刻含义,在分析长诗采用的语言手段和其他艺术手法时,也写得相当精彩。第二篇有五章,分别介绍《诗品》的版本、注家、仿作(续《诗品》等)和它的英译本。文中贯穿着比较研究的观点和方法。第三篇评述司空图其人。从他生活的历史时代、经历及传记材料、作为人和作为诗人的品格以及他的其他诗作,也分为五章。这里面涉及司空图同陶渊明、李白、韩愈等作家的相互关系或所受影响。第四篇从方法论上论述如何对待这部长诗。指出汉学家们,特别是英译本译者的缺点,往往是对原作没有弄懂,或者学得肤浅,因而闹笑话。他提出自己在本书中打算怎样处理译和注,怎样看待《佩文韵府》、各代注家和英译者等,也有四章。从中可以看到阿列克谢耶夫在方法论上所作的更新。

第二部分是翻译和注释。共分两篇。第一篇是《诗品》的译和注。按24品为序,每一品都有综合分析(题解)、直译(照字面逐字翻译)、意译(并参照俄诗的音节和韵律修改润饰)和注释四部分。这里面的直译和意译固然要紧,往往能显示译者的功力,注释部分也不简单,每个词、每一句、每一段以至从总体来说每一品都有注释,其篇幅往往比翻译部分大十几或几十倍。以第一品《雄浑》为例,题解、直译和意译共合为两页,注释部则有22页。总之注释不厌其详,都是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里有出处的引文和注文。第二篇是三部仿《诗品》之作,即《画品》(黄钺)、《书品》(杨景增)和《续诗品》(袁枚)的译和注。当然,这三部都只摘选若干片段。

阿列克谢耶夫不断深化比较研究的观点,在40年代重译了司空图的

---

① 孟列夫《阿列克谢耶夫——中国文学史家》,《中国传统文化》,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1967年,第33—34页。阿氏该书已于2008年再版。

《诗品》,新译了陆机的《文赋》,写出重要论文《罗马人贺拉斯和中国人陆机论诗艺》、《法国人布瓦洛和同时代中国人论诗艺》等,形成了系统的中西比较诗学的观点。概括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倡导开展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最早从理论上阐明这种比较研究的意义。其二,把司空图、陆机和贺拉斯、布瓦洛放在一起对比,具体地对比研究了《文赋》和《诗艺》。其三,没有简单地套用西方诗学的原则来分析东方诗人,而是从中国诗歌的实际出发,切实地论述中国诗艺。这样,阿列克谢耶夫的评论就有概论中国诗学艺术的性质。他最先实行了比较研究,可以说是中西比较诗学的先驱。

七、戈雷金娜论唐代传奇的《中国中世纪的短篇小说:8 至 14 世纪题材渊源及其演化》

唐代文学研究成果的数量依次为唐诗、传奇 、杂纂和敦煌变文、文论(诗论)、散文。

戈雷金娜的另一本专著《中国中世纪的短篇小说:8 至 14 世纪题材渊源及其演化》(Новелла средневекого Китая: Истоки сюжетов и их эволюция, Ⅷ - Ⅳ вв. 1980)是研究"传奇"的。其中头两章在谈"传奇小说的渊源(1 至 3 世纪)的散文"和"8 至 14 世纪传奇小说中的民间文学主题及其各种变体"时,以唐人的传奇作品为据,论它们从民间文学中汲取的主题,如《补江总白猿传》的"掠妻",《柳毅传》、《郑德璘传》、《张无颇传》的"游水府",《崔炜传》、《任氏传》、《周秦行记》的"娶仙女"。其研究方法的特点是作横向的概括,以主题或题材为线索把同类的作品放在一起综合分析,避免对单篇作品孤立论说的局限性,有可能对传奇作品的总特点作出论断。她发现传奇的特征总的看来是情节的生活化,唐代传奇也是利用神话和民间故事的情节,作了许多改写,但已有很大发展,包括爱情题材都有所发展。

研究唐代传奇的论文有索科洛娃的《论唐代传奇》(1969)。雅洪托夫的《七八世纪的中国书面语言与口语》①和李福清的《中世纪文学的类型学与相互联系》②两文中也有涉及。前者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唐代传奇语

① 《中国和朝鲜文学的体裁与风格》文集,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69 年,第 74—86 页。

② 《中世纪东西方文学的类型学与相互联系》文集,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74 年,第 84—103 页。

言的特点，认为它的语言近于脱离了口语影响的古文，它不是以先秦典籍，而是以西汉典籍的语言为标本的。后者在本论文的“印度在东西方文学交流中的特殊作用”部分里，探讨印度题材到了传奇中是如何转化的，他以《樱桃青衣传》的题材和中国的《搜神记》、《幽明录》中相应的故事对比，又和印度、蒙古、西藏、土耳其、西班牙、俄罗斯、日本等各民族古典和民间文学中同一题材的各种变体对比，其目的在于阐明印度题材在东西方文学发展中的作用，但对于唐代传奇的研究却也由此深入了一步。

李福清的这种对比方法是很有意思的，往往可以开阔思路，得出人们未曾想到的结论。例如他又以《襄阳老叟》及鲁班传说比较古印度《五卷书》中的一则相同的故事，并和这个题材的蒙古变体以及薄伽丘的《十日谈》的描述作对比，得出结论：该作品的题材产生于印度，其渊源是一个织匠乘坐其工匠朋友所制作的木鸟飞往情人身边的故事。

唐代传奇作品的俄译也有好几种，在1955年和1960年中分别出版过同书名的《唐代传奇集》各一种。前者为费什曼译，后者为费什曼与吉什科夫合译。70年代还出过《浪子与术士（又名枕中记）》（1970），索科洛娃和费什曼合译，也是唐代传奇的选集。

八、杂纂和敦煌文学在俄罗斯

（一）杂纂（Цзацзуань）

对唐代“白话”文学杂纂进行研究的是伊·埃·齐别罗维奇（1918—2000），她1941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1948—1967年在该系任教，1967年起为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图书馆员，1969年以研究杂纂的论文获副博士学位，论文题为《中国格言杂纂和李商隐的〈杂纂〉》。她在费什曼于50年代节译过李商隐的《杂纂》的基础上，扩大范围，集中精力加以研究，翻译出版了《杂纂·9至19世纪中国作家语录》（Изречение китай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Ⅸ－Ⅳ вв.，1969，第二版，1975）。其中有李商隐和11至19世纪的八位续作者（从苏轼到韦光黼和顾禄）的杂纂集。并写过几篇论文，如《关于〈义山杂纂〉的作者》（1967）、《论中国格言录〈杂纂〉的体裁（研究史和体裁分析）》（1969）、《关于中国名言录〈续杂纂〉的作者问题》（1971）等。她成了苏联唯一的杂纂专门研究者。此外，还翻译过《今古奇观》和《镜花缘》（均合译）等。

（二）敦煌文学（Рукописи из Дуньхуани）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现名东方文献研究所）保存有奥登堡于1915年带去的敦煌文献，包括完整的卷子和残页，全部藏品共1.2万件。还有考古画家杜金在敦煌拍摄的1000多张照片。[①] 那一万多件的敦煌文献由丘古耶夫斯基负责编成《敦煌发现的中国文书》，分四册发表，第一册已于1983年在莫斯科出版，其余各册随后也陆续出版。

集中全力进行敦煌文献研究的是孟列夫。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孟列夫（缅希科夫，1926—2005）从1957年开始敦煌学研究工作，他是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研究员，从事该所所藏敦煌写本的整理、翻译和注解。他从敦煌俗文学写本里发现了几种变文残卷和若干民歌体的韵文作品。经他整理出版的已有《维摩诘经变文》和《十吉祥》（1963）、《双恩记变文》（1972）、《法华经变文》（1984）等。他出版的变文，每篇都是全文影印，以供对原件（的影印件）进行勘考释读；同时附有俄译文并加详细注释。每一本书前的序言则是孟列夫研究心得的结晶。他在这些长篇序文中有《论变文的种类及起源》（1963，序《维摩诘经变文》和《十吉祥》），《报恩变文》（1972，序《双恩记变文》）等。

孟列夫的另一项工作是整理1909年由科兹洛夫带去的西夏古城遗址哈拉浩特[②]的写本与书籍，逐项著录。孟列夫已编成《哈拉浩特中国文献综录》，收入藏品中11至14世纪的全部汉文文献400件以上，由他写了《西夏国汉文文献》的长篇序文。此外，他还写了《哈拉浩特中国书籍插图》一文，介绍藏书中许多刻本的插图并附有复制的插图（载《哈拉浩特·研究与资料》一书中）。

孟列夫原先是研究戏剧的，1952年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毕业后即从事此项工作，1955年以《现代中国古典戏剧的改革》获副博士学位。后来还翻译了王实甫的《西厢记》（1960），写了长篇序文《〈西厢记〉和它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

参加敦煌写本研究工作的还有女汉学家杰米多娃和古列维奇。两

---

① 详见李福清《敦煌文献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小说戏曲）》第16—20页和113—114页。

② 蒙语，黑水城之意。

人都是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研究人员。前者写了《作为4世纪末至9世纪初中国文化遗存的敦煌书籍》的副博士论文;后者写了《佛本生变文残卷》一文,介绍她新发现的三件佛本生变文的残卷并译成俄文(1965)。

敦煌资料已影印由我国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共17卷。书名《俄藏敦煌文献》,1989年出版。

参加哈拉浩特存书研究工作的有女汉学家凯平。有一部现已失传的唐代小说集《类林》的西夏文译本,经过她的整理已于1983年出版(影印原文并附俄译文),还有一篇她写的文章《一部今佚的中国类书的西夏文译文》。

哈拉浩特(黑水城)文献资料则由中国学者史金波等主持,会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从1993年陆续出书,书名《俄藏黑水城文献》,预计出齐后当在30卷以上。

第十章
宋代文学在俄罗斯

一、宋代文学俄译概述

（一）宋诗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历经300年的宋代是一个重要又有深远影响的时期，文学创作也有许多丰碑。苏联时代汉学界对它的研究，比起对唐代文学的研究来要差得多。虽然也出过不少译作，诗歌方面如戈鲁别夫译《苏东坡诗词集》（1975）和《陆游诗集》（1960），巴斯马诺夫译《李清照〈漱玉词〉》（两种，1970版和1974版）和《辛弃疾诗词集》（1961），还有多人合译的《宋代诗歌》（1959）和《梅花开（中国历代词选》（1979）等，但研究者则为数不多，始终倾注于这个领域者唯有谢列布里亚科夫一人，是他填补了苏联汉学研究的这项空白。

早在19世纪中叶，俄国杂志就开始译介宋诗。《祖国纪事》1856年第六期刊载俄国诗人费特从其他欧洲文字转译的苏轼诗《阴影》。1880年出版的瓦西里耶夫院士著《中国文学史纲要》把苏轼作为中国大诗人之一，同杜甫、李白的名字并列向俄国读者作了介绍。后来1914年马尔科夫编译的《中国之笛》诗集中也有两首苏轼的诗。此后，从30年代至今不断有收入宋诗的中国诗集俄文版问世。

主要的俄文版宋诗集有两种。一种是郭沫若和汉学家费德林合编的四卷本《中国诗歌集》第三卷，国家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共334页。其中，宋代诗歌（包括词）占了120页，共收入宋代诗人37人的72首诗和词。入选的诗以范成大为最多，被选六首，陆游次之，选了五首，苏轼和王安石各选入四首。选入二首以上的诗人还有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梅尧臣、

杨万里、李清照、辛弃疾、朱淑真等，其他选入一首的有张先、晏殊、文同、柳永、张来、朱敦儒、张考祥、戴复古、张镃、文天祥、陈允平等。

然而，正如汉学家克立夫佐夫（1921—1985）所说，同唐宋诗在中国的地位以及唐诗已经得到广泛介绍相比，宋诗的翻译就显得很不够。他说："不但在苏联，而且在其他国家（日本除外），宋诗的翻译和研究都很不够。"因而，在1959年苏联又出了一本《宋代诗歌》，克立夫佐夫序，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宋诗最全的俄译本，它包括一部分宋词，共收入40位宋代诗人的181首诗。宋代的著名诗人均已收入。其中，入选诗歌最多的是辛弃疾、陆游和苏轼，分别为29、26和18。欧阳修、范成大、王安石、李清照被选的也不少，分别为12、9、10和8首。其他被选的人从1首到6首，多寡不等。计有：王禹偁3首，寇准1首，柳永6首，范仲淹2首，张先3首，晏殊1首，梅尧臣5首，苏舜钦1首，张泳1首，文同1首，王令2首，黄庭坚3首，陈师道2首，张来1首，唐庚1首，陈与义5首，朱敦儒4首，岳飞1首，杨万里2首，朱熹2首，韩驹2首，张考祥1首，刘克庄4首，元好问1首，朱淑真3首，戴复古3首，史浩1首，张镃1首，文天祥1首。

这本宋诗的译者阵容很强，主要译者是著名诗词翻译家巴斯曼诺夫、戈鲁别夫、切尔卡斯基、阿赫马托娃和雅罗斯拉夫采夫。其他的译者是阿杜耶夫斯基、班尼科夫、斯塔罗斯金、阿尔戈、柯尔察金和西佐娃。

选录宋诗的其他诗集还有：《中国古典诗歌集》，艾德林译，文艺出版社1975年和1984年出版的两种，《中国8至14世纪抒情诗集（王维、苏轼、关汉卿、高启）》，斯米尔诺夫编，科学出版社1797年出版，《中国3至14世纪写景诗集》，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等。

苏联时代还为几位著名宋代诗人出了专集。最早的是巴斯曼诺夫译的《辛弃疾诗词集》，国家文学出版社，1959年和1961年各一版，后来，有戈鲁别夫译《陆游诗集》，国家文学出版社1960年出版和《苏东坡诗词集》，文艺出版社1975年出版。

苏联时代唯一的研究宋诗专著是列宁格勒大学教授谢列布里亚科夫写的《中国10至11世纪的诗作·诗和词》。

（二）宋词

苏联时代对宋词的译介不如唐诗多，但仍然出过不少作品集。最早出的单人集是巴斯曼诺夫译的《辛弃疾诗词集》，由国家文学出版社于1959

年和1961年各出一种本子。接着，巴斯曼诺夫又译出李清照《漱玉词》，也出了两版（1970年和1974年），均由文艺出版社出版。此外，有戈鲁别夫译的《苏东坡诗词集》，文艺出版社1975年出版。除这些个人专集外，就是散见于各种诗选里的若干词人作品选，如《宋代诗歌》、《中国古典诗歌集》等。

入选词人最多、作品相对集中的一本集子是《梅花开（中国历代词选）》，由巴斯曼诺夫译、注并序，文艺出版社1979年出版。入选的词人有19位，其中宋代词人占了10位，即欧阳修、柳永、苏东坡、黄庭坚、秦观、李之仪、李清照、朱敦儒、陆游、辛弃疾。此书出版后反响较大，连续发表四篇书评。汉学家谢列布里亚科夫认为它的意义在于：这是俄文版的"第一部中国词选"。

1987年出版的《文学百科词典》介绍说："宋代词人流传最广的是柳永、李清照、辛弃疾和苏东坡。"始终倾注于词研究的专家是列宁格勒大学教授谢列布里亚科夫。他于1979年出版专著《中国10至11世纪的诗作·诗和词》（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出版，1979）。该书除了系统介绍词和诗在韵律上有何差异，并着重论述"词"的形成和发展史，还专门有四章评介宋代四位作家所写的词和诗：分别是《王禹偁及其诗词选》、《诗人苏舜钦》、《梅尧臣的词》和《欧阳修在发展诗词中的作用》。汉学家费德林曾论及该著，认为宋词对苏联汉学界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未经充分研究的领域"，而谢列布里亚科夫的贡献是"在相当大程度上填补了苏联在中国中世纪文学知识上的一个大空白，使人对中国古典诗歌史上'词'这种现象有所了解"。

（三）话本、平话与诗话

民间文学一直是俄罗斯汉学家关注的一个重点。宋元平话便是他们研究中国章回小说起源的对象。主要的研究都有列宁格勒东方学分所的巴甫洛夫斯卡娅（1929）。

她的研究方法很有特色，是使用校勘学的方法，用平话全文与各类史籍仔细对照，查清《新编五代史》有多少的文字取自《资治通鉴》、《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断定《新编五代史》所依据的是《资治通鉴》的两个宋代版本，从而可以推测它成书于13世纪六七十年代。（见其论文《历史的

事实和文学的事实》(以《新编五代史》为据,1976),[①]《论平话体裁》(1973)等)。

她进一步翻译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并发表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三篇文章(1980, 1981, 1982),分别论三藏西行,对玄奘生平事迹的取舍和诗话在情节和结构上使用多少史籍材料等问题。

其他研究者还有李福清,他写的关于《三国志平话》与民间文学关系的专著《中国的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1970),使用的是系统研究的方法。作者认为,作品是一个系统,要从思想内容、语言、方法各个方面加以研究。

此外,新译《京本通俗小说》(佐格拉芙、孟列夫译)也已于1995年出版,系增订新译本,有译者写序、跋和详细注释。

二、谢列布里亚科夫论宋代诗人的专著《陆游·生平与创作》

(一)译作《陆游〈入蜀记〉·翻译、述评和跋》(Лу Ю《Поездка в Шу》)

谢列布里亚科把重点由唐诗转向宋代文学,是从翻译陆游《入蜀记》(Поездка в Шу, 1968)开始的,他把陆游这本用文言文写的游记译成俄文,同时加了详尽的历史和语言文学方面知识的注解,在述评和跋中着重介绍中国中世纪文学中游记这种体裁的特点。译者认为,《入蜀记》是游记的早期作品,它兼有记述科学知识和反映作者内心世界的功能。从记实角度来说,它记述了宋代的政治现实、包括官吏和农民的日常生活风貌,这在史学和民族学上都有重要价值。从反映诗人的主观世界来说,谢列布里亚科夫注意从那个时期留传下来的诗歌,特别是诗人的诗和有关的日记,找出材料相对照,用以探讨诗人据以加工成诗的素材,以及其创作的规律。他发现,中国古典散文作品也是反映作者的心境,把作者丰富的内心感受充分体现于文学形象之中,因而不能说中国古典散文仅具有强烈的纯理性主义的性质。

---

① 载《东方文学研究理论问题》文集,列宁格勒国家文学出版社,1976年。

（二）专著《陆游·生平与创作》（《Лу Ю: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谢列布里亚科夫在这部专著上另加了一个中文书名《陆游传论》(1973)，这部261页的著作是他认真研读了中国有关的评论资料，又搜集中国中世纪大量诗歌材料进行分析归纳之后才写成的。这部专著的要点是：①全面叙述陆游的生平和创作，分阶段阐释了诗人的生活和创作的发展，包括政治观、美学观以及思想发展的过程，着重分析陆游世界观中驳杂的思想因素。谢列布里亚科夫认为陆游的思想和创作都受到儒家学说、道教"自然"学说和佛教的影响，而陆游参与王安石变法的主张，以及对待理学的态度也都体现了儒、释、道几种思想在他身上的影响。②专著认真作了艺术方面的研究，分析中国中世纪诗歌创作的一般经验和陆游创作的个性特点，进而说明传统的创作方法和个人创作方法的互相关系。③专著在分析陆游创作的基础上提出了诗歌创作的理论、抒情诗歌中的形象特点及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对美学特点等问题加以阐发，这在中国文学研究中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这使这部书成为受苏联时代汉学界重视的专著。

三、谢列布里亚科夫论宋词的专著《中国10至11世纪的诗歌·诗和词》

《中国10至11世纪的诗歌·诗和词》(Китайская поэтия X—XI вв., Жанры ши и цзы)这部书出版于1979年，是苏联汉学界研究宋词的一部力作。它运用丰富的材料首次在苏联阐释了中国诗歌的主要体裁之一词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同诗相区别的特点，作者着重解释了词和诗的韵律问题。这是书中第一章的内容。其余六章则分别论析个别作品或作家(诗人)的创作，并以这些作品为例，进一步说明词的特点、诗与词的相互联系，以及它们在形象地反映现实中各有什么特点。这六章既可以单独成立，又是统一著作中的有机部分。

其中《〈花间集〉词》一章评介了晚唐五代的著名词人，从温庭筠、韦庄到李珣等数十人，举重点人的词为例，阐释词这种体裁的特点和变化。《南唐诗人写的词》一章介绍了李璟、李煜、冯延巳等几位作者所写词及其特点。《王禹偁及其诗歌遗产》、《诗人苏舜钦》、《梅尧臣的词》、《欧阳修在

发展诗词中的作用》这四章则涉及宋代几位著名的词作者。此外,在每一个标明具体作家的章节里也旁及其同代诗人的创作,或用以说明同一派作家,或对比几个诗人的异同。这样,书中涉及的作家就更多,这本书对于苏联读者来说,无疑也是一部中国晚唐到北宋的词史。因而费德林肯定它是在苏联对"中国文学史上未经充分研究的一个时期和古典诗歌创作的两种主要体裁(诗和词)进行研究。说它"揭示了词这种诗歌体裁产生和形成的过程,以及词同传统体裁诗的相互联系",而谢列布里亚科夫研究工作的贡献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填补了苏联在中国中世纪文学知识的一个很大的空白,使人们对中国古典诗歌发展中的某些极为重要的趋势和现象有了了解"。①

四、热洛霍夫采夫论话本的专著《话本——中国中世纪的市民小说》

苏联时代对宋代的传奇和话本也有一定的研究。1972 年出版过罗加乔夫译的《碾玉观音(宋代传奇与话本集)》。在话本的研究者中,热洛霍夫采夫(А. Н. Желоховцев, 1933—)写出了专著。热洛霍夫采夫 1958 年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其研究的重点之一是宋元话本,1965 年以《作为文学体裁的话本小说》论文获副博士学位。专著《话本——中国中世纪的市民小说》(Хуабэнь——городская повесть средвекового Китая, 1969)比较系统地向苏联读者介绍"话本"的内涵及其特点,"话本"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其布局大致是这样:①作历史的溯源:中国传统上的小说有两种:古文即文言文小说和白话小说。白话小说则有变文、说话(话本)、传奇、笔记等民间小说的种种体裁形式。②探讨宋代各家的"说话"特点,分析罗烨对话本的分类。在阐述话本主题时,作者将其与变文等体裁中的相应主题作对比,如以《秋胡变文》和《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话本对比。从而说明话本与变文的关系。又以宋话本与唐传奇对比。以话本与笔记对比,说明话本也有取材于传奇的。同样。话本也影响了后来的笔记。书中揭示了话本体裁演变的规律。③以重要的话本作品作为典型来分析,进一步解释话本从说话人口中简单的记录,逐步发展成供人阅

① 《远东问题》1986 年第 4 期。

读的书面故事，有时是长篇文学作品的过程。④作者把某些话本同欧洲的某些体裁作对比，如把话本作者的思想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薄伽丘对比，把话本故事同俄罗斯的《萨瓦·格鲁岑故事》做对比。前者旨在说明作者的世界观和思想立场的实质，后者意在探索类型学上有何异同。此外，作者还指出，研究话本的国外学者，在美国和英国都有，但以捷克的汉学家普实克成就最突出。

五、巴甫洛夫斯卡娅论平话与诗话

中国文学的来源——民间文学一直是苏联汉学家的注重点之一。宋元平话便是他们研究中国章回小说起源的对象。

长期从事平话研究的是列宁格勒大学1953年的毕业生巴甫洛夫斯卡娅(1926—2002)，她是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研究员，曾于1975年以《〈新编五代史平话〉研究》论文获副博士学位，于1984年出版她的译作《新编五代史平话》(Заново составленная пинхуа по истории Пяти династий)。

她的研究方法很有特色，是使用校勘学的方法，用平话全文与各类史籍仔细对照，查清《新编五代史》有90%的文字取自《资治通鉴》，10%取自《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或全录，或节录，或拼凑几种史书的文字，再经作者艺术加工，这是全书所用的几种手法。有了仔细的查对，她就敢于断定《新编五代史》所依据的是《资治通鉴》的两个宋代版本，从而可以推测它成书于13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个结论对于该书产生时间问题的研究，无疑是有益的。因为在中国，这个问题仍然有待于解决，论者一般也只说“不一定成书于宋代”，说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巴甫洛夫斯卡娅认为，平话作者对历史事实作艺术加工，主要采用“集中手法”，把时间、空间、人物都集中起来，主题和情节线索更集中了，这就使平话离开史实，变成虚构的故事，但艺术性也增强了。

她的这些论点，见其论文《历史的事实和文学的事实》(以《新编五代史》为据，1976)，[①]《论平话体裁》(1973)等。

她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是翻译《大唐三藏取经诗话》(Шихуа о том, как Трипитака Великой Тан добыЛ священной книги)，并从思想性、史料出

① 载《东方文学研究理论问题》文集，列宁格勒国家文学出版社，1976年。

处、人物形象、艺术特色诸方面作分析。她认为该书已受了儒家观念的支配,完全脱离史书,对玄奘作了虚构处理,不再是慧立撰、彦琮续的《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那个玄奘了。巴甫洛夫斯卡娅对玄奘和孙行者两个形象也作了分析。其论点均见近年发表的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三篇文章(1980, 1981, 1982,分别论三藏西行,对玄奘生平事迹的取舍和诗话在情节和结构上使用多少史籍材料等问题)。

对平话和诗话问题作过论析的还有李福清写的关于《三国志平话》与民间文学关系的专著《中国的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1970)。他使用的是系统研究的方法。作者认为,作品是一个系统,要从思想内容、语言、方法各个方面加以研究。他分析《三国志平话》的提纲就包括:①作品的思想基础——佛教思想,三教合一论的反映,民间世界观的因素;②与民间叙事作品的关系——作品的主题、情节等;③人物描写的特点——主人公外貌、情绪、行动、思想、语言的描述或运用;④平话的叙事结构——时间的表述,叙事的方式,对其他体裁的运用等(第67—173页)。[①]

六、佐格拉芙的新译《京本通俗小说》

宋代白话短篇《京本通俗小说》(Простонародные рассказы, изданные в столице)于1995年出了新的俄译本(佐格拉芙译文并注释,孟列夫译诗,圣彼得堡东方学中心出版,289页),收入10—13世纪即宋代的七个短篇小说:《碾玉观音》、《菩萨蛮》、《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拗相公》、《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七篇均有篇首插图,以及篇首和篇末的诗词。

译者佐格拉芙是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研究员,她在序文中说明,此书之所以为新译,理由概括有三。

其一,启用了原版书名:缪荃孙刻印于1915年的话本《京本通俗小说》。该版曾于1954年在上海出书,被她作为本次新译的依据。她同时参考50年代印出的其他几种文本的相关篇目,有《宋元话本集》(1955年,上海),《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选》(1956年,北京)和《话本选》(1959年,北京)。

而译者以前曾译出过同书的另一种版本,但书名曾改为《十五贯·中国中世纪短篇小说》(佐格拉芙译,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出版,1962年,

① 参阅李福清著、马昌仪编《中国神话故事论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7页。

152 页)，所收篇目也是七篇，以《十五贯》为首篇(无《错斩崔宁》篇名)，其余六篇名相同。她当年即以研究《十五贯》话本集而获得副博士学位，论文为《12 至 14 世纪汉语的语法特点(据〈京本通俗小说〉)》(1962 年)。1980 年晋升博士。她将此次的新译本改回了原版的书名。

其二，新旧两种译本篇幅差别很大，增幅近一倍。旧译本按出版社的要求大量削减了书中的诗词，而保留下来的部分诗词又是改译的(波德戈里昌作的意译)，与原诗词出入极大。此次新译本已由资深汉学家孟列夫翻译，保持信达雅优美的风貌。

其三，译者佐格拉芙在序文和注释中详细阐明了《京本通俗小说》的思想内涵、人物形象，尤其是白话小说的语言特点(文学语言、说话人的民间俗话、俚语以及成语等方面)，以及该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因而新译本被圣彼得堡东方学中心作为精品推出。

第十一章
元代文学在俄罗斯

一、元曲在俄苏的翻译和研究

(一)元曲在俄苏的翻译和研究概述

俄国汉学家索罗金在20世纪70年代以发表《十三四世纪的中国戏曲》一书而成为俄国和苏联时代最有名的元曲研究家,同时也引起我国同行学者的注意。

"凡是在上个世纪或者前不久到过中国,而且将其见闻形诸文字的欧洲人,恐怕不会有人不提到那些令中国人男女老少皆喜爱的戏曲。马可·波罗是第一个报导他在元代忽必烈皇帝酒宴上看到一群用各种乐器演唱以欢娱宾客的表演,那显然……就是一出元代杂剧。"索罗金在他专著的开头这样描述道。

诚然,元代戏曲不但在欧洲,而且在俄国早有流传。在18世纪(1731年)元代杂剧《赵氏孤儿》被法国来华的传教士马若瑟译成法文,成为最早传入欧洲的中国剧本。俄国人涅恰耶夫于1788年将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根据该故事情节创作的剧本《中国孤儿》译成俄文。在此之前,俄国剧作家苏马罗科夫于1759年已从德文翻译了《中国悲剧〈孤儿〉的独白》。这些都向俄国人传达了元曲的信息。

但俄国出现最早的评介文字则在19世纪,1892年《雅典娜神庙》杂志6月第11期发表的短文《学者之女雪恨记》,介绍了《窦娥冤》的剧情和《元夜留鞋记》的故事梗概。第一篇俄译的中国戏曲剧本是《樊素,或善骗的使女》,载1839年《读书丛刊》第35卷,作者题名郑德辉。经俄国汉学家李福清查对,那就是郑光祖的《㑇梅香》,译者为巴依巴科夫。后来,1847年

在彼得堡有人由法文转译了高则诚的《琵琶记》，出版单行本。

对元曲首次作全面介绍的功劳应当归于俄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瓦西里耶夫(1818—1900)。他出生于俄国下新城，1837 年毕业于喀山大学历史语文系东方语言科，1840 年来华留学，居留北京 10 年。1851 年起先后在喀山大学、彼得堡大学担任教授，执教 50 年，著译丰硕。主要著作之一为《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该书辟有专节论述中国剧曲和小说，除了综合性的介绍，还有一些精辟的论断。在追溯中国戏曲和小说的历史时，较早提出"戏曲是从印度传来的"，"小说由传说到中篇、由中篇到长篇的发展，其源头可能也是外来的"等观点。同时又指出，"但是另一方面，无论在戏剧和小说的领域里，中国人都不是单纯的模仿者。这是一个一贯保持着独立自主精神的民族，对一切异邦和外来的东西，她都以自己的眼光加以检验，以自己的方式加以改造——因此，戏剧和小说总是显露出中国的精神，表达着中国人自己的世界观。"瓦西里耶夫特别推崇《西厢记》，认为"如此完美的剧本，在欧洲也不多见"。作者特地把《西厢记》编成故事梗概编入文学史书中，以供读者了解。

苏联时代的研究文字就更多了。重要的有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文章《中国历史上的优伶英雄》(《中国文学》文集，1978)。比较集中的是 1958 年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活动中出现的一系列纪念关汉卿创作 700 周年的著述：费德林的小册子《关汉卿——伟大的中国剧作家》，艾德林的文章《关汉卿》(《文学报》1958 年 6 月 19 日)，索罗金的文章《伟大的剧作家关汉卿》(《苏联文学》1958 年第 2 期)，还有晚些时候谢曼诺夫的文章《论关汉卿剧作的特色》(《东方学问题》1960 年第 4 期)。东方学家康拉德也有若干论述(见《中国学》文选，1977)。也是在这个纪念活动中，发表了直接译自关汉卿中文原作的两种俄译，一是《窦娥冤》，索罗金译并序，载《外国文学》1958 年第 9 期；一是《救风尘》，谢曼诺夫和雅罗斯拉夫采夫译，见《东方文集》1958 年第 2 集。两种均为节译。

俄国汉学家孟列夫写的专著《中国古典戏曲的改革》(1959)主要谈中国解放后的戏曲改革，但书中也涉及古典戏曲，如杨显之的《临江驿潇湘夜雨》等元剧。孟列夫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翻译了王实甫的《西厢记》。

1970 年出版的莫斯科大学教材《中世纪的东方文学》有主编波兹涅耶娃教授写的评述元曲专章。她从中国文学也有过"文艺复兴"时期(并确定该时期为 7—12 世纪)这种观点出发，认为元曲属于"蒙古侵占时期的文

学”。因而引起俄国汉学界的争议。

另一位女汉学家盖达写的专著《中国的传统戏曲》(1971)描述了从古代至14世纪中国戏剧艺术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它从表演艺术的角度涉及元曲。

论述元曲的文章还有谢列布里亚科夫《论元代剧作家马致远的剧本〈汉宫秋〉》(《东方国家语文学》文集,列宁格勒,1963),以及库切拉、齐宾娜、佐格拉芙、李福清等人的论文。

1. 元代戏曲研究,主要内容已如前述

其中索罗金的专著《十三四世纪中国古典戏曲:起源·结构·形象·情节》(Китайская 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драма XⅢ——XⅣ вв. : тенезис. структура. образы. сюжеты)这是苏联汉学界研究中国戏曲的一部重要著作,它熔注了作者自50年代末以来20多年的心血,于1979年出版。

该书的一个特点是资料异常丰富。另一个特点是采用对比和对照分析的方法。在谈到元代杂剧的结构时,他拿四折结构同诗词结构对照,认为李白、白居易等的绝句,四句是按起、承、转、合安排的。杂剧的四折结构也与之相似。即第一折故事开端,第二折趋于复杂化,第三折剧中冲突到达高潮并发生转折,第四折团圆结局。大多数杂剧的结构都是如此安排。只有少数例外,但也只是在其中某一折有些变化,仍然可以看出这种大致的剧情发展规律。在谈到杂剧的特征、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人物形象时,常同欧洲戏剧作对比。例如说欧洲的古典戏剧常常表现义务与感情之间的冲突,从而揭示这种冲突的悲剧性和主人公的矛盾心情及其悲剧结果。而元杂剧中则没有这种矛盾冲突,剧中人物都明确自己该如何行动,特别是正面人物总是毫不动摇地按照义务的要求行事。

专著还有一个特点,是始终重视艺术性的分析,除了结构、语言,还特别重视人物形象的分析,对帝王、文武官员、下级使役,直至书生、隐士,逐类分析,对妇女形象也用了不少篇幅来论述。

2. 明代戏曲研究

除了索罗金有专著外,对元、明戏曲的研究多是一些论文,其中相对集中的有两人:马里诺夫斯卡娅和马努欣。

列宁格勒大学副教授马里诺夫斯卡娅从事明代及清初戏曲研究已多年,其副博士学位论文就是《中国戏曲家洪昇及其〈长生殿〉》(1970)。他写的论明代戏曲的文章主要有三篇:①《明初杂剧(14世纪下半期至15世

纪上半期)》,载《远东国家的文学》文集(1976)。文章谈到明初杂剧的数目、分类和作者的情况。②《明代中期中国古典戏剧杂剧的发展(15世纪末至16世纪末)》,载《远东文学研究的理论问题》(1980)和③《晚明的中国杂剧(16世纪末至17世纪上半期)》,载《列宁格勒大学学报(历史、语言、文学版)》(1979年第4期)。后两文分别对该时期的杂剧按内容或按主题分类作了介绍。此外,她还写了其他文章分别论述单个作家的剧作,如孟称舜、冯梦龙等的剧作。

莫斯科大学副教授马努欣(1926—1974)主要研究《金瓶梅》,但也写过论戏曲的文章。如《卓文君与昙阳子:思想对抗》(1977)、《论汤显祖〈紫箫记〉》(1974)、《汤显祖戏曲〈霍小玉或紫钗记〉》(1974)等。

关于戏曲的著作,还应提到盖达写的一部综合介绍性的书《中国传统戏剧——戏曲》(1971),全书126页,是普及性的读物。

(二)元曲和明清戏曲的多种选本

《新编五代史平话》巴甫洛夫斯卡娅译,科学出版社,1984年。

《西厢记》孟列夫译,国家文学出版社,1960年。

《元曲》彼得罗夫编,孟列夫校注,艺术出版社,1966年。含《墙头马上》、《梧桐雨》、《窦娥冤》、《望江亭》、《单刀会》、《李逵负荆》、《汉宫秋》、《张生煮海》、《秋胡戏妻》、《合汗衫》、《倩女离魂》等。

《东方古典戏剧:印度·中国·日本》(《世界文学大系》分册)文艺出版社,1976年。中国部分包括:《窦娥冤》、《忍字记》、《杀狗劝夫》、《长生殿》(片段)、《桃花扇》(片段)、《牡丹亭》(片段)。

《十五贯》吉什科夫译,艺术出版社,1957年。

《梁山伯与祝英台》(十三折戏曲剧本)艺术出版社,1958年。

《空城记》瓦西里耶夫译,见《东方戏剧集》,1929年。

《窦娥冤》(节译)索罗金译,见《外国文学》,1958年第2期。

《救风尘》谢曼诺夫、亚罗斯拉夫采夫译,见《东方文集》,1958年第2集。

其中1966年出版的《元曲》俄译本,系由一批列宁格勒很有古文修养和古代文学知识的汉学家如斯佩斯涅夫、马里诺夫斯卡娅、费什曼、谢列布里亚科夫等合作完成的。而1976年出版的"世界文学丛书"《东方古典戏剧》卷(中国戏曲部分由索罗金编选并序,雅罗斯拉夫采夫、戈鲁别夫等参

加翻译)也收入《窦娥冤》等4个杂剧。至此译成俄文的元代杂剧已有14个,占现存中文作品的十分之一。据索罗金统计比较,用西欧文字翻译的元曲比俄文的译本种类要大两倍多(第14页),约占现存中文原作的五分之一(第186页)。

二、索罗金论元代戏曲的专著《十三四世纪中国古典戏曲:起源·结构·形象·情节》

索罗金著《十三四世纪中国古典戏曲:起源·结构·形象·情节》(Китайская 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драма XIII—XIV вв.: тенезис, структура, образы, сюжеты, 科学出版社,1979年,334页,印数3500册)一书,不但是作者的博士学位论著,为作者赢得了声誉,而且是苏联汉学界第一部专论元曲的著作。

除前言和结束语外,全书设四篇。第一篇"体裁的起源"(第17—76页),分为"戏剧艺术形成的早期(10世纪以前)"、"11至12世纪的歌舞表演和说唱"、"10至12世纪的戏剧表演"和"诸宫调演唱与'南剧'"四章。其内容是阐述元杂剧在形成过程中,吸收过诗词、小说及古代散文、民间传说以及戏剧的哪些成分,并论析这些成分在元杂剧中起了多大的作用。

第二篇"杂剧的结构"(第77—128页)也分为四章,为"唱段"、"杂剧的曲"、"调,曲的音乐抒情形式"和"杂剧的散文部分"。这一篇主要是论述杂剧唱段的结构和语言特点,通过各时期流传下来的剧本、残本对比,鉴定基本内容和主题思想有多大的变化。

第三篇"元剧的形象世界"不分章(第129—185页),集中分析元杂剧中出现的主要角色:帝王、文臣、武将、判官与罪犯、逆民与隐士、青年书生、妇女、商人、农民及其他。通过分类和详细的分析,探索杂剧作者的创作意图、美学观念以及杂剧反映时代的程度。

第四篇"十三四世纪杂剧的关目"(第186—296页),分别按每一折戏详细叙述迄今保存的162部元代杂剧的剧作内容,并列出剧中人物表和角色说明。

通观全书,可以发现其资料异常丰富。作者使用过的参考书目达500多条,他不但仔细研读过现存的每一折戏,而且参阅中国历代论述杂剧的书、文和外国的有关论著。关于戏曲的体裁问题,尽管中国学者王国维、周

贻白、赵景深等人已有论述，俄国的另一位戏曲研究者盖达也有对中国戏曲史的若干阐述，索罗金仍然有自己的见解，因而显得与众不同。他综合各家之言，概括自己的成果，提出中国戏曲的产生是一系列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即它不但有说唱艺术，而且有歌舞、滑稽戏、古典诗歌和小说等多种体裁的创作经验。

索罗金采用对比和对照分析的方法分析元代杂剧的结构，以其四折结构同诗词结构相对照。他认为李白、白居易等诗人常写的绝句，四句是按起、承、转、合安排的。而杂剧的四折结构正好与之相似。即第一折故事开端，第二折趋于复杂化，第三折剧中冲突达到高潮并发生转折，第四折团圆结局。作者解说其分析的依据，认为大多数杂剧的结构都是如此安排的，只有少数例外。即使有例外的情况，也只是在其中的某一折有若干变化，但在总体上遵循这一剧情发展的规律。

作者指出把这种方法运用到中外戏曲的对比分析上，尤其在论述杂剧的特征、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人物形象时，这样的对比分析更显得鲜明，能给人以启发。他指出，中国和欧洲戏剧的不同点之一是，欧洲的古典戏剧常常表现义务与感情之间的冲突，从而揭示这种冲突的悲剧性和主人公的矛盾心情及其悲剧结果。而元杂剧中则没有这种矛盾冲突，剧中人物都明确自己该如何行动，特别是正面人物总是毫不动摇地按照义务的要求行事。

不过，索罗金又提到，即便是义务的概念，中国与欧洲的作家也绝不相同。欧洲作家的义务观是指上帝，即个人对上帝负责，而中国元杂剧的作家则认为是效忠于君主和国家。可见二者的观念是相异其趣的。虽然从总体上看元杂剧与欧洲戏剧绝不相同，但从个别的、局部的特征上，又有不少共同点。例如元杂剧很接近于欧洲中世纪的奇迹剧、滑稽剧、劝世剧等。就某些方面的特点来看，它类似文艺复兴早期的戏剧，或近似稍后时期的市民戏剧。

索罗金在专著中特别说明：鉴于“大部分元杂剧事实上尚未受到非专门研究元曲的文学评论家，尤其是只关心一般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问题的汉学家的注意”，他特地把现存的162部元杂剧的剧作，详细编写出情节和内容提要，包括剧中角色的说明等。这样，不但可以为不能看到元杂剧原作的人提供一个概貌，即包含它的“题材、人物性格、思想以及剧情的时间和地点”等有概括的了解，而且大大扩展汉学家们对“中世纪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认识。在我们看来，它的意义还在这是元曲杂剧首次介绍给俄文读者，因而有必要把他所介绍的杂剧关目列举出来：

1.《汉宫秋》,马致远
2.《金钱记》,乔吉
3.《陈州粜米》
4.《鸳鸯被》
5.《嫌蒯通》
6.《玉镜台》,关汉卿
7.《杀狗劝夫》
8.《合汗衫》,张国宾
9.《谢天香》,关汉卿
10.《争报恩》
11.《张天师》,吴昌龄
12.《救风尘》,关汉卿
13.《东堂老》,秦简夫
14.《燕青博鱼》,李文蔚
15.《潇湘雨》,杨显之
16.《曲江池》,石君宝
17.《楚昭公》,郑廷玉
18.《来生债》,白朴
19.《薛仁贵》,张国宾
20.《墙头马上》,白朴
21.《梧桐雨》,白朴
22.《老生儿》,武汉臣
23.《朱砂担》
24.《虎头牌》,季直夫
25.《合同文字》
26.《冻苏秦》
27.《儿女团圆》,杨文奎(高茂卿)
28.《玉壶春》,武汉臣(贾仲明)
29.《铁朽李》,岳伯川
30.《小尉迟》
31.《风光好》,戴善夫
32.《秋胡戏妻》,石君宝
33.《神奴儿》
34.《荐福碑》,马致远
35.《谢金吾》
36.《岳阳楼》,马致远
37.《蝴蝶梦》,关汉卿
38.《伍员吹箫》,李寿卿
39.《勘头巾》,孙仲章
40.《黑旋风》(双献功),高文秀
41.《倩女离魂》,郑光祖
42.《陈抟高卧》,马致远
43.《马陵道》
44.《救孝子》,王仲文
45.《黄粱梦》,马致远
46.《扬州梦》,乔吉
47.《王粲登楼》,郑光祖
48.《昊天塔》,朱凯
49.《鲁斋郎》,关汉卿
50.《渔樵记》
51.《青衫泪》,马致远
52.《丽春堂》,王实甫
53.《举案齐眉》
54.《后庭花》,郑廷玉
55.《范张鸡黍》,宫天挺
56.《两世姻缘》,乔吉
57.《赵礼让肥》,秦简夫
58.《酷寒亭》,杨显之,(花李郎)
59.《桃花女》,王晔
60.《竹叶舟》,范康
61.《忍字记》,郑廷玉
62.《红梨花》,张寿康
63.《金安寿》(金童玉女),贾仲明
64.《灰阑记》,李行道

65.《冤家债主》
66.《佟梅香》,郑光祖
67.《单鞭夺槊》,尚仲贤
68.《城南柳》,谷子敬
69.《谇范叔》,高文秀
70.《梧桐叶》,(李唐宾)
71.《东坡梦》,吴昌龄
72.《金线池》,关汉卿
73.《留鞋记》,曾瑞卿
74.《气英布》
75.《隔江斗智》
76.《刘行首》,杨景贤
77.《度柳翠》,(李寿卿)
78.《误入桃园》,王子一
79.《魔合罗》,孟汉卿
80.《盆儿鬼》
81.《对玉梳》,贾仲明
82.《百花亭》
83.《竹坞听琴》,石子章
84.《梳妆盒》
85.《赵氏孤儿》,纪君祥
86.《窦娥冤》,关汉卿
87.《李逵负荆》,康进之
88.《萧淑兰》,贾仲明
89.《连环记》
90.《罗李郎》,张国宾
91.《看钱奴》,(郑廷玉)
92.《还牢末》,李致远
93.《柳毅传书》,尚仲贤
94.《货郎担》
95.《望江亭》,关汉卿
96.《任风子》,马致远
97.《碧桃花》
98.《张生煮海》,李好古
99.《生金阁》,武汉臣
100.《冯王兰》
101.《双赴梦》,关汉卿
102.《拜月亭》,关汉卿
103.《裴度还带》,关汉卿(贾仲明)
104.《哭存孝》,关汉卿
105.《单刀会》,关汉卿
106.《绯衣梦》,关汉卿
107.《诈妮子》,关汉卿
108.《陈母教子》,关汉卿
109.《五侯宴》,关汉卿
110.《遇上皇》,高文秀
111.《襄阳会》,高文秀
112.《渑池会》,高文秀
113.《金凤钗》,郑廷玉
114.《东墙记》,白朴
115.《圯桥进履》,李文蔚
116.《蒋神灵应》,李文蔚
117.《西厢记》,王实甫
118.《破窟记》,王实甫
119.《三夺塑》,尚仲贤
120.《紫云亭》,石君宝
121.《贬黄州》,费唐臣
122.《贬夜郎》,王伯成
123.《庄周梦》,史九敬先
124.《一介子推》,秋君厚
125.《东窗事犯》,孔文卿
126.《降桑椹》,刘唐卿
127.《七里滩》,宫天挺
128.《周公摄政》,郑光祖

129.《三战吕布》,郑光祖
130.《智勇定齐》,郑光祖
131.《伊尹耕莘》,郑光祖
132.《老君堂》,郑光祖
133.《追韩信》,金仁杰
134.《存孝打虎》(雁门关),陈以仁
135.《剪发待宾》,秦简夫
136.《霍光鬼谏》,杨梓
137.《豫让吞炭》,杨梓
138.《敬德不服老》,杨梓
139.《风云会》,罗贯中
140.《西游记》,杨景贤
141.《升仙梦》,贾仲明
142.《替杀妻》
143.《小张屠》
144.《博望烧屯》
145.《千里独行》
146.《赤壁赋》
147.《云窗梦》
148.《独角牛》
149.《刘弘嫁婢》
150.《黄鹤楼》
151.《衣袄车》
152.《飞刀对箭》
153.《玩江亭》,戴善夫
154.《村乐堂》
155.《延安府》
156.《黄花峪》
157.《猿听经》
158.《锁魔镜》
159.《蓝采和》
160.《符金锭》
161.《九世同居》
162.《谢柳垂丸》

三、孟列夫翻译《西厢记》和彼得罗夫编选《元曲》

(一)孟列夫译《西厢记》

孟列夫(Л. Н. Меньшиков,1926—2005)写的专著《中国古典戏曲的改革》(1959)主要是谈中国解放后的戏曲改革问题,也涉及古典戏剧,如杨显之的《临江驿潇湘夜雨》等。

他还翻译了王实甫的剧作,俄文书名为《西厢记,崔莺莺待月西厢》(Ван Ши-фу. Западный флигель, где Цуй Ин-ин ожидала луну. 列宁格勒文学出版社,1960年,283页)。这是根据王季思的校注本,并参考吴晓玲校注本翻译的。译本每折附中国木刻插图一幅,共20幅,扉页印木刻的莺莺"双文小像"一幅(木刻图均取自金圣叹批本)。孟列夫用诗体翻译了剧中的曲词,并写了长篇序文《〈西厢记〉及其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他在序文中简要概括了元曲发展的历史背景、关汉卿的开拓作用、王实甫的继承和创新,指出王实甫把元稹和董解元先后写过的同一题材加以提炼

和加工，运用元曲的抒情手段来描述主人公的内心感情，使莺莺的形象达到完美的地步。同时，孟列夫还谈到《西厢记》对于《水浒传》、《红楼梦》以及中国民间文学的广泛影响。也提到由剧本改编成的越剧（绍兴戏）《西厢记》1955 年在苏联演出时受到欢迎的情况。

（二）彼得罗夫编选《元曲》

《元曲》（Юаньская драма），彼得罗夫编，缅希科夫（孟列夫）校注。艺术出版社，1966 年。其中所选剧目和译者列如下：

《墙头马上》马里诺夫斯卡娅译（Бай Пу. как скакуна возле ограда остановил Пэй Шао－цзюнь）；

《梧桐雨》马里诺夫斯卡娅译（Бай Пу. Осенней ночью Мин－хуана печалит дождь в платанах）；

《窦娥冤》（Гуань Ханьцин. Тронувщая небеса и землю горькая Обида Доу Э）；

《望江亭》马里诺夫斯卡娅译（ГуаньХаньцин. Угощение рыбой редкой в ночь под празник в беседке над Цаяном）；

《单刀会》马里诺夫斯卡娅译（ГуаньХаньцин. Как храбрый Гуань Юй пошел с одним мечом на пир к врачу）；

《李逵负荆》斯佩什涅夫译（Кан Цзиньчжи. Ли Куй из Лагеря Ляншаньбо приносит повинную голову）；

《汉宫秋》谢列布里亚科夫译（Ма Чжиюань. Сон отгоняет крик одинокого гуся осенней порою в Ханьском дворце）；

《张生煮海》孟列夫译（Ли Хаогу. Студент Чпсан Юй морскую варит воду у острова Шамэнь）；

《秋胡戏妻》费什曼译（Ши Цзюньбао. Цю Ху из Лу，вернувшись домой，заигрывает с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женой）；

《合汗衫》费什曼译（Чжан Гобинь. Рубашку，порванную на две полосы，соединают в храме Сянгосы）；

《倩女离魂》孟列夫译（Чжэн Гуанцзу. Домашних духов обманув，душа Цянь－нюй расстается с телом）。

四、马里诺夫斯卡娅关于明清杂剧的新著《中国古典戏剧杂剧简史(14—17 世纪)》

圣彼得堡大学副教授马里诺夫斯卡娅(T. A. Малиновская, 1922—)1950 年在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于 1970 年以《中国戏剧家洪昇及其〈长生殿〉》获副博士学位。

此后,她长期致力于中国古典戏剧的教学和研究。发表著译多种。从翻译白朴《梧桐雨》开始,至撰成专书《中国古典戏剧杂剧简史(14—17 世纪)》(Очерк по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драмы в жвнре цзацзцюй (XIV - XII вв.) 1996 年,238 页)。历时 30 年,终于完成一部论著。

该书系统梳理杂剧从金末元初(14 世纪)形成,经历逐步完善,到元代成熟,趋于繁荣又在明清两代有所发展的过程。对杂剧的体裁、构成、角色和艺术特点都有分析和阐释。重点分析某些剧作家的作品,如她此前已陆续发表的单篇的论文:《冯梦龙的戏剧活动》(1974)、《16 世纪两出"中山狼"的杂剧》(1972)、《徐渭(1521—1593)及其戏剧遗产》(1977)、《汤显祖(1566—1541)的戏剧活动》(1979)、《朱有敦(1379—1439)的戏剧》(1977)、《梁辰鱼(1520—1595)的剧作〈浣纱记〉》(1987)、《汤显祖的宗教哲理剧作》(1989)等。

该书的特点是脉络清楚又重点突出。这里与作者重视写史的脉络并且着力披阅史料有关,例如关于明代杂剧,她此前就已作过系统撰述的三篇论文:《晚清的中国古典戏剧》(1979)、《初明的杂剧(14 世纪下半叶—15 世纪上半叶)》(1979)、《中国古典戏剧杂剧发展史上的中明时期(15 世纪后 30 年—16 世纪后 30 年)》(1980),还有某些时期的某种专题:《中国戏曲里的女性问题(16 世纪下半叶—17 世纪上半叶)》(1984)。

马氏的新著是俄罗斯继索罗金论元曲的专著之后的又一部力作。

五、元明清诗的俄译与论述

鉴于俄文版译作中常把元明清三代诗歌合集,为便于评介,此处也把明清诗歌传俄的资讯提前一并介绍。

在整个苏联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元明清诗研究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不过,从 50 年代开始,翻译的元明清诗歌已散见于各种俄文版的中国

诗集中。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中国朝鲜诗选》，吉托维奇译，彼得罗夫序，由国家文学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收入谭嗣同的诗15首。

《东方文学选集》，吉托维奇译，1957年出版，收入清代诗人谭嗣同的诗9首。

《中国8至14世纪抒情诗集》，斯米尔诺夫编，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收入关汉卿诗27首和高启诗60首。

《东方古典诗集》，阿赫玛托娃译，1969年出版，收入徐钒等元明清的五位诗人的诗5首。

《印中朝越日古典诗集》，1977年出版，书中收入中国元明清王冕、高启、戚继光、汤显祖等22位作者的诗35首。其中，高启最多，一人就占了14首，余下21人则每人收入一首。

此外，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曾译过刘致的一首诗，登在《苏联中国学》杂志1955年第1期上。

收入元明清诗最广的一本诗集是由费德林通讯院士编选的《中国诗集》第三卷，由国家文学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计收入72位诗人的104首诗。这些诗分别统计为：

元代：马祖常、贯云石、张翥、鲜于枢、萨天锡、徐再思、刘致、高启、王冕、适贤等17人的诗30首。

明代：李东阳、唐寅、边贡、何景明、杨慎、王世贞、冯梦龙等14人的诗15首。

清代：吴伟业、钱澄之、毛先舒、徐钒、朱彝尊、夏完淳、蒋士铨、林则徐、龚自珍、项鸿祚、黄遵宪、谭嗣同等42人的诗59首。其中，多数人仅收入一首，黄遵宪和谭嗣同则分别被选用四和六首。

在元明清诗的俄文译者中，比较著名的有伊里亚·斯米尔诺夫、吉托维奇、齐维里兴、尤·亚历山大罗夫、戈鲁勃科夫、阿尔戈以及女诗人阿赫马托娃等。

苏联汉学家对元明清诗的研究，重点放在少数几个名诗人身上。如莫斯科大学毕业，现任科学出版社副编审的斯米尔诺夫，就把主要精力用于译介和研究高启的诗。两种收有大量高启诗的俄译本均出自他的译笔：《中国8至14世纪抒情诗集（王维、苏轼、关汉卿、高启）》译载高诗60首，《印中朝越日古典诗集》译载高诗14首。同时，斯米尔诺夫发表过几篇论

文，先后有《论高启诗的若干特点》载《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青年科学工作者和研究生学术会议文集》（提纲）（1949 年，第一册）和 1975 年《14 世纪末中国诗史片段（高启早期的生活与创作）》，并于 1978 年以论文《高启（1336—1374）的生平与创作》（21 页）在东方学研究所获副博士学位。

苏联汉学家研究的对象注重具有革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诗人。如 50 年代出版的三种诗集：《东方文学选集》（1957）、《中国诗集》（1957）第三卷和《中国朝鲜诗选》（1958）中均收有谭嗣同的诗，分别为九、六和十五首。以研究清末谴责小说著称的莫斯科大学教授谢曼诺夫写出了长篇论文评介黄遵宪，题为《黄遵宪诗中的反帝国主义基调》①尼·彼得罗夫则以研究黄遵宪的论文《黄遵宪——19 世纪末的中国爱国主义诗人》（共 15 页）于 1955 年获副博士学位。论文由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出版。海参崴远东大学的副教授达·扎娅茨为《简明文学百科全书》（1975）第八卷写出专门词条介绍黄遵宪。此外，在《外国文学主要作品选·东方文学》一书中也选入了黄遵宪的诗若干首。

扎娅茨对黄遵宪的观点在苏联汉学界具有代表性。她认为，黄是“中国诗人、外交家和历史学家”，“拥护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改良运动”，“在诗中反映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斗争的各个阶段”，“其诗歌不但揭露列强对华的罪恶政策，而且，暴露清廷妥协投降的立场”。此外，她也肯定了黄诗是中国诗坛“第一次描写日、美、越、英等国生活”的作品，在艺术上充满了抒情情调和民歌基调。

清代诗人的革命精神得到充分肯定的还有谭嗣同和秋瑾。扎娅茨曾于 1987 年出版一本篇幅不大的专著《秋瑾——中国的女革命家和女诗人》，系统介绍秋瑾的革命生平及其反映革命志向和革命斗争的诗作。汉学家维·索罗金为《文学百科词典》撰写的“中国文学”条目中，评价黄遵宪的作品是“突出的爱国主义抒情诗”和“主张更新古典诗歌形式”的同时，也充分肯定谭嗣同提出“诗界革命”的功绩。

---

① 见《东西方文学的相互关系》文集，1961 年，第 81—82 页。

第十二章
明代文学在俄罗斯

明代文学传入俄国的主要类别——小说、戏曲和诗歌，都和明清时代古典文学传俄的总体有关。此处先作不分时代的综述，尔后再细分明清两代。

俄罗斯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虽然早在19世纪初就有人在做，例如，章回小说《好逑传》1832年首次直接从中文译成俄文，在莫斯科出版，1927年又有人（列文）从法文转译，在列宁格勒出版。但是真正作到成规模的翻译，则晚至苏联时代的20世纪中叶。此时译介的特点是大规模、有计划的进行，所选书目囊括了主要的小说，包括章回小说和传记、笔记等各种体裁形式，品种数目众多。同时，翻译与研究工作并行，或有人专做评析而写成专著，或由译者写成论析性的序、跋（长文），很能反映俄苏汉学家学术研究的水平和质量。

一、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和研究综述

（一）小说作品翻译

1. 章回小说，主要为明清时代的作品

明清小说的俄译在20世纪50—70年代基本形成高潮，至80年代已完成了主要作品的翻译与出版工作，已有俄译本的书目列如下：

《三国演义》（Троецарствие，两卷本）帕纳秀克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4年。1984年再出插图本，后李福清作序和注释。

《三国演义》（缩写本）帕纳秀克译，文艺出版社，1984年。

《平妖传》（Развеянные чары）帕纳秀克译，文艺出版社，1954、1983年。

《金瓶梅》(Цветы сливы в золотой вазе ,两卷本)马努欣译,文艺出版社,1977、1986、1993、1998、2007 年。

《水浒传》(Речные заводи ,两卷本)罗高寿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5 年,1959、1992、2008 年多次再版。

《水浒传》(为儿童读者缩改本)李西查、谢列布里亚科夫译,儿童文学出版社,1968 年。

《西游记》(Путешествие на запад , 四卷本)罗高寿、科洛科洛夫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9 年。

《猴王孙悟空》(《西游记》节略本)罗高寿译,华克生节略,文艺出版社,1982 年。

《镜花缘》(Цветы в зеркале)费什曼、蒙泽列尔、齐别罗维奇译,科学院出版社,1959、1998 年。

《儒林外史》(Неоф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конфуцианцев)华克生译、注,国家文学出版社,1959、1999 年。

《侠义风月传》(Счастливый брак, 好逑传)列文转译自法文,列宁格勒思想出版社,1927 年。

《十二楼》(Двенадцать Башен)华克生译、注,文艺出版社,1985、1999 年。

《肉蒲团》(Ли Юй Полуночник Вэй - ян, или Подстилка из плоти),华克生译、注并序,雅罗斯拉夫采夫译诗,莫斯科文学出版社,2000 年。

《红楼梦》(Сон в красном тереме , 两卷本),帕纳秀克译,国家出版社,1958、1995 年。

《说岳全传》(Сказание о Юэ Фэе ,两卷本)帕纳秀克译,国家文学出版社,1963 年。

《三侠五义》(Трое храбрых и пятеро справедливых)帕纳秀克译,文艺出版社,1974、2000 年。

《浮生六记》(Шесть записок о быстротечной жизни)戈雷金娜译,科学出版社,1979 年。

《老残游记》(Путешествие Лао Цаня)谢曼诺夫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8 年。

《孽海花》(Цветы в море зла)谢曼诺夫译,国家文学出版社,1960、1990 年。

2. 传奇、评话、笔记等中短篇，涉及古小说、汉魏六朝小说、唐代传奇、宋代评话、明代拟话本、清代笔记本等

《狐媚》（蒲松龄《聊斋志异》选译）阿列克谢耶夫译，国家出版社，1922年。

《狐媚》（蒲松龄《聊斋志异》选译）阿列克谢耶夫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5年。

《狐媚》（蒲松龄《聊斋志异》选译）阿列克谢耶夫译，文艺出版社，1970年。

《僧术》（蒲松龄《聊斋志异》选译）阿列克谢耶夫译，国家文学出版社，1923年。

《僧术》（蒲松龄《聊斋志异》选译）阿列克谢耶夫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7年。

《异怪故事》（蒲松龄《聊斋志异》选译）阿列克谢耶夫译，科学院出版社，1937年。

《异人故事》（蒲松龄《聊斋志异》选译）阿列克谢耶夫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4年。

《聊斋志异》（Странные истории из кабинета Неудачника）阿列克谢耶夫译，文艺出版社，1973年。

《聊斋志异》阿列克谢耶夫译，文学出版社，1983、1998、2000年。

《蒲松龄小说集》乌斯京、范加尔译，国家文学出版社，1961年。

《新齐谐（子不语）》（Новые записи Ци Се）费什曼译，科学出版社，1977、2003年。

《阅微草堂笔记》（Заметки из хижины“ Великое в малом”）费什曼译，科学出版社，1974、2003年。

《今古奇观》（Удивительные истории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и древности）维尔古斯、齐别罗维奇译，1962、1998年。

（二）译本与译者评介

1. 明代章回小说

明代章回小说中的主要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以及《平妖传》，拟话本中冯梦龙的“三言二拍”（选）及《今古奇观》等已译成俄文出版，而且译文都是经过认真推敲，译本是有质量的。但

研究这些作品的专论性著作则尚未出现。目前大多是这些作品的俄译者结合翻译写的一些前言、后记或评介文字,其中当然含有他们的研究心得。不过,总的看来,仍以评介性为主。

这些作品不但篇幅长,容纳的内容广,而且有文有诗,翻译起来难度相当大。译者要具备广泛的知识,高度的文字修养,兼通诗与文的翻译技巧,往往需要长时间的钻研和工作才能出成果,有几位长期在这个领域耕耘的汉学家便是例子。

译者当中最为突出的一位是帕纳秀克(В. А. Панасюк,1924—1990)。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帕纳秀克自1951年大学毕业以后,长期在军事外语学院任教,他从事汉语教学,结合教学工作翻译文学作品。译作不断出版,有明代的《三国演义》、《平妖传》,清代的《红楼梦》、《说岳全传》、《三侠五义》以及古代的散文《司马迁文选》等。另一位突出的译者莫斯科大学教授阿历克谢·彼得罗维奇·罗高寿(А. П. Рогачёв,1900—1981),他翻译了《水浒传》、《西游记》以及今人用章回体写的小说《吕梁英雄传》。此外,翻译《金瓶梅》的莫斯科大学副教授维克多·谢尔盖耶维奇·马努欣(В. С. Манухин,1926—1974)则翻译与研究并重,写出了论《金瓶梅》的副博士论文,因为过早去世,未能留下更多的译作。

还有一位突出的译者,莫斯科大学副教授季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华克生(Д. Н.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1926),他翻译了许多话本("三言二拍")作品选以及清代的《儒林外史》、《十二楼》、《肉蒲团》,并且写有大量文章。

同罗高寿合作翻译《西游记》的符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科洛科洛夫(В. С. Колоколов,1896—1979)则是老资格的翻译家,有许多译作。同帕纳秀克合译《红楼梦》的孟列夫(Л. Н. Меньшиков,1926—2005)也有深厚的古文修养,他负责翻译小说的诗词部分。

在评论明代章回小说的文、论中,比较有特色的,除了李福清(Б. Л. Рифтин,1932—)用结构分析的方法论《三国演义》外,就是罗高寿的遗著《吴承恩及其〈西游记〉》(1984)。这本118页的概论和评介性的著作,在谈论作品的艺术特色方面很有可取之处。

2. 清代章回小说,将在下一章叙写(详见第十三章第一节)

二、罗高寿的论著《吴承恩及其〈西游记〉》

《西游记》的俄译者为著名汉学家阿历克赛·罗高寿(А. П. Рогачёв,

1900—1981)，系俄国驻华大使、汉学家伊戈尔·罗高寿(И. А. Рогачёв, 1932—　)之父。为了区别，我们不妨称前者为老罗高寿。老罗高寿的主要成就在翻译和教学，尤其是翻译古典名著《水浒》(1955)和《西游记》(1959)为他带来了很高的声誉。他自从1928年于莫斯科东方学院毕业之后，曾三次来华进修或在苏联驻华的机构工作，前后居留中国13年。随后又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学院、莫斯科大学任教，直至1981年4月去世，教学生涯长达41年。他长期担任汉语语言文学教授、东方语言教研室主任等职，培养了大批汉学人才。

尽管他的中国语言文化素养很高，又经过长时间的准备，但在翻译小说时还是遇到了不少困难。章回小说这种体裁本来对于俄国人来说是很陌生的。在他们看来，诗必须是有韵的，而小说则是无韵的散文，二者不可混用。章回小说把它们糅在一起，叙事中不断地出现"有诗为证"，似乎显得不伦不类。对于汉学家来说，翻译古典诗词更加困难。何况《西游记》中有天、地、人三界和大量的人名、地名以及各路神仙、妖魔鬼怪，其译介的难度可想而知。译者只好用翻译加详注的办法来应对这一困难。即便如此，翻译工作也得旷日持久地延长下去。为了加快进度，他不得不请另一位老汉学家，当年曾以协助瞿秋白率先采访报道新俄社会而闻名的郭质生(В. С.. Колоколов，1896—1979，科洛科洛夫)来完成第三、四卷，他自己则翻译第一、二卷，并为小说写出长篇序文和详细注释。

小说出版以后，他又年复一年、锲而不舍地长期坚持研究工作，终于在晚年完成了一部117页的论著《吴承恩及其〈西游记〉》(У Чэньэнь и его роман〈Путешествие на Запад〉)，于1984年出版。这是俄国论析章回小说的著作中颇具特色的一部。尤以在评论艺术特点方面很有见地。

作者分析《西游记》的结构有三层。一是叙事，即叙写唐三藏到西天取经，经历的一个个惊险离奇、艰难曲折和饶有兴味的故事；二是说理，说明唐僧师徒四人遭遇到八十一难的缘由；三是作神秘主义的解说，交代整个西游取经故事和其中当事人的命运的总根源，给予神秘主义的宿命论的解释。他认为，检阅主人公的历险和遭遇劫难的每一个故事，就可以概括出"障碍——克服"这样的一个模式。每个故事情节都是按这个模式安排的。不过，吴承恩以他娴熟的写作技巧，巧作安排，使得它曲折多样、变化万千，以致引人入胜罢了。老罗高寿用分析欧洲小说常用的方法结构分析法来考察《西游记》，非常新颖。

此外，他也按分析世界文学习用的类型来看待这部小说，认为《西游记》属于“长篇小说—史诗”类型，说它兼具两者的特点。

多亏有了译者的翻译和评介，小说《西游记》得以在苏联长期流行，广受欢迎。到1982年又有莫斯科大学教授、资深汉学家华克生根据罗译本加以摘选，出版一本《西游记》的节略本，书名为《猴王孙悟空》，并且移用了老罗高寿为四卷全译本所写的长篇序文。这样做就更加大了小说在俄国传播的力度。

三、李福清的专著《中国的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论〈三国〉故事的口头和书面异体》

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李福清（1932—　）院士在1970年出版博士论文《中国的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论〈三国〉故事的口头和书面异体》。该书详细考察了三国故事的各种口头流传形式和书面的异体、异文；分析民间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之间的关系，证明不是只有前者影响后者，而是二者相互都有影响。这种研究在民间口头文学领域也具有开拓的意义。此外，本书从方法论上来看也有特殊的意义。

在一段时间里，我国学术界曾以为苏联的文艺评论乃至学术研究都是只谈思想内容不讲艺术形式和艺术性，甚至是仍然实行庸俗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往往一言以蔽之，曰“教条主义”。这是看了20世纪50年代翻译过来的文章后产生的印象。殊不知后来已有很大改变。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文学界对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也发生了强烈的兴趣，有使用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的和信息论方法的；心理学、社会学、价值学等观点的文艺著作也有不少种类问世。李福清这本专著成书于70年代初，恰好是这种变化的一个鲜明的例子。

他用结构分析的方法，把一个故事（段子）分成若干最基本的情节“成分”即“情节素”——包括时间地点（或场面）、人物（多少）、动作、彼此发生的联系等。同一个故事的其他异文、异体也划分成细小的情节素，然后放在一起对比。这样，内容相同的故事，其表现手段（艺术手法）的异同，就看得很清楚。李福清的独具匠心，也使人明显感到用结构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作品的艺术手法会更加切实。

他以诸葛亮看望周瑜生病的故事为例，把《三国演义》第49回的这一段子分成26个情节素，而在民间说书艺人的讲本中，这同一段子分成的情

节素数目大不一样，扬州的康重华是109个，苏州的唐耿良是60个，苏州的陆耀良是93个。从对比中看出，说书人讲的基本动作均来自《三国演义》，但在讲的过程中，结构发生了变化，有的段落被捏合，有的被展开；加强了描写性，尤其是人物内心的描述；增加间接引语、插叙等口头说书时所必须的艺术手段。结果作品当然就扩展开来了。

李福清用结构分析法不但说清了书面文学对口头文学的影响，而且具体探明了书面文学是如何利用民间文学中的情节、艺术手段以及语言的。

然而作者并不限于表现形式上的研究，而是仍然要谈思想内容。他所实行的系统研究方法，就是把作品当作一个系统，从思想内容、语言以及其他各种表现方法都加以研究。

应该说，结构分析和系统分析是本书在方法论上两个最值得指出的特点。

作者近年来出版的《李福清论中国古典小说》(1997)、《关公传说与〈三国演义〉》(1997)、《古典小说与传说》(2003)等书继续探讨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他认为，过去人们只研究一个方面：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的影响。但在中国，应该反过来研究另一个方面，即作家文学对民间文学的影响。用广泛的材料，《三国演义》的诸种民间文学形式，包括各种曲艺如说书、鼓词、弹词等民间艺人的口头创作，也包括俗文学作品，如唐代变文、宋元平话、明清时期的各种刊本，甚至民间艺术、地方戏、年画等，就可以看到这种往返多次的过程，即小说作家怎样运用民间文学材料写成书本作品。然后这个作品又下降民间，发展出各种形式的口头创作，诸如说唱等。

关羽的故事也是这样。《三国演义》之后，发展出广泛形式的民间崇拜，有多少关帝庙、关公塑像、关公剪纸等产生了。这一切无不说明在中国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相互影响之积极活跃的关系。

四、《金评梅》与古代艳情文学译介

(一)《金瓶梅》的译本与评论

小说首次由莫斯科大学副教授马努欣(1926—1974)翻译出版(1977年，两卷本)，李福清(及思乔夫参与部分)撰写长篇序文，书名 Цветы сливы в золотой вазе, или Цзинь Пин Мэй. 。同书于1986、1993、1998年

三次再版。同书于1994年有别的译者加入由科勃译夫编纂出过一种新版(三卷本在伊尔库茨克市出版)。

据李福清见证,汉学家蒙译勒(1900—1959)早在50年代就动手翻译该小说,因过世而未果。之后马努欣据《金瓶梅词话》本在1969年11月7日译完的文稿便成了西方的第一次全译本(两卷本)。然而由于当局的严格审查和出版社所作大段"除污"删节,译本几乎被缩减一半才在译者死后三年出版。是故科勃译夫编纂的马努欣译稿在1994年出版,是比较全的译本。该本有多人参与恢复和修订马译的文稿及其大量学术研究性的注解,可惜因其中一位参与者塔斯金(1917—1995)去世而中止,实际上1994年版仅大体占全部译稿的五分之三,始成三卷本。

李福清1977年的序文《兰陵笑笑生和他的长篇小说〈金瓶梅〉》①首次作出全面的评论。其要点有三:其一,对性的描绘"不是目的,而是揭露的手段"。其二,揭露的是当时社会和上层的腐败。通过主人公的私生活问题,显示了作者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关切。其三,大量引述小说的描写手法,阐明其艺术性,例如象征手法。

90年代以后,有科勃译夫的论文《中国生活最玄的百科全书(〈金瓶梅〉)》(1995)、戈罗杰茨卡娅的论文《〈金瓶梅〉的人物》(1996)和《小说〈金瓶梅〉中的诗歌与音乐》(2001)等四篇,还有华克生、扎依采夫等人的文章多篇。

青年时期曾在中国学习和工作过的马努欣,毕生从事《金瓶梅》的研究和翻译。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当他的译稿刚完成时,著名汉学家艾德林便为它大声疾呼:"迄今,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还有一部没有在苏联出版,这便是《金瓶梅》,现在已翻成俄文了。我们非常需要这部书。"

1977年,《金瓶梅》俄译两卷本(438页+502页)由国家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首印5万册很快销售一空,1986年再版7.5万册。汉学家相继发表评论:出版《金瓶梅》俄译本是"苏联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填补了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空白。""马努欣花了20年心血翻译《金瓶梅》,建立了科学的功勋。"

《金瓶梅》俄译本分上、下两册,据《金瓶梅词话》本底本翻译的,另

① 中译文:白嗣宏译,载《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4期,第80—84页。

从崇祯本中选出30幅木刻插图。俄译本为删节本，但保留了原书的百回结构。主要删去原书中一些过于露骨的性描写、跟书中内容没多大关连的诗词曲和妇人之间的无休止的吵闹等情节。《金瓶梅》俄译本虽是节译本，但并非洁本，原书中跟情节及刻画人物性格有关的一些性描写仍予保留。

马努欣自1959年发表第一篇研究金瓶梅的论文起，到死后刊出遗作《关于〈金瓶梅〉的作者》，共发表近十篇研究《金瓶梅》的论文，其中包括1964年的副博士论文《由传统到创新的社会揭露小说——金瓶梅》，《简明文学百科全书》撰写有关《金瓶梅》的辞条。关于《金瓶梅》的版本、作者、人物和艺术表现手法、语言特色等，都作过分析。他认为，“《金瓶梅》是中国文学中第一部取材于作者当时社会生活的小说。”“作者将小说主人公西门庆当成典型环境下活动的时代主人公的典型社会形象，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创举。”“《金瓶梅》代表中国文学史上艺术认识发现的一个新阶段，标志着现实主义的发展方向，即从细节的真实过渡到典型形象和情节的典型化。”他认为“《金瓶梅词话》本是最早和最有价值的版本，张竹坡评本虽然很流行，却是经过删改而为当局认可的版本，而杭州本（崇祯本）经文字处理和删改后虽然可读性增加了，却因删去原书中很有研究价值的细节描写、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和对反面人物的揭露性描绘等而在很大程度内削弱了其社会揭露倾向。”“这个问题是考证中最困难的问题，需文学家、版本学家和语文文体专家通力合作。”对于“兰陵”，“要从地理位置和形象比喻两个方面去考虑。兰陵盛产美酒，因此，作者很可能是兰陵一醉汉，而他借酒装疯是为了抨击当局，揭露社会弊端。因为当局是不会惩罚酒疯子的疯话的”。关于描写手法，“在书中第一次使用了个性化的语言，第一次把丰富的民间语言，不加修饰地便以它独特的生动形式，移植于小说当中。”“每一个人物都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语言特征已成为典型化的一种重要手段。”

李福清除为《金瓶梅》俄译本撰写了长篇序言和作了详尽注释外，还为库恩的新版德文译本撰写了“跋”和“关于中国的木刻及《金瓶梅》的插图”。并有论文《中国长篇小说的构成》和为九卷本《世界文学史》撰写“17世纪的中国文学”的章节。李福清认为，“17世纪初，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底层已开始出现新型的社会经济关系，即资本主义萌芽。”“《金瓶梅》及其木刻插图则是中国16世纪末和17世纪前半期的一个时代纪念碑。”“这部长

篇小说宛如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危机四伏时期的一面镜子。”“毫无疑问，《金瓶梅》的作者能够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描写主人公的私生活，乃是作者的创新。”而且，《金瓶梅》还“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中第一部写出金钱万能的小说”，至于它“花了许许多多的篇幅去描写中国妇女的生活，也不容争辩的是一个创举。”李认为，它刺激了一系列才子佳人小说的出现。

（二）《肉蒲团》的评介

80年代起，俄罗斯广泛译介东西方的“性趣”文学作品。汉学家沃斯克列辛斯基（华克生 1926—　）继翻译李渔的《十二楼》（Двенадцать башен 译、序并注解，351页；1985、1999、2000年连续印行三版）之后，又译出小说《肉蒲团》（译、序并注，其中诗词由雅罗斯拉夫采夫译，318页，2003年）。此前他并已编选一本《中国艳情小说集》（编、译、序并注，2003年，775页），作为“中国文学黄金系列丛书”之一发行。

《肉蒲团》（Ли Юй Полуночник Вэй－ян, или Подстилка из плоти. 2000），译者序文《中国唐璜的命运——略论李渔章回小说〈肉蒲团〉及其主人公》，把未央生与拜伦塑造的唐璜、俄罗斯民间文学中的萨瓦·戈鲁岑作了对比，认为未央生类似唐璜；但李渔小说更为深刻，涉及许多伦理和哲学宗教问题。

沃氏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色情狂主人公最终结局都是命定的，那么作者为什么还要诱人地描写其性爱的画面，以那样陶醉之情形象鲜明地描绘那令人难堪的丑态？

“他分析有三点原因：‘首先，这种刻意描写的情爱场面的肉欲努力表现了恶行本身令人讨厌的性质’，‘以便读者明显地信服这种恶行令人厌恶的特点，更重要的是明白，报应的不可避免’。其次，沃斯克列辛斯基认为，小说中大量情爱描写的出现说明了与那个时代的生理心理学以及养生保健学相联系的概念”。他指出：养生与养心实质上就是人类自我调节活动的部分或方面（李渔就此写过篇幅巨大的随笔著作《闲情偶记》——原注）。这种学说中最重要的就是阴阳的和谐。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性关系包括性实践（性活动的样式，必需的药剂，如何建立阴阳的和谐等等）起着重要作用。第三，沃氏认为，文学作品中的情爱描写是由那个时代的现实和道德来说明的实际生活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它们都存在于生活之中，都是现实的产物和现实的组成部分。”“是故沃氏对中国古代艳情文学

产生原因的这三点分析，是有参考价值的。[①]”

（三）《中国色情》的编译

科勃泽夫编选并序的《中国色情》（Китайский эрос）于1993年出版（504页）。从序言可以看出，编者旨在介绍中国古代性学，而不是研究文学。

《中国色情》第一部分题为《爱的怪癖和淫行的规则》，收入编者科勃泽夫为这一部分写的引言《中国艳情的奇谈》，美国汉学家珍·休马娜和吴旺（译音）合写的《爱情的阴暗面》，扎瓦茨卡娅－柏芝的《作为中国传统绘画特殊色调的性活动》和戈洛杰茨卡娅的《“春宫”的艺术》等四篇论文。介绍中国古代小说、绘画中对各种性交包括姿势、技巧、无射精性交、同性恋、口交、群交、恋物癖甚至变态性行为的描写。

第二部分翻译和讲述《房中术》、《素女经》、《玉房指要》、《玉房秘诀》、《洞玄子》等古代书籍的内容摘要。

第三部分才是“春情小说”，但篇幅最大（第203—504页）。译介中国古代艳情文学的一些著名片段，有伶玄的《赵飞燕外传》；《青琐高议》中的《梦闺记》；《绿窗女史》中的《红衫女》；《醒世恒言》中的《汪大尹火烧宝莲寺》和《赫大卿遗恨鸳鸯绦》；《初刻拍案惊奇》中的《闻人生野战翠浮庵》和《乔兑换胡子宣淫》；《聊斋志异》中的《黄九郎》、《恒娘》和《巧娘》；李渔《十二楼》中的《十卷楼》和小说《肉蒲团》节选，以及《金瓶梅》第51、52回。

全书配有大量古人作的“春宫画”插图，大小数量在123幅以上。

但是，正如我国学者李逸津在概括俄译艳情文学特点时，指出：

“与以往苏联时期”的评论大不相同，“不是从文学角度：文学体裁、题材、主人公形象、基本情节的渊源流变角度来研究”，“而是把它看成是中国古代性学、包括性哲学、性医学、性心理学、性民俗学的文献”。[②]

不过，编者科勃泽夫在引言《中国艳情奇谈》中提出了文学方面的两

---

① 李逸津《俄罗斯汉学视野中的中国艳情文学》，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八集，2004年第295—296页。

② 李逸津《俄罗斯汉学视野中的中国艳情文学》，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八集，2004年第290—291页。

点看法。

其一,起源问题。

他说,对中国艳情文学的起源,过去一般以《汉武帝内传》的公元前110年为中国艳情文学的开始,西方还有人认为应是公元3至7世纪。而他认为,中国于20世纪70年代初出土的马王堆汉墓中保存的《和阴阳》和《天下之道谈》是中国最早的艳情文献,所以中国出现艳情文学的年代应是"公元前2世纪初"。他说:"古代中国的书面文献早在汉代就极为广泛地普及了情爱内容。他们的内容涉及广泛的问题:从宇宙之爱的哲学到关于性交姿势和淫戏动作,以及同性功能药剂相联系的实践教导。"

其二,严格性禁忌和盛行艳情文学相矛盾的问题。

宋代以后,随着在中国一直到20世纪初都占统治地位之意识形态的后期儒家道德的全面形成,艳情文学却没有被消灭。于是出现了矛盾现象:一方面,是教条主义的后期儒家清教主义被强化;"另一方面是艳情文学的极其繁荣,并且常附有描绘艺术,如大量的春宫插图。"

对于中国古代一方面有着清教徒式的严格的性禁忌,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大量艳情文学的矛盾状况,他分析道,这一方面是由于在某种程度上官方儒家的禁忌是有效的,使得对两性问题的表现全部进入通俗文学,并采用"艺术暗示和多义性的半吞半吐的话语"。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人……学会了成功地解决棘手的性问题,去掉了它的为文学所必须的悲剧性的不可解决的色彩。也就是说,由于封建时代两性关系的不自由,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又不允许对这种不幸进行公开的揭露和抗议,如在文学中采取悲剧的处理方式,于是就用艳情文学的纵欲来化解这种矛盾。①

五、戈雷金娜论明代传奇的《中国中世纪短篇小说》

戈雷金娜撰写的著作《中国中世纪短篇小说·体裁的起源及其演变》(明代传奇,Китайская проза на пороге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я: Минский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 рассказ Ⅲ——Ⅳ вв. : Проблемы генезиса сюжетнего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я),出版于1980年,以论述明代的传奇为主,也回溯到唐宋传奇。她对明代传奇瞿佑的《剪灯新话》有过研究,并将它译成俄文出版。

① 转引自上述李逸津论文。

她参阅了大量材料，包括一些鲜为人知的、首次通过科学交流而获得的资料，如哈佛大学收藏的16世纪的刻本等。专著用三分之二篇幅论述瞿佑的《剪灯新话》，在《瞿佑〈剪灯新话〉及其在传奇小说史上的地位》一章中，她分析了民间文学题材在《新话》中的变体，如“游水府”、“娶仙女”题材，也谈了《新话》中叙事的新类型，包括“展开情节的特点”，“主人公及其环境”，“传奇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表达方式”。

书中有一章的写法，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是很有意义的。它把“瞿佑的传奇同远东15至18世纪的白话小说作对比”，包括“瞿佑小说同朝鲜小说”金时习的《金鳌新话》对比，“同越南小说阮屿的《传奇漫话》对比”，“同日本小说”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对比。实际上谈的是瞿佑小说对那些小说的影响。她认为远东各国和越南的短篇小说传奇体裁是受比较成熟的中国传奇的影响而产生的，当然各国都做了使外来题材民族化的工作，但传奇无疑已成了这个地区各国文学的共有体裁（第235—279页）。

六、明代戏曲研究概况

除了索罗金有专著外，对元、明戏曲的研究多是一些论文，其中相对集中的有两人：马里诺夫斯卡娅和马努欣。

列宁格勒大学副教授马里诺夫斯卡娅从事明代及清初戏曲研究已多年，其副博士学位论文就是《中国戏曲家洪昇及其〈长生殿〉》（1970）。他写的论明代戏曲的文章主要有三篇：①《明初杂剧（14世纪下半期至15世纪上半期）》，载《远东国家的文学》文集（1976）。文章谈到明初杂剧的数目、分类和作者的情况。②《明代中期中国古典戏剧杂剧的发展（15世纪末至16世纪末）》，载《远东文学研究的理论问题》（1980）和③《晚明的中国杂剧（16世纪末至17世纪上半期）》，载《列宁格勒大学学报（历史、语言、文学版）》（1979年第4期）。后两文分别对该时期的杂剧按内容或按主题分类作了介绍。此外，她还写了其他文章分别论述单个作家的剧作，如孟称舜、冯梦龙等的剧作。

莫斯科大学副教授马努欣（1926—1974）主要研究《金瓶梅》，但也写过论戏曲的文章。如《卓文君与昙阳子：思想对抗》（1977）、《论汤显祖〈紫箫记〉》（1974）、《汤显祖戏曲〈霍小玉或紫钗记〉》（1974）等。

关于戏曲的著作，还应提到盖达写的一部综合介绍性的书《中国传统戏剧——戏曲》（1971），全书126页，是普及性的读物。

第十三章
清代文学在俄罗斯

俄国人所说的“近代”，不是指鸦片战争以来，而是指从17世纪下半叶起至20世纪初叶，即清代。苏联汉学家研究清代文学的成果，形成专著的有章回小说和笔记体小说两方面的论著三本，综论文学理论的一本。其他只有戏曲方面的一些论文。

一、清代章回小说研究综述

前一章已经写到，俄罗斯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虽然早在19世纪初就开始，但是真正做到成规模的翻译，则晚至苏联时代的20世纪中叶。包括明清章回小说和传记、笔记等各种体裁形式，品种数目众多。有关明代作品的译介情况已在前章述及。本章将详述清代。

清代小说以长篇为主要形式。有的已翻译成俄文出版，除了《红楼梦》、《说岳全传》、《三侠五义》外，还有《镜花缘》、《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孽海花》也出了俄译本。清代其他的多数作品则尚未有俄译。但是俄国汉学家写的论文所涉及的作品，比已翻译的范围要广得多。

《隔帘花影》和《儒林外史》有华克生的两篇文章论及。前者为《中国文艺散文作品中的佛教思想——长篇小说〈隔帘花影〉的宗教思想问题》（载《中国：历史、文化和史学》文集，1977），后者是《吴敬梓和他的小说〈儒林外史〉》（小说俄译本前言，1959）。

《说岳全传》除有艾德林写的一篇俄译本前言，还有汉学家苏哈尔丘克写的一篇副博士学位论文《岳飞故事在13至18世纪初文学中的反映》以及她在1980—1982年发表的三篇论岳传的文章。

《镜花缘》的文章比较多，除了译者费什曼的后记，就是斯科罗包加托娃写的论文《李汝珍长篇小说〈镜花缘〉中对若干儒家教条的批判》（载《中

国的文学和文化》论集,1972)和《李汝珍长篇小说中的中国和其他民族》(载《远东文学研究理论问题》文集,1974)。

论《红楼梦》的文章最多。在俄译本 1958 年出版以前,波兹涅耶娃(Л. Д. Позднеева,1908—1974)为王力《中国语法纲要》一书俄译本写的前言里,已经详细论及《红楼梦》的内容和思想倾向,因为王力的语法例句多出自这部长篇小说。后来有林林写的副博士学位论文《曹雪芹小说〈红楼梦〉中的新人》(1972)以及她论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妇女形象和小说的象征意义等系列论文六篇(均发表于 20 世纪 70 年代)。李福清、孟列夫、庞英写过《石头记》版本的考证文章,分别发表于 60 和 70 年代。从林林的诘辩文章《梦于〈红楼梦〉的象征意义问题》(《莫斯科大学学报·东方学版》1972 年第 1 期)中得知,原来思乔夫写过一篇别出心裁的论文,专谈小说中人名和物名的象征意义。

思乔夫(Л. П. Сычёв,1911—　)的论文《曹雪芹小说〈红楼梦〉中物名和人名的传统象征意义》(《世界文学的启蒙主义时期问题》文集,1970)详细分析了小说里的服饰,并作了统计和对比。在曹雪芹的前 80 回中,提到服饰的地方有 160 次,在高鹗续写的后 40 回,提到服饰的地方仅 49 次。曹写明衣服的料子的有 64 次,高只有 13 次。曹形容衣料的颜色用了 28 种,高只用 17 种。如此看来,曹出身于江南织造监督之家,绝非偶然。思乔夫是从事中国服装史研究的,他的谈论当然是有根有据,还解说服装颜色的象征意义,如说红色不但代表欢乐,也象征凄惨,因为曹雪芹用了"血红"色。

二、费什曼的专著《启蒙时期的中国讽刺章回小说》

曾任列宁格勒大学教授、后为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研究员奥·列·费什曼(О. Л. Фишман,1919—1986)博士在 1966 年出版了专著《启蒙时期的中国讽刺章回小说》(Китайский сатир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 Эпох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费什曼在本书的开头提出了两方面的问题:

(1)中国 18 世纪至 19 世纪初的讽刺小说作家和他们的前辈相比有什么特点,中国讽刺小说批判现实的思想根源何在,它同 17 至 18 世纪的思潮有什么联系。

(2)中国在 17 至 18 世纪是否也存在欧洲历史上的"启蒙时期"。中

国的启蒙时期和欧洲是否相似，有什么特点。可否把中国18世纪的文学也看作是启蒙文学。

为了解答这两方面的问题，她把全书的构架放在宽阔的历史背景和广泛的文学资料基础上，使这部专著实际上写成了中国讽刺小说的发展史（17世纪至20世纪初）。专著特别安排了头两章即《17至19世纪初中国启蒙思想的发展》和《中国讽刺章回小说的前身和同时代的作品》。在第二章中，费什曼广泛地评析了《西游记》（吴承恩）和《西游补》（董说）、《钟馗捉鬼传》、《金瓶梅》、《红楼梦》、《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纪昀）等。她认为，中国小说体裁的演变过程是有规律可循的，先出现幻想小说（《西游记》），接着是生活爱情小说（《金瓶梅》），最后才是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而这个过程同作家的观念变化过程正好密切相关。当人把周围世界看作是有某种神秘力量支配时，只能创作幻想小说。稍晚时期，作家表现出对于人本身、对于人的生活和感受的关注，自然就出现写生活和爱情的小说。最后，不满现实和力图改变现实的愿望便促使作家去写讽刺小说。而这一切正说明是社会思潮，特别是启蒙运动思潮的影响。

第三、四章是专著的重点，分别分析了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和《镜花缘》。费什曼用比较的方法论述这些小说，认为唐宋话本可以归入世界“人道主义文学”的组成部分，唐传奇、宋话本、元杂剧都是歌颂人的幸福，关心个性的和谐发展或要求个性解放的，其思想要求与拉伯雷、薄伽丘、莎士比亚相近或相似。到了启蒙时期，“人道主义”思想已经具有新的特性，它提出的已经不是单个人的幸福，而是全社会的安宁。这样，只有在合理的社会政治制度下，人们才能普遍得到幸福。而吴敬梓、李汝珍同伏尔泰、卢梭的理想一样，正是追求这种“文明的国度”或“理想的共和国”。本书作者结合这两部小说分析了小说作家的理想及世界观，并说明小说所批判的社会弊病恰恰是作家们力图加以改变的不合理现实。

专著第五章以《中国和欧洲的启蒙运动》为题，也是本书立论的归结。作者全面肯定地回答了她在前言里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说，费什曼同意中国史学家侯外庐的观点，认为中国在17至18世纪也出现了启蒙运动。她就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和论述上述从《西游记》到《儒林外史》、《镜花缘》等一系列明清章回小说。这部专著在苏联引起了持续多年的热烈争论。也有不少赞同的，如谢曼诺夫也谈到东方，特别是中国有启蒙运动。后来，费什曼经过讨论改变了观点，放弃了原来的主张。

1980年，费什曼出版她的论著《17至18世纪的三位中国短篇小说作家：蒲松龄、纪昀、袁枚》，把苏联研究清代笔记和短篇小说的工作推向新的阶段。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有不少研究者，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早就翻译与研究并举，对该书作了许多认真的工作。接着有乌斯京写了副博士论文《蒲松龄及其短篇小说》(1966)。费什曼与他们不同，不仅是把小说作家作为单独研究的对象，而且是放到清代笔记小说的总背景或共同的历史潮流中来研究，作为三个著名短篇小说作家之一来考察。

三、谢曼诺夫的专著《中国章回小说的演变(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

莫斯科大学教授谢曼诺夫(В. И. Семанов，1933—　)于1970年发表博士论文《论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章回小说的演变》，对章回小说作了综合的分析与概括。

谢曼诺夫从研究鲁迅开始，为了对比鲁迅和前辈作家的异同，以找出鲁迅的继承和创新之处，便把研究对象逐步扩大到清末谴责小说，后来又致力于从18世纪至20世纪近两个世纪内的章回小说研究。作者多年努力，又到北京大学进修过，得到我国晚清文学专家阿英这样的前辈指导，终于在这个不但苏联人未曾触及，而且在中国研究者也很少触及的领域里，做出了可观的成就。

作者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搜集材料的过程，先是结合研究从事翻译，把清末小说中的重要作品刘鹗《老残游记》和曾朴《孽海花》译成俄文，分别于1958和1960年出版。又在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目》的基础上，广泛涉猎包括大量中文、日文和欧洲各种文字的参考文献和资料，补充注明了阿英书目中未经查明的若干俄国和西方文学著作的原作品名，写出介绍这类研究的书目文章和论文《19、20世纪之交外国文学在中国》，为写专著作了充分的准备。

他在1970年出版的《中国章回小说的演变》(Эволюц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романа：Конец XVIII——начало XX в.)这部专著具有开阔的视野，头两章《18、19世纪之交的中国章回小说》和《整个19世纪所特有的几种体裁以及政治小说的产生》，对章回小说这种体裁的发展作了全面的叙述。首先

谈到的是当时章回小说发展的特殊条件，客观方面是文字狱对著作的禁毁；主观方面是文学批评的发展，出现了报刊，章回小说得以在报章连载。小说的种类或数量日增，夏敬渠的《野叟曝言》、屠绅的《蟫史》这类“才藻小说”，李百川的《绿野仙踪》这样的讽刺幻想小说接踵而至。

作者分类评述各种章回小说的演变。讽刺幻想小说如李汝珍的《镜花缘》、张南中的《何典》，惊险小说如《施公案》、《荡寇志》、《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言情小说如《红楼梦》和陈森的《品花宝鉴》、韩子云的《海上花列传》，暴露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甚至政治小说竹溪一士的《雅观楼》（第一次写鸦片烟馆的小说）都作了评述。对《品花宝鉴》、《海上花列传》的论述尤为详细。这种分类有所依据，也有所改变，例如把习惯上的称谓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合并，称之为惊险小说。

暴露小说是本书论述的重点。谢曼诺夫用了整整两章分别论析当时最重要的作家吴沃尧和李宝嘉。在《“暴露小说”的创造者李宝嘉》一章中系统分析了作家的全部创作：《庚子国变弹词》、《官场现形记》、杂志《绣像小说》和小说《文明小史》、《活地狱》以及其他作品。他认为，《庚子国变弹词》的主要价值不在于艺术性，而在于用通俗易懂的形式表达了作家对社会政治现实大胆的看法。其中显示了作家的政治立场：同情义和团，对袁世凯和清廷持保留态度。《官场现形记》则集中表达作家对现实的愤慨，它的结构、人物形象和艺术手法都用来表达作家的这种感情。特别是用土话、洋话、古语和官场语言混杂使用，这也是小说用语的一大特点。关于《文明小史》和《活地狱》的深刻揭露和尖锐批判的作用，本专著也作了论述。

谢曼诺夫的结论是：“李宝嘉不仅是暴露小说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而且是中国的大作家之一。”他的讽刺力量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吴敬梓，也是鲁迅和老舍未曾达到的。《文明小史》中的一个主题在鲁迅的创作中就从未反映过，而老舍则在《赵子曰》、《二马》和《猫城记》中加以展开。此外，《活地狱》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未必有别的作品可以取代。不过谢曼诺夫也反对把李宝嘉称为“批判现实主义者”（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第4卷第295页，1959年版）。他认为李宝嘉这些19世纪末的作家只是为形成更为先进的文学思潮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准备了基础（第218页）。

在《吴沃尧的中、长篇小说》一章中，谢曼诺夫分析了吴的代表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及其续篇、暴露小说《瞎骗奇闻》、历史小说《痛史》、言

情小说《恨海》和《新石头记》、惊险小说《九命奇冤》。认为作家一方面揭露了帝国主义者及其帮凶,暴露社会不公正、官吏贪赃枉法等弊端,另一方面也表达中国人应该自强的看法,同时塑造了正面人物形象。

谢曼诺夫认为,"就讽刺的犀利、提出问题之重要而言,李宝嘉的成就较高。但就细腻的心理刻画和体裁的多样化来说,则吴沃尧更强。"如果同欧洲启蒙运动文学对比,"李宝嘉和吴沃尧在艺术上还没有欧洲的同行们成熟,不过总可以纳入'伏尔泰—果戈理'和'卢梭——屠格涅夫'这条线的"。谢曼诺夫的结论是:李宝嘉和吴沃尧"这两位作家相互补充,并一起同欧洲西方文学中的共同倾向相呼应。"(第295)这里的"共同倾向"即指启蒙文学,因为谢曼诺夫的观点是主张中国也同欧洲一样存在过启蒙运动时期和启蒙文学的。

四、《水浒传》、《红楼梦》、《镜花缘》、《儒林外史》、《三宝太监》、《普明宝卷》诸种明清小说译介简述

《水浒传》(Речные заводи)

由阿·罗高寿(1990—1981)于1955年译成俄文,科洛科洛夫编校,成两卷本(500+624页),莫斯科的文学出版社出版。同书1959年印行第二版。同书修订出版于1992年在里加印行,至2008年在莫斯科再印,最新印仍为两卷本(548—688页)。有俄译者罗高寿作的后记。

1968年在列宁格勒由儿童文学出版社出了一种缩改本,成一卷(319页),供少年儿童读者用,后由李西查和谢列布里亚科夫缩译的。

此外,还见过几种片断选译,有罗高寿选译并题解第20、21章,马马耶娃选译并题解第39章,均收入《中国文学选读》第一册第432—479页,莫斯科,1959年。北京外文出版社也出过史胡精选翻译成俄文的本子《野猪林》(106页,1960年)。

《水浒传》的研究文字有三类,一为书评。罗高寿的译本出现后,《永恒的列宁格勒》1955年4月7日发表简介《中国文学的名著》。《外国文学》1956年第12期发表书评《中国古典章回小说〈水浒〉》。二为研究论著。论者为庞英和李福清。

列宁格勒大学副教授庞英撰写系列论文6篇(发表于1969年至1974年),于1973年形成副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古典小说〈水浒〉的成本史》,论

及小说的体裁、结构、初版、成书的过程。基中引人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从语法特点和地名等方面提供补充的论据，以赞同郑振铎的观点，即认为征田虎和王庆的两回（第93和110回前半）是《水浒传》原本中没有的。而征辽情节（第83至89回）在最早的本子里就有。二是论及“忠义”原则，他认为“忠”反映儒家观念，而“义”则反映墨家思想。

李福清在其《对中国章回小说的传统评论》一文①（载《远在文学研究的理论问题》第100—104页，莫斯科，1970年）中也谈到《水浒传》。该文把从民间读物《大宋宣和遗事》到英雄史诗《水浒传》，进而章回小说《金瓶梅》的整个发展过程作了概述。论述《宣和遗事》的简略记述如何在《水浒传》里变成了生动具体的艺术描绘。并以武梅为例探讨由《水浒传》过渡到《金瓶梅词论》问题。

但据李福清查证，苏联第一位研究《水浒传》的人是王希礼（曹靖华早年的朋友），王在30年代曾作有《水浒传》里的儒家思想一文，未发表，手稿存于阿列克谢夫院士档案。②

第三类评论文字同1976年中国的“批水浒”运动有关，俄苏汉学家们也参与那场论争。计有热洛霍夫采夫、梅林诺夫、沃尔然宁和罗高寿等人写的5篇文章，均发表于1976年。如沃尔然宁的《古为今用——中国的批判〈水浒运动〉》（《外国文学》1976年第4期，第229—233页），热洛霍夫采夫与罗高寿合作《中国的评〈水浒〉运动》（《从亚非人民》1976年第1期第80—91页）。

《红楼梦》（Сон в красном тереме）

俄文首次全译本为两卷本（874页+862页），帕纳秀克译，费德林序，书中诗词为孟列夫译，1958年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1995年再版成三卷本。

《红楼梦》的珍贵手抄本之一（书名《石头记》），在清道光十二年（1832）由俄国来华的留学生帕维尔·库尔梁采夫从中国带至俄国，全书共35册。书中附有批语300多条，极有研究价值。此抄本久藏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已由中华书局影印分成六册于1986年出版。

研究文著有：林林《论〈红楼梦〉中两位女性肖像》（硕士学位论文，1974）。孟列夫、李福清《前所未闻的〈红楼梦〉抄本》（1964）。李福清、鲍

①、②李福清《中国古典文学在苏联（小说、戏曲）》，第31—32页。

格拉德《俄罗斯汉学家德明,其中国之行与〈红楼梦〉选译》(1983)。谢曼诺夫《中国章回小说的演变》(1970)。列·思乔夫加维·思乔夫《曹雪芹〈红楼梦〉中的服饰》(1975)。以及李福清的中文论文《红楼梦年画在苏联》(1986)等。

俄苏对《红楼梦》一向比较注意,早在1843年俄国一家重要杂志《祖国纪事》(第26期)就刊载了由柯万科译的《红楼梦》第一回。瓦西里耶夫院士写的《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一书在评述中国长篇小说时也把《红楼梦》放在首位。

俄国为搜藏《红楼梦》的版本曾费尽心力,目前在苏联图书馆中就保存有60多种刻本的《红楼梦》及其续集。其中"列宁格勒亚洲图书馆藏抄本《石头记》"是连中国也没有的孤本,它在1964年被发现,为我国已知的《红楼梦》12种抄本之外,增添了第13种抄本。

苏联写过评《红楼梦》文章的人不少,主要有三个人。最早的一位是莫斯科大学教授波兹涅耶娃(1908—1974)。她于1954年为王力的《中国语法纲要》的俄译本写了序文。由于这本文法书里许多例句都是引自《红楼梦》,她的序文便题为《论红楼梦》。以便帮助读者既能理解文法书,也可以了解小说的内容。这篇长达15页的序文中涉及小说的成书过程、作品内容、人物形象和思想倾向等方面,是第一篇向俄文读者全面详细地介绍《红楼梦》的文章(译文见《人民文学》)。

后来有莫斯科大学副教授林林(1924—　)作为专门课题进行研究,她是林伯渠同志的女儿,1959年毕业于苏联作协的高尔基文学院,1972年以论文《红楼梦中的新人研究》获副博士学位。此外她在70年代还发表过论《红楼梦》的文章八篇。《贾宝玉:中国启蒙主义小说〈红楼梦〉中的正面人物》一文(1970)认为宝玉对内心自由的追求与父亲宗法道德观处处发生冲突,曹雪芹在宣扬"童心"这一点上和卢梭的思想是相通的。《红楼梦中的"芙蓉女儿诔"》一文(1972)指出,宝玉祭丫环晴雯这篇诔文,正是其内心世界的披露,它不是献给达官贵人,而是悼念一个身份低微的女奴,是对传统的冒犯,这一点表明曹雪芹思想有启蒙主义的性质。在《论红楼梦中的两个妇女形象》一文(1974)中,林林分析宝、黛两个女主人公,指出宝钗深受儒家道德观念的熏陶而不能理解黛玉的孤高自许,但也不能把宝钗全盘否定。

另一位研究者是庞英(中国籍,长期留居苏联),他近年来对所发现的列

宁格勒抄本进行专门的研究，用它和其他版本互相勘比，准备以它为底本，印出一个加评注的本子。至1981年他已发表系列文章七篇。在《文学传统对红楼梦的影响若干例》(1979)一文中，他对看了《金瓶梅》和《红楼梦》两书的内容，指出后者从前者借取了若干文字。此外，李福清和孟列夫对苏联的藏抄本也作了分析。思乔夫对小说中的服饰进行的分析也颇有特色。

《镜花缘》(Цветы в зеркале)

李汝珍的《镜花缘》由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汉学家维尔古斯(1922—1980)、蒙泽勒(1900—1959)、费什曼(1919—1986)、齐别罗维奇(女1918—2000)译成俄文，费什曼作序，由文学典籍出版社于1959年出版，787页。费什曼在序文《李汝珍及其小说〈镜花缘〉》中称小说为"融各类小说的特征于一身的作品"，即包括"幻想小说、历史小说、讽刺小说、旅行小说等各类小说的特征"。该译本1998年在里加再版。

此前有《镜花缘》选，维尔古斯译，马马耶娃作引言，载《中国文学选读》第1册第684—701页，莫斯科，1959年。

研究文著有斯科罗包加托娃(著文5篇)等人创作论文10篇。如波兹涅耶娃、斯科罗包加托娃《李汝珍的乌托邦章回小说》(载《近代东方文学》教科书第510—527页)。谢曼诺夫《老作家在新环境》(载《中国文学与文化》第269—281页，莫斯科，1972年)，斯科罗包加托娃《李汝珍〈镜花缘〉中的中国与其他各国人民》(载《远东文学研究的理论问题》第139—145页，莫斯科，1977年)。

斯科罗包加托娃以研究《镜花缘》的专题获副博士学位，她写过《镜花缘对若干儒家教条的批判》(1959)等系列文章，论述小说反对死读经书、批判"孝道"、否定"女诫"等内容以及它对海外异邦的描写。其中有一篇文章把李汝珍(1763—1830)《镜花缘》同英国作家斯威夫特(1667—1745)的讽刺小说《格列佛游记》(1726)作了对比。

《儒林外史》(Неофи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конфуцианцев)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由莫斯科大学副教授沃斯科列辛斯基(华克生，1926—　)译成俄文，于1959年由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全书631页，有译者序。

该书1999年再版。此前有几种选译：伊文译《儒林外史》选段(第1—8章)，载《青年近卫军》1929年第18、19、20、21期。《范进中举》(小说第3章)载俄文杂志《人民中国》1955年第3期，无译者名。《儒林外史》选译

(第3、24章),沃斯科列辛斯基译,何其芳序,载《中国文学选读》(第629—655页),莫斯科,1959年。

论该小说的文著迄今已发表近20种,如沃斯科列辛斯基的文章《吴敬梓及其小说〈儒林外史〉》(副博士学位论文,1962)、《中世纪中国的文学世界:中国白话古典小说》,均见沃氏《文集》(第589—603页,2006年)。

《西游记》(Путешествие на запад)

全译本成四卷(456页+447页+487页+584页),罗高寿译,其中诗词为科洛科洛夫译,1959年出版。该书1994年在里加再版,孟列夫序。1982年由沃斯科列辛斯基把该译本缩编成一卷本(750页),改书名为《孙悟空——美猴王》出版。书中诗词为斯米尔诺夫和施泰因别尔格等译。

此前曾有《西游记》选(第18回),詹明森、穆库耶夫合译,载《中国文学选读》第1册第540—552页,莫斯科,1959年。

研究文著有罗高寿、齐赫文、李谢维奇、尼科里斯卡娅、阿赫麦特申等作15种。如罗高寿专著《吴承恩及其小说〈西游记〉》(1984年);尼科里斯卡娅文章《吴承恩小说〈西游记〉中的佛教题材》(载《佛教语文学问题》第114—123页,新西伯利亚,1984年)。费什曼专著《中国讽刺章回小说》(第71—106页,莫斯科,1966年)。

《三国演义》(Троецарствие)

迄今有三种俄文全译本:1. 两卷本(785页+792页),帕纳秀克译并注释,科洛科洛夫编校,莫斯科,1954年。2. 同前书,帕纳秀克译,李福清序并注释,莫斯科,1984年。3. 同前书,孟列夫序,里加,1997年。

学术研究文著主要有李福清专著《中国的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论〈三国演义〉的口头和书面异体)》,1970年,及其论文《中国历史演义中的文体问题》(1978)、《中世纪中国讲史演义形象体系的分析原则》(1983)、《中国章回小说理论:毛宗岗的〈三国〉评点规则》(2004)、《三国演义的16—17世纪图释》(2006)。还有李福清中文出版的专著《关公传说与三国演义》,台北,1997及1999年两种;和论文《三国故事与民间叙事诗》(载《古典小说与传说》第1—61页,中华书局2003年)。

《三宝太监》(Роман Ло Маодэна < ПЛаванне Чжэн Хэ по Индийскому океану >)

尼·叶·鲍列夫斯卡娅(1940—　)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现在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工作。1970年即以《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一文

获博士学位，从1966至1976年共发表论该小说的文章11篇，广泛涉及小说的题材、素材、艺术特点、反映现实的程度以及作者的哲学、宗教观点等问题。

鲍列夫斯卡娅研究方法的特点是比较研究。她大量引证欧洲文学中描写远洋航行和反映地理发现时代的小说来同《西洋记》作对比分析。如《〈鲁西亚德〉和〈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的比较分析》(1969)就是用葡萄牙诗人卡蒙恩斯的著名长诗同中国描写郑和下西洋的这篇长篇小说作比较。从文中可以看到世界各地区互相接触、开始往来时期在欧亚文学中有何反映和特点。她指出，随着描写旅行长篇小说的出现，文学作品也增加了海港、码头、船坞等场景以及边远民族的生活和异域的风情。

鲍列夫斯卡娅认为，小说作者脱离史实去写作，正是他进行艺术构思的长处。她还把小说同16世纪流行过的传说故事对比，发现作者已经给远航故事增添了新意。以往的故事中将帅总是主角，而在这部小说中将帅们显得滑稽可笑，水手等普通人则成了英雄，是新的主角。

鲍列夫斯卡娅在研究"16—17世纪中国章回小说里的喜剧因素"时，除了以郑和下西洋的小说为例，同时也涉及《封神演义》。

《普明宝卷》(Баоцзюань о Пу-мине)

斯徒洛娃译，两卷本(366页+393页)，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斯徒洛娃专门研究宝卷，发表过一系列论文，并完成编辑《普明宝卷》影印版的工作。这个俄译本是宝卷第一次译为外国文字。斯徒洛娃在这个译本的《前言》中论证《普明宝卷》出于黄天教派，并根据作品内容勾勒出这个教派的思想体系，指出它是释、道两家思想的揉杂。斯徒洛娃发现宝卷的结构有一个统一的格式：散文——诗——词——曲。她考察其格式、韵律、常用韵脚，并且制成表格。斯徒洛娃对于宝卷中某些韵脚问题以及民歌对曲的影响都有所论述。

苏联汉学家斯图洛娃(1934—1993)，曾在我国北京大学学习，一直从事于宝卷的研究，曾以编译《普明宝卷》一书而获副博士学位。

斯图洛娃指出：明代宝卷的内容十分丰富，可惜流传下来的明代宝卷大多残缺不全，而《金瓶梅》这部长篇小说，却能给出有关中国文学的丰富材料。在书中有十多处讲到宣卷的故事，特别是第七十四回，还有一篇有头有尾的《黄氏女宝卷》，都是研究和了解宝卷的珍贵资料。她指出，明朝是中国说唱文学的一种形式——宝卷的形成和流传时期，宣卷要求用不同

的声调和专门的形式分别讲述和演唱，所以宣卷是一门复杂的艺术，要求宣卷的人有熟练的技巧和耐性。通过《金瓶梅》的叙述可以对宣卷的情景有所了解。如在什么场合和由谁来宣卷以及如何宣卷的，斯徒洛娃指出：对于囿于家园而平时不能外出的妇人们说来，听尼僧来宣卷首先便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娱乐方式，使妇女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姿。所以吴月娘等人总是盼望着尼僧前来宣卷。然而，“听宣卷也有相当大的思想负担，因为尼僧极力向听卷的人宣传和暗示修好来世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因此，必须自我完善，并相信行善定有好报的说法。”

五、费什曼论清代笔记小说的专著《17 至 18 世纪的三位中国短篇小说作家：蒲松龄、纪昀、袁枚》

1980 年，费什曼出版她的论著《17 至 18 世纪的三位中国短篇小说作家：蒲松龄、纪昀、袁枚》（Три китайских новеллиста XVII—XVIII вв.：Пу Сунлин，Цзи Юнь，Юань Мэй），把苏联研究清代笔记和短篇小说的工作推向新的阶段。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有不少研究者，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早就翻译与研究并举，对该书作了许多认真的工作（详见本书第三章）。接着有乌斯金写了副博士论文《蒲松龄及其短篇小说》（1966）。费什曼与他们不同，不仅是把小说作家作为单独研究的对象，而且是放到清代笔记小说的总背景或共同的历史潮流中来研究，作为三个著名短篇小说作家之一来对比考察。

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是费什曼翻译，1974 年出版的。她结合翻译，认真考察了笔记小说从早期笔记发展到以寓教诫、谈鬼神为特点的纪昀笔记小说的过程。

1977 年出版的袁枚作品《新齐谐》（《子不语》）俄译本也是费什曼的译作。她进一步研究袁枚描写民间流传的迷信故事，找出袁枚的写法与纪昀有什么异同。前者藉超自然力量所显示的奇迹以讽喻世人，后者用鬼神故事以劝戒现实。

作者在专著中用前三章分别论述了三位短篇小说作家，第四章便综合谈论三本小说的共同点和独特性。她用统计分析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为此设计了分类表，按作品的主人公类型、主题方向、人物品行优劣以及人鬼神

的行为来分类。尤其是书中所附的综合对照表,对于蒲松龄、纪昀、袁枚三人作品中的故事和人物类型,一一摆到表中来对照,就很容易看出其共同点和特殊性(第379—421页)。这份详尽的表格也反映了苏联汉学家研究方法的一个新趋势:有些人正在力求更新方法,以促使研究工作改变局面。费什曼的尝试正是突出的例子。

六、俄国蒲松龄研究巡礼

俄罗斯对中国作家蒲松龄的译介和研究开展得早,持续时间长,成果丰硕。自1878年发表《聊斋志异》的第一篇译作以来,已出版的有蒲氏作品俄译29种,论述蒲氏的文著22种,体现了三代俄国汉学家的辛勤劳作。每一代都产生了著名的蒲研学人。蒲研成绩在俄国汉学史上可谓蔚为壮观。①

(一)俄国蒲研的开拓者瓦西里耶夫

俄国汉学研究的特点是起点比较高,从一开始就注重对中国文学的整体把握,而不是局限于对某一作家或某部作品的兴趣和深钻。这个特点应该说是由俄国第一位以汉学研究成名的科学院院士王西里开创的。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写出中国文学史史书(1880)的人。

"王西里"系这位院士自取的汉名,俄名为瓦·巴·瓦西里耶夫(1818—1900),1837年毕业于俄国汉学的摇篮喀山大学,1840年即随东正教传教士团来华,在北京居留十年,学通汉、满、蒙、藏语,兼懂日、朝、突厥语和梵文。回国后被喀山大学聘为汉、满文教授,立即为他的母校增添了光彩。

王西里从1851年起在喀山大学首创开设中国文学课程,据说他不但在俄国,而且就整个欧洲,都属于第一位系统讲授中国文学的人。他后来转入彼得堡大学,前后在两校执教共计50年,培养了大批门生。王西里在中国文学的研究和教学方面曾编出了两本教材:《中国文学史纲要》和《中国文学史资料》。此外,还有《汉语文选》三卷本。这些配套的读物都出版在20世纪60至80年代。它既叙述了中国文学的历史脉络,又提供了各

① 参阅李明滨、李淑卿《俄国蒲松龄研究巡礼》,载《蒲松龄研究》2000年第3—4期("纪念蒲松龄诞辰360周年专号")第447—457页。

有关作品的实例，可谓宏观的考察与微观的接触相结合，连他的科学方法都为后人所师承。

第一个翻译《聊斋》的人不是王西里，而是尼·莫纳斯特廖夫，后者译自《聊斋》的《水莽草》，登于《新作》杂志 1878 年第 195 号，但王西里却为蒲研作了奠基的工作。其作用是向俄国学人阐明《聊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定位。王氏在文学史里把中国文学按“美文学”的诗文、戏曲和小说三类进行撰述。小说还分出中短篇和长篇两类，凡属重要的作品都有所评述。如归类列出《列仙传》、《搜神记》、《太平广记》、《聊斋志异》等，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加以罗列，但已经强调了其重要性。他同时在《汉语文选》里译载了《阿宝》、《庚娘》和《毛狐》三篇，加了详细注文，收入《文选》第一卷（第 71—90 页），于 1883 年出版。

王氏运用这些教材，年复一年地分析讲述，自然给学生以基础的知识和对于中国文学的兴趣，包括《聊斋志异》。后来在其门生中译介蒲氏作品者不乏其人。从 20 世纪 90 年代至本世纪 30 年代，就出现过阿·斯米尔诺夫、阿·伊凡诺夫、伊·巴兰诺夫、弗·德科、巴·什库尔舍、瓦·阿列克谢耶夫、弗·丹尼连科、鲍·瓦西里耶夫、鲍·帕斯托夫斯基等人，他们先后选择自《聊斋志异》中的故事共约 80 篇，包括《婴宁》、《小翠》、《狐仙》、《赵城虎》、《胡四娘》等，分别发表在《亚州通报》、《东方》、《苏联科学院学报》等有影响的俄国苏联报刊上。其中最有成就的是 1902 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的阿列克谢耶夫，即后来的科学院院士阿翰林。

（二）《聊斋志异》的翻译和研究者阿列克谢耶夫

阿翰林全名为瓦·米·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他有幸成为瓦里耶夫的学生，聆听过后者的教导。大学毕业后曾来华进修过，以论《二十四诗品》的著作成名，并且成为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前驱。他的成就自然主要在学术研究方面，但也重视从事文学翻译。尤因其古文功底深厚，诗词歌赋，小说散文方面均有译作。而且学术眼光高远，大半个世纪前，即在苏联早期百废待举的时候，就已向同仁呼吁：瑰丽宏大、卷帙浩繁的中国文学尚未被俄国读者所了解，当务之急是大量翻译出版中国文学名著。阿氏成了高尔基组织外国文学名著翻译工程里中国文学部分的负责人，并且身体力行，自己开始翻译《聊斋志异》。

1922 年出版了他选择自《聊斋》的头一本集子《狐媚集》，共 158 页。

作为“世界文学丛书”之一，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前言中，他概括了聊斋故事人物中的几种基本类型，如狐仙、书生等，并评述了作品的文学风格。他就便介绍了蒲松龄的学识渊博和艺术风格的特点。

1923 年接着出版他的第二个译本（选集）《僧术集》，273 页。同前一本一样也为“世界文学丛书”，由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前言里他又论析了另一种类型的人物：和尚与道士。译者提出了一个问题：蒲松龄是否相信自己笔下描写的奇迹呢？接着从作者的儒家世界观出发来作答，其结论是否定的。他同时指出作品的艺术风格和文学手法：用根本听不懂的文言来表现民间故事、日常生活题材以及人物之间的对话，“把幻想与现实的冲突激化到异常尖锐的程度”，“把民间的迷信传说改写成典型清新的文章”，展示了人物的“情欲同戒律、理智发生冲突时的心理状态”，还有对“对懦夫的谴责和对英雄的赞美”。

后来，1978 年再次发表于《中国文学》的这篇前言之异文中，阿氏谈到作者对僧道这类人物形象的态度。认为蒲氏写出有身怀异术的僧人和道士存在、恰巧是为了解答“世上有无公道”的问题。僧道的法术使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其种种幻想都变成了实际行动。否则，岂不让这些人物都湮没在暗无天日、是非不分的尘世生活里了。

后来，在 1928 年由列宁格勒的“思想”出版社出版的阿氏所译的故事是另一种选本，曰《怪异故事集》，共 256 页。不过，除有前言外，还加了详细的注解。

1937 年出版的《异人集》已是阿氏翻译的《聊斋》第四个集子了，共 494 页，除有前言，也加了注解。由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同时印制。此时的阿氏离当选院士的年代（1929）已将近八年，虽然学术研究业务更繁忙了，但对翻译工作依然执着，尤其对《聊斋》。

阿翰林翻译的《聊斋》故事一共有 150 篇。他对译文总是反复推敲，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这是他的一个突出特点。他的晚辈学人当代俄国汉学家李福清曾满怀激情地说：“俄国读者能够欣赏到短篇巨匠蒲松龄的作品，主要应当感谢阿列克谢耶夫的精彩译文”。[①]

阿氏对译作求精的态度，已故的北京大学俄文系教授、我的恩师曹靖华先生曾经有过很好的见证。他说，当年在列宁格勒任教的时候，曾应阿

① 李福清《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小说、戏曲）》，第 51 页。

翰林之约请，为后者及其同仁的译作校阅，任务是“专门挑错”（不必改正，只要挑出错来，让译者自己去改。据阿氏说这样做才有益于译者学业上的前进）。曹先生仔细审校阿氏的译文，结果非常满意。有他当年写给后者的信为证：

阿先生有道：

……

关于校《聊斋》事，已将《画壁》一篇校完，只校出一个小错，实际上说来，与其说是错，毋宁说是对的。在译本第十四页第三段第三行第二字，先生将“有人暗牵其裾”的“裾”字，译作 Рукав”（按“衣袖”之意）。按“裾”即“襟”意，是上衣的一部分；有前襟后襟之分，前襟又分大襟小襟，或左襟，右襟。旧时在重男轻女之际，男左女右，在衣襟上也有分别。其两襟在胸前正对者，如马褂等，谓之对襟。

先生将“襟”译作“袖”者，想系“襟”之一字在俄文字习惯中不常用，故译为“袖”，使读者印象更加深刻，若果如此，则先生之主张不但不错，而且是十分对的！

先生对原文之忠实，译文之风雅，实令人不胜钦佩！

译书是似易而实难的一件事，第一要“信”，第二要“达”，第三要“雅”。平常能做到的第一二种功夫已属难能可贵，而在先生译文中这三层难关均迎刃而破，更是在翻译界仅见的了。

……

曹靖华敬上①

一九三〇年元月三日

从信中可以看到中俄两位前辈学者都有极其严谨的学风，令人感佩。而阿氏那种请人“专门挑错”的做法，也是世界译坛少见的美事，使人折服。

阿翰林的《聊斋》译本在俄文界已奉为圭臬。身后由其门生一再主持重版，在不同年代出了许多版本。举如：

五六十年代有：

① 《曹靖华书信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 297 页。

1. 费德林编辑、写跋的《异人集》,国家文学出版社,1954 年,第 284 页。

2. 费德林编辑、写跋的《狐媚·怪异故事》,国家文学出版社,1955 年,第 296 页。

3. 费德林编辑、写跋的《僧术·异人集》,国家文学出版社,1957 年,第 563 页。

七八十年代有:

4. 艾德林编辑整理的《狐媚·聊斋趣谭故事》,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70 年,第 383 页。

5. 艾德林编辑、整理并作序:《聊斋趣谭故事》,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73 年,第 573 页。

6. 艾德林编辑、整理并作序:《聊斋怪异谭》,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第 430 页。

以上六种版本均冠有"阿列克谢耶夫译",后三种除注明阿氏译之外,并注明系阿氏"译、注并序"。而费德林(1912—2002)和艾德林(1909—1985)不但是阿氏的门生,而且本人已是当代的俄苏汉学名家了。

阿翰林学术工作的另一个特点是翻译与研究并重,两者紧密结合。他生前出版的四本《聊斋》选译集均有学术性强的序言,每篇序言着重讨论一两个学术问题,而且都谈到作品的风格和文体特点。此外,阿氏还在 1934 年发表两篇专门的文章:《小说〈聊斋〉中儒生个性与士大夫意识的悲剧》(载《苏联科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34 年,第 6 期)和《中国汉文学通俗化史谈(论小说《聊斋》)》(载《纪念鄂登堡学术与社会活动 50 年文集》,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34 年)。

这两篇文章的论点,据俄国汉学家李福清的转述:[①]

第一篇论文介绍蒲松龄从事创作的时代背景。作者强调说:"蒲松龄写小说的时候,处于这样的环境:自由思想横遭压制,怀有民族感情的不平之士任何一句影射时政的言论,都可以定为死罪(第 301 页)。"他认为蒲氏的幻想作品立意都在宣扬德行,抨击邪恶。这些短篇小说也反映出蒲松龄本人儒生个性的悲剧。他缺乏"以儒家的不调和的语言谈论现实的勇气(不过孔夫子本人也难免如此),而只能违背儒家的观念和信仰,借助于一些荒诞不经的事物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和信念"。(第 307 页)

① 李福清《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小说、戏曲)》第 53 页。

第二篇文章中，阿翰林“讨论为使语言深奥的《聊斋》小说能被不懂文言的中国读者接受而采取的各种办法：加注释、译成白话、改编成曲艺。他认为最后一法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听众需要的，是把蒲松龄作品通俗化的最好途径（阿列克谢耶夫当时手头没有评书的本子，他依据的是1918年上海印制的《聊斋志异说唱鼓词》）”。而阿氏作此文时为1934年。

阿翰林学术活动的再一个特点是研究与教学相结合，两者相辅相成。他从1910年起在圣彼得堡（大学），间或也在莫斯科执教，前后共教三四十年，培养了不少门生，并且以独树一帜的汉学研究风格形成了“阿列克谢耶夫学派”。他的这一特点也在《聊斋》研究上打下烙印。其表现之一便是阿氏长时间使用《聊斋》为教材。阿氏虽然也理解《聊斋》用文言文写成的深奥难懂，但由翻译而精通它，又感到它是学古文的好教材。尤因蒲松龄善于运用古代的文学语言，同时大量吸收当时的方言俗语，二者互相熔化，形成了既典雅工丽又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尤其在人物的用语中雅中有俗，俗中见雅，两相结合，生动活泼，谐谑有趣。因而引得阿氏对此情有独钟，竟至也让学生学它的口语了。但阿氏对该作品过于执着，竟不明白“过犹不及”的道理，靠它来培养学生是万万达不到理想的。曹靖华先生对阿氏的这点偏向是很了解的。由此指出了阿氏闹成的笑话：

20年代中期，当着国民革命军实行北伐的时候，阿氏的学生王希礼来到中国，与曹靖华同为北伐军苏联军事顾问团的翻译（两人后来成了好朋友）。初次见面时曹对这位新来的俄国汉学青年讲的汉语大为惊愕。王氏的口语实在不敢恭维。难怪后来曹先生深有感慨地回忆说：“王氏《聊斋》体的汉语弄得人啼笑皆非。其原因是导师阿翰林宣称：‘谁要研究中国文学，就看《聊斋》好了’。”曹先生还风趣地说：阿翰林“把学生统统关在密不透风的‘聊斋’里”，以致他自己和他的学生同中国人讲话时，满口都是“聊斋”式的口语。[①] 阿翰林由钟爱《聊斋》到过份偏爱，以致弄巧成拙。他这事让人看来既可笑，又觉得可爱。

关于阿氏的口语，我国学者郭沫若也有过大体相同的印象。1945年郭沫若应邀访苏时认识阿氏。“这位苏联翰林的魁梧身材，朴素衣着，以及那光头和手中丁字形的大手杖，都给初见到他的郭沫若留下很深的印象。尤其是他的一口文言，更让中国客人惊讶。这位苏联翰林问候健康时，说

① 参见彭龄《而今百龄正童年——记曹靖华》，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126—127页。

'无恙乎?'谈学术时,问'见解有变乎?'之乎者也不离口"。①

但是郭沫若还是很尊敬他的学识,由于当时我国尚无"科学院院士"这样确切的翻译,郭说那就相当于我们中国过去翰林院的翰林吧,于是迳称对方为"阿翰林",以示敬重。对方也欣然接受,从此苏联汉学界传开了这个称呼,以它作为对"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尊称。

(三)蒲松龄创作的系统讲授者乌斯京

俄国蒲松龄研究到乌斯京这一代实现了飞跃,定型为一门学问。其标志是进入大学课堂和教科书,稳稳地占有一席之地,从此年复一年地讲授、传播,培养出一批又一批能够译研蒲松龄的学生,为日后不断成长出新的蒲研学人准备条件,使得蒲研后继有人。

一般说来,一个专门的学科或者学问趋向成型要具备三方面的条件:出现知识渊博的专家、推出坚实的研究成果和有成形的教材教法可出人才的高校。经过三代汉学家的努力和积累,至乌斯京60年代通过专题学位论文和70年编出专题教材,俄国蒲研学终于完成。

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副教授彼·马·乌斯京(П. М. Устин,1925—)是俄苏第一位以专门研究蒲松龄而获得副博士学位(相当于我国学制中的博士)的人。他1952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经过14年的研究和写作,于1966年5月以《蒲松龄的小说》(共317页,于1965年由莫斯科大学印刷出版)的论文通过答辩,获得文学副博士学位。

乌斯京是继阿翰林之后的又一位蒲研专家,从50年代起根据我国1955年初次公布的《聊斋》稿本开始蒲松龄的系统研究,着重比较分析稿本与刊本的异文,论析此前未曾发表过的篇目部分。他从两个方面阐释其论点,一是小说《聊斋志异》的情节来源,发现其情节来自干宝的《搜神记》、唐人的传奇和后来的话本;二是找出蒲松龄在艺术上的创新。50年代正值苏联在恢复"比较文学研究"的声誉,用比较的方法探索题材和情节的来源,考察它们被借用、移植后的变异以及推陈出新,诸种做法蔚为风气,作者无异受到影响,采用了来放诸蒲松龄的创作上,其写法和所得的结论立刻显出新意而为学界所肯定。

乌氏还有一点带上时代的痕迹,即与50年代恰逢"解冻文学"思潮盛

---

① 转引自高莽《汉学之林》,《妈妈的手》,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第178页。

行，他也着重论析了蒲氏作品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民主思想，尤其同情下层人物和妇女，并以种种有关的人物形象给予体现。这无疑能使蒲氏凭藉时代的潮流获得更大范围的认同，享有更高的声誉而广为传播。

此外，论文还涉及小说的文体和艺术风格、中国学界的有关争论等，后来，该文经过修订，又于1981年出版为专著《蒲松龄及其小说》（莫斯科大学出版社）。

作为蒲研学者，乌斯京还有一系列的论文发表，重要的如《蒲松龄小说中的政治讽刺》（1960）、（蒲松龄小说中引诗的若干特点》（1974）、《蒲松龄和他的启蒙主义观念》（1970）。

作为蒲研学者，乌斯京也从事翻译。他于1961年与法因加尔合译出版了一本《蒲松龄小说集》（共383页，国家文学出版社），由他自己加注释和写序。

更要紧的是他从1960年起长期在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任教，讲授中国语言和文学课程，为该校编著的教科书撰写了《蒲松龄》专章（约2万字），对《聊斋志异》及其作者作了全面系统、深入浅出的概括，是俄文书籍中迄今最为系统又是最基本的评论，可以让读者对这位中国作家的创作有一个简要精到的把握（限于篇幅，本文暂不转述其内容，等在以后另做翻译发表）。

莫斯科大学为东方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开设一门必修课《东方文学》，并经教育部审定批准出版一套相应的教科书，共三卷约130万字。涵盖了东方各主要国家和地区自古迄今的文学，具有文学史书的性质，但又是重点突出著名的作家，为他们设立专章作深入集中的论述，并辅以原作品课外阅读。全书中设立如下分部：阿拉伯文学、土耳其文学、伊朗文学、印度文学、印地安文学、乌尔都文学、印度支那文学、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

中国文学部分各个时期除了作文学概貌的叙述，均设立重点作家专章。例如在清代这一时期（近代）选立专章的有李渔、洪升与孔尚任、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李汝珍七人。

该教科书自20世纪60年代初编成出版以来，一直沿用，不但对汉语文专业，而且对整个东方学专业的学生都有莫大的益处。蒲松龄自然也与一系列东方的名作家一起为学生所熟知。

也有别的汉学家写过评蒲的文章，包括前面已经提到的名家阿翰林、费德林、艾德林和李福清，但是他们仅为“兼作”，而专于蒲松龄研究的唯

有乌斯京一人。他集翻译、研究和教学工作于一身，从而获得了突出的成就。

此外，对《聊斋志异》下功夫较多的还有已故的列宁格勒汉学家奥·费什曼（O. Fishman，1919—1986），其著作《17—18 世纪三位中国短篇小说作家：蒲松龄、纪昀、袁枚》（1980）。作者把《聊斋志异》也归入笔记小说，认为纪昀和袁枚是蒲松龄的后继者，都同样在这个领域进行创作实践。作者分析了蒲氏的世界观，认为有反清的思想和儒道观念，说："蒲松龄世界观的基础是儒家思想，但不是取其陈腐的教条，而是其旨在教育人、发掘人善良本性的道德教诲。"作者又认为，《聊斋》的各个部分，或以统一的主题，或以相似的情节结构，互相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作者对小说的艺术风格和语言特点也有独到的分析，比如语汇的用法（包括古文与俚语的结合运用）。于此也显出这位论文作者具有比较雄厚的古汉语功力。

当然，历数评蒲的学人中，还应当举出第一篇论析蒲氏小说的作者伊尔库茨克大学的青年教师帕什科夫（论文题为《〈聊斋志异〉目录学试析》，1921），还有列宁格勒大学的教师索科洛娃（论文题为《薄松龄小说中"奇事"的美学》，1974 和《蒲松龄小说中艺术形象的特点》，1976 等）。有许多人是在别的论析中国古典文学专著中连代涉及《聊斋》的（如司马文、华克生），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蒲松龄被介绍到俄罗斯，少说也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了。他的作品至今还为人们所珍惜。不但俄译本，而且是中文的原版本，如果你到过俄罗斯，看到科学院的汉学史料中心——中国学图书馆里，保存着那么多的《聊斋》各种版本，从刻本《聊斋志异新评》（王士正评，广顺但明伦新评），到《绘图新编聊斋志异说唱鼓词》，甚至我国学者阿英编的《晚清戏曲小说目》中都没有提到的《绘图新刊新聊斋》（光绪二十三年出版），你会感到惊讶。但作为中国人，亲自看到中国作家在友邦俄国受到如此细心的爱护，你更感到欣慰。

七、清代戏曲的译研

清代戏曲文学作品，无论翻译还是研究都比较薄弱。著名剧作《长生殿》和《桃花扇》也同《牡丹亭》一样，迄今只出了翻译的片断。研究文字也少，比较集中撰写这方面文章的，只有马里诺夫斯卡娅和古谢娃值得

一提。

马里诺夫斯卡娅在写了一系列评述明代戏曲文章之后，也有两篇评介清初戏曲的论文。一篇是《17 世纪下半期的中国杂剧》(《远东文学研究的理论问题》文集，1970)。它按历史题材和爱情题材等分类综述了当时的杂剧创作。另一篇《17 世纪中国杂剧》(《中国的文学与文化》文集，1972)则论述了清初 13 种杂剧的形式和内容。

但是她的文章中，更重要的还是副博士论文《中国戏曲家洪昇及其〈长生殿〉》(1970)，同时，还有系列论文《论〈长生殿〉的创作意图》(1959)、《洪昇及其时代》(1966)、《论洪昇〈长生殿〉的形式兼论它的若干艺术特点》(1969)。这些论文对洪昇创作中的题材、人物形象、体裁和风格都作了评论。她肯定《长生殿》的优点之一是表现生死不渝的爱情，说把杨贵妃作为正面形象来写，颂扬她为爱情、为唐明皇免于难而情愿献身，这就是对中国传统的责难“女人是祸”的观念作批判。因而不能不看到洪昇创作的新意。她还认为《长生殿》的艺术方法已接近于现实主义。主要成分是现实主义，也杂糅了幻想的，包括神仙幻想等成分。

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的古谢娃重点研究孔尚任的《桃花扇》。她写了一系列论文，如《孔尚任〈桃花扇〉凡例》(1970)、《孔尚任〈桃花扇〉中的主要人物》(1972)、《孔尚任〈桃花扇〉的命运》(1974)和《孔尚任〈桃花扇〉中的民间传统》(1977)，对剧作的人物形象、思想内容以及作家及作品本身的遭遇都作了分析。

此外，论及洪昇、汤显祖等的创作的还有谢罗娃。不过这位东方学研究所的副博士研究范围更广，不限于戏剧文学，而是包括舞台艺术在内，她写的《京剧(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 40 年代)》(1979)就是一部全面论说京剧(包括舞台艺术在内)的专著。

八、戈雷金娜的《中国美文学理论》

戈雷金娜对清末文学理论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其所著《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的中国美文学理论》(Теория цзящной словесности в Китае XIX——начала XX в. , 1971)一书中。这是一个汉学家很少涉足的领域。全书四大部分中，有一部分专门论析 19 世纪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包括文学思想和美学思想。认为传统的理论有固定不变的体裁形式，而且若干世纪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些固定不变的“高雅”的文学体裁概念，如“文”、

“诗”、“词”等。直到20世纪初之前，传统的体裁格局才被打破，并于世纪初形成新的、综合型的文学观念。

传统的体裁格局被打破的标志，是旧的体裁界限革除了，新分成艺术文体和“应用”文体，旧的文学传统体系也破除了，新的体系把一些真正的文学体裁如中、长篇小说、戏剧等吸收了进来。而在19世纪末之前，这些体裁本来一直被排除在“高雅”文学之外的。

书中有一部分评述了该时期的主要文学流派和几种有代表性的文学观点。占篇幅较多的是“桐城派”，分析其代表人物方苞的提倡古文要重“义法”的主张、刘大櫆有关古文艺术形式的理论以及姚鼐关于古文提倡“义理”的理论，叙述了“桐城派”的兴衰过程，对“常州词派”也作了记述。

书中还有一部分对19世纪重要的文艺学经典刘熙载的《艺概》作了评论，分析了刘熙载的美学思想和文学上的主张。最后一部分则评述了新观点和有开拓性的批评家王国维以及早年的鲁迅。肯定王国维和鲁迅的美学观点都是敢于打破儒家的清规戒律，是属于革新派的。

戈雷金娜在结束语中肯定，1917年开始了中国美学思想的新阶段。此时传统被当做否定的东西，看做是儒家封建思想的体现。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就是这样来批判“桐城派”的。不过十月革命的思想影响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产生和发展。于是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就不是仅具有历史的价值，而是在现代得到理解和运用。

第十四章
中国现代文学在俄罗斯(一)
——苏联的鲁迅学和谢曼诺夫的鲁迅论

一、鲁迅著作在苏联的传播

苏联时代历来重视对鲁迅作品的翻译与介绍。我国著名学者戈宝权先生曾对鲁迅著作最早的俄译本作过专门的考察。鲁迅作品中最早译成俄文的是《阿Q正传》,在1929年同时出了两种译本,一种是王希礼译,列宁格勒激浪出版社出版。另一种是"无译者名"(鲁迅语)的,由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后经研究,此系苏联汉学家科金和中国人高世华合译的。"至于传闻卢那察尔斯基曾译过《阿Q正传》和为俄译本写过序文,又俄译本第一版10万部一个月内售完,现经反复查考,并无其事,都是以讹传讹的"。①

鲁迅逝世以后,1938年苏联科学院出版了《鲁迅》纪念论文与译文集。后来又出版罗果夫编的《鲁迅选集》(1945,莫斯科)和他译的《阿Q正传》(1947,上海)。不久后又出版《鲁迅小说、杂文与书简集》(1949)。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翻译出版的鲁迅作品种类更多。有《鲁迅小说集》(1950)、《鲁迅短篇小说与论文集》(1952)、《鲁迅小说集》(1953)、《鲁迅短篇小说集》(1956,巴库和明斯克各一种)、《阿Q正传》(1960)、《故事新编》(1964)、《鲁迅中短篇小说集》(1971)、《鲁迅选集》(1981)、《鲁迅选集》(1989)等。

---

① 戈宝权《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页。

其中规模最大的要算1954—1956年出版的四卷本《鲁迅选集》(Лу Синь.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и)。第1卷收入《呐喊》、《野草》和《彷徨》,第2卷收入从《热风》、《坟》、《华盖集》、《二心集》、《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和《集外集》中选出来的杂文,第3卷为《故事新编》和《朝花夕拾》中选出的回忆文章,以及从各杂文集选出的杂文(多带有回忆性质的,如谈韦素园、刘半农、章太炎等),第4卷为《两地书》和书信选。这套选集无论编选和翻译都是精心之作。译者为汉学家的最佳阵容,而且多为从事鲁迅研究的专家。其中有费德林、罗果夫、艾德林、彼得罗夫、科洛科洛夫、罗加乔夫,帕纳秀克、齐赫文斯基等,还有当时的青年译者马努欣、杨希娜、瓦西科夫等。承担主要编选工作并译有大量作品的则是波兹涅耶娃。由费德林写了序言。

1981年科学出版社出版《鲁迅作品选》(一卷本),系霍赫洛娃编,艾德林序。1989年在莫斯科科学出版《鲁迅选集》(一卷本),则是彼得罗夫编,艾德林序。

鲁迅单篇作品被翻译作为单行本出版或登载报刊的,为数更多。还有被译成乌克兰、格鲁吉亚、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等20多种民族语言文字出版,其中有小说集或选集,也有单部作品。

在1977年还专门编辑出版了《鲁迅著作索引》(格拉戈列娃编,索罗金序,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46页),提供了译介作品的全貌。

二、苏联对鲁迅的研究

鲁迅在世时,苏联就有人开始研究他的作品。"1925年,苏联的中国文学研究者瓦西里耶夫(中名王希礼)着手用俄文翻译《阿Q正传》时,他在写给曹靖华的信中曾说:鲁迅是中国的'一位伟大真诚的国民作家!他是社会心灵的照相师,是民众生活的记录者……他不只是一个中国的作家,他还是一个世界的作家!'瓦西里耶夫的这封信,曾发表在当年六月的《京报副刊》上"。[①]

鲁迅逝世后不久,阿列克谢耶夫就把研究鲁迅的题目交给他的门生、

① 戈宝权《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第44页。

1939年来华工作的费德林,后者以《论鲁迅的创作》文章获副博士学位。

鲁迅享有世界声誉,在苏联也拥有许多研究者,从他去世到1956年的20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在苏联报刊和书籍中公开登载的评介、论述和回忆鲁迅的文章就有85篇。[①] 从1960年到1980年这近20年发表的文章更多,其中单属于研究性质的论文和著作,重要的就有50多种。[②] 苏联汉学家当中,事实上有一批是鲁研学人。具体人员虽然不好划定,因为他们当中对鲁研学有专研和兼研之分。但是参加前述四卷本《鲁迅选集》工作的重要译者,以及后起的索罗金、谢曼诺夫,应该可以都列入其中。

值得一提的是,当过去各国出版的百科全书和文学辞典中还很少提及鲁迅的时候,苏联在1932年出版的《文学百科全书》中已有鲁迅的条目。当然,近一二十年来,各国出版的百科全书纷纷增列了鲁迅的条目,如1968年的法国《世界百科全书》,1973年的英国《大英百科全书》,1973年美国的《麦格劳—希尔世界名人传记百科全书》……苏联在1974年出版的《大百科全书》、1976年出版的《简明文学百科全书》和1980年的《苏联百科辞典》(一卷本)都列入鲁迅条目。

苏联汉学家对鲁迅的研究从50年代中期,即四卷本《鲁迅选集》出版以来有了很大的进展。如果说他们以前所作的主要是对鲁迅著作的翻译、鲁迅生平和思想的介绍,那么近30多年来对鲁迅的思想和创作的分析研究则大为加强了,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在五六十年代,费德林、艾德林、索罗金和波兹涅耶娃等人写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均设立专章概要地论述鲁迅。从50年代末起陆续出了一批专著,对鲁迅作了全面的评论。如波兹涅耶娃著的《鲁迅》(1957)和《鲁迅·生平与创作》(1959),索罗金著的《鲁迅世界观的形成》(1958),彼得罗夫著的《鲁迅·生平与创作概论》(1960)和谢曼诺夫著的《鲁迅和他的前驱》(1967)等。其中在近年来影响较大的要算是谢曼诺夫的著作。以及艾德林为1971年版"世界文学丛书"中的鲁迅卷写的长篇序文《论鲁迅的短篇小说》。

---

① 据斯卡奇科夫的鲁迅研究文著目录统计。《鲁迅选集》第4卷,莫斯科,1956年,第239—249页。

② 《英文、俄文鲁迅著作翻译及研究索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1981年。

三、波兹涅耶娃、索罗金、彼得罗夫和谢曼诺夫的四本鲁研专著

（一）波兹涅耶娃的《鲁迅·生平与创作》（Лу Синь.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在苏联的鲁研学人中，最早拿出论鲁迅专著的是波兹涅耶娃。她1932年大学毕业后，1933年便着手研究鲁迅，1956年以《鲁迅的创作道路》学位论文获博士学位，1957年出版《鲁迅》专著，1959年扩大为《鲁迅·生平与创作》（莫斯科大学出版社），[①]成了苏联的同类专著中篇幅最大的一本（大32开本，572页）。

她在出专著前的20多年里，已经有许多论鲁迅作品的文章和译作，他不但自己搜集和整理大量有关的资料，而且同鲁迅的朋友曹靖华、李霁野、李何林以及陆宗达、胡乔木、许广平、戈宝权等有直接交往，得到他们在阐释鲁迅的思想和创作问题、搜集资料直至解释具体作品等多方面的帮助。加上她有广泛的中国文学知识和汉学修养为依托，几十年孜孜不倦的努力，终于完成很有分量的专著。

这本专著共设三篇九章。第一篇三章分别阐述鲁迅儿童少年时代、去日本求学和在辛亥革命这三个阶段的思想及活动。起止的时间是1881—1917年。第二篇写的是1918—1927年的事。三章中有两章分别写鲁迅从1918—1926年的革命活动和大革命失败后去厦门、广东、上海的情况，另外一章是评析《呐喊》、《彷徨》、《野草》三本作品集。第三篇也是三章，写1928—1936年鲁迅的生活。有一章写他与“左联”的关系，另外两章分别论述鲁迅后期的杂文和《故事新编》。

这是第一次全面、系统又深入地向苏联读者介绍鲁迅的专著。它以材料丰富翔实，分析细致，概括性强而著称。作者仔细分析了鲁迅的生活道路及思想发展的脉络，解释其创作的特点，重点是突出鲁迅的革命精神。指出“鲁迅是在中国实行革命、挣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锁链的那支大军中的一名战士”（第515页）。

波兹涅耶娃分析了鲁迅的全部创作后，最后归结为：“鲁迅的创作道路是从中世纪的八股经过革命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现实

---

① 已有中译本：波兹涅耶娃著，吴兴勇、颜雄译《鲁迅评传》，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

主义(第516页)。”

(二)索罗金的《鲁迅世界观的形成(早期的政论作品〈呐喊〉)》(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мировозрения Лу Синя: Ранняя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и сборник《Ключ》)

索罗金在发表专著以前已先完成长篇学位论文《鲁迅创作道路的开始和小说〈呐喊〉(1956)》,并于1958年通过论文答辩获副博士学位。接着又有《论鲁迅的现实主义》(1958)等文章。专著《鲁迅世界观的形成》(1958年,东方文学出版社)的基础学位论文,它从一个侧面,即早期的活动和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思想来论述鲁迅早年政治观、哲学观和美学观的形成。起止时间大致从19世纪末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为止。这本仅196页篇幅不大的论著中,除前言与结束语外,有四节论述鲁迅的经历(“儿童少年时代”、“初入文坛”、“1909—1917年”、“五四运动与文学革命”),另外三节分别剖析《狂人日记》、《呐喊》和《阿Q正传》。

作者认为鲁迅是在20年代末“从革命民主主义立场(鲁迅自称为‘进化论’的立场)……过渡到马克思主义”立场(第4页)。同时,在鲁迅的创作方面则论述他怎样从“充满革命思想的”批判现实主义逐步创造了一切前提条件,得以“在20年代末走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第192页)

从详细分析鲁迅早期的作品,包括留学日本时的文章、辛亥革命时的小说如《怀旧》以及《呐喊》,尤其是《阿Q正传》等作品来看,其深入详尽的程度,还是苏联鲁研学中的第一部,这也是本书的历史价值。

据作者说,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步,是由于拥有大量中国人写的有关鲁迅的文字资料。他在50年代初曾有两年时间在北京的苏联驻华使馆新闻处工作,有广泛的社会接触,搜集到自20年代初以来中国发表的相当丰富的鲁研材料。“在总体构思上我受瞿秋白和冯雪峰的影响最大,而最有意思的事实资料则是从周遐寿(周作人)的回忆录中得到的”。作者又谦逊地说:“我这本小书也只能说具有文学研究史上的意义。”①

① 此段文中的引语均见1988年12月21日索罗金给笔者的信。

（三）彼得罗夫的《鲁迅·生平与创作概论》（Лу Синь, Очерк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彼得罗夫（В. В. Петров, 1929—1987），1951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50年代就有不少著述，除专著《艾青评传》（1954）外，还有论别的作家的文章，如《马雅可夫斯基和现代的中国诗歌》（1952）、《老舍及其创作》（1956）、《巴金的长篇小说〈家〉》（1956）、《巴金的创作道路》（1959）、《论曹禺的创作（跋）》（1960）等，以及六七十年代的文章《元杂剧》（1966）、《中国早期翻译的列宁论文艺问题的著作》（1970）、《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短篇集出版前言》（1972）、《论20—30年代的中国诗歌》（1973）等。

其中，论鲁迅的文章占的比例不小，如《鲁迅和中国诗歌》（1958）、《鲁迅和郁达夫》（1967）、《鲁迅与苏联》（1976）、《鲁迅和瞿秋白》（1975）等，而专著《鲁迅·生平与创作概论》（1960，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383页）则是他在这个方面的代表作。

为了说明这部专著的特点，需要把它和同类的文著作对比。在波兹涅耶娃、索罗金的专著以及费德林、罗果夫、艾德林等的文章中，着重点是用鲁迅生平的主要经历和创作问题，论述他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这两个方面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同时剖析其创作（主要是《呐喊》、《彷徨》和一部分杂文）的特点，以论说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地位和作用。此外也兼及鲁迅怎样译介俄苏文学的问题。

彼得罗夫的特点是以分析鲁迅的作品为主。包括小说、散文及杂文，论证鲁迅创建革命文学的功绩及作用。全书九章中就有五章分别分析《呐喊》、《彷徨》、《野草》、杂文和《故事新编》。在叙述鲁迅活动的三章中也不是泛泛地谈生平，而是突出说明“鲁迅与革命文学的关系”和“鲁迅为创建革命文学而奋斗”。最后一章谈“鲁迅与外国文学”，内容比前述同类著作有更大的范围，不限于俄苏文学，而是广泛涉及世界各国文学，但中心仍是围绕鲁迅怎样吸收外国进步的、民主的和革命的文学，以增加中国新文学的养料。

4. 在五六十年代的鲁研学人中，谢曼诺夫属于后起之秀。他的专著《鲁迅和他的前驱》（Лу Синь и его предшественники, 1967，科学出版社）

虽然篇幅不大(仅148页)。但言简意赅,很有深度,而且研究方法特别,值得在下面辟专节论述。该书已有英译本(艾勃译,美国,1980)和中译本。[①]

四、谢曼诺夫的《鲁迅和他的前驱》

(一)评介鲁迅的文章和条目

弗拉基米尔·伊凡诺维奇·谢曼诺夫(司马文,1933—　)195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1968年获得博士学位,曾任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莫斯科大学亚非系主任,现任莫斯科大学教授。他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中国文学的研究工作,发表不少介绍中国文学的论著和译作。他在鲁迅研究方面的论著,除了《鲁迅和他的前驱》外,还有博士论文《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与鲁迅》(1962),论文《伟大的中国作家——评彼得罗夫著〈鲁迅·生平与创作概论〉》(1962)、《新的经典作品(1962)》、《鲁迅论外国文学》(1965)、《思想家——革命家》(1966)、《鲁迅反对庸俗化论者》(1972)、《评波兹涅耶娃著〈鲁迅·生平与创作〉》(1973)、《评两本关于鲁迅的著作(克列勃索娃:〈鲁迅·生平与创作〉,布拉格;黄颂康:〈鲁迅与现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阿姆斯特丹)》(1961),《"迅行"——为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而作》(1981)等。总之,他是苏联汉学界相当活跃的人物。值得注意的是,70年代出的新版《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1970—1978)和六七十年代出的苏联《简明文学百科全书》(1962—1978)中的鲁迅条目,均由谢曼诺夫一人撰写,足见他在研究鲁迅的苏联汉学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谢曼诺夫为两种百科全书写的鲁迅条目,同旧版大百科全书相比,有不少新的特点,从中可以看出他在鲁迅研究方面的若干新见解。

旧版(第二版)《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由波兹涅耶娃撰写的鲁迅条目(1954)主要内容是叙述鲁迅的生平业绩和创作概况,其中突出了两个方面。其一是详细介绍鲁迅的革命活动,即从他留学日本前后反清思想的萌发,参加"光复会",投入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组织"未名社"等团体,介绍俄国进步文学和苏联革命文学,在厦门、广州、上海等地从事进步的文化运

---

① 谢曼诺夫著,李明滨译《鲁迅和他的前驱》,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另见王富仁译,《鲁迅纵横谈》,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动，直至最后参加并领导“左翼作家联盟”，加入党所领导的统一战线等事迹，完整地论证了毛泽东同志评价鲁迅的话：“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56页，条目引用了这几句话）。其二是简要列举了鲁迅发表过哪些重要的短篇小说集，主要的杂文集、翻译作品和论文，着重指出这些著译具有反帝、反封建、反压迫的社会意义，至于作品的内容，除了对阿Q这个形象有所分析外，其他很少作艺术上的阐释。条目引用毛泽东同志的话作为归结：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新版《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5卷，1974）和《简明文学百科全书》（第4卷，1967，以下称《文学百科》）则一反过去，把重点移到了艺术方面，突出说明鲁迅是“作家、政论家和文学研究家”，而对他作为思想家和革命家的一面则谈得不够，只是简要地提到他参加辛亥革命、领导“左联”等活动。不过，谢曼诺夫对于鲁迅作为艺术巨匠的创作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评述，而且有的论述相当精辟。以《文学百科》为例。谢曼诺夫指出鲁迅是中国“现代民族文学的创始人”，并分析了鲁迅的创作道路：他受启蒙运动的影响，于1902—1908年从日文翻译了《斯巴达之魂》、《月界旅行》、《地底旅行》。《摩罗诗力说》一文则显出了他对浪漫主义的喜爱，几乎与此同时，鲁迅也对现实主义发生了兴趣。他在1909年出版《域外小说集》，1911—1913写了第一篇小说《怀旧》。他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准备工作，后来由于对革命的结局感到不满，几乎完全沉默下来。直到由俄国革命引起新的社会革命运动高潮到来时，鲁迅才又写出了《狂人日记》，表示对野蛮的“吃人”礼教深深的仇恨。

《文学百科》接着写到，鲁迅发表《呐喊》（1923）和《彷徨》（1926）两个集子，共收入25个短篇小说和一个中篇小说《阿Q正传》。后者的主人公，一个农村的短工，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饱受了同村人的嘲弄，最后被诬告偷盗罪而被处决。“阿Q的命运极为悲惨，但他的行为却逗人发笑，因为主人公并不理解自己的处境。小说表现了鲁迅有着同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契诃夫以及高尔基相似的对于人民诚挚和批判的态度”。这是鲁迅的一个特点。

“鲁迅的另一个特点是类似契诃夫的擅长短小精悍的体裁”。例如五四运动时期发表的小说集《呐喊》，其中短篇小说《故乡》表现了作者回到

阔别20年的故乡,耳闻目睹家乡凄凉的变迁。短篇小说《风波》表现了农民相信帝制复辟的传闻和他们那种愚昧、温顺的态度,《明天》则描写了失去独生儿子的单四嫂的悲哀。小说集《彷徨》继续保持短小精悍的这个特点。

《文学百科》归纳指出,鲁迅写了许多表现知识分子的短篇小说。这里有能够为自己的人民而死的勇士(《药》里的夏瑜),有已经认识到普通老百姓的崇高质量的聪明人(《一件小事》),有令人同情和可怜的旧书生(《孔乙己》、《白光》),也有《端午节》里的方玄绰这种随波逐流、趋时顺势的人物。而后一种人物在鲁迅写于大革命时期(1924—1927)的《彷徨》里就更为突出了,如《示众》、《幸福的家庭》、《肥皂》、《高老夫子》等。鲁迅也写到了曾经是正直的知识分子后来蜕化变质的情况,例如魏连殳(《孤独者》)不堪贫困的折磨,终于背弃了进步的思想,去充当军阀的幕僚。

《文学百科》着重指出,"散文诗集《野草》(1927)在鲁迅的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说它很像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在《野草》中,有几篇是反映作者在反动派的高压下产生悲观情绪的(《影的告别》、《秋夜》)。不过,对生活的信心终究超过了悲观苦闷的情绪,反映这种变化的有《希望》(它再次引用了裴多菲的诗)。"死火"这个形象(《死火》)很有意思,作品的题目就包含着矛盾,暗示革命之火只是表面上被扑灭,实际上它或迟或早总会冲出冰谷去的。"死火"为了帮助英雄"走出冰谷",同意让自身"烧尽"。这就很像高尔基笔下的丹柯那颗燃烧的心(按:指高尔基短篇小说《伊则吉尔老婆子》中的主人公),尽管这两部作品的基调很不相同。谢曼诺夫接着分析《野草》的艺术特色,指出它是抒情的,但常常带有讽刺的色彩(《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尖刻的挖苦(《狗的驳诘》),有时又像是讽刺诗(《我的失恋》)。故事情节常常是发生在梦中或幻影里,而作者采用的又往往是拟人化的手法,让无生命的东西和动物都能够思维和说话,有的比人还要聪明和敏锐。

在条目中,对《故事新编》的分析占了突出的地位。谢曼诺夫指出,鲁迅总是着力于描写当代的生活,但"在20年代和30年代之交,随着鲁迅逐步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渡",他就在探索更广的领域,包括历史题材,《故事新编》(1936)便是生动的体现。"它的基本内容就是批判古代的和现实中的畸形现象"。例如在《理水》中,鲁迅通过改编中国古代关于洪水的神话来嘲笑那些只顾自己安全而不管老百姓死活的知识分子,同时也谴

责老百姓的消极被动:他们久久不敢派出代表去请愿,一旦决定下来派代表,又只是推选出懦夫和只会拍马屁的人。接着谢曼诺夫从两个方面指出了这部集子的新进展。一是"《故事新编》的风格和鲁迅以往的作品迥然不同",不再是以严肃的揭露和注重心理分析为主(如《呐喊》和《彷徨》里那样),而是以"辛辣的、幸灾乐祸的讽刺为主了。这同作家的思想立场已经坚定对社会发展规律已有更深的认识有关。二是"积极探索正面的人物形象",并说明鲁迅在创作方面的新进展。例如《铸剑》,作者的侧重点已经是儿子为被皇帝杀害的铸剑工复仇了。而古代神话中的治水英雄大禹则已经成了劳动、民主和平等的化身(《理水》)。当然,这组讽刺小说的基本倾向还是批判和暴露,但是歌颂正面人物的基调已经很明显,在早期写的故事里,有女娲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补天》),铸剑工的儿子和黑脸人的死去(《铸剑》),稍后写的故事里的正面人物,或者取得了胜利,如主张和平的墨子(《非攻》),或者只遭受局部的失败,如大禹(《理水》)。

《文学百科》在评述了《呐喊》、《彷徨》、《野草》和《故事新编》这四部作品集之后,末了用一大段文字概括地介绍了鲁迅的杂文创作。它指出,鲁迅为了对时局作出迅速的反应,花了许多精力去撰写政论文,特别是在20—30年代当他居住在北京和上海的时期。他的杂文集有:《热风》(1925)、《华盖集》(1926)、《坟》(1927)、《而已集》(1928)、《二心集》(1932)、《伪自由书》(1933)、《准风月谈》(1934)、《花边文学》(1936)等。这里谢曼诺夫没有把杂文集列全,而且对杂文的艺术价值的估计似嫌不足,所以他说:"鲁迅的政论文的书比文学作品要多得多","甚至从这些政论文集的书名就可以看出,鲁迅把政论文几乎看成是文艺作品。他绝非偶然地把自己的文章称为'杂文',或者'杂感'。其中有一部分从性质上看接近于短篇小说,有一部分接近于小品文,有一部分则接近于散文诗。"条目举例说明鲁迅杂文题材的广泛:从抨击帝国主义者《友邦惊诧论》(1931)《我们不再受骗了》(1932)到辛辣地嘲讽清代式的书报检查制度、中国的旧礼仪,甚至头上的发式和戏台上的花脸等,无一不浸透了现代性。其中关于苏联的题材占有显著的位置,在《林克多〈苏联见闻录〉序》(1932)等文中,鲁迅揭露了反动派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诬蔑。同时,条目很看重鲁迅在介绍俄苏文学上的贡献,说他不但翻译了果戈理、谢德林、契诃夫、高尔基、法捷耶夫等作家的作品,而且给予苏联文学高度的评价;说鲁迅为许多翻译作品写的前言、后记和评论,以及中国文学史方面的讲稿,都

是别具一格的文学研究的论著。条目也提到鲁迅同反动文化作过斗争。

(二)研究鲁迅的专著

比较集中地反映谢曼诺夫在鲁迅研究方面的独到见解的,是专著《鲁迅和他的前驱》和论文《新的经典作品》。后者比前者早发表五年,可以看作是前者的准备和雏形。

他的论文和专著中最突出的一点是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文学的比较研究,亦称比较文学,本来是用于不同国家的文学之间进行对比分析,后来人们扩展开来,也用于对同一个国家的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同一作家的不同时期的作品之间进行比较,成为"历史比较分析法"。这在苏联,从六七十年代以来就运用得相当广泛。谢曼诺夫具有渊博的中国文学知识,研究的领域也比较广泛,曾先后出版过有关中国文学的专著:《18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中国章回小说的演变》(1965)、《中国章回小说的演变》(1970)、《慈禧太后生平掠影》(1976);论文《论东方文学的区划问题》(1966)、《关于文学分期的历史基础》(1968)等。同时,还翻译过中国文学名著——曾朴的小说《孽海花》、老舍的作品《猫城记》等。这使得他有可能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来研究鲁迅。《新的经典作品》一文就是将鲁迅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呐喊》跟清末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活地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劫余灰》、《老残游记》、《孽海花》等)作对比。而《鲁迅和他的前驱》一书则把这种对比的范围更加扩大。作者拿来同鲁迅对比的"前驱",不但有李宝嘉、吴沃尧、刘鹗、曾朴,而且有黄遵宪、梁启超、严复、林纾,甚至章太炎等。

谢曼诺夫正是通过对比得出结论:清末的谴责小说比起 18 世纪以前的古典小说(如《儒林外史》、《红楼梦》)来,有许多明显的弱点。它虽然"鞭挞腐朽的上层官僚、假仁假义的儒家道德,反对迷信和封建家庭的肆虐,主张关心个人的命运。但是这类作品对受苦人的同情往往流于伤感,而为其指明出路的愿望又变成了说教"。鲁迅的作品则克服了这些弱点,《呐喊》越过谴责小说而向 18 世纪以前的古典小说学习,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优良传统,成为"新的经典作品"。这里应附带说明,谢曼诺夫使用"Классика"这一具有"古典作品"和"经典作品"双层含意的词语,旨在肯定鲁迅作品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堪为后世楷模,可奉为经典。这表明他给鲁迅的创作以崇高的评价,而且见解也是很新颖的。

《鲁迅和他的前驱》全书分三章，还有前言（“作者的话”）和结束语（“若干结论”）。

第一章“在世纪的初叶”论述鲁迅前期，即从19世纪末到1918年在思想上的探索和创作上的尝试。分别以“初期的经验和体会”、“参加启蒙运动（1903—1906）”、“探索与失败（1906—1909）”、“在革命前夕和革命期间（1909—1913）”和“沉默的年代（1914—1918年初）”等五节来叙写。接着，在第二章“严峻评价的意义（1918—1936）”里分析鲁迅后期对文学创作和文学家们的评价以及这些评价前后的变化，实际上也是分析鲁迅美学思想的发展。分别设“政论文和诗词”、“翻译”、“戏剧”和“小说”四节，使这些评价得到全面而系统的论述。谢曼诺夫指出，中国评论家从“创造社”的成仿吾到“太阳社”的钱杏邨，当鲁迅在世时都说他是“仿古”，“旧调重弹”。鲁迅去世后又承认他是“创新”，但同时也割断了鲁迅同文学前驱的联系。有鉴于此，本书作者想以“阐明中国新、旧文学的关系为目标”。在前两章详细分析的基础上，就有可能在第三章“革新家”来论证本书提出的“目标”了，具体内容便体现在“体裁”，“题材、人物、思想、情绪”，“塑造性格的原则”，“景物描写、主人公的生活环境”，“结构”，“作者对事件的评价”，“语言”等七节中。

《鲁迅和他的前驱》的一个特色，是对鲁迅和他的前辈作家的作品做了详细的分析。并阐明鲁迅和他的前驱在创作上的联系。该书系统地说明了鲁迅世界观的演变、鲁迅的艺术方法和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顺带谈到鲁迅的创作同世界文学的联系。该书和别的鲁迅评传不同。一般的鲁迅评传在说明作家的创作道路，尤其是世界观的演变时，那很侧重或比较详细地叙写鲁迅的生平活动。而这本专著却立意“不去重复其他研究者已经说过的东西”，只是在遇有必要的地方请读者去参考那些著作，它则径直依据鲁迅作品的实际，即“从作家的文学作品、翻译作品和美学论文所反映出来的”鲁迅创作发展的情况来说明问题，这也使该书显得与众不同。它援引鲁迅的材料系统而全面，几乎遍及《鲁迅全集》（50年代版）的每一卷，甚至包括未收入全集的日记、书信和佚文。

专著对鲁迅的前驱作分析时所采用的方法也是别出心裁的。它从援引鲁迅论述入手，把鲁迅论及19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文学的观点，按文学体裁归类，整理出了鲁迅对“政论文和诗词”、“翻译作品”、“戏剧”、“小说”等文学类别及其作家的看法，这样涉及的前辈作家既广泛又有系统，做

到条理清楚。接着,它用文学史上的事实、其他评论家对同一个作家或作品的论述来和鲁迅的观点作对照,对比或印证,在此基础上才由该专著的作者谢曼诺夫对鲁迅的观点作出判断。如此多种角度来论述问题,而且材料也旁征博引,异常丰富,一本十来万字的专著,光是说明材料出处的注解就多达430余条,而且其中有的一条注解还含有两至三个材料出处。这样使人读后感到作者确实下了功夫,他所作的分析和论断也是有充分和可靠依据的。

谢曼诺夫多方面地论述了鲁迅的创新,主要的有:

关于体裁,他认为,鲁迅的创作是"体裁多样化","在小说、散文诗、回忆录、翻译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谢曼诺夫在这里补足了前面说到的《文学百科》中的缺陷,特别提到鲁迅创造了"杂文或杂感"这种新的文体。他说:"19—20世纪初大多数作家创作的特点是体裁的'专业化'长篇小说作家李宝嘉几乎不写短篇小说,黄遵宪仅以诗人的身份驰名文坛。诚然,这个时期也出现过总汇各家于一身的多面手,他们仿佛要赶紧完成好几代人的任务似的——梁启超是政论家、诗人、剧作家、长篇小说家,苏曼殊是诗人、小说家、翻译家。不过他们和鲁迅相比仍然略逊一筹。鲁迅在小说、散文诗(《野草》)、回忆录、翻译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还创造了中国的一种新文艺政论文体——杂文或杂感。"

关于作品里的主要人物,他认为,谴责小说主要写了上层人物(官吏、地主),作者希望他们得到改造;鲁迅更多的是写贫民(人力车夫、贫苦的纺织妇、潦倒的穷秀才),力图启发他们起来斗争。这是由于"鲁迅有博大无比的民主主义思想"。不仅如此,鲁迅还"把人民变成自己作品里的中心人物","塑造出一系列具有独特性格的人民形象(即使形象个性化)。这比谴责小说只写农民的苦难,却没有个性化的形象当然要强得多"。

同时,鲁迅对待普通人民的态度也很独特,"是批评与同情的有机结合",这是与他的前驱不同的。在谴责小说里,只要坏人被除掉,矛盾就得到解决。鲁迅则不然,他"以彻底的革命者的态度来看待人民运动",懂得人民"苦难的根源不但在于压迫者的残酷,而且在于被压迫者自身的愚昧和惰性",所以"鲁迅的短篇小说里绝少有幸福的结局"。此外,鲁迅不像谴责小说作家那样仅仅去暴露贪赃枉法的丑行,而是着力揭示"封建思想把小人物置于死地"的主题。因此,鲁迅谴责的对象,更多的是"那些自己拼命向上爬的人,以及他们那种天真地相信似乎真能爬上去的奴性"。这

样当然要比他的前驱所写的要深刻得多。而从文学史的进程来看,鲁迅的创作则“体现了中国小说对革命的描写从抽象的叙述向比较具体深刻的心理刻画方面的转变”。

关于塑造人物性格的原则方面,首先来看看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问题。谢曼诺夫认为,中国的旧小说都是借主人公的行动以揭示其性格,不像西方小说那样侧重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而“鲁迅是一个能综合运用本国小说和西方小说成就的作家”。他既“坚持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同时又“注意描写主人公的内心,包括采用自我分析这种复杂的手法”。

谢曼诺夫还指出,鲁迅在对人物内心活动的描写方面也有独到之处,一是“善于揭示人物复杂的内心活动和心理矛盾”,尤其是善于巧妙地运用“思想转变”这种方法,给人造成强烈的印象。例如《一件小事》。在他的前驱创作里(如谴责小说),不但主人公,就是作家本身都不具备有比较复杂的思想。二是能“表现人物性格的发展”。这也是鲁迅的前驱(如谴责小说作家们)所不及的。

再则是描写人物的外貌问题。谢曼诺夫认为,鲁迅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力求简洁地勾画人物的外貌。但是古典小说描绘外貌时绝少同揭示人物性格有关,而鲁迅笔下的主人公相貌都同其性格有密切关系,例如阿Q。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在勾画人物外貌时总是力图抓住人物独特的个性化特点。

还有,鲁迅为主人公取的名字也很有特色。谴责小说喜欢用人物的某些生理特征取名以突出人物的性格,如叫“黄胖姑”、“傅二捧锤”、“三荷包”。鲁迅不然,如阿Q这个中国的雇农,名字却得用拉丁字母来标示,这种讽刺的力量比谴责小说不知要大多少倍,而且“讽刺的锋芒不是对着阿Q,而是对着剥夺了阿Q的一切,包括他的名字的人”。

谢曼诺夫发现,鲁迅和他的前驱在塑造性格方法上的重要差别,还在于如何处理一般和具体的关系上。谴责小说对具体事件的描写过于粗略,不能使人得出更进一步的结论,只好通过总和来表现生活图景。所以,为了证实某种带普遍性的问题(如官吏腐败),作家就得写出许多具体的事件(如贪污事例),而且越写越多。鲁迅则赋予每个细节以个性和共性的意义。例如阿Q这个生动突出的形象就含有极丰富的内容,并“真正体现了中国的国民性”。不但如此,为了使形象更能被读者接受,“鲁迅有时还舍弃了一些过于带局部性的、只同特定的人有关的细节”。例如《白光》里

那个落第的书生,其原型所受的苦难本来还要多得多,但鲁迅没有不加选择的一律采用。

关于周围环境的描写。谢曼诺夫认为,中国旧小说对主人公的周围环境,如自然风景、家具摆设等,总是写得绘声绘色,然而缺乏个性化,而且少不得用诗词。"这显示了中国旧小说企图综合运用古文和古诗词的成果。但是,只有鲁迅才第一次做到了综合运用这两种成果。《呐喊》里大多数作品对风景的描写都极为简洁而含有深意。它恰好说明,那里面的主人公都不能也没有时间去欣赏风景。例如《阿Q正传》里这样描写:"村外多是水田,满眼是新秧的嫩绿,夹着几个圆形的活动的黑点,便是耕田的农夫。阿Q并不赏鉴这田家乐"。

谢曼诺夫在他的专著和论文中,详细阐明了鲁迅独具匠心的环境描写,说明鲁迅在必要的时候也能详细地描绘风景。而且善于从作品总的气氛出发采用各种笔调 。《故乡》里用悲凉的笔调来描写萧索的农村,《风波》里用讽刺的笔摹拟田园诗的格调。有时以写景作结尾,使写景"成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总结",即"具有哲理的意味"的结尾(《明天》、《药》)。同时,鲁迅更善于运用人物周围的具体物件(包括动物)来说明主要人物,把这些对象写得很有特色,使之起到说明主要人物的作用。如《风波》里那个钉着18只铜钉的饭碗,孔乙己拿给孩子们吃的茴香豆,单四嫂放进儿子棺材里的几件孩子平日喜欢的小玩意儿。鲁迅精心安排的这些细节具有以往中国作家笔下未曾有过的含义,这也是可贵的创新,"恰巧是借助于这些细节,作者才能塑造出难忘的形象"。

最后,关于作者叙事的方式。谢曼诺夫发现,在谴责小说中,凡是出现了"我"的作品,作者总是千方百计以"我"为中心来叙事。在鲁迅的小说里。"我"几乎从来不曾作为书中的主要人物,而是起辅助的作用,通过"我"引出更为出色的人物。对于这种手法,谢曼诺夫赋以重要的意义,说:"鲁迅大部分作品都不由作者出面慷慨陈词。这一方面是由于他越过了谴责小说作家而向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学习——在这类小说里作者从来不公开介入所叙的事件;另一方面也是出于鲁迅接受了西欧古典现实主义的传统——这类作品的倾向主要是通过性格、情节冲突来表现。"

但是,鲁迅的作品有时也有长篇的插叙(《阿Q正传)的"序")和同主人公的自我分析相结合的作者的话(《端午节》)。这说明鲁迅也在和20世纪初中国的杰出作家们同步前进:让文学直接介入生活,"力图加强艺术

的积极作用,加强艺术对生活的影响”。

此外,谢曼诺夫还指出鲁迅在“结构”、“作者对事件的评价”、“语言”等方面都有所创新,因而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全面而杰出的“革新家”。

谢曼诺夫在论述鲁迅的继承与创新时,还从比较文学的观点顺带说明:“在‘继承’这个概念里显然不但应该包括作家自己有意识地吸取的东西,而且应该包括他自己不觉察却已引进他作品的东西,还应当包括由于共同的流派倾向和发展的要求而出现在他创作中的东西。”所以他认为鲁迅是否研究过谴责小说有什么特点,应该学习什么和不学习什么,这都无关紧要。同时,从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的论著看,“恰恰可以肯定鲁迅研究过他的前驱的作品”。由此可见,谢曼诺夫让他的比较分析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

最后,还要顺便指出,谢曼诺夫对鲁迅的特点不断地探索和概括。在不久前为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而写的文章《“迅行”》[①]中,他又有新的说法:鲁迅是“中国的果戈理”。在文章中他是这样写的:“人们常说,鲁迅很像他曾经翻译过作品而且在创作上真的非常接近的高尔基(笔者按:在解放前后和50年代,在中国出于对这两位作家的崇敬,一般都喜欢称‘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但也有更多的根据可以称他为‘中国的果戈理’,因为鲁迅恰好是头一批把普通人作为自己作品的主人公的中国作家之一,而且,翻译《死魂灵》竟成了他晚年的主要活动。不过,鲁迅也许更接近于契诃夫——以他对人所持的沉思和批判的态度,对心理描写和简练文风的爱好,他首先是一个短篇体裁作品的大师。在他的小说中,中国现实里三教九流各种人物的典型、各个生活的侧面和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了。”

当我们和各国人民在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谢曼诺夫在他的文章中作这样报导:“鲁迅的作品已经译成了苏联几乎所有民族的文字。鲁迅在苏联普及的程度,只有在他祖国普及的情况可以相比拟。”这位苏联鲁研学人的估计也许不算过分。

---

① 苏联《文学报》1981年9月25日。

第十五章
中国现代文学在俄罗斯(二)

中国现代文学被苏联汉学研究作为重点的首先是鲁迅,其次为新诗,此外,还有十多位现代著名的作家都被写成研究性专著或专论。资料不全,国内图书馆也未多收藏,谨就现有材料作简要的评介。

一、翻译作品综述

(一)鲁、郭、茅等名家

在50年代苏联引进中国文学的"洪流"中,现代文学占很大比重,现代文学十大名家鲁郭茅、巴老曹、沈艾张赵,除沈从文、张爱玲未作介绍外,均已被翻译。已出现有《鲁迅选集》(四卷)、《郭沫若文集》(三卷)、《茅盾文集》(三卷)、《巴金文集》(两卷)、《老舍选集》(两卷)、《曹禺剧作选》(一卷)、《艾青诗选》和《赵树理小说选》,其他如叶圣陶、丁玲等大家都有介绍。其规模之宏大,时间之集中,在世界汉学史上极为罕见。鲁迅被称作中国的"高尔基"或"果戈理",其研究既多且深,独得学界青睐。而在60—80年代,切尔卡斯基持续不断地编译诗集,恰好组成了一个介绍现代诗歌的完整系列。所编四本诗集选诗人逾百名,规模相当可观。

"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也是苏联汉学注意的一个重点。对鲁迅的翻译和研究,成果最多,已在前一章做了介绍。其次是在诗歌方面,有综合性的评述,也有单个诗人的评传。对著名的作家都已写出研究性专著。如茅盾、瞿秋白、郭沫若、老舍、艾青、朱自清、闻一多、郁达夫、殷夫、曹禺、巴金、萧红以及当代作家张贤亮等。数量比较多,但有的书像属于普及性读物。

(二)解放区新文学

一批在新中国成立不久,1951 年荣获苏联国家奖——斯大林文艺奖金的作家:丁玲、周立波、贺敬之、丁毅、刘白羽,均为来自解放区的作家,他们时常在俄文报刊上被广为推介。凡是出自解放区作家的作品,当年在苏联文艺界均备受重视,迅即被翻译出版。

当时被翻译的代表作品举其大者如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罗果夫译,1952),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波兹涅耶娃译,1949、1952)、《丁玲选集》(波兹涅耶娃译,1954),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鲁德曼译,1951、1952)、《山乡巨变》正篇(俄译本改名《春到山乡》,克里弗佐夫译,1960)及续篇(俄译本改名《清溪》,克里弗佐夫译,1962),《铁水奔流》(伊凡科译,1957),赵树里的《李家庄的变迁》(克里弗佐夫译,1949)、《李有才板话》(施奈德译,1974),《张来兴》(俄译本改名《硬骨头》,贾托夫译,1963)和《赵树里选集》(贾丕才译,1953),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1956)、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罗高寿、斯佩兰斯基译,1951),邵子南的《地雷阵》(彼得罗夫译,1950)、欧阳山的《高干大》(彼得罗夫译,1951),周而复的《白求恩大夫》(法恩加尔译,1960)和《上海的早晨》(斯拉勃诺夫译,1960),柯蓝的《红旗呼啦啦飘》(贾托夫译,1951)。

曹明的《原动力》(罗高寿译,1950),刘白羽的《火光在前》(伊凡科、帕纳秀克译,1951)、《刘白羽选集》(罗扎诺夫译,1955)、《无脚拖拉机手》(俄译本改名《永不熄灭的火焰》,斯米尔诺夫译,1959),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马尔科娃译,1957),胡可的《战斗里成长》(贾托夫译,1951),杜鹏程的《保卫延安》(贾托夫、克里弗佐夫译,1957),吴强的《红日》(谢曼诺夫、斯米尔诺夫、施奈德译,1959),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帕列伊译,1956)等。

袁静的《红色交通线》(俄译本改名《特殊任务》,戈洛夫略夫译,1961),马烽的《仅仅十年》(收入 17 短篇,贾托夫译,1960)和《不能忘记的人》(短篇小说集,文学社编选,1960),周洁夫的《走向胜利》(沙什洛夫译,1959),梁信的《刘胡兰》(切尔卡斯基译,1958),雷加的《站在最前列》(戈洛夫略夫译,1959),张孟良的《儿女风尘记》(伊凡科译,1959),冯德英的《苦菜花》(帕纳秀克译,1959)和《迎春花》(帕纳秀克译,1961),梁斌的《红旗谱》(俄译本改名《三代人》,帕霍莫夫、亚诺夫斯基译,1960)。据不

完全统计,从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解放区文学被翻译成俄文的就有27位作家的近40部小说。当年这些作品在苏联读者中曾广为流传。

此外,还有新诗(白话诗)已译成俄文的,除了个人诗集为单行本,如作家《萧三诗选》(诗人自译,1954),艾青的《黎明的通知》(吉托维奇译,1952)《太阳的话》(切尔斯基编选并译,1989)和《艾青抒情诗选》(尤·索罗金译,1981)外,流行最广的为费德林编选于1959年出版的《中国新诗集》(1919—1958),费氏邀集了艾德林、切尔卡斯基、吉托维奇、亚罗斯拉夫采夫、鲍特文尼克、戈卢别夫、阿历山大罗夫、捷尔一格里戈梁、埃弗隆等35位译者,选译4位中国现代诗人新写的新诗,其中除郭沫若、康白情、闻一多、朱自清、冰心、冯至、蒋光慈、殷夫等外,其他大部分来自解放区的诗人,有毛泽东、朱德、刘伯承、萧三、柯仲平、蒲风、何其芳、田间、力扬、卞之琳、王亚平、严辰、戈壁舟、李季、阮章竞、张志民、贺敬之、郭小川等。

俄苏汉学家对中国解放区文学如此大量地、长时间地坚持翻译介绍,[①]这在国际汉学界显得特别突出,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

二、切尔卡斯基论现代诗歌的三本论著:《中国新诗》、《中国战争年代的诗》和《艾青——太阳的使者》

笔者是在80年代初搜集和整理"中国文学在俄苏"专题资料时,才开始注意切尔卡斯基的。其全名为列昂尼德·叶甫谢耶维奇·切尔卡斯基(Л. Е. Черкасский, 1925—2003)1925年6月2日出生于苏联基辅州(现为乌克兰切尔卡瑟州)之首府切尔卡瑟市的一个职员家庭,1951年毕业于莫斯科军事外语学院东方系,1965—1966年来北京大学进修。1962年以论文《曹植的诗(192—232)》获副博士学位,1971年12月以《中国新诗论(20年代)》晋升为博士。他1960年起即任职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主要研究中国诗歌,尤其是现代文学新诗,曾先后担任该所远东研究室副主任、主任。一生勤勉,共发表论文、著作260多种。

但是直到1986年10月他来上海出席中国作协举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学术研讨会,路过北京时,我们才有机会见面,作详细的交谈。此后我多次赴苏,他几次来华,都不断有联系,有一次是邀来北大与他当年进修时的指

① 参阅宋绍香编并译《中国解放区文学·俄文版序跋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

导老师谢冕教授会见，从中我了解到他更多的学术研究情况。可惜待到我1993年赴莫斯科大学高访时，一年之中竟未能见到一次，后来才知道他于1992年移居以色列了。90年代中期有一位耶路撒冷大学东方学系的女学生Sophia Katz来北大进修汉语询访到我，带来了切尔卡斯基的问候，说她是他的学生，也是从俄国移民以色列的，原名为Ольга Лейтман（奥丽佳·雷特曼）。此后再无更多的来往。我只能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李聃研究员处打听其所译切氏的两部中国新诗论著的翻译和出版进展的消息。哪知道后来辗转传来他于2003年10月在特拉维夫逝世的信息，心中不禁怅然。赶紧也转告谢冕，以共同缅怀这位杰出的，很有特色的俄国汉学家朋友。

切尔卡斯基对俄国汉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对中国新诗作了全面系统的译介和研究，其丰硕的成果使他不但在俄国汉学界成为对中国现代诗歌研究的第一人，而且在世界汉学界也属于罕见。他的业绩也体现了俄国在中国文学研究事业上的全面规划、统筹兼顾和重点突出的特色。

按苏联汉学的传统，“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向来是研究的一个重点。我国舆论历来推崇的十大名作家：鲁郭茅、巴老曹、沈艾张赵（后4位系80年代后才补足的），他们都优先翻译，出版俄译本，形成系列。计有鲁讯选集四卷，郭沫若文集两集，茅盾文集三卷，巴金文集两卷，老舍两卷集，曹禺剧作选，沈从文湘西小说，赵树理选集，艾青诗选（含《太阳的话》）等。译介的作家涉及小说、诗歌、戏剧各个领域，包括瞿秋白、叶圣陶、丁玲、周立波、艾青、陈登科、马烽、钱钟书等其他作家的作品。

汉学家们按统一规划，分工协作进行译介，切尔卡斯基依其个人爱好和集体计划部署，专事中国现代诗的评介，几乎是独立完成了中国现代诗坛的全面扫描和重点深入的探索。就其繁多译作中举出大者有：

编选、译并序：**《雨巷（20和30年代中国抒情诗）》**（莫斯科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1969年，199页），选入了戴望舒等16位诗人的161首诗。

编选、译并序：**《五更天（30—40年代中国抒情诗）》**（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5年，128页），选入了田间、艾青等24位诗人的161首诗。

编选、译并序：**《蜀道难（50—80年代中国抒情诗）》**（莫斯科虹出版社，1983年，199页），选入顾工、公刘、李瑛、韩瀚等55位诗人的112首诗。

这三本诗集恰好组成一个系列，提供了中国20—80年代诗歌的全貌，让苏俄读者不仅能够了解现代诗作，而且可以延伸到当代。切尼选择的诗

人之多和诗作面之广,那是其他外国的翻译界不可企及的。他曾经把现代(20—40年代)诗人另又编选成一本《40人诗集(中国20—40年代抒情诗)》(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8年,342页)。只要列举出那一长串人选诗人的名字,就足以说明他选编的精细和深入了。举如汪静之、刘半农、刘大白、朱自清、徐玉诺、谢冰心、徐志摩、朱湘、陈梦家、殷夫、蒋光慈、戴望舒、蒲风、王统照、王亚平、郑振铎、瞿秋白、郭沫若、臧克家、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袁水拍、沙鸥、李季、柯仲平、梁宗岱、宗白华、康白情、邵洵美、冯至、温流、萧三、艾青、田间、任钧、应修人、潘漠华。

切尔卡斯基对俄国汉学的主要贡献,还在于写成了两部中国现代诗论和一部现代诗人艾青专论。他既是坚守苏联汉学界"分配"给他的中国新诗阵地,勤勉耕耘,认真探索,成为俄国学界研究中国新诗唯一全面的专家,又是俄国汉学翻译与研究并重,既出翻译作品,又出研究专著的优良传统之鲜明体现。其所著三部论著为:

《中国新诗论(20—30年代)》(Новая китайская поэзия: 20—30 е. гг.),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2年,496页。

全书分两编14章。上编谈"五四诗歌"的8章,分别叙写五四运动、文学革命和中国新诗所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分析五四诗歌中的人道主义思想。用相当大的篇幅评论新诗,将其归纳为四类。一为现实主义诗人如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和刘大白、汪静之、谢冰心等人的诗,二为浪漫主义诗人如闻一多、郭沫若(《女神》)、朱自清等人的诗,三为自由诗,四为抒情诗。

下编以"现实主义派和颓废派"为题设置六章,(按"颓废派"即今日所称的现代主义流派。切氏在这里沿用了苏联当年的名称)。论及革命与诗歌和"太阳社"的诗,象征主义者李金发、穆木天的诗,"新月派"包括徐志摩等人的诗,欧体诗如闻一多等人,也论及叙事长诗这种体裁的创作,对于蒲风、田间等人的诗给予足够的重视。

切尔卡斯基注意的中心问题,是这个时期诗歌创作的方向、体裁、形式,是新诗中的传统与创新的因素。他对中国现代诗人中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几大流派的创作,特别是他们的思想、美学观和诗歌艺术特色都作了具体分析,对其中代表诗人的评析均以充分的资料为依据。专著对于中国自由诗、欧体诗、抒情短诗和叙事长诗特点所作的分析,也许是最为引人读的部分。作者在书中说明,中国新诗具有重要意义,它正在与西方和东方各国的诗歌互相交融,逐步走向世界文学的大家庭中去。

《中国战争年代的诗(1937—1949)》(Китайская поэзия военных лет: 1937—1949),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0年,272页。

本书是上一部书的续篇。它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发表的新诗作了全面系统的归纳加以概括分析。以大量丰富的史料阐明在这两次战争期间中国新诗的形式、体裁、结构和艺术形象之特色,涉及范围多达200部诗集,作为重点或典型分析的则有艾青、邹狄讯,"时代的鼓手"田间,"农民诗人"臧克家,长诗作者柯仲平,"灯塔看守人"王亚平,"国际主义诗人"萧三,"夜的歌和白天的歌"诗人贺敬之,人民"爱与恨"的表达者袁水拍,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作者李季,"农村的歌"作者沙鸥等50多人。专著对这两个时期中国诗歌与世界进步诗歌的联系,特别是与俄罗斯和苏联诗歌的联系也都作了详细的分析。

切尔卡斯基既肯定和赞扬战争年代诗歌创作的成就,也指出了它的缺点和不足。例如由于群众性的高昂热情鼓舞创作诗歌以空前巨大的数量出现,从抗战爆发到1942年就已发表有50多万首诗,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公式化和粗糙肤浅之作,艺术上当然也不成熟。切尼认为,他"这本书的宗旨正是客观地、有根据地分析战争年代中国诗歌发展的道路,分析它复杂和矛盾的现象,研究它同本国文学传统和世界文化的关系。既谈其达到的高度与成就,也谈缺点与不足"。

这两本书对"五四"以来新诗的发展进程,历史脉络、形式特点作了清晰的勾勒,合起来看恰是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诗歌史",论其成书的年代,甚至可以说它不比中国的同类著作晚。况且,它用欧洲习见的文艺学观点和方法来考察中国新诗的历程,例如用文艺思潮的原理来概括和梳理各个流派,阐明新诗创作的规律和得失,无疑更值得我们借鉴。

专著《艾青——太阳的使者》(Ай Цин——Подданный солнца),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3年,233页。此书系作者身后才出版的。

如果说前两部著作是从面上勾勒现代诗的发展历史,那么这部专著就是深入重点,把艾青作为典型例子进行剖析。切氏从诗歌历史发展中选了艾青作为重点诗人,反过来又用艾青事例来说明诗史。这无论对于切氏个人,还是对于俄国汉学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方法的意义,令人感到其研究方法的优异。因而它比此前出版的彼得罗夫著《艾青评传》(传略,莫斯

科,1954 年,116 页)更有影响。

本书系统评析了诗人艾青 50 年的创作历程。全书分为 11 章,按照评传的思路,头两章"双尖山下"、"激流湧进"写诗人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3—5 章以"抗战前夜"、"抗战时期"、"在延安窑洞"叙写了艾青作为战士和诗人在盛年叱咤风云的光荣历史与辉煌成就。从第 6 章起转入诗人命运的坎坷和久经磨难之后的复出与创作。分别以"艰难的十年"、"被错划为右派"、"我是清洁工"、"归来的歌"、"诗人永远和人民群众在一起",最后以"大师"归结。总之,作者满怀痛切之情写了诗人艾青痛苦的童年、漂泊的青年、成功的中年时代,到灾难临头不得不在逆境中蹉跎岁月,直至最后才"异峰"突起的晚年。切尔卡斯基最终以激情指出:中国杰出诗人艾青的名声早已跨出国界,他的作品已经成为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切尔卡斯基贡献于俄国的汉学,虽然主要是中国现代诗研究,但绝不限于此,他也研究了古典诗人曹植与建安文学,中俄文学关系与中外比较文学,如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作品在中国、中国文学中的列宁形象,曹植与罗马诗人奥维德之比较等等。为了反映切氏研究范围的全貌,值得将其晚年所开列的主要著译书目 26 种附出,以供了解。

切尔卡斯基在俄苏汉学界的名声和贡献,自从他 1986 年来华出席当代文学研讨会起,即为我国学界同行所知晓。我曾在 1990 年写出的《中国文学在俄苏》一书中设有专节加以概略的介绍。立意把他的主要三部著作翻过来的我国学者则有两位。

先动手的一位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新近故去的李聃研究员。他翻译了切氏的两部中国现代诗论,总共当有 50 万字左右。从 90 年代就默默地劳作,为了还原书中引证的大量诗作,曾历尽辛苦。要完成如此大的工程实属不易,有的译文还要经作者过目。这也反证了切氏为此二著作所下的苦功。由于条件的困难,这么庞大的著作迄今未能面世。

后起的一位是泰山学院外文系主任宋绍香教授。他最近已译出《艾青——太阳的使者》[①]约 15 万字,这是宋氏崇敬艾青心情的体现。他加倍用心地翻译,比李译早出版,后来居上。这里特地把切尔卡斯基主要著译书目列表如下:

1.《中国之声·中国诗人诗集》,编、译并序,文学出版社,1954 年,72 页。

---

① 切尔卡斯基著、宋绍香译《艾青——太阳的使者》,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 年。

2.《曹植的政治观与文学观》,《中国、日本·史学与哲学》文集,莫斯科,1961年,第131—145页。

3.《曹植〈七哀〉》,译并序,1962年,133页;1973年,168页。

4.《曹植的诗》,莫斯科,1963年,68页。

5.《赤潮·五四诗集》,译并序,莫斯科,1964年,98页。

6.《论五四诗歌中的人道主义问题》,《东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文集,莫斯科,1967年,第64—72页。

7.《中国诗人蒋光慈论文化遗产》,《亚非人民》,1967年,第2期,第100—106页。

8.《罗马的放逐者与魏国的贬黜者——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7)和曹植(192—232)》,《历史语文学研究·祝康拉德院士70寿诞》文集,莫斯科,第409—415页。

9.《雨巷·20—30年代中国抒情诗》,译并序,莫斯科,1969年,199页。

10.《论中国新诗的分期》,《东方文学理论问题》文集,莫斯科,1969年,第354—359页。

11.《中国诗社》,《远东文学研究理论问题》,莫斯科,1970年,第134—140页。

12.《五四时期的诗》,《中国新诗与西方文学》,〈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莫斯科,1971年,第232—251,252—261页。

13.《列宁思想与中国文学中的列宁形象》,〈列宁和国外东方文学〉,与施奈德合著,莫斯科,1971年,第51—91页。

14.《中国新诗论(20—30年代)》,莫斯科,1972年,496页。

15.《五更天(30—40年代中国抒情诗)》,译并序,莫斯科,1975年,128页。

16.《马雅可夫斯基在中国》,莫斯科,1975年,128页。

17.《40位诗人·20—40年代中国抒情诗》,译、序及注释,莫斯科,1978年,342页。

18.《论中外文学关系·中国30—40年代诗歌》,〈亚非人民〉,1979年,第1期,第108—116页。

19.《中国战争年代的诗歌(1937—1949)》,莫斯科,1980年,272页。

20.《中国诗歌》,译、序并注,莫斯科,1982年,239页。

21.《中国当代的“暴露”诗歌》,《亚非人民》,1982 年第 2 期,第 87—94 页。

22.《蜀道难·50—80 年代诗选》,编及译,莫斯科,1983 及 1987 年均 199 页。

23.《在长城后面的阴影下》,《远东》,1985 年,第 7 期,第 146—153 页。

24.《俄罗斯文学在东方》,〈翻译理论与实践〉,莫斯科,1987 年,184 页。

25.《艾青——太阳的使者》,莫斯科,1993 年,233 页。

三、彼得罗夫著《艾青评传》

不久以前去世的汉学家维克多·彼得罗夫也是长期坚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人士之一。他注意的一个重点是中国新诗。为此,他同诗人柯仲平、李季、严辰、田间、袁水拍、戈壁舟、萧三等人都有交往。交换信件,切磋问题,搜罗各类有关的文献资料。能写出《今日中国新诗》和《马雅可夫斯基与当代中国诗歌》(1952)这样的长文。紧密结合文坛情势、及时评论和阐释文学新现象,在国外汉学家中也是不多见的。这除了他个人的艰苦工作,恐怕同他有许多中国诗人朋友的帮助有关。

彼得罗夫研究中国诗歌的一个主要对象是艾青,并最早写出了著名诗人的论著《艾青评传》(Ай Цин: Критическо -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1954),对诗人的创作做了简要的评价。在 50 年代之初,他就通过自己的研究,在新作纷呈、新人大批涌现的时代,明确指出了在为新社会服务而著名的作家诗人中,有郭沫若、茅盾、老舍、丁玲、赵树理、田间等人,而艾青则在其中占有光荣的一席。艾青有他特殊的经历,“他从动摇和疑虑,从小资产阶级自发反抗社会的不公正走向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第一章《道路之始》和第二章《诗歌与解放战争》便是叙述诗人的艰难历程,并肯定《大堰河》、《向太阳》等诗的价值。第三、四章《延安——革命的冶炼场》和《在通向胜利的路上》对诗人思想上的成长和艺术活动作了细致的分析。最后两章《和平和友谊的歌手》、《为革命艺术的斗争》从诗人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活动说起,概括了解放以后艾青的活动以及整个创作的成就。作者对艾青各个时期作了论述,包括诗人的世界观和美学观以及创作方法的特点,尤其重视艾青的自由诗,认为是“中国当代新诗中成就最高者

之一”。本书的特色是始终把艾青的诗同时代、同人民的斗争联系起来考察，认为从这些诗歌中可看到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获得解放的曲折经历和战斗意志，它们无疑会给人以鼓舞。使人理解中国人民斗争的正义性和胜利的必然性。书中也分析了艾青创作中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主题。

彼得罗夫是一位敏捷的研究者，新中国成立不久，他就迅速发表长文《新中国文学》(1950)、《中国文学发展的新阶段——据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文献资料》(1950)和《走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道路的中国文学》(1954)。他运用的是最新资料，包括中国报刊所载的作品和文章，及时介绍和评论中国文坛的新人新作新现象。文章在苏联影响很大。《艾青评传》也是根据第一手(原文)材料写成的，在它之前中国国内还没有研究艾青的专著。

彼得罗夫的研究还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郁达夫和丁玲等人。他的鲁迅专著已在前一章(第十一章)论述。郭沫若的剧作《棠棣之花》(1954)、《虎符》(1955)、《卓文君》和《高渐离》(1958)俄译本(编入郭沫若文集第2卷)均是他的劳作成果。同时还为《巴金短篇小说集》(1955)写了序言，也为曹禺剧作俄译本两卷集写了后记，其中都含有他的研究心得。而《郁达夫的创作道路》(1972)一文则不但叙述了作家从20年代末到抗日战争期间的创作活动，而且阐明了郁达夫创作方法的特点。

彼得罗夫写的《列宁论文学艺术问题著作的早期中译本》(1970)和《苏联文学在中国:20至30年代》(1977)等文反映了他研究领域的扩大。看来他注意的范围是相当宽的，工作也很有成效。

四、苏霍鲁科夫著《闻一多生平与诗歌创作》

东方学研究所研究员瓦列里·季莫菲耶维奇·苏霍鲁科夫(B. T. Сухоруков, 1929—　)以研究闻一多的成果获得副博士学位，该成果并形成专著《闻一多生平与诗歌创作》(Вэнь И-до: Жизнь и поэтическ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 1968)出版，为苏联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增添了一分成绩。作者1964年曾来北京大学进修。得到中文系同行的帮助，其专著所依据的材料是比较丰富的。作者说，他依靠的是闻一多的诗作、文章、书信以及有关诗人的评论和回忆录等多方面的资料，在苏联第一个写成了研究闻一多的专著，其目的在于尽量充分、准确又客观地向苏联读者介绍诗人的生平与创作各主要阶段，既不作理想化的描述，也不夸大诗人的缺点，特别是有

关诗人早年的迷惘。全书(146 页)三章分别从“创作道路”、“诗歌创作”和“风格特点”来分析问题,确实体现了作者所设想的目标。他概括了闻一多的创作,认为后者是鲜明的浪漫主义作家,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济慈(1795—1821)的热情崇拜者,融民族传统与西方诗歌艺术成就于一身的中国当代著名诗人。他指出,全面评价闻一多的一生,应该认为这是一个著名的诗人,通晓中国古典文学的杰出学者,争取自由和民主的积极战士和著名社会活动家。他特别推崇《忆菊》、《洗衣歌》等诗。苏霍鲁科夫并于 1974 年翻译出版了闻一多的《忆菊》诗集。

此外,苏霍鲁科夫还翻译过《王维诗集》(1979),写过《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情节、形象、主人公》(1980)、《中国当代小说特写中的知识分子主人公形象》(1982)等论文。

五、阿直马穆多娃著《郁达夫与“创造社”》

维奥拉·谢尔盖耶夫娜·阿直马穆多娃(В. С. Аджимамудова, 1936—　)曾于 1970 年以研究郁达夫的论文获副博士学位,题目为《郁达夫与“创造社”》(Юй Да - фу и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щество《творчество》, 20 页),后来 1971 年又出版同书名专著(192 页)。此外,她在 1971 年还发表论文《早期的“创造社”(1921—1924)》,载《中国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文集(1973)。

《郁达夫与“创造社”》可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讲“创造社”,包括 1921 至 1924 年早期的“创造社”和 1925 至 1929 年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对这个著名的文学团体作了系统的历史回顾并评价其得失。肯定了“创造社”在 20 年代中国的文学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犯过“　”左倾思想和宗派主义的错误。不过,作者指出,在中国于五六十年代出版的许多现代文学史书、研究性的专著中,对于 20 年代那批主张文学革命的人士所提出的庸俗化的、教条主义的文艺理论,还没有给予应有的批判,倒是西方的汉学家著作中先做了这件工作。专著对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以及后期参加该社的成员李初犁、彭康、冯乃超、朱镜我、王独清的思想观点、文学活动都作了分析。

专著后半部分论析了郁达夫的生平和创作,着重讨论郁达夫的散文和小说作品,对小说《沉沦》(1921)、《茫茫夜》(1923)、《过去》(1927)、《迷羊》(1923)、《人妖》(1923)和他的散文小品包括游记、随笔等作了重点分

析。作者概括了历来对郁达夫的评论,说郁达夫的创作方法曾经有过几种不同的提法。在二三十年代,成仿吾、郭沫若这些评论者几乎一致把郁达夫归入颓废派,这种观点也被苏联有些汉学家接受,例如鲍·瓦西里耶夫(王希礼)1932年发表的文章《帝国主义时代中国文学里的外国影响》(载《东方文学问题》集),就写到"资产阶级颓废派"作家郁达夫是仿效安德烈耶夫等人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美国汉学家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也写到郁达夫作品中的颓废派特点。但阿直马穆多娃认为,即便郁达夫自称颓废派的话也不可信,因为颓废艺术是产生于反对中世纪斗争的时期。后来,50年代的中国文学教材中又用庸俗化的术语称郁达夫的创作方法是"保守的,反动的浪漫主义"。比较认真地分析郁达夫创作方法的是捷克女汉学家多列扎洛娃,她称郁为浪漫主义作家,这个意见得到捷克老汉学家普实克院士的赞同。

本专著的作者认为,郁达夫的创作方法,更准确一点说,应该是"感伤的浪漫主义"(第143页)。阿直马穆多娃还引用了郁达夫很长的一段作者自白(《郁达夫全集》第2卷第16页,上海,1927)来证明自己的论点。

郁达夫的短篇小说集《春风沉醉的晚上》已译成俄文,于1972年出版,全书有207页。

阿直马穆多娃一向致力于现当代文学的译研,1988年又译出谌容小说《人到中年》。1993年写成专著《田汉》。上世纪末她赴台北淡江大学任教,于2001年接待笔者时说,仍研究当代文学。

六、索罗金著《茅盾的创作道路》

中国现当代文学一直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索罗金注意的领域之一。他曾在早期发表研究鲁迅的专著,后来又陆续写了论述叶圣陶、老舍、叶紫、艾芜及一些现代作家的文章。他翻译的现代文学作品则更多,有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茅盾、老舍、郁达夫、艾芜、王统照、王愿坚、茹志鹃的中、短篇小说。不久前又翻译了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还有王蒙、刘心武、冯骥才、陈香河、韩少功的中、短篇小说。

1962年出版的专著《茅盾的创作道路》(Творческий путь Мао Дуня),则是他的一个重要成果。这本132页的著作全面介绍了茅盾的生平和活动,不但在苏联,而且在中国国外都是第一本专门论析茅盾的书。本书分几个方面来谈论这位当代中国大作家的创作。首先谈到茅盾早期

的探索,肯定他在20年代初倾向于自然主义的艺术观,以茅盾自己的创作以及文学思想、文字主张为据,断定他实际上奉行的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原则。书中接着分析在中国革命形势日益发展的情况下,茅盾的创作就显出两个方面的重大作用:既揭露统治者反人民、反正义的罪恶,批评小资产者革命的摇摆性;又描绘和表现工农大众包括革命者为自由解放、为公理和正义所作的斗争。其结果是成就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塑造出一批正面人物形象。接着,书中论述作家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创作,特别肯定茅盾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最后,简要地涉及新中国成立之后茅盾的活动,自然不限于文学,而是包括一个社会活动家的各个方面。

七、施奈德著《瞿秋白的创作道路》

东方学研究所研究员马克·叶夫谢耶维奇·施奈德(M. E. Шнейдер, 1921—1981)主要研究领域是瞿秋白的思想、活动及创作。1965年来北京大学学习时,曾得到导师曹靖华教授的直接指导。中国新文学的前辈,鲁迅和瞿秋白的朋友曹靖华给了施奈德很大的帮助,不但给予答疑,共同讨论和分析瞿秋白的创作,而且回忆瞿秋白的革命活动,包括指点搜集珍贵历史资料的处所。施奈德曾以有曹靖华这样在苏联也享盛名的学者为导师而自豪,也为自己在"文革"刚发动时期亲眼看到曹靖华受到不公正待遇而感到不平和忧虑。施奈德早在1963年就以《瞿秋白的创作道路》论文获副博士学位,先后编译过《瞿秋白文集》(1959)、《瞿秋白选集》(1975)和《瞿秋白各个年代的政论文集)(1979)等。

专著《瞿秋白的创作道路》(Творчество путь Цюй Цю-бо, 1964,共227页)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革命家、作家、政论家》基本上概括了瞿秋白一生的主要业绩。其中《朋友的眼光》一章肯定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是最早向中国人介绍俄国新的社会和人们的艰苦斗争,反映的是作者热烈的共产主义激情和信仰,所以施奈德赞颂瞿秋白有"朋友的眼光"。其他各章均具体评介在苏联也已驰名的瞿秋白革命和写作的生涯。第二部分《文学理论家》介绍瞿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的情况,分析瞿的文艺观点,包括"文学是具体的历史的现象"、"现实主义问题"、"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方法"、"揭露资产阶级的艺术理论"等方面。第三部分是《革命作家们的导师》,也是肯定瞿秋白在中国革命斗争,特别在革命文学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施奈德还编了一份详细的瞿秋白著译书

目，附于书后。

八、两部评老舍的专著——安季波夫斯基《老舍的早期创作》和博洛京娜《老舍战争年代的创作》

在苏联最受重视的中国现代作家，除了鲁迅，就是老舍。老舍的主要作品已全部译成俄文出版，评论文章迄今已发表120多篇，研究专著已出版两部，还有一部（谢曼诺夫著《通过讽刺和幽默作家的镜子》）即将出版。正如为鲁迅研究而编有《鲁迅传论书目》（1977）一样，苏联汉学界也为老舍研究而编了《老舍传论书目》（1983）①。

（一）《老舍的早期创作：主题、人物、形象》（Раннее творчество Лао Шэ: Тема, герои, образы）②

作者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安季波夫斯基（А. А. Антиповский, 1923—　）是远东研究所研究员，曾于1964年以研究老舍的论文获副博士学位。他在1952年曾来中国短期工作过，在50年代中期认识了老舍。他说："这次见面对我研究专题的选择起了很大作用"，"同老舍的交谈，使我理解作家与他那已赢得读者的作品中那些人物、主题有着深刻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专著《老舍的早期创作：主题、人物、形象》共有四章。第一章《伦敦时期的创作》评述老舍的重要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第二章《猫城记》很有特色，在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众说纷纭、争论很大的时候、安季波夫斯基率先充分肯定了它的价值。认为"小说《猫城记》标志着老舍早期创作进入了转折阶段。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讽刺作品之一"。一方面，"在这作品里清楚地表露了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爱国主义者的大作家的才能"，另一方面，"作家对现实集中了批评的火力，夸张和怪诞让作者得以把现实放大到神话般的大规模的讽刺"。安季波夫斯基在1985年3月北京的"全国第三次老舍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继续发表他的观点，不同意我国学术界视该小说为"有严重错误的"作品

① 两本书目均由格拉戈列娃编，索罗金序。

② 中译本改名为《老舍早期创作与中国社会》，安季波夫斯基著，宋永毅译、曹素华校，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

的看法,认为它是"世界讽刺史上的杰作","作家的名字完全可以和世界文学中的谢德林及法朗士并列而无愧"。第三、四章《早期的短篇小说》和《作家创作中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及《骆驼祥子》、《离婚》、《月牙儿》以及一批短篇小说,紧紧扣住主题和人物形象做文章,也有可发人思考之处。本书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常把老舍与狄更斯、果戈理、谢德林等西欧、俄国作家对比,这同样可给人以启发。

(二)《老舍战争年代的创作(1937—1949)》(Творчество Лао Шэ в 1937—1949 гг.)

本书仿佛是上一部书的续篇,虽然作者不同,但从时间上恰似互相配合,分别论述 1926—1937 年和 1937—1949 年的创作,正好对老舍解放前的创作做了完整的论述。

作者奥尔迦·彼得罗夫娜·博洛京娜(О. П. Болотина, 罗金兰, 1945—　)是海参崴远东大学的副教授,属于年轻一代很有才华的汉学家。曾以论《老舍在 1937 年至 1949 年的小说》(1978)一文获副博士学位。同时,从 1973 年研究生毕业后,即陆续发表论老舍的短篇小说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长篇小说《火葬》、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以及老舍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的活动等方面的文章约 17 篇。1983 年发表的专著《老舍战争年代的创作(1937—1949)》(230 页)则是她的近作。短短的十年里集中发表这么多文章,使她立刻成为引人注目的苏联研究老舍的专家,并被邀请来参加 1985 年 3 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三次老舍学术研究讨论会"。随后她来北外任教时曾与笔者晤谈,云她还写过抗战时期文学史的片断等。

博洛京娜论老舍的专著分为四章。第一章《老舍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从"作家与时代"、"文协的成立"、"处于事变的漩涡"、"寻求公众"、"抗战人人有责"、"文化友好往来"等方面集中论述了老舍在该时期的活动,说明积极投入抗战促进了老舍的思想和创作,带来了丰硕的成果。第二至四章论述老舍的作品,分别剖析短篇小说、长篇《火葬》和长篇《四世同堂》。作者用社会学的分析办法谈了"短篇小说里的人、社会和战争"、《火葬》里反映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英雄业绩"、《四世同堂》里描写的"生活真实"。专著由此引申出同西方学者不同的评价。作者说,她不能

同意美国汉学家把《四世同堂》将“小说人物划分为好的(爱国的)和坏的(附敌分子),是很粗疏的”看法。认为“这部长篇小说就是把人物形象分成‘爱国主义者’和‘背叛者、侵略者’,也是完全符合民族解放战争实际生活的,在那些年的中国社会中间是很有代表性的现象。”(第208页)

博洛京娜所采用的方法,实际上也有比较分析的方法,时时与中国学者、与欧美汉学家的评论相对比,从而引出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结论。

当然,直接用比较来阐明作品本身特色的,还是另一位汉学家谢曼诺夫更明显。他论《猫城记》的文章题目就是《猫城记与欧洲文化》[①]。文中把老舍的这部长篇小说与威尔斯的《月球上的第一批人》、法朗士的《企鹅岛》、谢德林的《一个城市的历史》作了对比研究,指出威尔斯的讽刺极尖锐,法朗士的讽刺毫不掩饰,因为欧洲对讽刺已经习惯了。而谢德林和老舍需要隐晦一些,因为那里的人们还不习惯。

九、尼科里斯卡娅著《曹禺创作概论》

莫斯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一本学术新书《曹禺创作概论》(Цао Юй: Очерк творчество, 1984),是该校副教授莉吉娅·亚历山大罗夫娜·尼科里斯卡娅(Л. А. Никольская, 1926—)的著作。这是她以1960年答辩通过的副博士学位论文《曹禺的剧作》为基础,作了重大修改和补充后写成的。全书有182页。

我国著名作家曹禺的剧作在国际上流传的范围越来越广,迄今已在苏联、匈牙利、捷克、东欧各国以及拉丁美洲上演过。在日本和亚洲各国早已上演更不用说了,美国也在1980年上演《日出》和《北京人》,1984年上演《家》。

在苏联,除了五六十年代曾翻译和上演过他的剧本外,1983年,即两国交往中断了20年之后,又在海兰泡市(布拉戈维申斯克)重新上演《雷雨》,演出时改名为《台风》。从此《台风》便成了“阿穆尔剧院”的保留剧目。1983年8月在莫斯科也上演《台风》。同样,近年来苏联对曹禺的研究也多了起来。

尼科里斯卡娅的专著主要是为曹禺勾勒了一个创作的概貌。除了用不长的《前言》简叙作家早期的活动与创作外,主要篇幅是分九章依次分

---

① 见中译本《老舍早期创作与中国社会》的附录。

析曹禺的剧作《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蜕变》、《家》、《晴朗的天》、《胆剑篇》和《王昭君》。

本书根据对一系列剧作的具体分析,阐明了曹禺创作的个性特点,包括他的创作思想、表现民族性格、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素质以及剧作者对当代中国和世界重大问题、生活现实的态度。

尼科里斯卡娅所写的论中国当代作家的专著,还有《郭沫若:作家、学者、革命家》(1958)、《巴金创作概论》(Ба Цзинь: Очерк творчества, 1976, 103 页),以及一批论田汉、巴金、许地山创作的文章。

在写到本章主要内容的时候,还有两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汉学家热洛霍夫采夫和孟列夫值得一提。热洛霍夫采夫曾经写过评鲁迅、郭沫若、邓拓等的文章,翻译了邓拓的《燕山夜话》(1974),还以 1966 年在中国进修期间亲眼目睹的事件写了《近距离观察"文化革命"》,在 1968 年的《新世界》杂志上连载,并于 1973 年出了单行本。

孟列夫写了专著《中国古典戏曲的改革》(1959),主要内容是谈中国解放后的戏曲改革,这是汉学家中很少人涉足的领域。可惜资料不全,这里不能作介绍。

十、其他几位作家的专论

现代文学作家中,还有多人被写成评传,或成单行本,或作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如:马尔科娃作《郭沫若的诗歌创作》(1961 年,99 页),扎雅茨作《秋瑾的生平与创作》(1984 年,136 页),列别捷娃作《萧红的生平、创作与命运》(1998 年,164 页)和《叶圣陶的创作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上的地位》(1983 年);此外,还有特尔洛夫作《叶圣陶的创作》(1963 年),罗季昂诺娃作《中国当代作家张贤亮的创作》(2003 年)等。

十一、中国现代文学在俄苏时代的乌克兰

中国文学,特别是现当代文学作品也有了苏联其他各民族文字的译本。如鲁迅、老舍等人的作品都被译成乌克兰文、塔吉克文、亚美尼亚文、哈萨克文等出版,但是其中多数是从俄文转译的。而乌克兰文的译本,由于有几位懂中文的汉学家的工作,使得不少作品都是从中文原作直接翻译的。其中值得介绍的有两位汉学家。

住在基辅的苏联作家协会会员、乌克兰作协工作人员伊凡·科尔涅耶

维奇·契尔科(И. К. Черко, 1922—)是乌克兰著名的汉学家。1940年参军,曾在远东部队服役,1943年进海参崴东方语言军事翻译专修班学习,到过我国吉林市苏军俘虏日军的战俘营工作,1953年退役。从1955年起,在担任报刊编辑工作之余,坚持不断翻译中国文学作品,迄今用乌克兰文出版的已有30多种。计有:《新中国的孩子们》(1955)、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1956)、鲁迅《故乡》(1957)、朱白《快乐的日子》(1957)、夏衍《考验》(1957)、鲁迅《阿Q正传》(1958)和《鲁迅选集》(1961)、茅盾《虹》(1959)和《蚀》(1985)、老舍《月牙儿》(短篇小说集,1974)、高玉宝《我要读书》(1959)、杜鹏程《在和平的日子里》(1961)、巴金《家》(1976)等,还有古典文学作品如蒲松龄的《聊斋选》(1980)、宋代的话本《碾玉观音》(1983)。

契尔科还经常在乌克兰报刊上发表文章介绍中国文学作品,为乌克兰百科全书撰写所有介绍中国作家的条目包括《中国文学》综合条目。为基辅电影制片厂翻译中国电影的对白供译制片用,如电影《地道战》等。

另一位乌克兰汉学家是住在莫斯科任苏联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的雅德维加·康士坦诺夫娜·李谢维奇(Ядвига Лисевич, 1951—),係汉学家伊·李谢维奇的夫人,笔者会面过的这位年轻的女汉学家也是诗人,从1969年起就经常发表诗作。这样,她从中文翻译成乌克兰文的作品就以诗居多,如译杜甫、艾青、李瑛、张志民、公刘、流沙河、邵燕祥、张学孟、舒婷的诗。同时,她也翻译了不少当代小说,如张抗抗、周克芹、张贤亮、王蒙的作品。其中有的是同另一位莫斯科的汉学家尤里·亚历山大罗维奇·索罗金合作翻译的。

基辅的重要乌克兰文杂志《全球》和其他报刊近年来经常登载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作,并撰文介绍我国的舍甫琴科诗译者——著名翻译家戈宝权的事迹。经常出版中国文学作品乌克兰译本的是第聂伯河出版社和青年出版社。

第十六章
中国当代文学在俄罗斯

1991 年 12 月苏联解体之前，曾有过一波中国当代文学热潮，从 80 年代初起延至世纪末。

在十年“文革”动乱之后，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文学创作的勃兴立刻引起了苏联汉学家的注意。70 年代末起苏联报刊陆续加强报道，不断译介中国文学，特别是反映改革开放的作品，更受苏联读者欢迎。苏联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可以说又达到高潮。

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彼此之间文化交流的加强，许多汉学家重申了他们对中国文学的高度评价，当代汉学家费德林在 1989 年讲的话就很有代表性。他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就没有中断过，为人类文化宝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在文学和文化方面是值得自豪的国家。中国的诗经、楚辞、唐诗、元曲等优秀文学著作是任何一个国家所望尘莫及的。”

为了扩大流传，让苏联读者共同享用中国文学这笔可贵的精神财富，在苏联时代已决定选编、翻译出版一套大型的“中国文学丛书”，共分 40 集，包括从《诗经》到当代作家的文学名著。有几十位汉学家从事这项选编工作，迄今已出版了大部分选集。

一、小说、诗歌翻译作品数量剧增

苏联解体前后，文学翻译以中国当代作品为重点，报刊已发表许多当代中国文学的译作，汇编成书出版的有中、短篇小说集七部，中、长篇小说十种，诗集一部。其中，中短篇小说集计收入小说近 60 篇，诗集收入 22 位诗人的 30 余首诗。按年代计算为 1982、1983、1984 年各出版一部，1985、1986 年各出版三部，1987 年出版小说二部、诗集一部，1988 年出版小说四部，1989 年出版小说二部。

（一）中短篇小说集

短篇小说集《人妖之间》（Люди и оборотни，热洛霍夫采夫、索罗金编选，1982年，进步出版社），收入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夜的眼》，陈翔鹤的《广陵散》，刘心武的《班主任》、《我爱每一片树叶》，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李陀的《愿你听到这支歌》，韩少功的《月兰》，韶华的《舌头》、《上书》，刘宾雁的《人妖之间》，李准的《芒果》，共12篇。

中篇小说集《一个人和他的影子》（Человек и его тень，热洛霍夫采夫编选，1983年，青年近卫军出版社），收入刘宾雁的《一个人和他的影子》，刘心武的《如意》，王蒙的《蝴蝶》，陈淼的《稀有作家庄重别传》，共五篇。

《当代中国小说，王蒙，谌容，冯骥才》（Современная новелла Китая：Ван Мэн，Шэн Жун，Фэн Цзи－цай，索罗金编选，1984年，消息报出版社），收入王蒙的《春之声》、《海的梦》，谌容的《人到中年》，冯骥才的《啊！》及《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等五篇。

短篇小说集《纪念》（Память，索罗金编选，1985年，文学出版社），收入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钱钟书的《纪念》，峻青的《山鹰》，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春之声》，陈翔鹤的《陶渊明唱挽歌》，王希坚的《李有才之死》，李准的《芒果》，冯骥才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蒋子龙的《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刘绍棠的《蛾眉》等12篇。

中短篇小说集《人到中年》（Средний возраст，李福清编选，1986年，虹出版社），收入冯骥才《啊！》、王蒙的《杂色》、张一弓的《犯人李桐钟的故事》、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谌容的《人到中年》、刘心武的《立体交叉桥》及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七篇。

《冯骥才中短篇小说集》（Фэн Цзи－цай，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李福清编选，1986年，虹出版社），收入《啊！》、《铺花的歧路》、《感谢生活》、《神鞭》、《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三十七度正常》、《意大利小提琴》、《匈牙利脚踏车》、《在两个问号之间》、《在早春的日子里》和《老夫老妻》等十篇。

短篇小说集《相会在兰州》（Встрача в Ланчжоу，热洛霍夫采夫编选，1987年，青年近卫军出版社），收入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秦兆阳的《觉醒》、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何士光的《快乐》、周克芹的《勿忘草》、张贤亮的《苦泉》、李功达的《伤疤》、温小钰的《小太阳》、张抗抗的《夏

天》、冯骥才的《酒的魔力》、陆文夫的《临街的窗》、刘宾雁的《千秋功罪》以及刘心武的《相会在兰州》等13篇。

（二）中长篇小说（单行本）

古华的《芙蓉镇》（В долине лотосов），谢曼诺夫译，热洛霍夫采夫写了后记。这是两国停止交流后20年来苏联翻译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于1986年由虹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十万册印行不久就销售一空。据译者说，他应作者和中国现代文学馆之要求，为了搜集该书俄译本作为藏品，曾在出书后不久跑遍了莫斯科各书店，竟然一本也买不到。

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索罗金译，艾德林作序，1980年由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40年代写的作品，但在中国刚出版不久就被汉学家译成了俄文。

张抗抗的《北极光》（Северное сияниек），已译载在苏联《外国文学》杂志1985年第6期。

谌容的《太子村的秘密》（Деревенская тайна）由谢曼诺夫译，载于《莫斯科》杂志1987年第8期。

路遥的长篇小说《人生》（Судьба），谢曼诺夫译，1987年，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

王蒙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Метаморфозы, или Игра в складные картинки），华克生译，1988年由虹出版社出版。

张贤亮的长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Женщина——половинка мущины），华克生译，1989年由虹出版社出版。

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Тяжёлые крылья），谢曼诺夫译，1989年由虹出版社出版。

此外，即将出版的还有谢曼诺夫所译蒋子龙的中篇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和谌容的中篇小说《结婚进行曲》（Хвалебные песни，1995年，青年近卫军出版社）。

（三）诗歌

诗集《蜀道难·50至80年代的中国诗歌》（切尔卡斯基编选，1987，文学出版社），其中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诗”一栏中选入艾青、公刘、浪波、李发模、骆耕野、刘祖慈、吕剑、寥寥、苏叔阳、吴力军、方冰、方殷、方敬、傅天

琳、韩瀚、胡笳、黄永玉、赵恺、朱健等22位当代诗人近年写的诗30首。

当代文学的译作大量出现，这同汉学家中的当代文学热有关，许多人对当代文学倾注了极大的精力。不但一向是重点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学者如索罗金、热洛霍夫采夫，就是以往研究重点不是当代文学的人，如华克生、李福清、谢曼诺夫等，现在也转向当代文学。谢曼诺夫说他“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继续培养青年汉学家和翻译中国当代小说”，他认为“这是当前最主要的事，因为这类小说非常多”。

此外，苏联读者的中国当代文学热也是促进的因素，这类作品的俄译本印数很多，往往在五万册以上，还供不应求。这种形势大大鼓舞了汉学家的译介热情，不少杂志报纸也以刊载这类作品为乐事，以吸引读者。

二、汉学家的评论

注重评论是这个时期苏联介绍中国文学工作的特点。像《芙蓉镇》俄译本1986年出版以后，一年之内有四篇评论文章发表。热洛霍夫采夫为译本写的后记认真分析小说的得失，并由小说论及新时期中国文学的成就，极力向俄文读者推荐作品和作者，他说“古华的小说是属于摆脱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新时代的中国文学。但他的作品中最引人之处还是人。小说里都是有血有肉的山乡居民。没有空发政治议论，没有堆砌司空见惯的套话，也没有摆弄肤浅的哲理，而是一些具有七情六欲活生生的人出现在我们眼前。”“长篇小说《芙蓉镇》以及1981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无疑可以证明，古华属于中国当代文学中社会批判倾向中最有才华的作家之列。”远在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的故乡塔冈罗格，当地的报纸也发表文章评论《芙蓉镇》，说：“这是中断了20年之后，在苏联出版的第一本大部头的中国文学作品。”该文作者米哈依洛娃称赞说古华熟谙农村生活，“芙蓉仙子的故事取材于生活，不过现实中的那个农村妇女命运更为悲惨，她的第二个丈夫也被害死。但古华认为，最好是让小说人物的命运具有概括性和乐观的结局。小说在中国广为流传，这一点说明了作者那样决断是正确的。它已获得最光荣的文学奖金——茅盾文学奖，并于不久前搬上了银幕。”

苏联近年来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论，其要点有以下几方面：

(一)肯定成就

肯定我国80年代的文学,指出它有暴露阴暗面和反映开放改革的成就。汉学家认为从70年代末开始了新阶段。李福清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传统成分》一文中指出:"自1979年当代中国文学开始了一个新阶段。"索罗金在《纪念》小说集的前言中说:"当代中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传统到70年代末开始恢复"。他同热洛霍夫采夫为《人妖之间》小说集写的前言中,表示同意中国评论界的看法:"新阶段"从1979年开始(11月发表刘心武的《班主任》(Классный руководитель)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开端)。他们两人还进一步指出:"居于当代中国文学生活中心的,是'暴露文学'流派",它"是中国一种全新的现象,其批判的力量大大超过以前的同类作品。"热洛霍夫采夫在另一篇文章里还说道:"中国出现了社会批评倾向的文学,这是国内生活中的大事。"

李福清在《人到中年》俄译本的长篇序言中指出,暴露文学和"文化大革命"的题材是1978年到1981年小说创作的主要题材,之后它就逐步退居次要地位。出现反映改革的文学。他说《乔厂长上任记》(Директор Цяо приходит на завод)"抓住了时代的要求,现在中国正需要这种人"。索罗金在《纪念》小说集的序言中回顾了中国小说创作的发展历程,他以为"伤痕文学"产生的原因,是由于艺术家感到需要讲述个人的遭遇和国家的不幸,讲述人民消除苦难的希望,需要倾吐郁结在心中的痛苦。但是中国生活在恢复正常后,在城市和乡村里,"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仍存在不少重大的、难以解决的问题",而《陈奂生上城》、《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已经反映了这类问题。

(二)推介新一代作家

向苏联读者推荐中国新一代作家,并对他们的创作做深入具体的分析。谢曼诺夫在介绍《芙蓉镇》的文章中盛赞新一代作家:"当代中国文学的突出特点之一,是一代文学新人的崛起。50年代我们介绍过的那些中国作家根据自然法则,现在都已处于'古稀之年',因而也很少写作了。站在文学舞台前沿的是一支新的文学创作力量。古华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们分析古华文学创作的成就,说:"古华明朗而令人信服地描绘了中国农村近20年中的生活,有时他像老舍、赵树理的名作一样运用了一些

讽刺和民间的幽默。对小说中心人物的性格处理,多姿多彩的风景描写以及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是异乎寻常的对爱情主题的关注,构成了古华创作的特点。”“抒情和社会批判相结合、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等特点,必将使古华的创作得到发展。”谢曼诺夫也指出:“并非全书都保持同一水平。小说中有一些冗长和过于伤感的地方。老共产党员谷燕山虽然总体来说描写是成功,但是使人觉得有些装腔作势。”

巴斯曼诺夫的一篇评论中充分肯定谌容在《人到中年》表现出的才气,认为小说是“50 年代走上工作岗位、具有社会主义理想并热烈希望参加新中国建设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生活独特的编年史”。

李福清在《论当代中国中篇小说及其作者》。一文中,逐一介绍中国几位当代的知名作家。充分肯定冯骥才勇于探索、不怕风险的创作精神,尤其是他的《啊!》和《铺花的歧路》,他指出,张一弓的《犯人李桐钟的故事》特色是具有强烈政论的色彩,使人能“更为深刻地理解中国农村发生过的事情”;同样,“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系涉及中国未来道路问题”。他分析《人到中年》和《立体交叉桥》(Вертикальная развязка)等作品的成就,认为前者说明作家谌容“准确地把握住女主人公病倒的社会原因,细致地描写了千百万热爱人民的知识分子内心的苦恼”;后者表明作家刘心武“不单对北京目前的生活作了速写,而且告诉人们,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应当改善,应当生活在适宜人生活的正常条件”。而《乔厂长上任记》则表明作家蒋子龙准确地抓住了时代的要求:“中国正需要这种熟悉业务而不是只懂得喊口号的人,需要精力充沛和行动果断的人来领导经济工作和工业。”

此外,李福清也同索罗金一样重视中国文学创作手法的更新。索罗金在《纪念》的前言中特别肯定:“中国近年来的小说创作,除了题材更扩大、人物更多样外,还在形式方面作了探索,如运用内心独白、意识流、时序颠倒等手法,以王蒙的小说具有代表性”。李福清则在其长文中分析了王蒙小说《杂争》的艺术特点,并指出王蒙采用的意识流手法也具有自己的特点,即与中国传统的叙事方式,传统的形象性相结合。如其所写的骑者与马谈话便是中国的传统手法。

(三)探索当代文学中的民族传统成份和外来影响

汉学家注意到中国 80 年代文学的一个特点是重视借鉴外国的,特别是现代派手法。但他们对于这方面成就的评价都不高,认为当代文学更多

的是吸收了中国传统的成分。托罗普采夫这位最有代表性的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研究员描述道："中国今天发生的变化，可以用一个术语来概括，即'开放政策'。在文艺上这就意味着尊崇一种文艺观的做法已经寿终正寝，开始广泛接受包括先锋派在内的各种不同的文艺美学理论和流派。""今日中国在探索，可是必须承认，这探索不是任何时候都成功，有时显然是权宜之计，比如电影中的大量'功夫'片。1979—1980 年举办了两次星星画展，作品有现代派、超现实主义、流行艺术，甚至有拼贴。报刊上也纷纷发表文章，要求中国发展多种多样的文艺流派，甚至走到极端，把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对立起来，主张踢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绊脚石'，来'为西方艺术鸣锣开道'。在戏剧方面则热衷于布莱希特和梅耶尔霍尔德，而冷落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成就。"

托罗普采夫在分析了王蒙的《海的梦》、《春之声》、《杂色》后，对作家手法的评价仍持保留态度。他认为："王蒙这些中国文学的创新之作中究竟哪些是本民族的，传统的，哪些是借鉴来的呢？要弄清这些问题还为时过早。"他说，连王蒙自己都"流露出一种担心，广大读者会怎样看待这种新的形式"。

托罗普采夫阐述了他的评价：王蒙的手法，与其说是借鉴外来的不如说是继承了传统。其理由是："首先应当指出，在欧洲传统文学中可以算作创新的那些特点，对远东来说只不过是掌握传统的遗产而已。比如在中国中世纪文学中，有一种独立的体裁叫做杂纂，它的特点是内容杂而散（近似一种'自由联想'），有大量无关紧要的细节，仿佛是作者顺便看到的一般（普希金根据斯特恩类似的笔法称他为'不堪忍受的观察者'，而这在中国却是习以为常的）。所以说王蒙的一系列手法都有深厚的民族传统作基础，他只需作'小小的'变换，即把这些手法的描写作用换为心理作用。"①

李福清 1986 年 10 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上的发言甚至表示要同一些有不同看法的西方汉学家争辩，说：他们以为"在当代中国文学里没有什么与千百年的，极其丰富的民族传统相联系的特色，这种见解自然是肤浅的"。李福清详细论述中国当代文学从题材、情节、肖像描写，甚至形象和语言手段诸方面同民族传统有密切联系的看法。

他举写普通人的题材为例加以论述，冯骥才的短篇小说《雕花烟斗》，

① 转引自李明滨《中国当代文学在苏联》，载《中国比较文学》1990 年第 2 期。

使人想到《今古奇观》里的话本故事“俞伯牙摔琴谢知音”那个写高明的艺术鉴赏者(又是普通人)的传统题材。二者的情节相似,所不同的是,俞伯牙很快就明白了樵夫钟子期确实能赏识他的琴技;而唐画家是直到老花匠临死时才明白自己错估了人,后悔当初没有拿出自己雕刻的上品赠送花匠。即便小说中的“知音”二字,冯骥才也是取自俞伯牙的故事。

另一个例子阿城的中篇小说《棋王》(Король шахмат),也能使人想到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里的话本故事“小道人一着饶天下,女棋童两局注终身”。这两个故事似有亲缘关系,两个作品的主人公都迷上围棋,都想寻找旗鼓相当的对弈者。不同的是,话本里的国能在找对弈时还找到门当户对的妻子——少女奴观,而阿城的小说则没有爱情线索。但情节也是传统的神仙道士秘授技术。国能从道士手里得到弈棋的秘诀,阿城写的王一生则从拾破烂的穷老头那里得知下围棋的秘密。不过阿城也赋予穷老头以“神”的色彩,让王一生说出这样的话:“我心想,怕是遇上异人了。”

关于情节的传统色彩,李福清还举冯骥才的短篇小说《鹰拳》为例:“在练武馆里一个西方拳师逞凶狂,这时一位武艺高强的老者突然出现,教训了西方拳师一通,然后忽地消遁,无影无踪——这便是中国神奇故事中极为典型的神仙及时相助的情节。”

在肖像描写上使用传统模式也被李福清发现。他说蒋子龙的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对少女解净的描写,“她可真漂亮,秀发像翘起的凤尾,椭圆脸似粉妆玉刻;绣花绸衫,西服短裙,赤脚穿一双白色高跟牛皮凉鞋,难怪姑娘们……”在这里,尽管主人公的衣着全然是今日生活的特征,但在形象描写上却不乏传统的现成用语,如把发型比为凤尾,把姑娘的脸比为洁玉。“粉妆玉刻”与《红楼梦》第一回写少女英莲的美貌完全一致:英莲“生得粉妆玉琢”。

由此,李福清得出结论:“所有这些观察使我有理由认为,中国作家在世界现实主义文学轨道上前进的同时,在借鉴外国经验的同时,也会尽力运用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

三、作家的看法

应当看到,“中国文学热”主要还限于在汉学家当中。当代作家则相反,他们大多直言不讳地承认,对中国文学接触不多。我国读者所熟悉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书的作者瓦西里耶夫 1987 年访问中国时就

说："很遗憾我们对贵国文学的了解比你们对我国文学的了解要少得可怜。"苏联作协书记、作家巴克兰诺夫也说："我很惭愧对中国文学所知不多。"

这种情况，究其原因还是译介得少，远不能满足苏联读者的需要，也不能充分反映中国当代文学蓬勃发展、作品大量涌现的面貌。俄国人一向把学习汉字视为畏途，在俄语成语中就把一切无法理解或难以弄懂的事物称做"好像中国字"。几代汉学家克服了语言、文字，甚至古文等几重障碍，取得明显的成就，这是很可贵的。然而究竟难以造就规模宏大的中国文学工作队伍，即便在苏联时期已经作了有计划的培养，情况仍如李福清所说："我们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并不太多，……接班人也有问题"，因为目前"大部分有才华的中文毕业生愿意研究中国历史、哲学和当代问题，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兴趣不怎么大"。这一切不能不影响到中国文学在苏联的评介。正如长诗《二百一十步》的作者，80 年代访问过我国的诗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所指出，"对中国现代小说及诗歌，直到现在我国翻译得显然很不够"。

由于不了解，甚至闹了笑话。苏联著名的巴什基里亚民族诗人卡里姆（М. Карим，1919—　）说到一段故事："30 年代初，我第一次读到中国诗歌。那是我们的课本里用我们民族的文字译介了一首萧三写上海人力车夫的诗。女教师解释说，人力车就是人代替马拉一辆大车。一个人拉一辆大车！这不是开玩笑吗?!"所以这首诗令他百思不得其解，更谈不上欣赏或加以接受了。

再加上两国作家之间文学观念和传统的差异，要作中国文学对俄苏文学的影响研究，实际上是比较难找到根据的。

不过，有些作家也谈到对中国文学的关注。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说："还是在童年的时候，我就对中国发生的事件产生了兴趣，而接触中国文学已经是在文学院里了。至今我还能记得杜甫、李白及古代其他诗人的作品所给予我的感受（这些诗人的作品在我国译得十分出色！）。我也了解中国小说，从《红楼梦》到鲁迅的作品……中国现代小说及诗歌在我国引起巨大的兴趣。"

瓦西里耶夫具体谈到他所接触的当代作品，"我读过王蒙、谌容、蒋子龙的作品，但是使我感到亲切的是冯骥才的作品。他最优美的、伤感的、细腻的作品是《啊！》，我看到了作品中契诃夫式的辛辣的讥讽，看到了果戈

理为普通小人物忧心如焚。这也许可以说明我为什么对冯骥才的作品特别关注。”

由于有一批热心的汉学家在孜孜不倦地工作，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和影响会日益扩大和深入。

四、当代文学跨世纪的俄译

1991 年 12 月苏联解体后的形势影响，中国当代文学俄译的规模缩小。据统计，1992—2008 年仅出版俄译作品 16 部，其中长篇小说 7 部，中篇 26 篇，短篇 97 篇，散文 22 篇以及诗歌若干首。

（一）长篇小说有

棉棉《糖》，日丹诺娃译，252 页，2005 年，印数 5000 册。系从英文本转译。

卫慧《上海宝贝》，库德里夫切娃译，368 页，2006 年，印数 4000 册。卫慧《我的禅》，库德里亚夫切娃译，336 页，2006 年，印数 4000 册。此二书均从英文本转译。

蔡骏《病毒》，热洛霍夫采夫译，317 页，2006 年，印数 5000 册。蔡骏《诅咒》，热洛霍夫采夫译，461 页，2006 年，印数 5000 册。

姜戎《狼图腾》，阿格耶夫译，544 页，2008 年，印数 1 万册。

苏童《我的帝王生涯》，叶戈罗夫译，288 页，2008 年，印数 2500 册。

此外，有余华《许三观卖血记》被节选，沙皮罗译，选入沃斯克列辛斯基编《中国变形》中（2007 年）。

（二）中短篇小说集有

《孔雀开屏》，查哈罗娃、谢曼诺夫编选，多人译，292 页，1995 年，印数 5000 册。收入谌容《生前死后》、张洁《最后的高度》等人作品 12 篇。

《我们的同时代人》（杂志，1999 年，为新中国 50 周年国庆而编专号，印数 1 万册）。收入王蒙《春堤六桥》等人作品 7 篇，查哈罗娃等译。

《中国 20 世纪诗与小说》查哈罗娃、雅罗斯拉夫采夫编选，多人译，688 页，2002 年，印数 4000 册，收入臧克家等 60 多人的诗和王蒙《风筝飘带》等 20 人的小说，其中当代作品为 9 篇，译者托罗普采夫等多人。

《俗世奇人》小说集，收入冯骥才短篇小说《苏七块》等 18 篇，均斯佩

斯涅夫译，160 页，2003 年，印数 1000 册。

《上海人，当代上海作家选集》，罗季昂诺夫、谢列布里亚科夫编选，多人译，336 页，2003 年，印数 1000 册。收入王安忆《叔叔的故事》等人作品 12 篇。

王蒙《山坡上的脚印》，托罗普采夫编并译，256 页，2004 年，印数 1000 册。收入王蒙的中、短篇小说 17 篇（其中中篇 4，短篇 13）。

《中国变形》小说散文集，沃斯克列辛斯基编选，多人译，525 页，2007 年，印数 3000 册。收入王安忆《上海女性》、王小波《知识分子的不幸》等人小说散文 42 篇。

（三）两国互办友好年的互动文集

2006 年中国主办“俄罗斯年”，2007 年俄国主办“中国年”期间，由中国作家协会编选并资助对方翻译和出版了三本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选集。三本俄译均在 2007 年出版，卷首均冠以作协主席铁凝写的序言。详情为：

《雾月木栏》，416 页，印数 5000 册。收入 5 部中篇、9 部短篇小说。有迟子建的《雾月木栏》、铁凝的《永远有多远》等 14 位作者各一篇作品。译者有涅赫留多娃、斯佩斯涅夫、罗季昂诺夫等 11 人。

《命若琴弦》，543 页，印数 3000 册，收入 4 部中篇、7 部短篇小说，有史铁生的《命若琴弦》、王蒙的《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等 11 位作者各一篇作品。译者有米青娜、热洛霍夫采夫等 12 人。

《红云》，511 页，印数 3000 册，收入 5 部中篇、7 部短篇小说。有曹征路的《红云》、陈应松的《松鸦为什么会鸣叫》等 12 位作者各一篇作品。译者有杰米多、列梅琴科等 10 人。

综观当代译坛，在译研中国小说上最为活跃的为热洛霍夫采夫、托罗普采夫、查哈罗娃、沃斯克列辛斯基、斯佩斯涅夫和罗季昂诺夫。

（四）当代汉学家的评说

据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副系主任罗季昂诺夫的评说[①]，认为跨世纪时期的俄译中国小说有如下不足：一为发行量极小，仅几千册，很少有万册以上

① A. 罗季昂诺夫：《中国新时期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国际汉学》第 20 辑，大象出版社，2009 年。

的。同苏联时期的译本印数不是5万就是10万册相比,实在不可同日而语。其二为社会影响有限,读者甚至全不知晓。据罗氏向笔者说明,《俗世奇才》系译者斯佩斯涅夫自己出资印行,才印了1000册,作为赠品,少量在彼得堡大学校内销售,未超出校园范围。其三,大部分书是中方资助的,选材内容取决于中,但不一定适合俄国读者的口味,更不用说要达到广泛流传了。

这是文学交流中存在的新问题和新情况。

附　录
俄罗斯汉学家简介

（限本书提到者，以文学界为主，哲学、史学、语文学、艺术学等方面的人士酌量选入）

一、20 世纪以前

比丘林 Бичурин Н. Я.（1777.8.29—1853.5.11）

俄国汉学和东方学奠基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第九届宗教使团领班，修士大司祭，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出生于喀山省齐维利斯克县阿库列沃村楚瓦什族神父家庭。1799 年毕业于喀山神学院，以修道士留校任教，教法语，取法号亚金夫。1801 年任喀山约阿诺夫斯基修道院院长。1802 年为修士大司祭，任伊尔库茨克主升天修道院传教士学校住持。1807 年任俄国东正教驻北京第九届宗教使团领班，1808 年 1 月抵京，在京居留 14 年，习汉、满、蒙、藏语，先后编纂多部双语和多语辞典、汉语语法，编译大量经籍与文献，1821 年回国后因未能完成宗教使命等原因受东正教事务管理总局法庭审判。1823 年 9 月 4 日比丘林关押于瓦拉姆修道院，1826 年 11 月 1 日获释，任外交部亚洲司译员。1828 年 12 月比丘林当选为俄国科学院东方文学和古文物通讯院士。1829 年任圣彼得堡公共图书馆名誉馆员，负责汉、满文图书分类编目工作。1830 年随科学考察队赴俄中贸易中心喀尔喀蒙古区搜集资料，1831 年被选为巴黎亚洲协会会员。同年 1 月比丘林在恰克图应商人要求开办第一所汉语学校（1831—1861）。不久返圣彼得堡，1835 年再次前往任教，拟定教学计划，编写教材，为俄国汉语教学方法学奠定了基础。1838 年重返圣彼得堡，主要从事介绍中国历史、文学和哲学的著述活动。主要著作：

《中国——其居民、风俗、习惯与教育》(1840)、《中华帝国统计概要》(1842)、《中国的民情和风尚》等,翻译《成吉思汗家系前四汗史》(1829)、《三字经》(1829)等。

瓦西里耶夫(王西里)Васильев В. П. (1818.2.20—1900.4.27)

俄国科学院院士,通晓汉、满、蒙、藏、梵、朝、日文,俄国汉学学派集大成者。出生于下新城。1834 年入喀山大学语文系东方班,1837 年毕业留校。1937 年以《佛经》为题获候补博士学位,1839 年以《论佛教的哲学原理》一文获硕士学位。同年被派往东正教驻北京第十二届宗教使团为学员。他 1840 年到北京,1850 年回国。1851 年任喀山大学教授,1855 年任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教授、汉语教研室主任,教满语和中国史地与文学。1866 年瓦西里耶夫被选为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1886 年为院士。在 50 年中培养了大批俄国汉学家。主要著作有《佛教教义、历史、文献》(1857—1860)、《10 至 13 世纪中亚东部的历史与古迹》(1857)、《东方宗教:儒、释、道》(1873)、《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等。

沃伊采霍夫斯基 Войцеховский О. П. (1793—1850.11.7)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第十届宗教使团随团医生,喀山大学汉语教研室主任,生于乌克兰基辅省波韦茨克县,毕业于基辅神学院。1819 年他毕业于外科医学院。1820 年作为随团医生来华,学满、汉语,因治愈礼亲王之病而声名大振,1820—1821 年对防治霍乱流行卓有劳绩,1829 年 11 月 14 日获"鹊仙妙术"匾。1830 年他回国任亚洲司医生。1844 年任喀山大学汉语教研室主任,为该校第一任满语教授,主持成立满语教研室。著作:《汉满语初学课文》、《满语语法规则新释》等。

格奥尔吉耶夫斯基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 М. (1851.10.7—1893.7.26)

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汉语和中国古代史。他出生于科斯特罗马神父家庭。1873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语文系,获副博士学位,1875 年入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学习,1880 年毕业并获副博士学位。他随即前往中国,服务于茶叶公司两年。回国后又在东方系深造,1885 年格奥尔吉耶夫斯基以《中国初史》一文进行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同年在东方系开始讲授汉语和中国史课程。1889 年他以《对反映古代中国

人民生活史的象形文字的分析》一文进行博士论文答辩并于1890年获教授职称。其著作有《中国的生活原则》(1888)、《研究中国之重要性》(1890)、《中国人的神话观和神话故事》(1892)等。

卡缅斯基 Каменский П. И. (1765—1845)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第十届宗教使团领班,科学院院士,满文学家,出生于教士家庭。1787年毕业于下新城传教士学校,后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1794年他自愿参加驻北京第八届宗教使团为学员。1807年回国。任外交委员会亚洲司八等文官。1819年当选为俄国科学院研究东方文献和古文物的通讯院士,后为院士。1820年卡缅斯基被任命为第十届宗教使团领班并于1821年到北京,1830年其回国后还俗。主要著作有《关于雅克萨人札记》(1906)等。

卡法罗夫(巴拉弟) Кафаров П. И. (1817.9.16—1878.12.6)

修士大司祭,俄国东正教驻北京第十三、十五届领班。出生于契斯托波尔市(今鞑靼自治共和国境内)。1838年毕业于喀山传教士学校,后进入圣彼得堡神学院学习。1839年他自愿参加第十二届宗教使团,取法号鲍乃迪。卡法罗夫1840年到北京,1847年回国。1849年出任第十三届宗教使团领班并于1850年到京,1858年回国。1864年卡法罗夫由驻罗马大使馆教堂住持被任命为第十五届宗教使团领班,3月25日到京,1878年退休回国。先后三次来华,共居留30余年。其间1870—1871年他曾参加俄国地理学会组织的阿穆尔河和南乌苏里江考古与民族考察队约一年。他第一次居京时期,从汉、蒙、藏文佛典中作了大量摘译,除部分发表外,全部手稿赠给B·П·瓦西里耶夫。此外,他的著作全部发表,大部分刊于其本人创办的《俄国驻北京宗教使团成员著作集》(1852—1866)。所编《华俄大辞典》(1888)使其享有世界声誉。译作有《佛陀传》(1852)、《古代佛教史略》(1853)等。

列昂季耶夫 Леонтьев А. Л. (1716—1786)

俄国最早的汉学家之一。出生于莫斯科教堂工作人员家庭。1738年在汉语学校学习。1740年底结束。1741年调外交委员会工作。同年与罗索欣合编俄国的第一部中国书目,但未传世。1742年他自愿参加东正教

驻北京第三届宗教使团为学员并于1743年到京。列昂季耶夫曾任清廷理藩院满语通译,并在俄语学校任教。1755年与第四届宗教使团一同回国。1757年他协助罗索欣翻译16卷本《八旗通志》。1761年罗索欣去世后由他继续翻译,于1784年全部出版。1763年在圣彼得堡开办汉、满文学校,1767年参加修订《恰克图条约》的翻译工作。1769年返圣彼得堡任原职。从1771年至1786年列昂季耶夫共出版译作和著作21种,此外还有大量手稿。内容涉及史地、俄中关系、政制刑法、哲学伦理和上谕等。18世纪俄国共出版有关中国书籍和论文120种,他的译著占其中1/5,许多是欧洲第一次译本,并有大量注释。主要译作有《大清会典》(1778—1783)、《大清律》(1778—1779)、《大学》(1780)、《中庸》(1784)、《八旗通志》(1784)等。

米纳耶夫 Минаев И. П. (1840.10.9—1890.6.1)

佛学家,印度学俄国学派奠基人。出生于唐波夫省,1869年任圣彼得堡大学副教授,1873年被评为教授,主要研究南亚各国古代、中古和近代史,其贡献在于综合研究佛教史及其对东方各民族的影响。他对大乘和小乘佛经的年代和相互关系的研究成果,对世界佛学的发展很有影响。主要著作有《佛教研究和资料》(1887)等。

莫纳斯特廖夫 Монастырев Н. И. (1851.7.20—1881)

《春秋》的首位俄译者。他出生于沃洛格达省官宦之家庭。1870年毕业于沃洛格达传教士学校后进入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1875年他以《春秋》为题进行中国语文学硕士论文答辩。著有《评孔子的编年史〈春秋〉及其古代注释者》(1876)等。

彼特林(裴特林) Петлин И. Ф(

托木斯克的哥萨克,俄国官方第一次派赴中国的外交使团团长。1618年5月9日从托波尔斯克出发,途经大青山、呼和浩特、张家口,过长城,由南口抵达北京。他在驿馆逗留四天,未获晋见明神宗,得国书后于10月11日从张家口起程返国,于次年春抵达托木斯克。9月他到莫斯科呈交国书和中国地图一幅。

波波夫(柏百福) Попов П. С. (1842.8.26—1913.12.7)

主要研究中国政治、语文。他出生于库尔斯克传教士家庭,1865 年入圣彼得堡大学神学院。后转入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1870 年毕业于汉满班、获副博士学位。同年被派往外交部亚洲司工作,并派往北京。1886 年任北京总领事。1890 年当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波波夫 1902 年回国,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中国语文教研室任编外副教授,主持中国语文学讲座。俄国研究中亚和东亚委员会成员。波波夫以编《俄华辞典》和增补与完成卡法罗夫《汉俄合璧韵编》而驰名。

罗索欣 Россохин И. К. (1717—1761)

俄国第一个汉学家和满学家。1729 年参加东正教驻北京第二届宗教使团为学员,曾在国子监习满汉文。1735 年任理藩院通译,并在俄罗斯文馆任教,因获汉文中国地图并标出俄文而获沙皇赐准尉军衔与加薪。1741 年回国任科学院通译,讲授汉满语(1741—1751),身后遗有手稿约 30 部,主要为史地著作的翻译与注释,现大部分藏于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译作有《八旗通志》(1784)、《阿尔泰山记》(1781)等。

西维洛夫 Сивиллов Д. П. (1798—1871)

修士大司祭,法号丹尼尔,1921 年参加驻北京第十届宗教使团为修士司祭,1830 年回国。1837 年任喀山大学第一任汉语教研室主任,为 19 世纪前半期推动俄国汉学发展的重要学者之一。1840 年编出俄国第一部《汉语文选》。著有《中国儒释道三教简述》(1831)等,译稿有《四书》、《书经》、《孟子》、《道德经》等。

斯卡奇科夫 Скачков К. А. (1821—1883)

俄国外交官,驻塔城、天津等地领事,1848 年以第十三届宗教使团学员身份赴北京担任气象观测台台长,同时学习汉语。1857 年因病返俄,1859 年再度来华任塔城领事。1862 年卸任返圣彼得堡。1867 年第三次来华,任驻天津领事。1870—1879 年任驻中国各开放港口领事。其收藏汉籍善本之富,为当时俄国之冠,藏书现存莫斯科国家图书馆。居华期间,曾深入考察中国民情风俗、并与农民结交朋友,所著日记反映 19 世纪中叶中国农民生活的广阔画面,并记载太平军起义时期北京的情况。

斯帕法里 Спафарий Н. Г. (1636—1708)

俄国外交官。俄政府为了与清廷建立外交关系以发展贸易,于1675年3月派他为特使来华,1676年5月抵京,康熙四次接见,于1677年7月1日起程返俄。著有《经过西伯利亚的旅行》(1882)、《1675—1678年斯帕法里访华使团文案实录》(1906),两书均由尤·阿尔谢尼耶夫整理出版。

施密特 Шмидт П. П. (1869—1938)

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学院教授。1896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后出差北京。1899年到东方学院教汉语和满语。

二、20世纪以来

阿博尔京 Аболтин (Аварин) В. Я. (1899.10.1—1978.11.8)

经济学博士、教授。出生于拉脱维亚的农民家庭,1925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东方系。1935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27—1928年任驻中国总领事。1929—1930年任莫斯科东方学院教员、副校长。1935—1937年为塔斯社驻中国工作人员。1931—1935年为全苏东方学会、苏联科学院民族问题研究所、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员,1948—1956年为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1956年起为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发表著作300余种。主要著作有《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1957)等。

阿直马穆多娃 Аджимамудова В. С. (1936.2.2—)

出生于莫斯科职员家庭,1959年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以研究郁达夫的论文于1970年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1959年起为东方学研究所研究人员。90年代末起到台北淡江大学俄文系任教。著有《郁达夫与"创造社"》(1971)、《田汉》(1993)。

阿列克谢耶夫 Алексеев В. М. (1881.1.2—1951.5.12)

主要研究中国语文学和中国考古学、民族学及文化史。出生于圣彼得堡(列宁格勒)职员家庭。1902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1916年获硕士学位,后留校进修,以学位论文《中国诗人论诗:司空图(837—

907)的〈诗品〉》于1929年获语文学博士学位。1923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29年为院士。1910—1951年在彼得格勒(列宁格勒)大学、地理学院、俄国艺术史学院、东西方语言和文学比较史学院、列宁格勒历史、语文和语言学院、莫斯科东方学院执教。1933—1951年任亚洲博物馆中国部(后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主任。1904—1905、1910、1926年在中国,1911、1923、1928年在英国,1911、1926年在法国进修和讲学。1907年曾参加发掘河南新石器时代遗址。1912年曾到中国东南部为苏联科学院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收集民族学资料。曾研究过中国和中亚及西伯利亚南部各民族人民文化史问题。发表著作约260种。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学》(1978)、《东方学》(1982)等,译作有《聊斋志异》等。

阿里莫夫 Алимов М. А. (1964.8.11—)

1986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入科学院南亚及东亚各国民族学研究所工作。1992年起任"彼得堡东方学出版社"社长,兼刊物主编。1997年以论文《〈笔谈〉是宋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一种资源》获副博士学位。著有《沈括及其〈梦溪笔谈〉》(2003)等文,翻译有《欧阳修〈六一诗话〉》(1992)等。

安德烈耶夫 Андреев М. Г. (1888.11.21—1945.12.13)

出生于圣彼得堡,1924年毕业于列宁格勒东方学院。1937年获经济学副博士学位。1935年获高级研究员职称。1913年在中国进修,1925—1927年在中国工作。1925、1927—1930年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任教。1925—1931年为莫斯科东方学院,1928年起任伏龙芝工农红军军事学院东方系教员。从1933年起为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员。著有《中国:经济与对外贸易概述》(1925)等。

安季波夫斯基 Антиповский А. А. (1923.11.17—)

语文学副博士。出生于卡卢加州,1952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64年10月16日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老舍的早期创作(1926—1936)》。1957—1965年任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学院教员。1965—1966年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1966年曾出差到中国。主要译著有《老舍的早期创作:主题、人物、形象》(1967)、《中国

现代散文选》(1969)等。

安东诺夫 Антонов В. И. (1923. 11. 28—)

1948 年毕业于军事外语学院,曾在驻大连、平壤的苏军新闻局任翻译和记者。后任大连《诗画报》(1948—1952)、北京《中国》画报(1952—1955)编辑。1955 年起,在东方学院新苏共中央任职。发表著译 150 余种。主要有翻译《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法规》(1994 年)、《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组成》(1993)和编撰《台湾(商务手册)》(1993)。

阿拉波娃 Арапова Т. Б. (1938.11.17—)

主要研究陶瓷艺术。1961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1965 年起在埃尔米塔什博物馆东方部工作,副博士(1974)。发表《埃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中国瓷器(14 世纪末至 18 世纪前 25 年)》(1977)等文著 50 种。

阿斯塔菲耶夫 Астафьев Г. В. (1908.8.25—1991.4.1)

经济学博士,出生于赤塔州。1930 年毕业于国立远东大学东方系。1944 年 11 月获经济学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新疆政治经济概论》。1960 年以专论《美国对中国的干涉及其失败》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51 年获高级研究员职称,1961 年获教授职称。1960 年任莫斯科大学教员。1960—1968 年任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员。1966 年起任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1974—1976 年兼国立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社会经济系经济和地理教研室主任。发表著作 100 余种。主要著作有《中国的经济纲要》(1952)、《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1956)年。

阿斯特拉罕 Астрахан Е. Б. (1949.8.9—)

1972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入远东研究所工作,副博士(1981),著有《普通话词汇的形成》(1981)和《中国汉语与方言》(与扎夫雅洛娃、索福隆诺夫合著,1985)

阿赫麦特申 Ахметшин Н. Х. (1953.6.24—)

出生于鞑靼自治共和国库克莫尔村。1976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先后在山东大学(1986—1989)、中国人民大学(1990—1991)进修,

1979 年获副博士学位。曾在莫大亚非学院(1979—1988)任职,后于 1988 年转入科学院国家语法研究所。其间 1997—2002 年曾来新华社工作。著有《丝绸之路的奥秘》(2002)、《大沙漠的奥秘》(2003)等。

巴雷什尼科夫 Барышников В. Н. (1929. 8. 18—　)

1954 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现在远东研究所任职,以《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获博士学位(1965)。曾于 1973—1979 年和 1986—1989 年在苏联驻华使馆任职。发表著译 100 余种。主要有《现代香港的若干社会经济问题》(1963)、《美蒋统治下的台湾》(1963)、《苏联对台湾问题的原则方针》(1982)、《论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问题》(1984)。

巴斯曼诺夫 Басманов М. И. (1918.10.14—　)

出生于阿尔泰边疆区,文学翻译家,苏联作家协会会员,多年从事宋词研究,译作有李清照和辛弃疾的《词集》、《中国历代词选》。

别任 Бежин (Бадылкин) Л. Е. (1949.5.29—　)

出生于莫斯科,1972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1975 年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国立东方民族艺术博物馆研究人员。主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艺术。著有《4 至 5 世纪的中国诗人:谢灵运及其时代》(1975)、《谢灵运》(1980)等。

博洛京娜(罗金兰) Болотина О. П. (1945.1.25—　)

出生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职员家庭。1969 年毕业于远东大学,留校后在汉语教研室任教,1970 年考取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生,1973 年毕业后仍回海参崴远东大学任教,1978 年获副博士学位, 1982 年提升为副教授。著有《老舍战争年代(1937—1949)的创作》(1983)、《抗战文学史片断》(1983)等。

博列夫斯卡娅 Боревская Н. Е. (1940.5.13—　)

语文学副博士。主要研究中国文学和文教问题。出生于莫斯科职员家庭。1965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学院。1970 年 10 月获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罗懋登〈三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1965—1966 年在

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工作，1967 年起为远东研究所研究人员。有论文《〈卢齐阿德〉和〈三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的比较分析》(1969)等和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校(1957—1972)》(1974)。

布罗茨基 Бродский Р. М. (1907.7.31—1992.2.1)

主要研究中国现代史。出生于尼科拉耶夫市职员家庭。1938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东方学院。1947 年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是《1915 年日本对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1965 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学位论文是《1898—1914 年帝国主义大战前美国在中国东北部和俄国远东地区的扩张》。1967 年获教授职称。1945 年起任里沃夫大学教员。著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期阶段(1919—1927)》(1959，乌克兰文)和文章《里沃夫的中国学》(1958)等多种。

布纳科夫 Бунаков Ю. В. (1908.10.23—1942.1.1)

主要研究汉语和甲骨文。出生于哈尔科夫卡村，1931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东方学院。1938 年起任职于东方学研究所，著有《河南出土的卜骨》(1935)等书及论文《马尔和汉语》(1937)等。

布尔拉茨基 Бурлацкий Ф. М. (1927.1.4—)

出生于基辅。1947 年毕业于塔什干政法学院。1951 年获法学副博士学位。苏联作家协会会员、记者协会会员。曾任《共产党人》杂志副主编、《真理报》政治评论员和《文学报》主编等职。主要著作有《毛泽东和他的继承人》(1970)，《毛泽东、江青和顾问邓》(2002)，和《毛泽东》(2003 年，256 页)。

布罗夫 Буров В. Г. (1931.8.2—)

出生于哈尔滨。1954 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63 年以论文《17 世纪中国唯物主义者王船山的世界观》获副博士学位，1986 年以《现代中国哲学》一书获博士学位。1959 年起在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有合著《古代中国哲学》(1972)，独著《台湾社会的现代化》(1998)、《俄罗斯学者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2000)。

瓦西里耶夫（王希礼）Васильев Б. А.（1899.12.20—1937.11.24）

1922年毕业于彼得格勒大学社会科学系中国班。1935年获文学副博士衔，同年升任教授。1921—1937年先后在佛教研究所、亚洲博物馆（后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曾在列宁格勒东方学院、列宁格勒历史语言学院任讲师。1924—1927年来华工作。著作有《中国戏剧》（1929）、《聊斋的古代渊源》（1931）等；译著有《明代话本》、《聊斋故事》（1931）、《李娃传》（1935）等。以鲁迅《阿Q正传》（1929）的首次外文译者驰名。

瓦西里耶夫 Васильев Л. С.（1930.10.9— ）

出生于莫斯科职员家庭，1953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1958年获副博士学位，1974年以《中国远古历史的若干问题（黄河流域文明的起源——物质文化基础与民族基础的形成）》获博士学位，1956年起在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工作。主要著作有《中国的迷信、宗教和传统》（1970）、《东方国家的宗教文化传统》（1976）、《中国的道和道家哲学》（主编，1982）、《东方宗教史、宗教文化的传统和社会》（1982）、《中国国家的起源问题》（1983）、《东方史》（两卷，1993）等。

瓦赫京 Вахтин Б. Б.（1930.11.3—1981.11.12）

生于顿河罗斯托夫。1954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1959年以研究汉魏南北朝乐府的论文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1957年起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员，1966年升为高级研究员。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翻译《中国古代乐府选集》（1959、1969）两种。

韦利古斯 Вельгус В. А.（1922.9.5—1980.7.2）

1962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1966年以研究中国古籍中有关非洲及印度洋区域的史料论文获史学副博士学位。1960年起为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研究员。合译《今古奇观》（1980），著有《11世纪前中国史料中有关非洲国家与民族的信息以及太平洋、印度洋区域的海上联系》（1978）。

维尔琴科 Верченко А. Л. (1948—)

1971 年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1977 年起入远东研究所任职。主要研究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社会中的作用,以及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著有《中国民间节日》(2002),及论文《春节——中国的新年》(2004)、《蒋方良(Ф. И. Вахрева)90 寿诞》(2004)、《2005 年台湾经济发展总结》(2005)。参与翻译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2001)一书等。

沃伊京斯基(吴廷康) Войтинский Г. Н. (1893.2.21—1953.4.11)

出生于涅维尔职员家庭。1935 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35 年获教授职称。1929—1935 年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红色教授学院、莫斯科东方学院、国立莫斯科大学教员。1929—1948 年为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太平洋研究所、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1918—1922 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地下工作和国内战争。1922—1927 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主任。著有《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分子》(1924)、《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国家独立与民主的斗争》(1950)等。

沃罗比约夫 Воробьёв М. В. (1922.4.21—)

主要研究女真族历史。出生于列宁格勒职员家庭。1950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1953 年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日本海各国的石器时代》。1972 年 12 月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学位论文《女真族和金国(公元 10 世纪至 1234 年)》。1954—1965 年为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研究人员。1965 年起为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研究人员。主要著作有《女真族和金国历史概述、10 世纪至 1234 年)》(1975)、《女真族的文化和金国》(1983)等。

沃斯克列辛斯基(华克生)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Д. Н. (1926.9.9—)

生于莫斯科。1950 年军事外语学院毕业,1953—1957 年在高等外交学院任教。1957—1959 年在北京大学进修。1963 年以研究吴敬梓《儒林外史》的论文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1959 年为苏联科学院中国研究所研究员。1960 年起任教于莫斯科大学东方学院,副教授。兼任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67—1971),高等外交学院副教授(1985),1971—1972 年在新加坡,1979—1980 年在日本进修,1985 年再次来华进修。研究

中国明清及现代文学和文化、东南亚华人文学等问题。发表过有关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的论文100多篇，译有《儒林外史》，李渔《十二楼》和《肉蒲团》，老舍《正红旗下》等。

沃斯特里科夫 Востриков А. И.（1904.10.10—1937.9.26）

出生于萨拉托夫州阿加列夫卡村，1924年毕业于彼得格勒大学社会师范科，1935年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任职于亚洲博物馆、佛教文化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大学。著有《西藏历史文献》（1982）。

维亚特金 Вяткин Р. В.（1910.3.6—　）

出生于瑞士巴塞尔侨民家庭，1939年毕业于远东大学，1949年获副博士学位，从1939年起先后在军事外语学院、莫斯科东方学院、莫斯科大学任教，1956年起转入中国学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工作。著有《班固——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1975），合译《史记》（1972）。

盖达 Гайда И. В.（1926.9.8—　）

主要研究中国戏剧。出生于莫斯科职员家庭。1951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65年6月获艺术学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中国传统戏剧的形成》。1962—1964年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1964—1966年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1967年起为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人员。1948—1950年和1961—1962年为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翻译。1951—1952年和1953—1957年任苏联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翻译。著作有《中国民间戏剧》（1959）、《中国传统戏剧》（1971）等。

加连诺维奇 Галенович Ю. М.（1932,4,20—　）

1954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63年以《现代汉语中简单句的语调》一文获副博士学位。1982年以《"文革"时期中共领导层关于对苏政策问题的斗争》（1981年，600页）升为博士。曾任科学院汉学家学会副会长、俄中友协副主席。1982年起入远东所任职，曾任副所长（1982—1988）。有著述200余种。主要有关于中俄两国领导人系列论著（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版），入《从尼古拉二世和慈禧到列宁和孙中山》（1999）、《两位大元帅斯大林和蒋介石》（1999）、《两位领袖斯大林与毛泽

东》(1999)、《两位头号人物赫鲁晓夫第一书记和毛泽东主席》(1999)、《从勃列日涅夫与毛泽东到赫鲁晓夫和邓小平》(1999),以及《刘少奇之死》(2000)、《毛泽东之死》(2005)、《一位汉学家的札记》(2002)等。

格利布拉斯 Гельбрас В. Г. (1930.1.19—)

主要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出生于弗拉基米尔州科利丘金诺职员家庭。1953 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80 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中的工人阶级》。1967 年获高级研究员职称。1967 年起为苏联科学队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研究人员。现为莫斯科大学教授。著有《中国社会政治结构(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1980)、《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中国居民的社会结构》等。

吉托维奇 Гитович А. ч. (1909.3.1—1966)

生于斯摩棱斯克,诗人。多年与翻译者合作,对中国古典诗歌的俄译文进行诗歌加工。出版的中国古典诗集有《李白诗选》(1958)、《杜甫诗选》(1962)、《中国古典抒情诗》(1962)等。

格卢宁 Глунин В. И. (1925.9.29—)

出生于斯摩棱斯克州职员家庭。1951 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54 年 6 月获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争取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而斗争》,后获博士学位。1960 年获高级研究员职称。1966 年起任远东研究所研究人员。1958—1959 年到中国进修。发表著作 30 余种。著作有《中国现代史》(1980)等。

戈雷金娜 Голыгина К. И. (1935.1.28—2009.8.7)

生于莫斯科,1959 年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1966 年以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理论的论文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1966 年起为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员。1970 年起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传奇与笔记小说。著作有《19—20 世纪初的中国文学理论》(1971)、《中世纪中国的短篇小说:题材渊源及演化》(1980)、《中世纪前的中国散文》(1983)、《太极——1 至 14 世纪文学与文化中的中国世界模式》(1995)。译作有《剪灯新话》、《浮生六记》(1979)。

戈尔布诺娃 Горбунова С. А.（1949.4.2—　）

出生于莫斯科。1972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曾到复旦大学进修（1988—1989），先后获副博士（1980）、博士（2000）学位。在远东研究所任职，著有《中共民族统一战线时期（1921—1927）的工人运动政策》（1982）、《共产国际与中共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1919—1924）》（1989）、《中国历史上的佛教团体（世纪初至 90 年代）》（1998）。

戈列洛夫 Горелов В. И.（1911.4.4—1994.4.4）

主要研究现代汉语。出生于赤塔职员家庭。1941 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60 年 3 月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汉语句法研究》，1960 年 7 月获副教授职称。1967 年 10 月获教授职称，1931—1935 年任中东铁路译员（中国）、1956 年起任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员。著有《汉语修辞学》（1974）、《现代汉语修辞学》（1979）等。

格里戈里耶夫 Григорьев А. М.（1933.4.28—　）

历史学博士，出生于莫斯科职员家庭，1956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1963 年获副博士学位，1977 年获博士学位，1987 年晋升为教授，先后在中国学所、亚洲民族学所工作，1966 年起调入远东研究所。著有《1927—1931 年中国的革命运动》（1980）。

格里涅维奇 Гриневич П. А.（1888.1.28—1941.10.24）

主要研究中国史，1920 年毕业于东方学院，1924 年毕业于远东大学，1935 年获副博士学位，1925—1941 年先后在远东大学、东方学院任教，担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古陀什尼科夫 Гудошников Л. М.（1927.12.6—　）

出生于彼得罗扎沃斯克。1950 年毕业于莫斯科外贸学院法律系，先后获副博士（1953）、博士（1972）学位，1980 年升为教授。先后在国家与法研究所、远东研究所任职。获颁“功勋科学家”衔，著作 270 余种。著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制度的演变》（1971）和《如何管理中国（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 中国政权结构的演变》（2004）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建立》（1993）、

《过渡时期的香港》(199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体制》(1996)等文。

古米廖夫 Гумилёв Л. Н. (1912.9.18—1992.6.15)

出生于皇村,1946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主要研究中亚历史,1948 年获副博士学位,1962 年为博士(均以研究突厥史为题的论著)。先任职于冬宫博物馆,1962 年起在列大地理系执教。与汉学相关的著作有《胡人在中国——中国与草原民族三个世纪的战争(3—6 世纪)》(1974)、《古罗斯和大草原》(1992)等。

古列维奇 Гуревич И. С. (1932.4.28—)

她出生于克列明楚克,1956 年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毕业。1964 年以题为"公元 3—5 世纪汉语文法特点"的论文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1957 年起为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研究员。参与编纂《亚洲民族研究所所藏中国敦煌写本综录》(1963)以及《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藏木版书目录》(1973),1974 年出版《3—5 世纪汉语文法概论》。翻译有《百喻经》(1985)。

达革丹诺夫 Дагданов, Геннадий Баторович (1948.6.4—2002.1.8)

生于伊尔库茨克,1993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后任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布里亚特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1980 年以论文《大乘佛教对唐代诗人的影响:以王维和白居易为例》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1995 年晋升博士。1986—1987 年曾到辽宁大学进修。1992—2000 年曾任职于布里亚特大学,并于 1997 年升为教授。著有《王维创作中的禅佛思想》(1984)。

达策申 Дацышен В. Г. (1964.5.15—)

出生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1989 年毕业于克拉斯诺雅尔师范学院。1996 年以《1900—1901 年在满洲的俄华战争》一文获副博士学位。2001 年以《1881—1903 年的俄中关系》(伊尔库斯克大学)升为博士。先后在克拉斯诺雅尔大学(1996 年起)和布拉戈维申大学(2003 年起)任教。著有《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俄中关系史》(2000)、《帝俄时汉语教育史》(2000)、《中国近代史》(2003)等。

杰伊奇 Дейч Т. Л.（1936.8.19—　）

出生于莫斯科，1958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主要研究非洲，1971 年获副博士学位。1967 年入科学院非洲研究所任职。著有《中国与非洲.80 年代改革时期》(1992)、《中非经济合作考察》(1998)、《中国与南非》(1999)。

杰柳辛 Делюсин Л. П.（1923.11.16—　）

主要研究中国现代史。出生于莫斯科职员家庭。1950 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61 年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土地改革时期中国中南区农民的阶级斗争(1950—1952)》，1971 年获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中国共产党政策中的农民土地问题》。1969 年 4 月获高级研究员职称。1950—1953 年为《真理报》驻中国记者。1958—1959 年为《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工作人员。1965—1966 年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1966—1967 年为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副所长。1970—1972 年任社会科学图书情报研究所所长。从 1967 年起任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室主任。著作有《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化》(1957)、《中国的传统和现时代》(1976)等。

杰米多娃 Демидова М.

1974 年通过副博士论文《作为 4 世纪末至 9 世纪初中国文化遗产的敦煌书籍》。多年从事敦煌写本及早期刻本古字体研究。

多罗宁 Доронин Б. Г.（1928.6.20—　）

历史学博士，出生于卡拉切沃军人家庭，1952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1976 年获副博士学位，1993 年升为博士。1968 年起在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任教。著有《〈明史〉是 1627—1646 年中国农民战争史的文献资料》(1975)等。

德拉古诺夫(龙果夫) Драгунов А. А.（1900.2.12—1955.2.2）

主要研究汉语和东干语。出生于圣彼得堡官吏家庭。1925 年毕业于国立列宁格勒大学社会科学系民族语言科。1937 年获副博士学位。1948

年获高级研究员职称。1925—1926 年和 1935 年在托尔马切夫军事学院、1928—1930 年和 1936—1942 年在列宁格勒东方学院和国立列宁格勒大学、1930—1936 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国立远东大学和远东师范学院任教，并在汉语拉丁化委员会兼职。1928—1955 年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著作有《汉语词类》(1937)、《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词类》(1952)、《现代汉语口语语法体系》(1962)等。

杜曼 Думан Л. И. (1907.5.14—1979.6.29)

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出生于圣彼得堡手工业者家庭。1930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语言和物质文化系。1935 年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18 世纪末清政府在新疆的土地政策(1760—1800)》。1965 年获博士学位。1952 年 12 月获高级研究员职称。1936—1941 年为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1954—1956 年为莫斯科东方学院和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员。1956—1961 年为中国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史纲(公元前 12 世纪到公元 1 世纪)》(1938)、《中国史纲》(1950)、《17 世纪清帝国的对外政策》(1977)等。

叶尔马科夫 Ермаков М. Е. (1947.2.23—2005.12.17)

列宁格勒东方学分所研究员，1972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1983 年以《〈高僧传〉是一部文学典籍》获副博士学位，1990 年升为博士。此前已发表文章论《〈高僧传〉中鸠摩罗什传及其在中国官方史学中的异说》(1978)、《中国官方史学家所描写的佛教人士》(1987)、《中国文学里早期涉及的〈观世音经〉》(1987)等文。1990 年在北大进修时曾受业于汤一介教授。翻译《高僧传》第 1 卷“译经”(1991)，第 2 卷“义解”(2005)，《中国风水学》(俄文，1998；英文增订版，2003)。

叶菲莫夫 Ефимов Г. В. (1906.4.3—1980.6.3)

历史学博士，出生于沃罗涅什州乡村教师家庭，1932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历史、语文和语言学院，1939 年以论文《孙中山争取中国独立的斗争》获博士学位。1958 年以《19 世纪末中国的国际关系和清政府的对外政策》获博士学位，并升为教授。先后在白俄罗斯大学等校任教，1941 年起在列宁格勒大学任教，曾任副校长(1961—1965)。著有《中国近现代史纲》(1949、

1951)、《辛亥革命》(1959)、《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1961)等。

热洛霍夫采夫 Желоховцев А. Н. (1933.9.29—　)

生于莫斯科。1958 年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毕业。1965 年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作为文学体裁的话本小说》。1958—1969 年在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工作,1969 年转入远东研究所工作。著作有《话本——中世纪中国的市民小说》(1969)、《近距离观察"文化革命"》(1973,被译成英、法、德、保、阿拉伯、斯洛瓦克等数种其他国文字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艺理论和政治斗争》(1979)。译作有邓拓《燕山夜话》短小说集《相会在兰州》(1987)、张抗抗《北极光》(1987)、蔡骏《病毒》(2006)等。

扎瓦茨卡娅 Завадская - Виноградова Е. В. (1930.5.29—2002.5.25)

主要研究中国古典艺术,出生于莫斯科职员家庭,1953 年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历史系,1962 年获艺术学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新中国的国画(论传统与创新)》。1950—1954 年为东方文化博物馆研究人员。1954—1957 年任职于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57 年起为东方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绘画美学问题》(1975)、《东方文化在当代西方》(1977)、《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1978)、《齐白石》(1982)、《米芾》(1983)等。

札多延科 Задоенко Т. П. (1924.4.13—1993.1.7)

主要研究汉语。出生于卢甘斯克(伏罗希洛夫格勒)工人家庭。1951 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55 年获语文学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现代汉语中的结果动词》。1962 年获副教授职称。1955 年起为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语文系教员。著有《汉语教科书》(1965 年第 1 版,1973 年第 2 版,合著)。

查哈罗娃 Захарова Н. В. (1950.9.11—　)

1974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1994 年起在莫斯科人文大学任教。1983 年以《当代中国女作家谢冰心的生活与创作道路》一书获副博士

学位。著有《中国的烹调艺术与传统》(1977)。翻译有陆文夫的《孔雀开屏》(1995)、王蒙的《春堤六桥》(1999)等。

佐格拉芙 Зограф(Бабиева) И. Т. (1931.12.17—)

主要研究中国古汉语。出生于北奥塞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莫兹多克职员家庭。1954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1962 年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12 至 14 世纪汉语的语法特点(根据〈京本通俗小说〉)》。1980 年获语文学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中世纪中国的语言(形成和发展的趋势)》,1954 年起为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研究人员。主要著作有《中原汉语语法概论》(中国元朝白话文语法)(1962)、《中原汉语》(1979)。参与编纂《亚洲民族研究所所藏中国敦煌写本综录》(1967 第 2 卷)。翻译话本集《十五贯》(1962)、《京本通俗小说》(1995)。

伊万诺夫(伊文)Иванов А. А. (1885.9.28—1942.2.10)

主要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史。出生于奥廖尔省利夫内市的商人家庭。1904—1905 年在自由俄国大学社会科学高等学院学习,因参加 1905 年 12 月起义被囚禁于感化院。1909—1917 年在法国工作与学习。1917 年毕业于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院。1936 年获博士学位。1935 年获高级研究员职称。1917 年以前在法兰西学院工作,以后任法国《北京报》编辑、《真理报》记者。1917—1927 年在北京大学任教。1932—1942 年为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著作有《中国和苏联》(1924)、《红缨枪(中国农民运动)》(1927)、《1927—1930 年中国游击队活动概况》(1930)等。

伊凡诺夫(伊凤阁)Иванов А. И. (1878—1937)

1901 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1902—1904 年来华习汉语,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俄文教习。1913 年获博士学位升为教授。此后在圣彼得堡市任教。1922 年随苏俄全权代表越飞来华,1924—1927 年任苏联首任驻华大使馆汉文参赞,1923 年受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新国学门导师,于北大《国学季刊》一卷四号(1923 年 12 月)发表文章《西夏国书说》。其研究为俄国西夏学之发端。著有《王安石及其变法》(1909)、《华语初级读本》

(1910)、《中国哲学资料:法家、韩非子》(1912)、《西夏史略》(1911)等。

伊凡诺夫 Иванов П. М. (1956.7.11—　)

1978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1980 年获副博士学位,系东方研究所研究员,1984—1985 年曾来北大进修。著有《香港历史与现状》(1990)、《基督教在台湾》(1999)、《基督教和世界宗教》(2000)等。

伊柳舍奇金 Илющечкин В. П. (1915.4.23—1996.4.24)

出生于尼日尼戈罗德州农民家庭。1939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1952 年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1931—1940 年中国共产党为争取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斗争》。1966 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太平军的农民战争》。1960 年获高级研究员职称。1950 年起为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研究人员。著作有《太平天国起义(1851—1864)》(1960)、《太平军的农民战争》(1967)等。

约尔克 Иолк Е. С. (1900.8.14—1942.12.18)

主要研究中国革命史。出生于里加职员家庭。1925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东方语言学院。1930 年毕业于红色教授学院东方部。1935 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28—1929 年任教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兼该校中国研究所副所长。1931 年任教于国际列宁学院。1931 年为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员。著有《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

伊萨延科 Исаенко Б. С. (1914.3.26—1965.5.30)

主要研究汉语。出生于哈尔滨中东铁路职员家庭。1940 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58 年以专论获副博士学位。1957 年获副教授职称,1964 年获教授职称。1935—1942 年、1947 年、1954 年在莫斯科东方学院任教。1942—1943 年在军事外国语学院任教、1954—1965 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任教。1941—1965 年历任上述各校汉语教研室主任。1943—1947 年为苏联驻华大使馆工作人员。1958—1960 年为苏联科学院中国研究所研究人员。著作有《潘克拉托夫编(汉语会话教材)分句解释词典》(1939)、《汉俄发音词典试编》(1957)等。

伊茨 Итс Р. Ф.（1928.10.1—1990.7.9）

主要研究中国民族史。出生于切烈波韦次（沃洛格达州）职员家庭。1950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1958年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苗族（历史民族学概述）》。1968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中国南部各民族的起源（壮、苗、傈僳族民族史概述）》。1960年获教授职称。1954年起为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东南亚、澳大利亚、大洋洲研究室研究人员和领导人。著作有《古代至17世纪中期的中国历史概述》（1961）等。

卡柳日娜娅 Калюжная Н. М.（1924.2.23—　）

出生于阿斯特拉罕职员家庭，1952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64年以论文《超越山东省界以前义和团运动的萌芽与发展》获副博士学位，1984年以专著获博士学位。1953—1955年在驻华使馆工作，1961年起在东方学研究所工作。著有《义和团起义史料》（1973）、《章炳麟的革命理论》（1988）等。

康托罗维奇 Канторович А. Я.（1896.10.10—1944.12.3）

出生于圣彼得堡法学家家庭。1921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1935年和1936年先后获经济学副博士和博士学位。著有《远东的战争策源地》（1934）、《美国参与瓜分中国的争斗）（1935）等。

卡皮察（贾丕才）Капица М. С.（1921.11.5—1995.11.15）

主要研究中苏关系。出生于乌克兰赫美尼茨基州农民家庭。1941年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外国语语言学院。1948年毕业于外交部高等外交学校。1953年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1931—1945年的苏中关系》。1958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1917—1932年的苏中关系》。1960年晋升为教授。1943年起为苏联外交部工作人员，曾被授予特命全权大使衔。1943—1946年和1950—1952年在驻中国大使馆工作。1954—1960年在苏联外交部工作，1962年起任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东方国家经济和经济地理教研室主任。1966—1970年任外交部东南亚司司长。1970起为远东司司长。1983年起为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主管中国

和东南亚事务。1987 年起任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长。著作有《苏联外交政策史》(1976)、《远东国际关系史》(1978)等。

卡拉佩季扬茨(高辟天) Карапетьянц А. М. (1943.5.27—)

语文学博士,出生于莫斯科职员家庭,1966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1969 年获副博士学位,1992 年升为博士,1969 年起在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任教,1992 年起为汉语教研室主任。著有《汉语语词单位的类型学》(1992)等。

卡尔波夫 Карпов М. В. (1967.1.6—)

1992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现在该校任教(1994 年起)。1990—1991 年来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1995 年以《中国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斗争》(1984—1989)论文获副博士学位。

克平 Кепинг К. Б. (1937.2.7—2002.12.13)

生于天津。1959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中文专业。1970 年获副博士学位,论文题为《西夏文〈孙子〉词汇与语法研究》。整理出版西夏文孤本书《孙子》(1977)、《类林》(1983)。后又出版专著《西夏文语法》(1985)。1959 年起为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研究员。

科勃泽夫 Кобзев А. И. (1953.10.15—)

出生于莫斯科职员家庭,1975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1979 年以论文《王阳明的哲学》获副博士学位,1989 年以《中国古典哲学的方法论》获博士学位。著有《王阳明学说和中国古典哲学》(1983)、《中国新儒家的哲学》(2002)以及合编《中国精神文化百科全书》(2006)等。

科洛科洛夫 Колоколов В. С. (1896.2.28—1979.1.18)

主要研究汉语。出生于中国新疆喀什职员家庭。1920—1922 年在工农红军军事学院东方部(莫斯科)学习。1935 年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同时获教授职称。1922—1937 年任工农红军军事学院、莫斯科大学东方学院教员、1937—1939 年任红色教授学院教员,1947—1957 任军事学院教员,1951—1954 年任国立莫斯科大学教员。1923—1924 年为中国劳动者

共产主义大学教员,1924—1927 为中山大学教员,1949 年起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与罗加乔夫合译《西游记》。编辑《中国南方各族史诗传说集》(1955)。专著有《中国:国家、人民和历史》(1924)和《汉俄军事术语词典》等。

康德拉绍娃 Кондрашова (Молодцова) Л. И. (1933,1,27—)

先后就读和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地理系(1951—1957)、北京大学(1957—1960)。1966 年获经济学副博士学位,1986 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远东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发表著作 100 余种。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发展的特点》(1949—1985)(博士论文,1985 年)、《中国的工业》(1980 年)、《新千年伊始中国发展工业的战略和策略》(2001 年)和《道德经》(诗体翻译)(2003)。

康拉德 Конрад Н. И. (1891.3.13—1970.9.30)

主要研究中国、日本历史。出生于里加职员家庭。1912 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和实用东方研究院日本分院。1914—1917 年在日本东京进修。1934 年获语文学博士学位。1926 年为教授。1934 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58 年当选为院士。1913—1914 年为基辅商学院、1919—1923 年为国立奥廖尔大学、1922—1938 年为列宁格勒东方语言学院、1934—1936 年为红色教授学院、1941—1950 年为莫斯科东方学院教员。1931 年起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人员。著有文集《西方与东方》(1966)、《中国学》(1977)等。

科罗文娜 Коровина С. Г. (1969.9.27—)

1992 年毕业于赤塔师范学院(后贝加尔师范大学),留校任教。2000 年获副博士学位。著作有《论 20 世纪末期中、美小说的若干特点》(2000)等文。

克拉芙佐娃 Кравцова М. Е. (1953.6.19—)

出生于列宁格勒。1975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曾于 1990—1991 年来华进修。现为彼得堡大学教授。1983 年以《沈约的诗歌创作(411—513)》一文获博士学位,1994 年以论文《中国传统诗歌的文艺美学

规范的形成(以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早期的诗歌创作资料为据)》升为博士。著有《中国文化史》(1998)、《中国艺术史》(2004),翻译《雕龙(六朝诗集)》(2004)等。

克拉宁娜 Кранина Е. И. (1947.10.5—)

出生于阿尔罕格尔斯克,1972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地理系,1974 年入科学院远东所任职。著有《中国农业生产水平与结构》(1989)、《产业改革条件下的农业多种发展问题》(1992)、《中国保护环境与自然资源问题》(2003)、《全球化条件下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与战略》(2005)等文。

克里夫佐夫(克立朝) Кривцов В. А. (1921.4.18—1985.12.20)

历史学副博士,出生于莫斯科工人家庭,1949 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63 年以论文《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获副博士学位,1968 年起在远东所工作。著有描写汉学家比丘林的《亚金甫神父(长篇传记小说)》(1978)等。

克罗尔 Кроль Ю. Л. (1931.8.9—)

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出生于列宁格勒职员家庭。1954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1963 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司马迁——秦亡后的历史学家》。1991 年以研究《盐铁论》的论文晋升为博士。1957 年起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研究人员。著作有《历史学家——司马迁》(1970)、《司马迁关于"六家"的考证》(1977)和《盐铁论——汉代的文化典籍》(1991)。翻译《盐铁论》(1997、2001)。

克雷莫夫(郭绍棠) Крымов А. Г. (1905.1.17—1988.12.22)

主要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史。出生于浙江省农民家庭。1934 年毕业于红色教授学院。1935 年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1962 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中国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斗争(1917—1927)》。1957 年获高级研究员职称。1961 年为教授。1928 年起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教员。1930—1932 年为国际土地研究所研究人员,1937—1938 年为民族殖民地问题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1955 年起为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并任该所中国国家建设组组长。著作

有《列宁和中国》(1960)、《北伐时期的思想斗争史略》(1978)、《胡适的社会政治观》(1979)等。

刘华夏 Крюков В. М. (1962.8.28—2008.7.12)

汉学家刘克甫之子。1984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入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任职,1987 年以论文《古代中国赏赐制的社会经济和礼仪考察》获副博士学位,1997 年升为博士。90 年代末在台北淡江大学任教。著有《西周青铜器铭文》(1988)等。

克留科夫(刘克甫) Крюков М. В. (1932.7.12—)

1955 年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196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65 年以论文《中国古代的氏族和父系姓氏》获副博士学位,1971 年升为博士。先后在东方学所、民族学所、莫斯科大学工作。著有《中国人的氏族制·进化和规律》(1972)、《殷代铭文》(1973)、《古代的中国人:族源学问题》(1978)等。

克恰诺夫 Кычанов Е. И. (1932.6.22—)

主要研究西夏史。出生于阿塞拜疆萨拉普尔职员家庭。1955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1960 年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西夏国(982—1227)》。1970 年以专题著作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67 年起为高级研究员职称。1968 年起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研究人员。著作有《西夏国史纲》(1968)、《西夏学》(1972)。

屈沙强 Кюзаджян Л. С. (1932.5.22—)

出生于第比利斯职员家庭,1955 年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历史系。1969 年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 1975 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57 年为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研究人员。1957—1959 年在《苏联中国学》杂志编辑部担任责任秘书。1959—1962 年为东方文学出版社远东国家编辑部主任,1962—1965 年任《真理报》驻中国记者。1970 年起为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著作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思想运动(1949—1966)》(1970)、《国外东方和现代》(1974)等。

屈纳 Кюнер Н. В.（1877.9.25—1955.4.5）

主要研究东亚地理及民族学。出生于第比利斯音乐教师家庭。1900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1900—1902、1909、1912、1913及1951年在中国、日本、朝鲜进修，1905—1906年在奥地利进修。1909年以学位论文《西藏地理记述》，获硕士学位。1935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02年起为东方学院（海参崴）教员，1925—1955年为列宁格勒东方学院、列宁格勒大学教员。1934—1955年为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东亚和东南亚室主任。1942—1945年为哈萨克中央历史档案馆、图书馆工作人员。著作有《关于西伯利亚南部、中亚和远东各民族的中国文献》（1961）等。

库利科夫 Куликов В. С.（1933.10.1—2005.7）

出生于莫斯科，1958年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从1958年至1988年30年间曾作为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和苏联莫斯科电视台的记者来往于莫斯科和北京，其间有短期在苏驻华使馆文化处任职。最后，作为莫斯科奥斯坦基诺广播电视公司的特派记者来华。从1988年起常驻北京，1995年起受聘任北京电视台国际部顾问。

他制作了许多新闻片、中国民俗国情系列纪录片，如《改革新风》、《宝岛》、《北京冬日漫步》、《幸福》，在俄国等国引起很大反响，主要的出版著作有《中国人自述》（1989）、大型摄影集《中国》（1990）和《北京俄语导游指南》（2007）。

库切拉 Кучера С. Р.（1928.5.5—　）

出生于里沃夫，1952年毕业于华沙大学，留校任教，曾到北京大学就读研究生（1953年起），先后获副博士（1980）、博士（1981）。曾在北京外国语学院（1958—1959）、莫斯科大学历史系（1988—2000）任教。2000年起为俄国人文大学教授。著有《中国上古和古代史》（1996）等。翻译《商君书·列子·庄子·管子选段》（载《古代中国哲学》第1、2卷，1972）等。

拉宾娜 Лапина З. Г.（1934.12.27—　）

出生于莫斯科职员家庭，1957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于1964年和1986年先后获历史学副博士和博士学位。1964年在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

任教，1990 年提升为教授，曾任中国史教研室主任。著有《中世纪中国的治国学说》(1985)等。

拉林 Ларин А. Г. (1932.9.29—)

出生于莫斯科职员家庭，1954 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66 年以论文《论两种语言(汉、俄语)语法系统之间对应关系的确定》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先后在东方学所、工人运动所工作，1972 年转入远东所。著有《论汉—俄机器翻译中句法对应关系的确定》等文。

列别捷娃 Лебедева Н. А. (1954.10.20—)

1977 年毕业于海参崴远东大学东方系，入远东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工作，2002 年调远东大学东方系任教。以论文《叶圣陶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上的地位》获副博士学位(1983)。著有《萧红的生平、创作与命运》(1998)等。

林林 Лин－Лин О. М. (1924.7.24—)

生于上海，林伯渠之女。1959 年毕业于苏联作协办的高尔基文学院，1972 年以《〈红楼梦〉中的新人研究》论文获副博士学位。现为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副教授，发表过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多篇。翻译张一弓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1985)等。

李谢维奇·雅德维加 Лисевич Я. К. (1951—)

女汉学家，生于乌克兰利沃夫州德罗戈贝奇市。1972 年毕业于德罗戈贝奇师范学院乌克兰语文系，1975 年起任莫斯科苏联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自 1969 年起发表许多诗作并翻译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以乌克兰文出版，其中有杜甫、艾青、王蒙、李瑛、舒婷等人的作品。

李谢维奇 Лисевич И. С. (1932.5.26—2000.1.27)

生于莫斯科。1955 年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1965 年以研究中国古代诗歌与民歌联系的论文于 1965 年获语文学副博士。1956—1959 年在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任教。1963 年起为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研究员。专著有《中国古代诗歌与民歌(公元前 3 世纪至公元 3 世纪初的乐

府)》(1969)、《古代与中古之交的中国文学思想》(1979)。编并译作有《圣贤书摘》(1986)。

洛曼诺夫 Ломанов А. В. (1968.2.11—　)

1989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入远东所工作,曾到中国社科院进修,依次获副博士(1994)、博士(2001)学位。主要著作有《冯友兰 20 世纪 20—40 年代著作对中国哲学传统的诠释与发展》(1994)、《现代儒学(冯友兰哲学)》(1996)《东正教使团在中国活动的文化拓展问题》(2000)。为远东所编《中国哲学百科词典》撰写梁启超、冯友兰、熊十力、任继愈、钱复等 30 余条目(1994)。

卢博—列斯尼钦科 Лубо - Лесниченко Е. И. (1929.9.23—　)

生于里夫内市。1953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以研究研究汉代丝织品于 1959 年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1965 年起为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远东部主任。1990 年以《中国的丝绸之路(古代与中世纪中国的丝绸和对外关系)》获博士学位。与普济斯基、索罗金合译袁珂《中国古代神话》(1965、1987)。

卢基扬诺夫 Лукьянов А. Е. (1948.10.28—　)

1975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1979 年以《古代中国哲学的形成》获副博士学位,1991 年以《道和德:早期道家哲学(黄帝—老子—庄子)》论著晋升博士。著有《〈易经〉之道》(1993)、《古代中国哲学的起源》(1994)、《老子与孔子》(2000)等。翻译《易经》(译并序,2005)。现为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俄中友协副主席。

马季亚尔 Мадьяр Л. И. (1891.11.24—1940.7.17)

主要研究中国土地问题。出生于匈牙利小商人家庭。1922—1926 年在塔斯社工作。1929—1934 年在共产国际工作(东方书记处副主任)。1928—1930 年为国际土地研究所东方部主任。1926—1928 年在中国从事外交工作。1919 年参加匈牙利革命。著作有《中国革命的现状》(1929)、《从广州公社到中华苏维埃》(1934)等。

马里诺芙斯卡娅 Малиновская Т. А.（1922.9.22— ）

1950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中文专业，留校任教。1970 年获副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中国戏曲家洪昇及其〈长生殿〉》。自 1960 年起专门研究中国明代及清初戏曲作品，发表大量有关明代戏曲的研究论文。著有《中国古典戏曲杂剧简史（14—17 世纪）》（1996）等。

马良文 Малявин В. В.（1950.9.13— ）

历史学副博士，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中国史教研室教员。主要研究中世纪中国的历史和文化。1972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先后到新加坡（1972）、日本（1982）、中国（1988）进修，90 年代末赴台北淡江大学任教。1977 年和 1988 年先后获历史学副博士和博士学位。著作有《阮籍》（1978）、《跨进中世纪的中国民族》（1979）、《孔子》（1992）、《16—17 世纪的中国：传统和文化》（1995）等。

马努欣 Манухин В. С.（1926.9.18—1974.5.26）

生于莫斯科州巴甫洛夫镇。莫斯科东方学院 1951 年毕业。1949—1951 年曾在中国担任翻译工作。1953—1957 年为莫斯科大学语文系研究生，后在该校亚非学院任教。1964 年以论文《由传统到创新的社会揭露小说——〈金瓶梅〉》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1956 年起在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任教。1969 年升为副教授。发表过研究《金瓶梅》及汤显祖戏曲的论文多篇。翻译《金瓶梅》（两卷集，1979）。

马尔科娃 Маркова С. Д.（1923.11.17—2001.6.6）

1945 年毕业于军事外语学院，留校任教。曾来华在苏联新闻通讯社工作（1946—1948）。回国后先后在东方学研究所、远东研究所工作。为高级研究员。1955 年以论文《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诗歌（1937—1945）》获副博士学位。著有《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诗歌（1945—1949）》（1958）、《郭沫若的诗歌创作》（1961）、《20 世纪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2004）等。

马斯连尼科夫 Масленников В. А.（1894.10.8—1968.11.4）

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出生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库什瓦市职员家庭。1935 年毕业于红色教授学院。1940 年起为高级研究员。1949 年升为教

授。1935—1947 年在科学院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经济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当研究员。1957—1958 年在中国国际关系学院任教。1957—1965 年为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经济教研室主任，1962 年以前任副校长，后在莫斯科市立师范学院、莫斯科大学任教。著有《中国政治经济概况》(1946)、《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制度》(1958)等。

马斯洛夫 Маслов А. А. (1964—　)

主要研究武术和气功。1986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1993 年以《20 世纪中国政治文化中的秘密团体(20 年代末至 80 年代)》获副博士学位。1995 年升为史学博士，论文为《武术的社会主义理论观及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作用》。1986 年起入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现为研究员。

发表著译 20 余种，其中著有《长拳》(1991)、《中国武术文化的理论与实践》(1991)、《气功操》(1992)、《达摩与少林派武术》(1993)、《形意拳》(1994)、《武打艺术之天路·中国武术的精神艺术》(1995)。翻译《菩提达摩大师略辩大乘入道四行观》(2000)等。

梅利克谢托夫 Меликсетов А. В. (1930.1.1—2006.2.15)

出生于莫斯科职员家庭，1953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1956 年和 1975 年先后获副博士和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中国国民党的社会经济政策(1927—1949)》，1976 年晋升为教授。1960 年起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任教。1989—1995 年任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院长。著有《中国现代史》第 1 卷(1981)等。以及合著《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1937—1945)》(1988)和《中国史》(1998)等。

孟列夫(缅希科夫) Меньшиков Л. Н. (1926.2.17—2005.10.29)

生于列宁格勒。1952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1955 年以题为《中国古典戏曲的现代改革》的论文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1970 年晋升为博士。1960 年翻译出版王实甫的《西厢记》，以后主要从事苏联所藏中国敦煌写本的整理、翻译、注释工作。出版《维摩诘经变文》、《双恩记变文》、《法华经变文》等俄译本。专著有《中国古典戏曲的改革》(1959)，发表有关敦煌变文的论文多篇。与帕纳秀克合译《红楼梦》(两卷集，1958 年；修订版 1997 年)。

米连纽克 Милянюк А. О.（1962— ）

1990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曾于 1988—1989 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系副博士（1994），莫斯科武术协会副会长（1999），主要研究中国精神文化和养生文化。著有《中国太极拳的历史》（1999）、《论中国传统中对待饮食文化的两种观点》（2001）。

米夫 Миф П. А.（1901.8.16—1939.9.10）

主要研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出生于赫尔松省职员家庭。1921 年毕业于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1935 年获副博士学位及高级研究员职称。1922—1923 年在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工作。1926 年任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副校长、1927—1929 年任校长。1928—1937 年在红色教授学院任教和在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研究所任研究员。1929 年起为中国学研究所所长，1930—1935 年为苏联中国学家机关刊物《中国问题》主编。1937 年起任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所长。1928—1937 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1928—1935 年任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处副主任，1935 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政治助手。

蒙泽勒 Монзелер Г. О.（1900.10.9—1959.10.3）

出生于圣彼得堡职员家庭。1924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文学语言学系，1930 年毕业于该校历史语言学系。1924—1931 年任苏联科学院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远东部主任。1933—1938 年为列宁格勒东方学院东方宗教系教员和主任。1939—1941 年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人员，1952—1956 年为宗教研究所学术顾问。编选并翻译《王维的诗》（1959）和《唐朝三诗人：李白、王维、杜甫》（1960）等。

蒙库耶夫 Мункуев Н. Ц.（1922.7.1—1985.4.29）

出生于布里亚特色楞格州农民家庭，1950 年毕业于军事外语学院，1962 年和 1972 年先后获历史学副博士和博士学位，1957—1985 年在东方学研究所工作。翻译《蒙鞑备录》（1975）和吴晗的《朱元璋传》（1980），著有论文《论〈蒙鞑备录〉和〈黑鞑事略〉》（1961）等。

米亚斯尼科夫 Мясников В. С.（1931.5.15—　）

科学院院士，出生于莫斯科职员家庭，1955 年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1964 年和 1978 年先后获历史学副博士和博士学位，1982 年提升为教授，1990 年当选科学院通讯院士，1997 年为院士。1956 年起先后在多个研究所工作，1966 年起转入远东所，任副所长（1985 年起至 2003 年）。现在东方学所任职。著有《17 世纪的清帝国和俄国》（1980）等，编出系列“俄中关系”文件汇编。长期致力于研究俄国汉学和中俄关系史。

涅夫斯基（聂历山）Невский Н. А.（1892.3.2—1937.11.24）

出生于雅罗斯拉夫尔职员家庭，1919 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1935 年获语文学博士学位，1915—1929 年在日本多所大学任教。1929—1936 年在列宁格勒大学等校任教。主要研究西夏语、汉语、日语。所著有《西夏语文学·翻译与词典》（两卷集）后于 1960 年出版并于 1962 年获列宁奖金。1931 年写出《西夏学史纲》。

涅波姆宁 Непомнин О. Е.（1935.5.3—　）

出生于莫斯科职员家庭，1958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1965 年和 1985 年先后获历史学副博士和博士学位，1962 年起在东方学所工作。著有《中国经济史（1864—1913）》（1979）、《中国社会经济史（1894—1914）》（1980）。

尼基福罗夫 Никифоров В. Н.（1920.11.19—1990.12.16）

出生于波洛茨克职员家庭，1947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1950 年和 1967 年先后获历史学副博士和博士学位。先后在东方学所和远东所工作。1953—1956 年曾来华在北京高级党校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获苏中多枚奖章。著有《苏联历史学家论中国问题》（1970）、《第一批中国革命家》（1980）、《亚洲觉醒时代的中国》（1982）等。

尼古拉耶娃 Николаева Н. С.（1930.8.12—　）

出生于扎戈尔斯克职员家庭，1953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1968 年获艺术学副博士学位，1961 年起在美术科学院造型艺术理论和历史研究所工作，著有《齐白石》（1960）、《画家、诗人、哲学家马远及其时代》（1968）等。

尼科里斯卡娅 Никольская Л. А.（1925.10.5— ）

主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出生于摩尔达维亚职员家庭。1948 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61 年获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曹禺的创作》。1948—1951 年在中长铁路当译员。1958 年起在莫斯科大学东方学院任教。著有《郭沫若：作家、学者、革命家》（1958）、《巴金创作概论》（1976）、《曹禺创作概论》（1984）。

诺夫戈罗茨基 Новгородский Ю. В.（1928.12.5—1977.7.23）

主要研究汉语和西北方言。出生于列宁格勒，其父为中国学家 В. И. 诺夫戈罗茨基。1951 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63 年获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汉语西北方言语音纲要》。1970 年起获高级研究员职称。1951—1953 年在苏联中央团校任教。1968 年起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任教。1952 年在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维吾尔文研究委员会从事兰州和西安方言研究工作，1956—1966 年先后在东方学研究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工作，1966 年起为远东研究所研究人员。译作有《孙中山选集》（1964）等。

鄂山荫 Ошанин И. М.（1900.5.5—1982.9.5）

出生于雅罗斯拉夫尔法学家家庭。1924 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44 年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现代中国象形文字的发生、发展和结构》。1947 年获语文学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汉语的单词和词类（汉语史分期试论）》。1945 年获教授职称。1924—1926 年在苏联驻中国商务代办处工作。1929—1933 年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中文秘书。1926—1939 年为苏联外交部工作人员。1931—1942 年在莫斯科东方学院、1939—1955 年为苏联外交部高等外交学校教员，1945 年起为研究人员。1956 年起为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东方辞典部主任。主要著作有《汉语口语教科书》（1935）、《论汉语词类》（1946）、《汉语教科书》（1946）、《中国语言学问题》（1957）、《华俄辞典》（1959）、《华俄大辞典》四卷（1983—1984）。

巴甫洛夫斯卡娅 Павловская Л. К.（1926.11.14—2002.12.1）

1953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入科学院图书馆（在列宁格勒），1959 年起调东方学列宁格勒分所工作。以研究平话获副博士学位（1975）。著有《中国民间章回小说评话》（2003）并翻译《新编五代史评话》（1984）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1987）。

潘英 Пан Ин

中国籍，多年在苏联工作，现为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中文专业讲师。以研究《水浒传》的论文获副博士学位。自 60 年代起致力于对列宁格勒收藏的《石头记》抄本的研究。

帕纳秀克 Панасюк В. А.（1924.2.27—1990.1.14）

生于白俄罗斯普罗茨克。1951 年毕业于军事外语学院。1954 年以研究现代汉语表态词的论文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苏联作家协会会员（1995）。自 1954 年起在军事外语学院任教。文学翻译家。主要译作有《三国演义》、《红楼梦》、《说岳全传》、《平妖传》、《三侠五义》、《司马迁文选》。

潘克拉托夫 Панкратов Б. И.（1892.3.12—1979.8.19）

汉学家、蒙古学家、藏学家、满学家。出生于科斯特罗马农民家庭。1911 年起在蒙古学习，1916 年毕业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学院，留校从事满、蒙语教学工作。1952 年获副教授职称。1918 年在汉口教俄语，同时学习湘、鄂方言。1921—1935 年在北京工作，先在俄罗斯通讯社工作，1924 年起为苏联驻华大使馆学术专家，1922—1929 年翻译《元朝秘史》初稿。1929 年受聘为哈佛燕京社中印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以后担任过该所副所长。1935 年回国后任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高级研究员，负责编撰蒙俄大辞典。1942—1948 年又到苏联驻华使馆工作，回国后仍为苏联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研究人员，同时兼手稿部学术秘书。1963 年退休。其主要著作有《7 至 14 世纪西藏史概论》、《西藏文学概论》、《元朝秘史》（1962）等。

佩列洛莫夫（稽辽拉）Переломов Л. С.（1928.12.5— ）

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史。出生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军人家庭。1951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54年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秦帝国的建立和崩溃（前221—前207年）》。1970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学位论文《法家学说和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问题（前5至前3世纪）》。1955年起在东方学研究所工作，1966年起在远东研究所工作。主要著作有《中国政治历史上的儒家和法家》（1981）、《孔子的〈论语〉》（1992）、《孔子：生平、学说、命运》（1993）《四书——中国文明的基础》（2004）、《儒学与中国现代战略方针》（2009）、《孔子与儒学·从古代到当代》（2009）及翻译《商君书》（1992）等。于1995年被推选为俄国孔子基金会主席。

彼得罗夫 Петров В. В.（1929.5.4—1987.1.13）

生于列宁格勒。1951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留校任教。苏联作家协会会员（1957）。出版专著有《艾青评传》（1954）、《鲁迅生平与创作概述》（1960）。发表研究老舍、巴金、郁达夫创作的论文多篇。编选《元曲》俄译本（1966）并作序。编选两卷本《中国短篇小说选》（1959）。

彼得罗夫 Петров Н. А.（1908.3.1— ）

1933年毕业于列宁格勒东方学院，曾来华工作（1935—1937），1938年起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工作（1938—1940，1961—1965），曾在苏联军队服役（1953—1961）。以《黄遵宪——19世纪末的中国爱国诗人》获副博士学位（1955）。著有《中国现当代文学》（1940）。

波兹涅耶夫 Позднеев Д. М.（1865.2.7—1937.10.20）

主要研究中国史和日本史。出生于奥勒尔神父家庭。1889年毕业于基辅神学院历史系。1893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汉、满、蒙专业。1893—1894年在伦敦、巴黎、柏林进修。1898—1904年在中国进修。1905—1910年在日本进修。1896—1898年在圣彼得堡大学任教。1904—1905年任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学院第二任院长。1910—1917年在实用东方学院任教。1917—1931年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列宁格勒大学、列宁格勒东方语言学院（后改称列宁格勒东方学院）任教。其主要著作有《北京围

城56天见闻记》(1901)、《大连——大连湾、貔子窝和大东沟的贸易》(1902)、《现代中国》(1925)、《中国和日本》(1926)等。

波兹涅耶娃 Позднеева Л. Д. (1908.7.2—1974.8.25)

生于圣彼得堡。1932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1946年以论文《元稹的〈莺莺传〉》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高级研究员(1957)、教授(1958),1932—1939年在中国列宁学校及国立远东大学任教。1944年后在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任教,为该校东方语言学院语文学系汉语文学教研室主任(1949—1959),发表过有关中国古代文学和哲学的论文多篇。专著有《鲁迅》(1957)、《鲁迅的生平与创作》(1959)等。

波利瓦诺夫 Поливанов Е. Д. (1891.2.16—1938.1.25)

出生于斯摩棱斯克职员家庭。1912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1920年起为教授,在列宁格勒大学等校任教,著有《现代汉语语法》(1930)等。

波梅兰采娃 Померанцева Л. Е. (1938.8.12—)

主要研究《淮南子》。出生于莫斯科职员家庭。196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学院。1963—1964年在北京大学实习。1972年获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淮南子〉——公元前2世纪的中国古代文献》。从1965年起在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任教。主要著作有《民歌》(1962)、《淮南王刘安的生平和不同的处世方式》(1970)、《晚期道教论:自然、社会和艺术》(1979)等。

波波娃 Попова И. Ф. (1961.9.28—)

1983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依次获副博士(1988)、博士(2000)学位。博士论文《中国初唐的治国理论》。先后在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工作。现为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所长(2003年起)。著有《中国初唐的政治实践与意识形态》(1999)等。

波尔佳科夫 Портяков В. Я. (1947.10.16—)

出生于诺夫戈罗德市,1970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1978年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1999年以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经济发展道路探索(70年

代末—90 年代上半期)》晋升经济学博士。1992 年起在远东研究所工作,1999—2003 年曾短期调任俄驻华大使馆经贸参赞。近著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制关系改革与多成分经济的发展》、《俄罗斯发展前景预测:2015 年最佳方案》(2001)等。共有论著 150 种。

波斯特列洛娃 Пострелова Т. А. (1931.9.19—)

出生于列宁格勒,1954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1969 年获艺术学副博士学位,现在列宁格勒师范学院任教。著有《10—13 世纪的中国画院》(1976)、《徐悲鸿的创作和 20 世纪的中国艺术》(1987)等。

普里亚多欣 Прядохин М. Г. (1925.11.11—)

出生于阿拉木图,1949 年毕业于军事外国语学院,获副博士(1969)学位。先在东方学研究所任职,后为莫斯科外贸学院、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教员。著有《现代汉语中的隐喻》(1969)、《简明现代汉语隐喻辞典》(2001)和《简明汉语难解词典》(2002),编著有《三年级汉语教材》(1980)等。

拉祖莫夫斯基 Разумовский К. И. (1905.6.14—1942)

主要研究中国艺术。出生于圣彼得堡军官家庭,1931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历史、语文和语言学院中国部语言系。1938 年获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中国肖像画的封建理论》。1940 年为高级研究员。1934—1942 年在美术学院、列宁格勒东方学院任教。1939—1942 年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著作有《中国艺术》(1934),及译作《中国肖像画论》(翻译及注释,1971 年)等。

拉赫马宁(罗满宁) Рахманин О. Б. (1924.10.7—)

1960 年毕业于苏共中央外交部高等外交学校。1945 年起为苏联外交部工作人员,曾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参赞。1963 年起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曾任中央候补委员,1968 年起为苏共中央联络部第一副部长。主要著作有《苏中关系(1945—1970)》(1971)、《中国札记·论中国的文化、传统、习俗》(1982)和《俄中和苏中关系》(第 2 卷,1982)等。

李福清 Рифтин Б. Л.（1932.9.7—　）

科学院院士，生于列宁格勒，1955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1965—1966 年在北京大学进修。1961 年以论文《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1970 年以著作《中国的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三国故事的口头和书面异体）》获博士学位，并任高级研究员（1972），自 1956 年起在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87 年当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2008 年 5 月 29 日晋升院士。有专著《从神话到章回小说》（1979）等四部，发表中国古代神话、俗文学论文汇篇数种，译中国民间故事集数种，译小说集《紫玉》（1980）等。

罗高寿（罗加乔夫）Рогачёв А. П.（1900.2.10—1981.4.22）

生于东哈萨克斯坦，1928 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24—1928 年在中国进修。1951 年以有关汉语成语的论文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1962 年晋升为教授，1928—1934 年在驻华使馆工作；1934—1936 年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39 年在莫斯科东方学院、高等外交学院、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东方语言学院任教。1956 年为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教研室主任。译作有《水浒传》（1955）、《西游记》（1959）、《碾玉观音》（1972）、《吕梁英雄传》（1951）等。

罗高寿 Рогачёв И. А.（1932.3.1—　）

А. П. 罗高寿之子，1955 年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1958 年起长期从事外交工作，曾任外交部副部长（1986—1991），驻华大使（1992—2005），1965 年获副博士学位；主要著作有《论美中关系》（1977）、《美帝国主义对越南的侵略》（1986）等。

罗季昂诺夫 Родионов А. А.（1975.3.31—　）

1997 年毕业于布拉戈维申斯克（伯力）大学，现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任教（2003 年起）。2001 年以《老舍创作里中国人的性格》一文获副博士学位。

罗季昂诺娃 Родионова О. П.（1976.6.2—　）

1998 年毕业于布拉戈维申斯克（伯力）大学，现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

系任教。2003 年以《中国当代作家张贤亮的创作》一文获副博士学位。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ая (Молчанова) Е. И. (1922.3.16—)

出生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农民家庭,1947 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49—1950 年来华进修,1963 年以论文《现代汉语规范语中的副词范畴》获副博士学位,1956 年起在莫斯科大学任教。译作有老舍的《离婚》(1967),戴厚英的《人啊,人!》(1988),蒋子龙、谌容的短篇小说(1989)等。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й Ю. В. (1926.12.10—1999.10.24)

主要研究汉语语法,出生于莫斯科省克林市职员家庭。1952 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55 年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现代汉语中的虚词"的"》。1970 年获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词的类型学》。1967 年获高级研究员职称。1952—1959 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员,1961—1971 年为莫斯科第一外国语师范学院教员,1971 年起为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教员。主要著作有《汉语语法史中词的形态概念·汉学史略》(1958)、《词的类型学》(1969)、《语言学史概论》(1975,合著)等。

鲁宾 Рубин В. А. (1923.9.14—1981.10.18)

历史学副博士。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在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基础图书馆亚非民族分部工作。主要著作有《古代中国的思想和文化》(1970)等。

鲁缅采夫 Румянцев М. К. (1922.11.17—)

主要研究现代汉语。出生于斯摩棱斯克的农民家庭。1951 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54 年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现代汉语中作为主语的句子》。1968 年获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现代汉语的声调和语调》。1960 年获副教授职称,1970 年获教授职称,1954—1955 年任教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1960 年起为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学院教员。主要著作有《现代汉语中作为主语的句子》(1957)、《现代汉语的声调和语调(实验研究)》(1972)等。

萨莫秀克 Самосюк К. Ф.（1938.11.8—　）

1960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入冬宫博物馆东方部工作。1973年以《郭若虚的绘画笔记〈图画见闻志〉（研究与翻译）》获副博士学位，后于1978年出版《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翻译并注释）》一书。

谢曼诺夫 Семанов В. И.（1933.3.3—　）

生于列宁格勒。1955年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毕业，1958年在中国进修。1967年以研究鲁迅文学思想渊源的论文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1958年起为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亚非文学部主任。1969年以研究章回小说演变的论文获博士学位。1978年起在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任教。著有《鲁迅和他的前驱》（1967）、《中国章回小说的演变（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1970）、《慈禧太后生平事略（1835—1908）》（1976）。译作有《老残游记》（1958）、《孽海花》（1960）、《猫城记》（1977）、《芙蓉镇》（1986）等。

谢缅年科（西门诺科）Семененко И. И.（1947.8.4—　）

1970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1973年起在该校亚非学院任教，曾任历史语文组主任（1983—1989），先后赴新加坡（1978—1979）和中国（1986—1987、1991—1992）进修。1975年获副博士学位。著有《稽康——中国三世纪的作家》（1973）、《孔子的箴言》（1989）等。翻译有《论语》（2000）。

谢明 Семин Н. Г.（1936.4.24—　）

出生于普斯科夫州伊德拉茨村，1964年毕业于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大学。1994年获副博士学位。著有《日中关系的进展与问题（1972—1992）》（1994）、《21世纪初日中关系的现状与前景》（2004）等。

谢宁 Сенин Н. Г.（1918.6.2—　）

出生于阿尔切夫斯克工人家庭。1943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1953年获哲学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孙中山的社会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196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中国近代进步的社会政治和哲学思想》，1965年提升为教授；1943—1947年在驻华大使馆工作。

1947—1951 年在外交部工作。1951 年起为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著作有《孙中山是伟大的中国革命民主主义者》(1956)、《19 世纪末中国的进步思想家》(1958)、《近代中国进步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1840—1919)》(1963)等。

谢列布里亚科夫 Серебряков Е. А. (1928.10.6—)

生于列宁格勒。1950 年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毕业。1954 年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中国伟大诗人杜甫的爱国主义与人民性》。1973 年以论文《陆游生平与创作》获博士学位。1950 年后在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任教,担任中国语文教研室主任、系主任。专著有《杜甫评传》(1959)、《陆游生平与创作》(1973)、《中国 10—11 世纪的诗词》(1979)、《曹靖华评传》(1999)。译作有陆游的《入蜀记》(1965)、茅盾的《动摇》(1956)。

谢尔金娜 Серкина А. А. (1915.2.12—)

1968 年以论文《译注中国古文字的尝试(甲骨文和金文)》获副博士学位。1943—1953 年在外交部工作。1950—1952 年在驻中国总领事馆工作。1954 年起为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著作有《译注中国古文字的初步尝试(甲骨文)》(1973)、《中国古代奴隶地位的标志》(1982)等。

谢罗娃 Серова С. А. (1933.1.29—)

出生于莫斯科职员家庭。1957 年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1966 年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传统戏剧(京剧)和中国争取新文化运动的斗争(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中叶)》。1957—1961 年在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工作。1961 年起在东方学研究所工作。主要著作有《京剧(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 40 年代)》(1970)等。

西蒙诺夫斯卡娅 Симоновская Л. В. (1902.3.28—1972.12.6)

出生于哈尔滨职员家庭。1928 年毕业于哈尔科夫大学。1939 年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李自成起义(17 世纪中国农民战争史片断)》。1967 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67 年获教授职称。1936—1944 年为列宁格勒东方学院、远东大学、哈尔科夫大学教员。1944 年起为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学院历史系教员,1956—1972 年任教研室主任,曾任莫斯科

大学党委委员。主要著作有《中国史纲》(1956)、《17 世纪中国农民的反封建斗争》(1966)、《从古代到今天的中国史》(1974)等。

斯卡奇科夫 Скачков П. Е. (1892.2.13—1964.11.8)

东方学家,图书学、历史学和古生物学方面的出版专家。出生于圣彼得堡农民家庭。1912—1914 年在实用东方学院学习。1925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东方语言学院。1935 年获经济学副博士学位,1962 年获高级研究员职称。1925—1928 年在中国工作。1929 年起为列宁格勒东方学院教员。1930—1964 年在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工作。主要著作有《中国书目:关于中国俄文书籍和论文目录(1730—1930)》(1932)、《内蒙古(经济地理概述)》(1933)、《中国书目》(1960)、《俄国汉学史纲要》(1977)等。

斯拉德科夫斯基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1906.11.21—1985.9.24)

主要研究中国和远东国家的经济、苏中和俄中经济关系。出生于叶尼塞省工人家庭。1930 年毕业于远东大学东方系。1952 年获经济学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1958 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61 年获教授职称,1972 年当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1926—1927 年任中国上海闸北区共产主义大学教员,1945 年任苏联驻中国东北苏军司令部顾问,1946—1948 年在中国哈尔滨负责东北解放区经济援助工作,1951—1958 年任苏联对外贸易部外贸学院学员,1951—1954 年任莫斯科东方学院、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员。1961—1965 年为苏联驻中国的商务代表。1957—1961 年在科学院汉学研究所工作,1967 年起为远东研究所所长。主要著作有《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概论》(1953)、《苏中经济关系概述》(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1970)、《1917—1970 年的中国现代史》(1972 年主编)等。

斯米尔诺米 Смирнов И. С. (1948.4.4—　)

1971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曾在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编辑部(1976—1991)东方学研究所(1991—1994)工作,后任俄罗斯人文大学东方文化与古代研究所所长(1994 年起)。以《高启(1336—1374)的生平与创作》获副博士学位(1978)。为《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多部小说翻译诗词部分。

斯莫林 Смолин Г. Я. (1930.12.26—)

出生于沃洛格达工人家庭,1953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留校任教。1960 年和 1971 年先后获历史学副博士和博士学位。1962 年起在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任教,1976 年晋升为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有论王小波、李顺、张余、王仙芝等农民起义的系列文章,著作有《1130—1135 年湖南和湖北的农民起义》(1961)等。

宋采夫 Солнцев В. М. (1928.3.28—2000.4.19)

通讯院士,出生于波果罗茨克职员家庭,1949 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53 年和 1971 年先后获语文学副博士和博士学位,1971 年为教授。1984 年当选通讯院士。1958 年起在东方学所工作,1965 年起任副所长。著有《现代汉语概论》(1957)、《作为系统结构构成的语言》(1971,博士论著)等。

宋采娃 Солнцева Н. В. (1926.2.2—)

主要研究汉语。出生于莫斯科工人家庭,1949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东方学院,1954 年获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现代汉语规范语中的被动语态》。1970 年获高级研究员职称。1949—1951 年在莫斯科东方学院任教。1954 年起为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著作有《汉语中的被动语态(词法问题)》(1962)、《汉语研究》(1967)、《俄苏学者汉语研究书目》(1968)等。

索罗金 Сорокин В. Ф. (1927.10.14—)

生于萨马拉市。1950 年莫斯科东方学院毕业。1958 年以研究鲁迅早期创作的论文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1979 年晋升博士。1950—1957 年任教于莫斯科东方学院、莫斯科大学历史系、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1957—1967 年在科学院东方研究所、1967 年在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文化组从事研究。1962 年升高级研究员。研究鲁迅、茅盾、中国古典戏曲。著有《鲁迅世界观的形成、早期政论与〈呐喊〉》(1958)、《茅盾的创作道路》(1962)、《13—14 世纪的中国古典戏曲:起源·结构·形象·情节》(1978)、《中国文学简编》(1962)、翻译《围城》和王蒙、刘心武等人的短篇小说。

索福隆诺夫 Софронов М. В.（1929.10.11—　）

主要研究西夏语和汉语，出生于列宁格勒职员家庭。1952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1958 年和 1972 年先后获语文学副博士和博士学位。1957 年入东方学所，1970 年调远东所工作。又任莫斯科大学教员。合著有《西夏语音学研究》（1963），专著《西夏语语法》（第 1—2 卷，1968）、《中国语言和中国社会》（1979）等。

索罗金·尤 Сорокин Ю. А.（1936.5.7—　）

语文学副博士。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人员。在第六次"中国社会与国家"学术讨论会上发表论述现代中国散文中的语言特点问题。在第八次会议上作报告，将孔子的言论与生平同 1 世纪末到 2 世纪初著名罗马哲学家埃皮克泰特的言论作了对比。写有许多论翻译的文章，如《翻译过程中民族心理语言因素的作用》（1977）、《言语思维的民族文化观》（1985）、《中国当代小说及其俄文等价物》（1987）等。主编有《民族心理语言学》（1988）等。

斯佩什涅夫（司格林）Спешнев Н. А.（1931.8.13—　）

生于北京。1957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中文专业，留校任教，1974 年升任讲师，现为教授。最初研究中国语言发声学问题，1968 年以题为《中文元音的声学特征》的论文获副博士学位。1970 年开始研究中国曲艺。1987 年获博士学位，专著有《中国俗文学（讲唱体裁）》（1987）。

斯皮林 Спирин В. С.（1929.5.5—2002.5.17）

出生于乌拉尔州贝加尔洛沃职员家庭，1952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留校任教。1970 年获哲学副博士学位，论文为《中国古代哲学的若干方法论问题》。著有《中国古文结构》（1967）、《古汉语词汇的结构》（1976）等，合编有《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写本目录》（第 1 卷，1963）。

斯捷普金娜 Степгина Т. В.（1923.6.26—　）

出生于莫斯科职员家庭。1948 年毕业于莫斯大学历史系。1956 年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公元前 5 世纪至公元前 2 世纪的中国》。

1990 年晋升博士，学位论文为《大汉帝国——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完成阶段》。1951—1952 年在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53 年起为东方学研究所研究员。

斯托罗茹克 Сторожук А. Г.（1970.5.28— ）

1993 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留校任教。以《唐代诗人元稹（779—831）的生平与创作》一文获副博士学位（1997），副教授（2000）。后该文修订成专著出版（2001）。另有《中国中世纪的女性（唐宋两代）》（2002）等论文。

斯图任娜 Стужина Э. П.（1931.5.12—1974.7.15）

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和中世纪史及民族艺术。出生于雅罗斯拉夫尔工人家庭。1954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1962 年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16 世纪下半期至 18 世纪末中国的手工业生产》。1967 年获副教授职称。1957 年起为莫斯科大学东方学院教员。主要著作有《11 至 13 世纪的中国城市：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1979）等。

斯图洛娃（司徒洛娃）Стулова З. С.（1934.8.20—1993.9.23）

1960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61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从 1960 年起专门从事“宝卷”的研究，以《〈普明宝卷〉研究》一文获副博士学位。1961 年起为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研究员。所译《普明宝卷》于 1979 年出版。

苏霍鲁科夫 Сухоруков В. Т.（1929.2.19— ）

生于伊尔库茨克。1955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1968 年以研究闻一多生平与创作的论文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1964 年在中国北京大学进修。自 1961 年起任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研究员。专著有《闻一多生平与创作》（1968）。翻译闻一多诗集《忆菊》，1979 年出版译作《王维诗集》。

思乔夫 Сычёв Л. П.（1911.4.29— ）

毕生致力于中国服饰史研究，与其子 В · Л · 思乔夫（也是汉学家）合著《中国服装》（1975）一书。正编写《 中国明代服饰》和《中国服饰词

典》。已发表《论〈红楼梦〉服饰》论文多篇。

谭傲霜 Тань Аошуан (1931.11.21—　)

出生于上海,1954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66 年起在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任教。以《广东方言的音系》获副博士学位(1972),以《隐性语法问题(以汉语类型学资料为据)》晋升博士(1995)、教授(2000)。北大对外汉语学院荣誉教授。世界汉语教师协会理事。著有《汉语口语教科书》(1983,1988)、《隐性语法问题》(1995)等,与高辟天(卡拉别江次)合著《中国文言教科书》(2001)。

塔斯金 Таскин В. С. (1917.1.20—1995.6.1)

出生于外贝加尔州农民家庭。1936 年毕业于哈尔滨东方学院法律系东方经济部。1968 年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有关匈奴的历史资料(根据中国文献)》。1957—1961 年在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1961 年起为东方学研究所研究人员。著作有《有关匈奴的历史资料(根据中国文献)》(1966)。翻译有司马迁的《史记》(1972)和《契丹国志》(1979)等。

季塔连科(基达连克) Титаренко М. Л. (1934.4.27—　)

科学院院士,出生于布良斯克州克里莫夫区农民家庭,1957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1957—1959 年在北京大学,1959—1961 年在复旦大学学习。1965 年和 1979 年先后获哲学副博士和博士学位。1997 年当选为通讯院士,2003 年为院士。1961—1965 年先后在苏联外交部及驻上海领事馆、驻华使馆任职。1965—1985 年在苏共中央任职,1985 年起任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俄罗斯汉学家协会会长(1988—1998),俄中友好协会理事会主席(1998 年起)。著有《古代中国哲学家墨子,其学派和学说》(1985)、《俄罗斯与东亚——国际关系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1994)、《俄罗斯面向亚洲》(1998)、《中国文明与改革》(1999)、《俄罗斯:以合作谋安全——东亚潮流》(2003)、《远东的地缘政治意义——俄罗斯、中国及亚洲各国》(2008)等。以及合著《中国在现代化与改革的道路上奋进》(1999),主编《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共 6 卷,2006—2010)。

齐赫文斯基(齐赫文) Тихвинский С. Л. (1918.9.1—)

科学院院士,苏联科学院主席团顾问,俄国历史学家全国委员会主席,俄中友好协会荣誉主席,科学院历史学部委员会委员,历史学家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俄中关系、苏中关系及日本近现代史。出生于列宁格勒医师家庭。1935 年先后在列宁格勒大学语文系和文史哲学院语言系学习。1941 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45 年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孙中山的原则:民族主义和他的对外政策》。1953 年获博士学位,论文为《19 世纪末中国的维新运动》。1959 年获教授职称。1968 年当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1981 年晋升院士。1966 年起被授予特命全权大使。1938—1957 及 1967 年起为苏联外交部工作人员。1939—1940 年任驻乌鲁木齐副领事,1946—1949 年任驻北平总领事,1949—1950 任驻华大使馆参赞。1953—1956 年为驻英国大使馆参赞,1956—1957 年为驻日本代办处负责人和大使馆公使衔参赞。1957—1960 年为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远东司司长。1968—1974 年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委会委员。1975 年起为外交部历史外交管理局局长。1969—1970 年为中苏边界谈判苏联代表团团长。1957—1961 年在科学院汉学研究所工作,1959 年起任该所所长。1964 年起为东方学研究所所长。1939 年起转入远东所。主要著作有《孙中山外交政策的观点和实践》(1964)、《孙中山——苏联人民的朋友》(1966),《19 世纪末中国的维新运动》(1950)、《我的一生与中国》(1992)、《周恩来与中国的独立与统一》(2000)、《回到天安门》(2004)、《齐赫文斯基选集》五卷(2006)。翻译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和《在酒楼上》(1957)。

特卡琴科 Ткаченко Г. А. (1947.10.21—2000.8.23)

1970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后留校任教。1974 年先后转入东方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所。以《〈吕氏春秋〉是一部文学典籍》获副博士学位(1982)。译作有《吕氏春秋》(2001)和老舍《猫城记》(1969)等。

托米海 Томихай Т. Х. (1939.1.9—)

1964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任教于远东大学(1964 年起)。以《庾信(6 世纪)的诗歌创作》获副博士学位(1980),后出版专书《庾信》(1988),作为"东方作家与学者丛书"之一。

托罗普采夫 Торопцев С. А.（1940.4.23—　）

1963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东语学院，先后来北京大学（1962—1963）、北京电影学院（1987—1988）进修。现为远东研究所研究员（1967 年起）。依次获副博士（1971）和博士（1992）学位。博士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电影制片事业（1949—1989）》（1991）。著有《中国电影史略》（1979）、《台湾的电影制片事业》（1998）、《太白写照—李白的诗歌与生活》（2002）。翻译《王蒙诗选》（1988）等。

托尔琴诺夫 Торчинов Е. А.（1956.8.22—2003.7.12）

1978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在宗教与无神论历史博物馆任职（1981—1984），后转入彼得堡东方学分所（1984—1994）和彼得堡大学任教（1994 年起）。以《葛洪〈抱朴子〉是一部历史民族学典籍》获副博士学位（1993），曾来北大进修（1990—1991）。以专著《道教、历史宗教考察》一文晋升博士（1993）。著有《大乘佛教哲学》（2002）等，翻译《房中术》（1993）、《修心要论》（1994）、《大乘齐心论》（1997）、《星云大师论经》（1998）、《道德经》（1999）、葛洪撰《抱朴子》（1999）等。

特列捷亚科夫（铁捷克）Третьяков С. М.（1892.6.8—1939.8.9）

作家，1915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1924 年来北京大学教授俄文和俄国文学历时一年有余，写过中国的新闻和通讯、汇编成书《中国》（1927），据帝国主义者在万县码头的暴行写成名剧《怒吼吧，中国！》（1926），又据北大俄文系学生高世华的身世写成小说《邓世华》（1930）。

佳普金娜 Тяпкина Н. И.（1928.8.18—　）

出生于布祖卢克市职员家庭。1950 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54 年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现代汉语的后置词》。1954 年起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著作有《20 世纪初中国的地方管理与村社的社会组织》（1977）等。

乌索夫 Усов В. Н.（1943.1.5—　）

1967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先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1975）、中国人民

大学(1989)进修。1974年获副博士学位,1998年以《中国在60年代末期:探索发展之路(1960—1966)》晋升博士。现为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著有《中国共产党历史》两卷集(1987)、《苏联间谍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2002)、《康生——中国的贝利亚》(2003)、《中国末代皇帝溥仪》(2003)、《旧中国女性秘史(皇宫里的后、妃和嫔)》(2004)、《邓小平和他的时代》(2009)等。

乌斯京 Устин П. М. (1925.6.21—)

1952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留校任教(1952—1954)先后到北京《友好报》(1955—1957)、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工作(1960年起)工作曾两次到新加坡南洋大学进修(1997、1980)。以《蒲松龄的小说》获副博士学位(1966)。发论表蒲松龄的文章多篇。有专著《蒲松龄及其小说》(1981),翻译有《龙眼——中国各民族传说与神话》(与林林合译1959)、陶承《我的一家》(与弗洛尔金合译,1959)、《蒲松龄小说集》(与法因加尔合译,1984)、刘心武《如意》(见小说集《一个人和他的影子》,与林林合译1983)。

费德林(费多连科) Фёдоренко Н. Т. (1912.11.9—2002.10.2)

生于皮亚吉戈尔斯克。1937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语文学博士(1943),高级研究员(1958),科学院通讯院士(1958)。1939—1968年在苏联外交界工作。曾任苏驻华使馆参赞(1950—1952),驻日本大使(1958—1962),常驻联合国及安理会代表(1963—1968)。自1957年起任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研究员。1970年起任《外国文学》杂志主编。著有《当代中国文学概论》(1953)、《中国文学史纲要》(1956)、《中国见闻录》(1958)、《诗经及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1958)、《中国文学研究问题》(1974)、《中国古代文学作品》(1978)、《中国文学遗产与现时代》(1981)。翻译有《中国古典诗歌集(唐代)》(1956)、《中国诗选》(1956)等。

费奥克蒂斯托夫 Феоктистов В. Ф. (1930.8.17—2005.3.5)

1954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72年以论文《荀子的哲学和社会政治观点》获哲学副博士学位。1954—1958年在中国外国专家局任翻译组组长,1965—1968年在马里,1971—1972年在中国从事外交工作,1968年

起为远东所研究人员。著有《荀子的哲学观点和社会政治观点(研究和翻译)》(1976)。译作有杨沫的《青春之歌》(1959)和曹禺的《北京人》(1960)。

费什曼 Фишман О. Л. (1919.6.9—1986.1.17)

她生于敖德萨,1941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语文学系。1946 年以论文《欧洲对李白的学术研究》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1965 年以论文《启蒙时期的中国章回讽刺小说》获博士学位。1946—1949 年在列宁格勒大学任教。1958 年起为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研究员。1962 年升高级研究员。专著有《李白生平与创作》、《中国章回讽刺小说(启蒙时期)》(1966)、《17—18 世纪三位中国短篇小说家:蒲松龄、纪昀、袁枚》(1980)。翻译有《阅微草堂笔记》(1974)、《新齐谐(子不语)》(1997)。合译有《镜花缘》(1959)。

弗卢格 Флуг К. К. (1893.10.2.9—1942.1.15)

研究中国图书版本学。出生于圣彼得堡的职员家庭,1927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1935 年获副博士学位,1942 年为高级研究员,1925—1942 年在亚洲博物馆工作。

哈尔恩斯基 Харнский К. А. (1884.6.11—1938.5.25)

主要研究日本史和中国史。出生于立陶宛卡尔瓦里亚市军人家庭。毕业于武备中学和米哈伊洛夫斯克炮兵学校。1912 年在日本留学。1921—1922 年在中国工作。1923—1943 年在远东大学东方系任教,参加过国内战争。曾在哈巴罗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从事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主要著作有《自古迄今的中国》(1972)。

齐佩罗维奇 Циперович И. Э. (中名齐一得,1918.8.31—2000.1.31)

生于彼得格勒,1941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1969 年以研究"杂纂"的论文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1948—1967 年在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任教。1967 年后任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图书馆员。翻译中国话本,1954 年出版《今古奇观》选译本,1962 年与维尔古斯合作出版全译本。辑选并翻译《杂纂(9—19 世纪中国作家语录)》,1969 年出版。

齐宾娜 Цыбина Е. А.（1928.11.4—1988.10.2）

出生于西伯利亚边疆区职员家庭。1951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东方系。1955 年获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抗日战争时期的郭沫若的剧作》，后获博士学位，1970 年获高级研究员职称，后获教授职称，1956 年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任教。主要著作有《中国语文学问题》（1974）等。

切尔卡斯基 Черкасский Л. Е.（1925.6.2—1998.5.20）

生于基辅省。1961 年毕业于军事外国语学院。1965—1966 年在中国进修。1962 年以论文《曹植的诗》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1971 年以论文《中国的新诗（1920 年代）》获博士学位。著作有《中国战争年代的诗（1937—1949）》（1980）、《艾青——太阳的使者》（1993），翻译有《雨巷》（1969）、《五更天》（1975）、《蜀道难》（1983）三部现代白话诗集。

契尔科 Чирко И. К.（1922—　）

乌克兰汉学家，生于乌克兰契尔尼戈夫区诺索夫卡市的一个农民家庭。1943 年入海参崴东方语言军事翻译专修班学习，苏军进军东北击败日军时他曾来吉林市战俘营工作，1953 年退役，从事编辑工作，1959 年在基辅外语师范学院英语系毕业。1983 年退休，为苏联作家协会会员。翻译大量中国文学作品，以乌克兰文出版，主要涉及鲁迅、夏衍、茅盾、老舍、巴金以及蒲松龄的作品 30 种。

丘古耶夫斯基 Чугуевский Л. И.（1926.8.3—2000.6.23）

生于中东铁路石头河子站。1950 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东方经济系，曾在中国高校任教（1950—1954），后到东方学彼得堡分所工作。著有《敦煌学》（1968），整理出版《中国敦煌文献》（1983）。

沙别利尼科娃 Шабельникова Е. М.（1952.9.9—　）

出生于车里雅宾斯克职员家庭，1974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留校任教。1984—1985 年在北京大学进修。1980 年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汉语语调与分段的理解》。

施奈德 Шнейдр М. Е.（1921.8.23—1981.6.19）

主要研究瞿秋白。出生于哈尔科夫职员家庭，1952 年毕业于军事外国语学院。1963 年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瞿秋白的创作道路（1899—1935）》。1978 年获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俄国古典文学在中国》。1965—1966 年曾来北京大学进修，受业于导师曹靖华教授。1968 年获高级研究员职称。1957—1968 年在科学院汉学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工作。著有《瞿秋白的创作道路（1899—1935）》（1964）、《俄国古典作品在中国》（1977）。编选并译有《瞿秋白文集》（1959）。

施普林钦 Шпринцин А. Г.（1907.2.15—1974.12.7）

出生于圣彼得堡医生家庭。1929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语言系东方专业。1929—1938 年为太平洋委员会研究人员，1958 年起为苏联科学院苏联地理协会东方委员会研究人员。著作有《中国新文字的成人识字教育》（1933）等。

施泰因 Штейн В. М.（1890.10.5—1964.10.9）

出生于尼科拉耶夫市律师家庭。1913 年毕业于圣彼得堡综合技术学院经济系。1915 年毕业于彼得格勒大学法律系。1936 年获博士学位。1945 年起为教授。1926—1927 年任中国国民政府财政部顾问。1917—1947 年在列宁格勒大学任教。1935—1964 年在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任职。著有《〈管子〉研究和译文》（1959）、《古代中国和印度的经济与文化联系（公元前 3 世纪以前）》（1960）等。

什图金 Штукин А. А.（1904.3.10—1963.3.30）

生于彼得堡。1925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1926—1928 年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山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35 年起为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室研究员。1928 年后曾在列宁格勒东方学院任教。翻译有鲁迅的《阿 Q 正传》（1929）、《诗经》全译本的译和注（1957）。

彻尔巴茨基(谢尔巴茨科伊) Щербатской Ф. И. (1866.10.1—1942.3.18)

科学院院士,出生于波兰凯尔策市贵族家庭。1889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1910年和1918年先后成为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和苏俄科学院院士。1901—1930年在圣彼得堡大学任教,1930—1942年在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任职。为佛教研究中俄国学派的代表人物。著有《佛教的中心概念及"达摩"的字义》(1923)、《佛教涅槃的概念》(1927)和《古印度的逻辑》(1902)等。

休茨基 Щуцкий Ю. К. (1897.8.22—1938.2.18)

主要研究汉语和经籍。生于叶卡捷林堡林务员家庭。1921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社会科学系民族语言班。1935年获副博士学位。1937年获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中国的〈易经〉·语文学研究和翻译经验》。1935年起为教授。1922—1937年在列宁格勒大学任教。1936—1937年在国立爱尔米塔什博物馆,1920—1937年在亚洲博物馆——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从事研究。翻译有《7—9世纪中国诗选》(1923)和《易经》(1936)等。

艾德林 Эйдлин Л. З. (1909.12.23—1985.10.28)

生于契尔尼戈夫市。1937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42年以论文《白居易的绝句》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1969年获博士学位。后升教授(1969)和高级研究员(1951)。苏联作家协会会员(1950)。1937—1952年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学院、军事外国语学院任教,担任汉语教研室主任。1944年起为东方学研究所研究员。专著有《论今日中国文学》(1955)、《中国文学简编》(1962)、《陶渊明及其诗歌》(1967)等。发表研究鲁迅及中国文学史问题的论文多篇。翻译白居易、陶渊明等的诗作。1984年出版《艾德林译中国古典诗歌》。

尤里耶夫 Юрьев М. Ф. (1918.4.24—1990.9.7)

出生于比萨拉比亚省职员家庭。1941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1950年获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革命军在1925—1927年革命中的作用》。1967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1969年起为教授。1950年起为莫斯科大学教员,1957—1961年为

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学院历史、语文系主任，1963 年起为东方语言学院（1972 年改为亚非学院）副院长。主要著作有《1925—1927 的中国革命》（1951）、《中国红军》（1958）、《从古到今的中国史》（1974）等。

杨兴顺 Ян Хин－шун（1904.12.14—1989.10.16）

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史。出生于浙江宁波，1933 年毕业于社会科学教师共产主义大学。1948 年获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道德经〉的哲学学说》。1968 年获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古代中国的唯物主义思想》。1951 年获高级研究员职称。1933—1939 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国列宁学校任教员。1939—1940 年在国际革命援助中央委员会任教员。1914—1946 年在广播委员会工作。1948 年起为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片断》（1956）、《中国近代进步思想家作品选（1840—1896）》（1961）、《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思想》（1981）等。

杨申娜 Янщина Э. М.（1924.9.30—　）

生于萨拉托夫。1947 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65 年以题为《古代中国的神话》的论文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1952—1960 年在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学院历史系任教。1962 年起任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员。发表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的论文多篇。完成《山海经》俄译本的翻译和注释工作，1977 年出版。

雅罗斯拉夫采夫 Ярославцев Г. Б.（1930.10.1—　）

1954 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人文学出版社担任编辑，记者协会会员（1958 年起）。主要译作有《叶圣陶短篇小说》（1955）、《中国诗选》（1957—1958，第 1—4 卷中楚辞、王昌龄、皮日休、王安石、闻一多的诗选）、《闻一多诗选》（1960）、《红豆》诗集（1972）、《印中朝越日古典诗选》（1977，其中若干首诗）等。

雅洪托夫 Яхонтов С. Е.（1926.12.13—　）

主要研究古汉语。出生于列宁格勒职员家庭。1950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1962—1963 年在北京大学进修。1954 年获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汉语的动词范畴》。后获博士学位，1956 年起为列宁格勒大

学东方系副教授。著有《古汉语》(1956)、《汉语的动词范畴》(1957)、《汉语史论集》(1986)等。

附记:

本书俄国汉学家简介资料来源:《苏联大百科全书》、《苏联百科辞典》、苏联《简明文学百科全书》、密丽班德《俄国东方学家辞典》、李福清《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小说、戏曲)》、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5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俄苏中国学手册》、李明滨《中国文学在俄苏》和《俄罗斯汉学史》。有一部分是作者亲自采访来的。

参考书目

(一)俄文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Пб. , 1880.

Скачков П. Е.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Китая》, М. ,1932, 1960.

Голыгина К. И. и Лисевич И. С. Soviet Sinology in the past Fist years. М. 1968.

Лисевич И. С. Великий Октябрь и развит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 1968.

Скачков П. 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 1977.

Милибанд С. Д. Био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востоковедов. М. 1977 и 1995.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Д. Н. Перевод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М. 1981.

Алексеев В. М. Кит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 , 1978.

Глаголева И. К. Китайская 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уазатель. М. 1986.

Федоренко Н. Т.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Т. 1 - 2, М. ,1987.

Тихвенский С. Л. И не распалась связь времени, М. ,1993.

Титаренко М. Л. Китай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Эе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 1997.

Голыгина К. Н. ,Сорокин В. Ф. Изуче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России. М. ,2004.

Титаренко М. Л. Духов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в 6 - ти томах. М. 2006.

Литератураведение

Аджимамудова В. С. Тянь Хань: портрет на фоне эпохи.

М. ,Ь 1993.

Алексеев В. М. Китайская поэма о поэте. Стансы Сыкун Ту (837 – 908). Пер.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1916 г.

Алексеев В. М.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картина. Духовная жизнь старого Китая в народных изображениях, М. изд. 《Наука》, 1966 г.

Алексеев В. М . Кит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М. изд. 《Наука》, 1978 г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Пб. , 1880.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Д. Н. Литературйый мир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го Китая. Китайская 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проза на байхуа: Собрание трудов. М. ,2006.

Глаголева И. К. Китайская 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указатель русских переводов и кр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М. ,1989.

Голыгина К. И. 《Великий предел》: Китайская модель мира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культуре(I – XIIвв.). М. ,1995.

Голыгина К. И. Теория изящной словесности в Китае XIX—иачала XX в. М. ,1971.

Голыгина К. Н. ,Сорокин В. Ф. Изуче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России. М. ,2004.

Дагданов Г. Б. Чань – буддизм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Ван Вэя. Новосибирск,1984.

Дагданов Г. Б. Мэн Хаожань в культуре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го Китая. М. , 1991.

Желоховцев А. Н. Хуабэнь – городская повесть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го Китая:Некоторые проблемы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и жанра. М. ,1969.

Конрад Н. И. Запад и Восток:Статьи. 1966.

Конрад Н. И.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Синология. М . ,1977.

Кравцова М . Е. История культуры Китая:Учеб . пособие . СПб . , 1988; 2003.

Лебедева Н. А. Сяо Хун: жизнь, творчество, судьб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98.

Лисевич И. С. Древняя китайская поэзия и народная песня. (Юэфу

конца Ⅲ в. до н. э. – начала Ⅲ в. н. э.). М. ,1969.

Лисевич И. С.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мысль Китая на рубеже древности и средних веков. М. , 1979.

Литература Востока в средние века: Ч. 1/Под ред. Н. И. Конрада и др. М. ,1970. [Из содерж. : Позднеева Л. Д. Кит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 23 – 236.]

Литература древнего Востока/Сост. Л. Е. Померанцева. М. , 1962. [Нз содерж. : Позднеева Л. Д. 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 307 – 438.]

Лу Синь. 1881 – 1936: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и переводов, посвященный памяти великого писател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я/Отв. ред. Х. И. Муратов. М. ,1938.

Малиновская Т. А.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драмы в жанре цзацзюй(XIV—XVIIвв.) СПб. ,1996.

Малявин В. В. Жуань Цзи. М. ,1978;

Маркова С. Н. Китайская поэзия в период национально –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й войны, 1932 – 1945. М. , 1958.

Матков Н. Ф. Инь Фу—певец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 ,1962.

Меньшиков Л. Н. Реформа китайской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драмы. М. ,1959.

Никольская Л. А. Тянь Хань и драматургия Китая XX века. М. ,1980.

Петров В. В. Ай Цин. М. , 1951.

Петров В. В. Лу Синь: Очерк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М. , 1969.

Позбнеева Л. Д. Лу Синь: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1881 – 1936). М. , 1959.

Рифтин Б. Л. Сказание о Великой стене и проблема жанра в китайском фольклоре. М. ,1961.

Рифтин Б. Л.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эпопея и фольклорная традиция в Китае. (Устные и книжные версии Троецарствия). М. ,1970.

Рифтин Б. Л. От мифа к роману. Эволюция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персонажа в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М. ,1979.

Рогачев А. П. У Чэнъэнь и его роман《Путешествие на Запад》: Очерк. М. ,1984.

Семанов В. Н. Лу Синь и его предшественники. М. 1967.

Семанов В. Н. Эволюц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романа, конец XVIII – начало XX в. М. , 1970.

Серебряков Е. А. Ду Фу: Критико –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М. ,1958.

Серебряков Е. А. Китайская поэзия X – X1 веков (жанры ши и цы). Л. ,1979.

Сорокин В. Ф. Китайская 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драма XIII – XIV вв. : Генезис. Структура. Образы. Сюжеты. М. , 1979.

Сорокин В. Ф. Творческий путь Мао Дуня. М. , 1962.

Сорокин В. Ф. Эйдлин Л. З. Кит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М. , 1962.

СпешневН. А. Китайская простонарод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Песенно – повествовательные жанры. М. , 1986.

Сторожук: А. Г. Юань Чжэнь: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поэта эпохи Тан. СПб. , 2001.

Сухоруков В. Т. Вэнь И – до: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М. , 1968.

Томихай Т. Х. Юй Синь. М. , 1988.

Торопцев С. А. Книга о Великой Белизне. Ли Бо: поэзия и жизнь. М. , 2002.

Федоренко Н. Т.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В 2 т. М. , 1987.

Фишман О. Л. Три китайских новеллиста XVII – XVIII вв. : Пу Сунлин, Цзи Юнь, Юань Мэй. М. , 1980.

Черкасский Л. Е. Ай – Цин – подданный Солнца: Книга о поэте. М. ,1993.

Черкасский Л. Е. Китайская позия военных лет, 1937 – 1949. М. ,1980.

Черкасский Л. Е. Маяковский в Китае. М. , 1976.

Черкасский Л. Е. Новая китайская поэзия (20 – 30 – е годы). М. ,1972.

Черкасский Л. Е. Поэзия Цао Чжи. М. ,1963.

Шнейдер М. Е. Русская классика в Китае. М. , 1977.

Шнейдер М. Е. Творческий путь Цюй Цю - бо. М. , 1964.

Переводы

Ай Цин. Слово солнца: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Предисл. Л. Черкасского. М. , 1989.

Антолог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поэзии: В 4 т. / Под общ. ред. и с предисл. Го Мо - жо, Н. Т. Федоренко. М. , 1957 - 1958.

Ба Цзинь. Избранное/ Сост. В. Сорокина. М. , 1991.

Бо Синьзянь. Да лэ фу: Ода Великой радости соития Неба и Земли, тени и света/ Пер. О. М. Городецкой. М. , 2003.

Ван Вэй. Река Ванчуань/ Сост. ,Р. В. Грищенкова;СПб. , 2001.

Ван Мэн. Избранное/ Сост. С. А. Торопцева;М. , 1988.

Го Можо. Сочинения: Сост. Н. Федоренко. М. , 1990.

Гу Хуа. В долине лотосов: Роман/ Пер. Е.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ой - Молчановой М. , 1986.

Дай Хоучн. О,человек, человек!: Роман/ Пер. Е.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ой - Молчановой;М. , 1988.

Ду Пэн - чэн. Битва за Яньань: Роман/ Пер. А. Гатова, В. Кривцова; М. ,1957.

Ду Фу. Сто печалей/ Сост. , Р. В. Грищенкова. СПб. , 1999, 2000.

Дэн То. Вечерние беседы в Яньшани: Сост. А. Н. Желоховцев. М. , 1974.

Жоу Ши. Февраль. Мать - рабыня: Повесть и рассказ/ Пер. Н. Маткова, Л. Урицкой. М. , 1958.

Заново составленное пинхуа по истории Пяти династий : (Синь бянь У - Дай ши пинхуа)/ Пер. Л. К. Павловской. М. , 1984.

Из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рики VIII - XIV веков: Ван Вэй, Су Ши, Гуан Хань - цин, Гао ци/ Сост. , Н. Смирнова. М. , 1979.

Из книг мудрецов: Проза древнго Китая/ Сост. ,И. С. Лисевича. М. , 1987.

Китайская поэзия в переводах Льва Меньшикова/ Отв. ред. И. А. Алимов. СПб. , 2007.

Китайская эротическая проза/ Сост. , пер. Д. Н. Воскресенского. СПб. , 2004.

Китайские пинхуа/ Сост. Т. И. Виноградова;СПб. , 2003.

Китайский эрос: Научно –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сборник/ Сост. А. Н. Кобзев. М. ,1993.

Лао Шэ.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Сост. Е.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ая – Молчанова; М. ,1991.

Ли Бо, Ду Фу. Избранная лирика/ Пер. А. Ахматовой и др. , М. , 1987.

Ли Жу – чжэнь. Цветы в зеркале/ Пер. В. А. Вельгуса и И. Э. Циперович. М. – Л. , 1959; 2 – е изд. , испр. М. , 1998.

Ли Юй. Двенадцать башен: Повести/ Сост. , пер. Д. Воскресенского. М. , 1999.

Ли Юй. Полуночник Вэй – ян, или Подстилка из плоти: Роман / Сост. ,пер. Д. Воскресенского. Пер. стихов Г. Ярославцева. М. ,2000.

Ло Гуань – чжун. Троецарствие: Роман: В 2 т. / Пер. В. А. Панасюка; М. ,1954.

Лу Синь.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4 – х томах. М. ,1954 – 1956.

Лу Синь. Избранное/ Вступ. ст. Л. Эйдлина; Коммент. В. Петрова. М. , 1989.

Люди и оборотни: Рассказы китай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Сост. А. Н. Желоховцева, В. Ф. Сорокина. М. , 1982.

Лян Бинь. Три поколения: Роман/ Пре. Н. Пахомова, Н. Яновского. М. , 1960.

Мао Дунь. Сочинения: В 3 – т. / Сост. ,Н. Федоренко. М. , 1956.

Нефритовая Гуаньинь: Новеллы и повести эпохи Сун (X—XIII вв.)/ Пер. А. Рогачева; Предисл. и коммент. А. Желоховцева. М. , 1972.

Память: Сборник рассказов / Сост. , В. Ф. Сорокина. М. , 1985.

Поэзия эпохи Тан, VII—X вв. / Сост. Л. З. Эйдлина. М. , 1987.

Простонародные рассказы, изданные в столице (Цзин бэнь тунсу сяошо)/пер. И. Т. Зограф; Стихи в пер.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а. СПб., 1995.

Пу Сун – лин. Странные истории из Кабинета Неудачника (Ляо Чжай чжи и)/ Пер., В. М. Алексеева; Сост., М. В. Баньковской. СПб., 2000.

Синь Цицзи.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Пер. М. Басманова. М., 1985.

Средний возраст: Сост. Б. Рифтина. М., 1985.

Три танских поэта: Ли Бо, Ван Вэй, Ду Фу: Триста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й / Сост. Г. О. Монзелера; Пре. А. И. Гитовича; М., 1960.

Трудны сычуаньские тропы: Из китайской поэзии50 – х и 80 – х гг./ Пер. Л. Черкасского;М., 1983, 1987.

Тянь Хань. Гуань Хань – цин:[Пьеса]/ Пер. О. Фишман; Стихи в пер. А. Левинтона; Предисл. Л. Никольской. М., 1959.

У Цзин – цзы. Неофи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конфуцианцев: Роман / Пер. Д. Н. Воскресенского. М., 1959, 1999.

Удвительные истории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и древности: В 2 т. / Пер. В. А. Вельгуса, И. Э. Ципепрович. М., 1962; М., 1988.

Фын Дэ – ин. Жасмин: Роман/ Пре. В. Панасюка;М., 1961.

Хань Юй, Лю Цзун – юань. Избранное/ Пер. И. Соколовой. М., 1979.

Цай Цзюнь. Заклятие:[Роман ужасов]/ Пер. А. Н. Желоховцева. М., 2006.

Цао Сюэ – цин. Сон в красном тереме: Роман: В 2 т./ Пер. В. А. Панасюка;Л. Н. Меньшикова. М., 1958;М., 1995.

Цао Чжи. Семь печалелей: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Пер. с кит., вступ. ст. и примеч. Л. Черкасского. М., 1973.

Царь – дерево: / Сост. А. Желоховцева. М., 1989.

Цветет мэйхуа: 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поэаия Китая в жанре цы/ Пер. М., Басманова. М., 1979.

Цветы сливы в золотой вазе, или Цзинь, Пин, Мэй: Роман: В 2 т. /Пер. В. Манухина; Стихи в пер. Г. Ярославцева. М., 1977, 1986,

1993,1998, 2007;В 4 т. / Сост. А. Н. Кобзева и О. М. Городецкой; Пер. В. С. Манухина,Иркутск,1994.

Цзацзуань: Изречения китай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IX – XIX вв. / Сост. В. А. Вельгус; М., 1969.

Цзи Юнь. Заметки из хижины《Великое в малом》(Юэвэй цаотан бицзи)/Перй. О. Л. Фишман. СПб., 1974, 2003.

Цзэн Пу. Цветы в море зла: Роман/ Пер. В. Семанова; Стихи в пер. И. Голубева. М., 1990.

Цюй Юань. Лисао: Сборник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й / Пер. А. И. Гитовича и др.;СПб., 2000.

Цянь Чжуншу. Осажденная крепость: Роман. Рассказы; Ян Цзян. Шесть рассказов о《школе кадров》/ Пер. В. Сорокина. М.,1989.

Человек и его тень: Сборник повестй / Сост. А. Желоховцева. М., 1983.

Чжан Цзе. Тяжелые крылья: Роман/ Пер. В. Семанова. М., 1989.

Ши Юu – кунь. Трое храбрых, пятеро справедливых: Роман/ Пер. В. Панасюка; М., 1974, 2000.

Ши Най – ань. Речные заводи: Роман: В 2 т. / Пер. А. Рогачева. М., 1955;2 – е изд. 1959; Рига, 1992.

Шихуа о том, как Трипитака Великой Тан добыл священные книги (Да Тан Сань – цзан цюй цзин шихуа) / Пер. Л. К. Павловской. М., 1987.

Шицзин: Избранные песни/ Пер. А. А. Штукина; М.: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7. 299 с.;М.: Худож. лит., 1987. 350 с.

Эми Сяо (Сяо Сань). Избранное: [Стихи]/ Ред. И. Франкель. М., 1954.

Юань Мэй. Новые записи Ци Се, или О чем не говорил Конфуций:[Рассказы]/ Пер. О. Л. Фишман. СПб., 2003.

Юаньская драма/ Сост. В. Петрова; Ред. и примеч. Л. Меньшикова. М., 1966.

Юэфу: Из древних китайских песен/пер. Б. Б. Вахтина. М. –

Л., 1959.

Яшмовые ступени: Из китайской поэзии энохи Мин, XIV - XVII вв. / Пер. И. Смирнова; М., 1989.

(二)中文

戈宝权《谈中俄文字之交》(周一良编《中外文学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 年。

戈宝权《中外文学因缘》,北京出版社,1992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中心《俄苏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

李福清著、田大畏译《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小说、戏曲)》,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年。

李福清著、马昌仪编《中国神话故事论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 年。

李明滨《中国文学在俄苏》,花城出版社,1990 年。

李明滨《中国与俄苏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概览(1944 - 1991)》,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 年。

周发祥、李岫主编《中外文学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年。

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第 1 - 10 集,中华书局,1996 年。

任继愈、张西平主编《国际汉学》丛刊第 5 - 17 辑,大象出版社,2001 年。

后　记

本书的前身是《中国文学在俄苏》(花城出版社,1990年)。笔者曾准备了十年写成该书;又经过这20年的资料积累,如今才完成本书。不但更新了内容,而且加大一倍篇幅,书名也相应改为《中国文学俄罗斯传播史》。

笔者主要的专业方向本来是俄罗斯语言文学,由于所教课程"俄罗斯文学史",不仅在俄文系,而且在中文系都须要开设,这自然促使我在长期兼教两系的过程中,经常关注中俄两国文学交流的问题;加以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比较文学热潮的影响,更促使我去搜集相关的史料。没想到30多年的实践,居然逐渐增加了一个新的专业方向,即中俄比较文学研究,或俄罗斯汉学研究。

文学交流是双向的,但其中要了解"中流外"的情况,却有相当的难度,须得到对方国家去考察,要具备适当的条件。在这个方面笔者曾做过相当的努力。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学术考察,我前后造访俄苏不下十次,既是搜集俄苏文学发展现况和研究资料的需要,也是为要了解中国文学传播俄罗斯的历程。

反过来,北京国际来往频繁,也是交流资讯的途径。俄苏学界来华人士,无论是专访、顺访,或者参加会议路过,只要对方告知,我都认真接待。俄苏汉学家是我们北大俄罗斯学研究所的常客。

如此有来有往,几十年下来我见过的人真不少。本书重点写到的人,凡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当代学者,可以说我大部分都见过。或曾在一起开会讨论,或诚挚访谈,或互赠图书,总是留下很好的记忆,对于我的写作,真有莫大的益处。其中,我要提到三位予我助益最大的友人,都是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苏联来北大留学的老同学。

一位是李福清院士。同他接近起源于我的老同学刘锡诚、马昌仪。他

们三人早在青年时代就有来往，后来刘、马这对夫妇都成了民间文学的名家，对于李福清的研究成果更具评价能力。我对李氏的评论，时常参考刘、马二位的意见。以后来往多了，四个人之间也都成了老友。李福清研究领域广，学术方法自成一家，其影响大，自不待言。他感人之处还在于助人为乐的精神。汉学家来华次数最多者，在80年代当推他。当着两国交往尚处不太通畅的年代，他无疑是最有效的沟通渠道，总是双向传递着各方所需要的图书、资料。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源源不断的新资讯。每次见面谈话，他总能讲起汉学家们的新成果、新开拓；而且对于其本国同行们的成就，总是津津乐道，如数家珍。晤谈之后你会更受其学术眼光和学者胸怀所感动。正是他引起我从宏观上来考察俄国汉学的想法。既考察历史，也综述现状，旨在借鉴俄苏的学术方法。

另一位是谢曼诺夫教授。正是他帮助我了解俄国汉学界的堂奥。20世纪50年代他来北大进修时曾受业于先师王瑶教授，80年代初又作为杰出的鲁研学人被王先生邀请来参加鲁迅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王先生曾对我赞扬谢的专著《鲁迅和他的前驱》“讲了中国人不曾说过的话”。我同谢从那时起来往就更多了。后来，1987年丁石孙校长率北大代表团赴莫斯科大学访问，谈判合作事宜。我和谢恰巧又成为各自学校代表团的成员，谢始终陪同我们遍访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远至波罗的海边的塔林，以及内地的喀山，引领我认识各地的俄苏文学专家和汉学家，考察喀山大学的汉学古籍珍藏。此后我们两人更是充当北大和莫大沟通学术信息的桥梁。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俩都专注于对方国家当代文学，包括教学与研究须要互通新信息。记得有一次看了我们编辑的“苏联当代文学概观”系列丛书之后，他兴奋地对我的学生戏言：“现在情况倒过来了。要了解苏联当代文学，你们应当去问李老师；相反，要了解中国当代文学，你们倒应当来问我”。谢和我的来往，已经不计其数，彼此到了“登堂入室”的地步。这不仅指互访都能到过对方家中做客，而且指交谈可以深入到学界学术思想和观点的演变进程。他向我披露了汉学家们学术研究的艰辛，包括两国学人因政治形势影响而未能来往那些年间的思想苦恼和心情变化，应该说，我在写俄罗斯汉学史时敢于涉足20世纪那些大变动的年代，在许多方面正是得益于他，或者再加上他的同事卡拉别江茨教授的口述情况和对历史的判断。他们让我知其然和所以然。可惜，谢氏由于太敬业，大部头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一部接一部地翻译出版。1999年当我们最后

一次见面时，见他写字手指头颤抖，我非常心疼，劝他别太劳累，告诉他前辈戈宝权老师正经受着帕金森氏病的折磨呢。他无奈地说“我可能就是那种病啊”。此后他去治病，我们互访的机会已经绝少，只能托出差的人带点讯息。谢曼诺夫至今让我放心不下。

再一位是季塔连科院士。他曾来北大进修，师从冯友兰教授治学。1958年，当学生们要随冯师下乡大半年与农民“三同”时，准许外国留学生自愿参加，其中只有季一人背着行李大清早赶到集合地点，准备同乘火车去远地的黄村。季氏断然地说，学中国哲学史不了解农民不行。此情已传为佳话。他感人之处在于身上的“大气”，眼界高远。其中或许是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历代文人武士均怀有“建功立业”之志，季氏自从80年代中期接掌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以后，果然是把俄国汉学当作一番事业来做。为了展示俄国汉学的历史与现状，他给中国同行的了解提供许多方便。对于我，则数次邀请去参加他们的中国社会与文化问题学术讨论会。有一年专门邀请我去调研俄国汉学，让我住到郊外的“Узкое”别墅宾馆，并配备一名年轻的汉学者引路遍访名家，那次一个月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的访问收获，抵得上多少次短暂的顺访。季氏对俄罗斯汉学事业的推动，更能使人理解俄国汉学“综合型”或“百科全书”的传统，他主持编纂的六卷大型《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便是“百科全书”传统的印证。他的精神也使人备受感染。

让我受益的人还有多位，或指点资料的处所，或说出一般的交往所听不到和见不着的信息，那些友人让我不能忘怀。举如东方学所的李谢维奇、戈雷金娜、阿直马穆多娃，远东所的伊帕托娃、热洛霍夫采夫、佩列洛莫夫、索罗金，莫大的华克生、谢缅年科、谭傲霜、卡拉别江茨，列宁格勒东方学分所的孟列夫、齐一得、科洛利，列大的司格林、斯莫林，冬宫博物院的伊沃奇金娜，基辅大学的契尔科等教授、博士，确是不胜枚举。

有的汉学界前辈则以其治学精神感人。先师曹靖华教授的得意门生和好友齐赫文院士和艾德林博士使我亲眼见到“著作等身”的壮观。而被曹先生夸赞为“业余的”汉学家费德林通讯院士，一生主业在外交工作，官至外交部副部长，但公余时间仍勤勉著译，当1993年夏天他将随年轻的夫人举家迁居保加利亚的时候，我恰巧在莫斯科，急忙赶去送别，只见他住屋内所有书籍已打包拟捐赠科学院，唯有专门摆放他个人的著作和译作的一个书架未动，准备随身带往保加利亚，我仔细数了一数，共有35种，怎不令

人惊叹。这还只是“公余”的工作呢!

是故,为了诔谢,也为了记录俄罗斯汉学家们之业绩,十几年前我就开始筹划编立一套俄罗斯汉学文库,包括文集、评论和资料三类。其中文集部分拟编入汉学家的论文精选,选入杰出院士、通讯院士、教授和研究员16人,以人为卷,每人一卷。这将随经费筹措的程度而分期出版。我想,一套文库将会比我们简单的一本综述史科书要具体、生动和壮观得多!

最后,我还要感谢一位勤勉的学者阎纯德教授,也是北大的老同学。他的学术眼力令人感佩。自从1996年在他主编的《中国文化研究》(秋、冬及翌年春之卷连续三期)刊载拙作《中国文化传播俄罗斯三百年》之后,他就一直关注我对俄国汉学的评介,每期都催要一篇稿。几年前又来约书稿,我原以为多年来已经各方面都写过,由文学,到文化,到汉学全貌,逐步扩大范围了,担心再写将要重复自己。阎教授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尚须一本传播史,广为收纳,梳理系统化,不然可惜我有那么多资料,零散且不易寻索。书名正是他想出来的,所以本书也是他促成的。

李明滨

于北大承泽园

2010.3.20

列国汉学史书系
Sinological History Series

中国文学俄罗斯传播史

印章篆刻：郑怀宝
责任编辑：杨　雷
封面设计：徐道会

ISBN 978-7-5077-3726-4

9 787507 737264 >

定价：45.0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国文学俄罗斯传播史
作者=阎纯德著
丛书名=列国汉学史书系
页数=343
SS号=12824934
出版日期=2011.05
出版社=北京：学苑出版社
ISBN号=978-7-5077-3726-4
中图法分类号=I512.09;I209
原书定价=45.00
主题词=文学-文化交流-文化史-中国、俄罗斯
参考文献格式=阎纯德著.中国文学俄罗斯传播史.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05
.
内容提要=本书作为“列国汉学史书系”之一，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是综述18世纪至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情况；下篇分时代具体总结和论述各时期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内容翔实，有很多宝贵的俄文资料，都是作者在俄罗斯留学以及讲学期间辑录下来和考证过的。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前言
上篇
第一章18—19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
一、俄国引进中国文学的开端
二、从西欧文字转译的中国文学作品
三、早期直接译自汉、满文的文学作品
四、普希金所体现的中国文学在俄国早期的影响
第二章19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
一、汉学中心形成与中国文学研究
二、瓦西里耶夫院士撰世界首部中国文学史
三、托尔斯泰对中国文学的接受
四、诸子散文俄译的开始
第三章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
一、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全面开拓
二、俄国汉学学派的形成
三、中国文学译介在50年代趋向繁荣
四、宣传介绍中国文学概况
第四章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
一、60—70年代起文学译介的扩大与深化
二、莫斯科大学编出中国文学史教材
三、20世纪末翻译和研究成果的归结
四、李福清院士在中国文学研究上的贡献
下篇
第五章　中国神话、民间文学和俗文学在俄罗斯
一、俄罗斯的中国神话研究综述
二、俄国人撰写的第一部论中国神话的专著
三、李福清关于中国神话的论著
四、戈雷金娜论中国古代神话志怪小说的专著
五、李福清论民间文学孟姜女和三国故事
六、斯佩什涅夫的《中国俗文学》
第六章　先秦文学在俄罗斯
一、古代诗歌传俄综述

二、《诗经》的俄译和费德林的《〈诗经〉及其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
三、楚辞的翻译和研究
四、先秦诸子散文的译研
五、李谢维奇编选《圣贤书摘·中国古代散文》
第七章　秦汉文学在俄罗斯
一、两汉乐府、汉赋和秦汉散文的翻译
二、古代散文研究综述
三、李谢维奇关于乐府和古代文论的两部专著
四、克罗尔论《史记》的专著《历史学家司马迁》
五、《中国古代文学》论文集
第八章　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文学在俄罗斯
一、建安文学的译研
二、艾德林著《陶渊明和他的诗》
三、戈雷金娜的专著《六朝小说》
四、文论、散文译介和《文心雕龙》的诠释
第九章　隋唐五代文学在俄罗斯
一、唐诗俄译和研究综述
二、费什曼著《李白的生平与创作》
三、杜诗评介和谢列布里亚科夫的《杜甫评传》
四、杜甫研究专题综述
五、达格丹诺夫著《王维创作中的禅佛思想》
六、阿列克谢耶夫论司空图《诗品》的巨著
七、戈雷金娜论唐代传奇的《中国中世纪的短篇小说：8至14世纪题材渊源及其演化》
八、杂纂和敦煌文学在俄罗斯
第十章　宋代文学在俄罗斯
一、宋代文学俄译概述
二、谢列布里亚科夫论宋代诗人的专著《陆游·生平与创作》
三、谢列布里亚科夫论宋词的专著《中国10至11世纪的诗歌诗和词》
四、热洛霍夫采夫论话本的专著《话本——中国中世纪的市民小说》
五、巴甫洛夫斯卡娅论平话与诗话
六、佐格拉芙的新译《京本通俗小说》
第十一章　元代文学在俄罗斯
一、元曲在俄苏的翻译和研究

二、索罗金论元代戏曲的专著《十三四世纪中国古典戏曲：《起源·结构·形象·情节》

三、孟列夫翻译《西厢记》和彼得罗夫编选《元曲》

四、马里诺夫斯卡娅关于明清杂剧的新著《中国古典戏剧杂剧简史（14—17世纪）》

五、元明清诗的俄译与论述

第十二章　明代文学在俄罗斯

一、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和研究综述

二、罗高寿的论著《吴承恩及其〈西游记〉》

三、李福清的专著《中国的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论〈三国〉故事的口头和书面异体》

四、《金瓶梅》与古代艳情文学译介

五、戈雷金娜论明代传奇的《中国中世纪短篇小说》

六、明代戏曲研究概况

第十三章　清代文学在俄罗斯

一、清代章回小说研究综述

二、费什曼的专著《启蒙时期的中国讽刺章回小说》

三、谢曼诺夫的专著《中国章回小说的演变（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

四、《水浒传》、《红楼梦》、《镜花缘》、《儒林外史》、《三宝太监》、《普明宝卷》诸种明清小说译介简述

五、费什曼论清代笔记小说的专著《17至18世纪的三位中国短篇小说作家：蒲松龄、纪昀、袁枚》

六、俄国蒲松龄研究巡礼

七、清代戏曲的译研

八、戈雷金娜的《中国美文学理论》

第十四章　中国现代文学在俄罗斯（一）——苏联的鲁迅学和谢曼诺夫的鲁迅论

一、鲁迅著作在苏联的传播

二、苏联对鲁迅的研究

三、波兹涅耶娃、索罗金、彼得罗夫和谢曼诺夫的四本鲁研专著

四、谢曼诺夫的《鲁迅和他的前驱》

第十五章　中国现代文学在俄罗斯（二）

一、翻译作品综述

二、切尔卡斯基论现代诗歌的三本论著：《中国新诗》、《中国战争年代的诗》和《艾青——太阳的使者》

三、彼得罗夫著《艾青评传》

四、苏霍鲁科夫的专著《闻一多生平与诗歌创作》
五、阿直马穆多娃著《郁达夫与“创造社”》
六、索罗金著《矛盾的创作道路》
七、施奈德著《瞿秋白的创作道路》
八、两部评老舍的专著——安季波夫斯基《老舍的早期创作》和博洛京娜《老舍战争年代的创作》
九、尼科里斯卡娅著《曹禺创作概论》
十、其他几位作家的专论
十一、中国现代文学在俄苏时代的乌克兰
第十六章　中国当代文学在俄罗斯
一、小说、诗歌翻译作品数量剧增
二、汉学家的评论
三、作家的看法
四、当代文学跨世纪的俄译
附录　俄罗斯汉学家简介
参考书目
后记
封底